

WAR HISTORY STUDIES

战争史研究（二）

主编 阎京生
副主编 刘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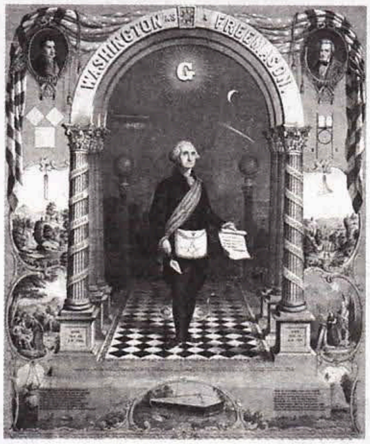
第39册

拒绝任何形式的商业用途与QQ群外传播仅作个人收藏由战研群友情扫描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VISI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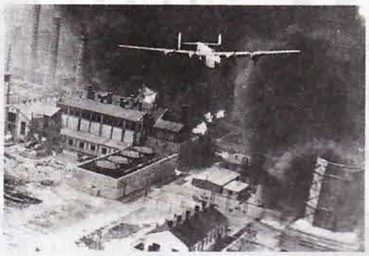
LANZAROTE Caliente.com



山巅之城

02-45

地图中的美国史（二）



幸福的达契亚

46-99

近世的罗马尼亚与战争（中）



出没风波里

100-120

日本海军水雷战队旗舰（三）

拒绝任何形式的商业用途与QQ群外传播 个人收藏由战研群友情扫描

邮购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增光路45号

《战争史研究》发行部　联系人：杨洁

发行部电话：010-88561472

邮购部电话：010-88560080

邮政编码：100048

编辑部信箱：war.history.studies@gmail.com

（邮购、购买过刊等事务请垂询发行部）

如有错页、漏订、脱页等现象，请与本刊发行部联系调换

合作论坛：超级大本营

http://lt.cjdby.net/forum-118-1.html

山巅之城

——地图中的美国史（二）



一个国家的艰难诞生

如果出席大陆会议的代表们在筹款、募兵、张罗给养和指导革命进程等方面像起草《独立宣言》一样熟练，那么美国独立战争本来是可以速战速决的。但是从《独立宣言》那文笔华美、排比雄壮的文字领域转向具体事务和实际操作的领域时，这些共济会商人们、律师们和种植园主们就遇到了几乎无法逾越的障碍：他们没有国库。虽然没有债务，但也没有存款。从事独立战争所需的全部财政来源必须凭空筹措，并且要特别小心。这首先是因为签署了《独立宣言》的那些爱国志士不愿意对他们自己的财产——烟草种植园、地产、商号、货栈——征收足以支持战争的重税；构成北美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没有多余的钱来缴纳税款；其次，既然北美人对英国的一项主要不满是税收，那么大陆会议在把税收负担加于人们身上时就必须十分谨慎。

在整个独立战争期间，大陆会议自始至终依靠各州议会的恩惠来获得军队、金钱和给养，但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些州在涉及到本州边境之外的一切事情上也是拖延不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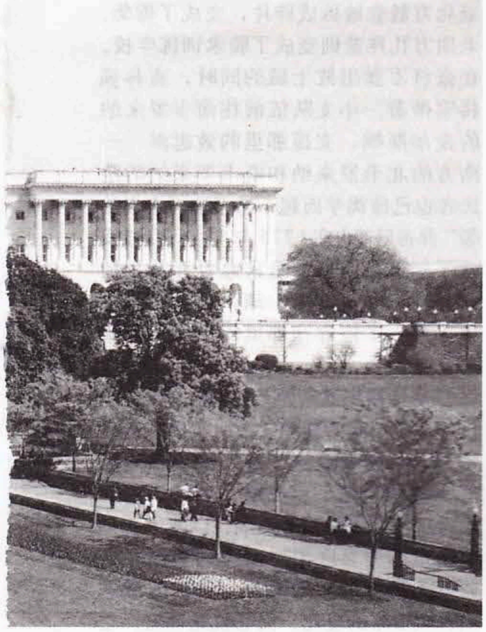
因此，大陆会议在独立战争前期和中期用来同英国人作战的主要兵力是各州民兵，而它筹措军需的主要来源是发行纸币、征用物资和举债。在1775年至1779年间，大陆会议发行了价值约2.4亿美元的大陆券纸币，规定将来由各州按分摊的定额兑换成金银硬币，仅在第一年就发行了4000万元。除此之外，各州议会也发行了类似的纸钞，最后结果是在十三个原殖民地流通的纸钞高达4.5亿美元之巨。

这种筹款办法在实施的过程中出现的严重混乱状况不是一般的笔墨能形容的。当纸币大量出笼的时候，其价值迅速跌落。1776年时，大陆会议发行的信用券与金币的兑换比例为1.5:1，1779年1大陆券纸币只值两分或三分硬币，1781年这一比价飙升到147:1。各州纸币的贬值程度也令人惊叹，1780年，纽约州发行的新旧纸币的兑换价高达128:1。

大陆会议稳定币值的多次努力毫无结果，最后在民间出现了“一文不值”（not worth a continental，即“不值一张大陆券”）这种意味深长的轻蔑俚语。其结果变得很可笑。理发店开玩笑地用纸币糊墙；巡航归来的水手领到了作为工资的这种没有价值的成捆纸币，把它们糊成衣服，穿着这种破烂的华丽服装招摇过市；还有人把狗的身上也贴满了大陆券。唯一从这场货币混乱中得到好处的是那些货币投机者，他们通过散播关于战场输赢的小道消息和“从法国获得了更多硬币”的谣传，在币值发生波动时从中渔利。从各州金库流出的纸币也遇到了同样的命运，有时甚至更糟。弗吉尼亚



右图是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大陆议会于1775年发行的“大陆券”，票面规定可兑换20枚西班牙银元。这种纸币设计十分粗糙，非常容易伪造，在六年的战争时间里出现了大量伪币，再加上大陆议会本身过量印刷，造成剧烈的通货膨胀，以至形容某一物品分文不值的美国俚语“不值一张大陆券”流传至今



题图：坐落于华盛顿国会山山巅的美国国会大厦（US Capitol）。Capitol的名字来自古罗马城的卡皮托尔山，后来在拉丁语中引申为山巅之城的意思，契合基督教中“山巅之城”（人间的基督教天国）的寓意。1793年9月18日，乔治·华盛顿身穿共济会大师的全套制服，在一群身为共济会会员的美国建国先驱的环绕下，为这座大厦举行了奠基仪式

州最后落到了这样一种悲惨的地步：它发行的纸币与硬币以1000:1的比例流通，其中大多数在持有者的手中就消失了。

筹措资金的第二种办法是在国内外举债。通过发行类似现代公债的债券，大陆会议回收了约6700万美元的纸币。在这一不稳定的国债基础上，还加上大量由大陆军的军官和军需机构为了支付粮食、军服和其他军需物资而向商人签发的欠款凭证。只是在1777年萨拉托加战役获胜之后，美国才从法国和西班牙获得了以捐赠形式提供的少量援助，继之而来的是正式贷款，法国提供了总额的3/4以上，如果没有从凡尔赛政府那里得到这么慷慨的财政援助，很难设想大陆会议会把这场革命进行到底。剩余的贷款由西班牙国库提供了一部分，在1782年殖民地获得胜利已经成为事实后，荷兰冒险提供了余下的贷款。

简单地说，抛开欧洲提供的援助不提，美国独立战争的主要资金是用纸币和公债来支付的。纸币实际上完全被人们拒绝接受，而公债则转变为由消费者承担的间接税所支撑的国债。在这一过程中蒙受最大损失的是士兵，他们做出了牺牲，所得到的报酬是大量的纸币，以及有权在西部荒地垦殖的一张书面证明。

1775年5月25日，威廉·豪将军（William Howe）在亨利·克林顿将军（Henry Clinton）、查尔斯·康华利将军（Charles Cornwallis）和约翰·贝高英将军（John Burgoyne）的陪同下，率援军乘船抵达北美叛乱活动的中心——波士顿港。一万六千名新英格兰商人和农民正把托马斯·盖奇将军和北美大陆上仅有的一支英国军队围困在那里。援军到来后，波士顿的英军数量大约有7000人（6000名陆军加上1000名海军），守城有余而反攻不足。

波士顿的地形是东面临海，城市北边是查尔斯河，河口有一条狭长的海湾，把北边一个半岛和城市隔开。这座半岛与大陆由一条狭长的地带连在一起，岛上的邦克山（Bunker Hill）和布利德山（Breed's Hill）俯瞰波士顿全城。如果马萨诸塞人占领并控制这两个高地，他们就能用居高临下的火炮把英军赶出波士顿城和波士顿港。

6月15日，马萨诸塞州的安全委员会下达了抢占邦克山和布利德山的命令。第二天晚上，英军的威廉·普雷斯科特上校占领了布利德山一处较低的阵地，并且修筑了土木工事。马萨诸塞人闻讯后在布利德山顶掘壕固守，试图防守邦克山。不过他们的处境并不安全，英国舰队可以从港口轰击他们，也可以派兵在那条狭长地带登陆，切断他们与后方的联系。不过，英国人没有采取这两种比较容易的方法。托马斯·盖奇将军决定炫耀一下武力。他手下有英国最精锐的部队，他们在前几



威廉·豪（1729–1814），出身于军人世家，曾参加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和七年战争，1759年率领一支部队发动突袭，攻克了被认为无法攻占的魁北克要塞。1775年10月就任北美英军总司令，1778年法国参战后辞职返回英国。其兄长理查德·豪海军上将是英国最著名的海军将领之一，1799年去世后将豪子爵的爵位传给了威廉。

次战争中对北美人的民兵产生了强烈的蔑视心理，因此他决定向邦克山发动一次华丽的正面进攻，让那些不老实的波士顿人从窗子里和屋顶上亲眼看看帝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士兵列队向叛军阵地大踏步前进的奇观。

炎热的6月17日的下午，豪将军根据盖奇将军的命令率领2200名英军在半岛登陆。他下令队伍排列整齐，把“那些农民”赶下山去。英军排成三排，缓慢地向布利德山前进。四周一片寂静，波士顿全城都在注视着。

英军距马萨诸塞民兵的阵地100码时，前面仍然没有动静。到了50码的距

描述1775年邦克山战役场面的版画



离时，一阵弹雨突然从民兵的老式滑膛枪中射了出来，同时响起了喊叫声和咒骂声。英军在这一阵弹雨中受到了很大伤亡，豪将军的白色丝绸裤子上沾满了血迹，但是他下令重整队伍，在海军的火炮支援下继续冲锋。英军很快被第二阵弹雨驱散，退到海岸边上，豪将军的威望受到了严重的打击。这时他想到山上民兵的弹药恐怕快打光了，于是下令发起第三次冲锋。此时已是黄昏时分了，英军终于把布利德山上的马萨诸塞民兵赶出了阵地。

当天傍晚，在邦克山的山坡上僵卧着一千多具英国士兵的尸体，而北美民兵投入战斗的1500人当中只有140人战死、271人受伤、30人被俘。英军在战术上获得了胜利，占领了山头，但邦克山战役给北美各殖民地造成的心理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北美民兵与英国正规军交了手，只是由于弹药耗尽才致失败。此役之后，北美人的信心大增，而盖奇将军却在十月被不光彩地召回英国，豪将军接管了北美英军的指挥权。

1775年冬天，大陆会议决定发动主动进攻，向加拿大发起远征。指挥这支部队的是理查德·蒙哥马利，他带着600人从缅因出发，沿着1759年英军征服新法兰西的路线，取道尚普兰湖向北进军。蒙哥马利占领了未设防的蒙特利尔城，但是英军的主要据点在魁北克城，于是蒙哥马利带着他的军队继续向魁北克挺进。在那里，他与本尼迪克特·阿诺德带领的1100人的部队——或者说残部——会合，随后在魁北克城外的亚伯拉罕平原与防守该城的几百名英军发生交火。蒙哥马利在战斗中阵亡，阿诺德的腿骨被子弹打断，但是英军仍然坚守在坚不可摧的魁北克要塞中。

大陆会议派遣七十岁高龄的本杰明·富兰克林率领一个民间代表团到加拿大进行谈判，但是即便以富兰克林的威望和名声也没能说服北方的殖民者加盟到北美十三州的事业当中。到翌年春天圣劳伦斯河解冻时，英国又调来了一批援军增援加拿大，阿诺德只好带着死伤过半的队伍蹒跚返回提康德罗加要塞。

此后华盛顿否决了他的法国同盟者入侵加拿大的计划，后来美国人的同样建议也被法国人所拒绝。美法双方都唯恐对方掌握魁北克要塞。这样，完全由于奇怪的命运的摆布，加拿大这才躲过了北美革命的浪潮——它的法裔居民基本上满意英国人的统治，而英裔居民不是保皇派，便是对革命战争持一种观望心态。不久之后，加拿大将成为逃离美国的那些忠于英王乔治的效忠派难民的庇护所。

到1776年的前几个月，英国人觉得波士顿不是进行战争的最佳城市。这不仅是因为它是反英情绪最为强烈的中心地区，而且因为波士顿在战术上无法防御——它与内陆相连的长颈地带很容易被孤立包围。1776年3月17日，豪将军终于带着英国部队和几百名亲英的效忠派难民撤到大西洋沿岸唯一的英国海军基地——新斯科舍殖民地的首府哈利法克斯。他在撤退之前没有烧毁这座城市，这是因为他怕北美人报复留下来的效忠派，同时也为了保留最后的和解希望。不过，英军留下来的仍是一片废墟，约翰·汉考克的华美住宅和其他一些富有的“叛乱分子”的私宅被洗劫得七零八落，波士顿的老北方教堂被拆成碎片，变成了劈柴，老南方礼拜堂则变成了骑术训练学校。在豪将军撤出波士顿的同时，克林顿将军带着一小支队伍前往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支援那里的效忠派——南方的北卡罗来纳和南卡罗来纳的殖民者也已经揭竿而起，甚至连“老自治领”弗吉尼亚也在1775年12月27日发动了起义。当地的皇家总督邓莫尔勋爵仓皇离开首府里士满，逃到诺福克港，登上了停靠在那里的一艘英国船避难。



《邦克山战役中沃伦将军之死》，美国最著名的爱国主义题材画家约翰·特恩布尔的作品。这位画家认识沃伦将军和其他一些参加过这场战斗的人，并且在很远的地方目睹了整个战斗的状况

英国撤出波士顿对美国人来说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胜利。此时英国人对战争局势的发展更趋明确：波士顿地区的冲突并不是个别现象，美国的加拿大远征、南方的战争热潮、以及十三个殖民地的明显联盟，都说明英国必须做好大规模战争的准备。英国的撤退只表明策略的变化、而非就此认输，它是战争的新阶段开始的信号。至少从表面上看来，这场英美战争的优势在英国一方。它具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舰队和世界上最好的步兵力量，而且还拥有一整个全球性帝国的资源和一个统一的组织结构，甚至就连北美洲的二十六个英国殖民地[注]也只反叛了十三个，足见革命和分裂在大英帝国是不得人心的。

相比之下，美利坚合众国在参战的时候只不过是反叛的十三个殖民地的乌合之众，面临着组建新军、成立政府和获得外国援助等许多艰巨而紧迫的任务。然而合众国也有一些尚未表露出来的战争优势：美国人是在自己的国土上作战，占有地利；英国人战线太长，远离自己的国土和资源。美国的起义者从总体上来讲全心全意投入独立战争，而英国人对战争的支持则三心二意。埃德蒙·伯克就曾经在邦克山战役之后写道：“……人们表现出倦怠冷漠的态度，就像对待与自己无关的事情一样……商人背叛了我们，也背叛了他们自己……他们全体或大多数人都嗅到了有利可图的战争散发出的腐臭气味。战争已经成为商业的另一种形式，由于运输的物资很多，海运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商人们因此把美洲

战争看作他们在不可避免的经济萧条时期的一线希望，而不是看作一场灾难。”

英国的显贵政要们不仅攻击英国陆军和海军的指挥不当，而且也反对同美洲殖民者进行战争。乔治三世甚至命令他在美国的两个主要司令官，指挥陆军的威廉·豪和指挥海军的理查德·豪，在1776年夏天“尽最大的努力争取与殖民地居民和解”。9月初，两位将军在纽约的斯塔滕岛会见了大陆会议的三个代表，但是当威廉·豪提出在谈判开始前大陆会议必须收回《独立宣言》时，和解的最后一线希望也就完全破灭了。



1776年7月9日，一群纽约市民和奴隶在百老汇大街尽端的波灵格林（Bowling Green）拉倒乔治三世的骑马塑像，随后将这尊重4000磅的铅像砸碎，熔化铸成42088颗子弹。雕像的脑袋被人们戳在长矛上游街，后来被效忠派分子找到并送回英国。如今有六块雕像碎块存于纽约历史学会，一块存于纽约市立博物馆。波灵格林后来成为纽约金融区的中心，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海关大楼和著名的华尔街公牛铜像都座落于这里。

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二阶段从1776年持续到1778年，这是对于北美独立者来说最艰苦的一段时期，也是英国人最应该获胜的阶段。这一时期的战争从殖民地人擅长的游击战变成了传统的常规战，美国人在战场上多次遭到惨败，如果不是一连串的背运和失误，英军本应该能够彻底平息叛乱。

英军撤出波士顿后迅速重组，1776年夏天，即北美十三殖民地发表《独立宣言》后几个星期之内，在纽约港南边的斯塔滕岛上挤满了北美历史上最强大的一支大不列颠兵力——这也是直至1944年诺曼底登陆前皇家海军集结过的最大的一支登陆舰队。和蔼的威廉·豪将军现在统帅着五百艘军舰和2.5万名训练有素的士兵，隔着上纽约港水道与曼哈顿岛和布鲁克林高地的美军阵地遥遥相峙。

豪将军在战场上是个勇敢而称职的指挥官，但在战略上却比较消极。他在战争的最初两年里始终抱着和北美人和解的愿望，希望能够用展示武力的方式慑服北美人，使其投降，而不是真正作战。他相信只要有机会，大多数北美人还是愿意重新效忠国王的。在9月份与大陆会议代表的那次谈判中，他提出了两种选择：或者是投降而得到王室的宽大赦免，或者打一场对抗绝对优势的战争。

面对豪的强大兵力，华盛顿在联合了大陆军和各州民兵之后也只有1.9万名装备不齐、未经训练的士兵，而且没有任何海军（不过却有许多非常称职的私掠船船长）。但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利坚合众国还是马上拒绝了豪提出的条件，决心继续作战。这个决定自然带来了一连串的败仗。豪将军计划沿着哈得孙河北上，攻占河岸的一系列要塞，与来自加拿大的英军会师，这样他就可以把“叛乱活动”的中心新英格兰地区与拥有三分之二人口以及大部分粮食和财富的中部和南部殖民地分割开，为此首先要夺取纽约城。

1776年8月27日，英军在长岛登陆。邦克山战役给豪将军留下了深刻的教训，这次他决定避免正面作战，而是对长岛上的美军阵地发动佯攻，把自己的主力调到美军的左翼实施突袭。这次他的策略获得了成功，在英军攻击下，美军被赶出长岛，只是由于逆风阻碍了英国军舰的活动，华盛顿才得以安全度过东河——9月6日夜间，艾兹拉·李军士驾驶着大卫·布什内尔发明的单人潜艇“海龟”号，对锚泊在斯塔滕岛附近的英国军舰发动了一次不成功的偷袭，这是世界上第一次潜艇战。

长岛战役后，华盛顿向大陆会议呼救：继续固守纽约是不可能的，而放弃它会影响北美人的士气。大陆会议批准华盛顿可以不战而退，撤出纽约。9月12日，华盛顿决定放弃纽约。他在哈

【注】1775年时的26个英属北美殖民地：
1、纽芬兰
2、新斯科舍
3、圣约翰岛（爱德华王子岛）
4、魁北克
5、鲁珀特地
以上五个殖民地中，由于美国独立战争后大量效忠派分子流入新斯科舍省，因而从该省又分出了新不伦瑞克省。这两个省与爱德华王子岛省和魁北克省在1867年构成了加拿大自治领，其中魁北克在1791年被重新划分为下加拿大省（今日的魁北克）和上加拿大省（今日的安大略省），鲁珀特地仍保持其哈得孙湾公司私有领地的性质，直至该公司在1870年将其出售给加拿大，而纽芬兰直至1949年才并入加拿大；
6、马萨诸塞
7、新罕布什尔
8、纽约
9、康涅狄格
10、罗得岛
11、新泽西
12、宾夕法尼亚
13、特拉华
14、马里兰
15、弗吉尼亚
16、北卡罗来纳
17、南卡罗来纳
18、乔治亚
以上十三个殖民地在1776年宣布独立，成为美利坚合众国；
19、东佛罗里达
20、西佛罗里达
以上两个殖民地是英国在七年战争中从西班牙手中夺得的，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被西班牙重新占领，战争结束之后在1783年《巴黎和约》中割让给西班牙；
21、牙买加及附属领地（牙买加岛、英属洪都拉斯、莫斯基托海岸、海湾群岛、开曼群岛）
22、英属背风群岛（圣基茨、安提瓜、巴布达、英属维尔京群岛、蒙特塞拉特、尼维斯、安圭拉）
23、英属向风群岛（格林纳达、圣文森特、多巴哥、多米尼加）
24、百慕大
25、巴巴多斯
26、巴哈马群岛
以上六个加勒比海殖民地当中，多巴哥岛在1783年《巴黎和约》中割让给法国，法国将独立战争当中占领的巴哈马、圣基茨、尼维斯、蒙特塞拉特、多米尼加、圣文森特、格林纳达等岛屿归还英国，英国将战争当中占领的圣卢西亚等岛屿归还法国

莱姆高地同英军进行了小规模战斗后，沿着一条小道——即今日的百老汇大街——撤出了曼哈顿岛，渡过哈得孙河，从新泽西平原向南一路撤兵，一直渡过特拉华河退至宾夕法尼亚境内。英军紧跟在华盛顿的后边，迅速占领了纽约和新泽西——直到战争结束，纽约市一直牢牢地掌握在英国人手里。

此时豪将军面临着终结北美独立战争的大好机会，如果他紧追华盛顿，必将全歼大陆军，但是他却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按兵不动。十月底，豪在白平原战役中再次击败华盛顿，可是又没乘胜追击，而是选择派康华利将军南下攻打费城。大陆会议的代表听闻此讯后纷纷逃离这座城市，上千名效忠派蜂拥到英军营中表示忠顺。就当时而言，北美人的唯一希望似乎是翻越阿勒根尼山，集体迁移到美洲中西部的新地区建立新国家，就像下一个世纪为了摆脱英国的统治而集体逃离开普殖民地、在南非内地建立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的布尔人那样。甚至连华盛顿也考虑过这个方案，但他最终决定率领部队前往新泽西，以迎击来犯的英军，保卫费城。

华盛顿从纽约的失败中明白过来，他的部队在阵地战方面远不是英军的对手。他也明白，如果一再失利，美国的独立必将成为泡影。最终他决定对英军实施消耗战略，其重点并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要使英国人为战争付出尽可能大的代价，同时尽量保护美国居民。显然，他将在以后的战争中坚持这一策略。这样一来，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期阶段以后的几年里，战争就成了一场对双方来说同样乏味，而且谁都难以取胜的角逐。


1776 年 9 月华盛顿撤出纽约后，一名爱国派妇女在城中放起大火，致使该城近四分之一的建筑完全被焚毁。直到独立战争结束后，清理和重建工作才得以进行

十八世纪的欧洲式战争是一种季节性行为，在天寒地冻的冬天一般停止作战。1776 年的冬天也是这样，英军在新泽西的各处兵营内安顿下来，劈柴腌肉，准备过冬。但华盛顿没有休战。当年圣诞之夜，他率领2400 名士兵渡过结冰的特拉华河，从宾夕法尼亚进入新泽西。未来的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未来的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未来的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未来的大陆议会议长阿瑟·圣克莱尔都在渡河者之列。

12 月26日，这伙人袭击了新泽西的特伦顿，打败了驻扎在当地的1400 名黑森雇佣军，俘虏了1000 名雇佣兵，缴获了大批物资，包括两门火炮。华盛顿随后率部挺进到普林斯顿，赶走了驻扎在普林斯顿大学校园里的英国军队。不过华盛顿既没有坚守住普林斯顿，也没有守住特伦顿，而是在康华利将军的主力到达之前就向西撤退，最后在新泽西的山区中度过了那年的除夕。

1777年1月2日，华盛顿的部队在特伦顿与康华利将军指挥的5000 人部队遭遇，此时华盛顿麾下只有1600 名正规军和3600 名不可靠的民兵，而在华盛顿背后的普林斯顿还有康华利的2500 人待命参战。当夜华盛顿下令燃起篝火，然后率部悄悄地从康华利部队后面一条废弃的小路逃了出来。第二天，他的部队与普林斯顿的英军遭遇，并迅速将其击败，缴获了大批物资。

这样，在横渡特拉华后短短的10天之内，由于华盛顿个人杰出的领导才能，将要熄灭的革命之火被重新点燃。同时代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将特伦顿－普林斯顿战役视为军事史上最辉煌的胜利之一。由于华盛顿此时已威胁到了英军交通线的侧翼，因此英军将所有在新泽西中部和西部的守卫部队都撤了出来。

进入1777年之后，英国采取了将合


1850 年到1851 年，出生于德国的画家艾曼纽尔·卢策创作了巨幅油画《华盛顿渡过特拉华河》，虽然它采用了古典的三角构图，富于英雄主义色彩，但是却与真实的历史严重不符，比如说站在华盛顿身旁的詹姆斯·门罗在1776 年冬天便打出了翌年6 月才首次出现的星条旗。实际上当时大陆军的旗帜是“大联邦旗”，左上角是英国的米字旗图案。另外华盛顿乘坐的那条船也太小，有几条船上面还载着马匹，如果当年华盛顿一行真是乘坐这种船的话，恐怕要把这帮人翻进特拉华河的冰水中。除此之外，卢策笔下的特拉华河上冰块呈现出嶙峋的姿态，更像是他老家莱茵河的河冰，而真正的特拉华河冰层是像床单一样平坦的。实际上这幅画绘制了两次，第一张画在画完后不久就由于工作室火灾而受损，后来被卖到英国，1942 年毁于德国轰炸机对伦敦的空袭。第二幅画作完成于1851 年秋天，当年10 月在纽约首次展出，有5 万人参观了这幅油画。一位名叫马歇尔·罗伯茨的收藏家以当时不啻为天文数字的1 万美元购下这幅画，随后几次易主，最后在1897 年由苏格兰商富翁约翰·斯图亚特·肯尼迪捐赠给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众国军队一分两半的策略。豪将军从纽约溯哈得孙河北上，攻占刚刚在法国建筑师的帮助下加固的西点要塞，然后包围奥尔巴尼；另一股英国兵力从加拿大南下，占领提康德罗加要塞后在奥尔巴尼与他会合。年轻气盛的约翰·贝高英担任后一支英军的司令，他计划从莫霍克河和哈得孙河上游两路同时进攻提康德罗加。但是豪将军在计划开始实施时却改变了主意，他想转而进攻反叛活动的中心费城，指望这场进攻会挫败北美人的士气，联合亲英派分子迅速结束这场战争。他把大批海军调离纽约，驻扎在切萨匹克湾水域，9月11日与华盛顿兵力匆匆交手后北进费城，轻而易举地拿下了这座城市。大陆会议被赶出首府，只好跑到宾夕法尼亚的兰开斯特县重组，不久之后又逃到了约克县。

与此同时，华盛顿在10月4日攻打日耳曼城未果，死伤700人，还有400人被俘。剩余的部队士气低落，华盛顿只好把手下带到宾夕法尼亚的福吉谷(Valley Forge)进行休整。那是个非常严酷的冬天，在美国革命史中留下的是一场惨淡的记忆。美军在福吉谷里搭起了900顶帐篷，每顶帐篷住12个人。士兵们缺衣少食，五分之一的人没有鞋；由于没有清洁的饮水，两千多人得了痢疾。咸肉吃光了，只剩下25桶面粉，于是士兵们就以水熬煮的面糊为生。军营里牢骚满腹，许多人开了小差，而在二十英里外的费城，近两万装备优良的英军部队却住得暖和舒适，轻歌曼舞，频繁举行社交活动。

在福吉谷越冬的美军部队里有60%的人是罪犯、被释放的奴隶和新移民。不光是靠华盛顿的领导风范才将这些乌合之众聚合到一起的。当时美军实际上已经不堪一击，本已是英军囊中之物，但豪并未对其发动攻击。有人认为豪就是不想取胜，暗中同情美国革命，因为他的家庭与北美殖民者有密切联系，他本人又和英国政府中的反战势力有政治关联。也有人指出豪的个性弱点，例如好酒成性和绯闻不断，但最重要的问题显而易见，那就是缺乏战略判断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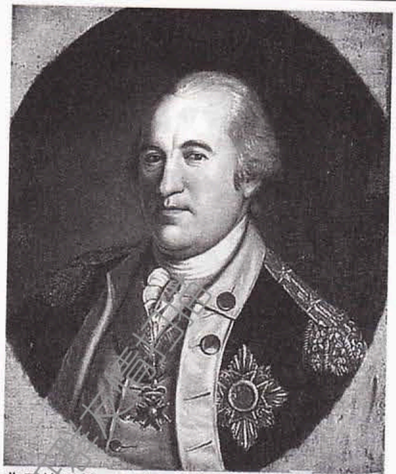
福吉谷纪念碑



1778年2月，原普鲁士军官冯·施托伊本男爵(Friedrich Wilhelm von Steuben)来到福吉谷，投入大陆军麾下。他曾经在腓特烈大帝的总参谋部供职，但是由于猥亵男童而被开除出普鲁士军队。他试图在奥地利、巴登和法国的军队中谋得一官半职，但是处处碰壁。正当这位男爵在巴黎走投无路时，碰到了美国驻法公使本杰明·富兰克林。他拿着富兰克林写的一封推荐信前往美国。

在福吉谷，这位性格严厉的普鲁士男爵花了六个月的时间对饥寒交迫、衣不蔽体的大陆军残部进行军事训练，以加强其战术技能。他的方法是挑选出100名最聪明精干的士兵，对其训练，然后这些士兵每人再训练100人。为了改善营地的卫生状况，冯·施托伊本下令把厕所移出军营，在营房的另一边新建厨房，然后根据团和连的编制重新组织营房。他还教会了美军在战斗中使用一种新型的致命武器——刺刀。刺刀让来复枪兼具长矛的功能，从而使得士兵可以在不用上膛的情况下进行近距离搏击。更重要的是，施托伊本写下了一本训练手册，确定了训练军队所用的方法，其中一些方法被美军沿用至今。

冯·施托伊本给福吉谷的美军带去了秩序、纪律和卫生，加强了军纪，将一群乌合之众变成了一支真正意义上的军队。在重新整编大陆军队的过程中，冯·施托伊本注意到了殖民地人一个与欧洲人截然不同的特点。他在回忆录里写道，当一名军官向普鲁士、奥地利或法国的士兵发布命令时，他们都不假思索地照做。但是在这里不行。如果你要对一名北美士兵发布命令，你必须向他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经过几代人的自由生活，对君王和威权的先天性的奴性服从已经从这些北美人的血液里消失了。



弗里德里希·威廉·奥古斯特·海因里希·斐迪南·冯·施托伊本(1730–1794)，出生于军人世家，幼年随父前往俄国为安娜女皇服务，1740年回国。七年战争中先后担任步兵军官和参谋军官。普鲁士在七年战争结束后裁减军队，施托伊本前往霍亨佐伦－黑兴根选帝侯的宫廷服务，1776年因被指控猥亵男童而被迫离职。几经辗转后前往北美，投奔大陆军，并成为美国陆军总监。独立战争结束后被宾夕法尼亚和纽约授予美国公民权，定居于曼哈顿，参与组建退伍军官组织“辛辛那图会”。冯·施托伊本被德裔美国人视为民族骄傲，每年9月中旬都在纽约市和其他地方举行“冯·施托伊本日”游行。纽约州和印第安纳州的施托伊本县、以及俄亥俄州施托伊本维尔市以其名字命名，美国海军SSBN-632号核潜艇也以其命名。在白宫南边的拉法耶特公园，以及德国的波茨坦和马格德堡都立有施托伊本纪念塑像

1777年豪将军决定转道攻打费城后，留下贝高英独自应付北方战役。贝高英派巴里·圣莱杰上校沿圣劳伦斯河向安大略湖和莫霍克河上游进发，他自己则带领4000名英军和3200名黑森雇佣军直击哈得孙河上游。

英军在7月5日夺取了提康德罗加要塞，并且俘获了要塞中的大批武器弹药。此后贝高英带领部队穿过面积足有五个英格兰那么大的纽约州原始森林，向奥尔巴尼进军，以求与圣莱杰会合。但是他在森林中吃尽了苦头，原先为皇家海军军舰制作桅杆而保留的大片白松被殖民地居民成片地伐倒，成为路障，英军一天的前进速度只有一到两英里。

贝高英离开提康德罗加后不久便吃了两次败仗：8月6日在奥里斯坎尼，一群德国自耕农在德国移民尼古拉斯·赫基默的带领下击败了圣莱杰率领的印第安人和亲英效忠派民兵；8月16日，在本宁顿，2000名佛蒙特民兵“青山仔”(green mountain boys)袭击了为贝高英将军筹措粮草的一个支队。



约翰·贝高英（1722–1792），英国军人、政客和剧作家。10岁时进入威斯敏斯特军校（当时出身贵族的英国陆军军官大多自该校毕业），其后作为龙骑兵军官参加了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75年前往北美，参加了邦克山战役。1778年在萨拉托加以“宣誓不再对美国作战后释放回国”的条件投降，但在大陆会议要求下被华盛顿拘留至战争结束，回到英国后从事政治和剧本创作生涯



丹尼尔·摩根（1736–1802），美国独立战争军事领袖之一，父母为威尔士移民，定居于弗吉尼亚边区，曾多次与印第安人交战。1775年列克星敦战役后被弗吉尼亚议会任命为民兵军官，率领部队北上作战，参加了加拿大远征和上纽约地区的游击战，1778年在萨拉托加令贝高英将军投降，随后退休。1780年重新应召，与纳撒尼尔·格林将军前往南方作战，指挥了考本斯战役。战争结束后成为联邦党众议员。美国电影《爱国者》主角“本杰明·马丁”的一部分经历参考了摩根的生平

前弗吉尼亚冒险家、牲口贩子、酒鬼、赌徒、大陆军上校丹尼尔·摩根和他的手下也在贝高英的前进路线上对其发动了持续不断的袭击。这些北美人使用新型的美国长管猎枪，这是一种有效的轻型武器，以德国猎枪为原型，枪管细长，至少有40英寸，膛内施有来复线，因此在射击50码外的目标时偏差只有0.5英寸。北美殖民地的神枪手可以用它击中250码外的目标，射程是今日FBI狙击步枪的三倍多，是当时英国陆军使用的滑膛枪的两倍。狙击手通常先打死为英军带路的印第安人向导，这样英军就会在繁茂的哈得孙河上游森林中迷失方向。摩根的这种战术是北美边民在与印第安人的常年战争中学来的，其要点是神出鬼没，出其不意，速战速决。

经过几个月的游击战，贝高英军队的所有印第安人向导不是被打死就是逃回战线后面自己的部落中，英军对地形的仅有一点了解也无影无踪。接下来游击队开始以英国军官为狙击目标。当时军官是军队里学历最高的人，他们熟知上级的指令，熟知交通补给线，熟悉战争的指挥艺术，是战场上取胜的关键。一旦军官被击中，他手下的士兵就会陷入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在贝高英的部队中发生的正是这种状况，比如说第53步兵团的11名军官中只有1人幸免，其余的10名军官非死即伤。

此时贝高英已深陷北美民兵的游击战海洋中。他被切断后路，军需紧缺，只好撤到纽约北部的萨拉托加，向在纽约代理豪将军的克林顿将军写信求援。10月3日，克林顿派4000名英国和黑森士兵从纽约出发，溯哈得孙河而上，占领了沿岸的克林顿要塞和蒙哥马利要塞。但是在这之后，他认为自己已经满足了策应贝高英的目的，于是在烧毁了伊索普斯之后就返回了纽约。与此同时，贝高英仍在萨拉托加掘壕固守，等待克林顿的援军到来。

但是霍雷肖·盖茨将军毅然下令丹尼尔·摩根率领美国部队发动攻击。这些新英格兰人以自己的方式在灌木丛中或大树上作战，贝高英部队的严整训练和整齐队形都无济于事。

摩根手下最著名的神射手是一名目不识丁的爱尔兰移民，名叫蒂姆·墨菲，在1777年10月7日的比米斯高地战役中，他击毙了贝高英手下最能干的军官西蒙·弗雷泽准将。当时这位身穿猩红军服的将军骑在他的马上，是个非常显眼的目标。墨菲的第一枪打飞了，第二枪擦过弗雷泽的马，但这位将军仍然骑在马上。墨菲的第三枪正中要害。弗雷泽被打死后，英军群龙无首，在比米斯高地战役中阵亡1000多人，是北美军队的两倍。贝高英退回萨拉托加要塞，被两倍于己的北美军队彻底包围。10月17日，他率领残部约5000人向盖茨将军投降。

萨拉托加战役被视为美国独立战争的转折点。提康德罗加和皇冠角要塞的英军撤退了，克林顿将军放弃了哈得孙河高地，英军此后只控制着纽约城、罗得岛的一部分和费城。更重要的是，胜利的消息传到欧洲，导致美法联盟的诞生。

此外，对北美印第安人来说，英军在纽约北部一系列战役的失败导致易洛魁部落联盟的分裂和瓦解。当时大多数北美印第安人对美国独立战争抱有相当动摇的态度。美国人极力劝说他们保持中立，“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把战斧埋得越深越好”。但是对某些印第安部落来说，战争的意义在于一个集团（美洲人）正在试图取代另一个集团（英国人）。前者在他们看来充满敌



《贝高英将军在萨拉托加投降》，约翰·特恩布尔受美国国会之托，为国会大厦中央圆厅创作的四幅巨型油画之一（酬金4000美元）。画面中贝高英正将佩剑交给盖茨将军作为投降的标志。盖茨左手前为丹尼尔·摩根，手扶大炮者为后来的马萨诸塞州长约翰·布鲁克斯，两人中间为鲁弗斯·普特南准将

意，是入侵印第安领土的急先锋，而他们对后者至少还稍有信赖，因为英国人一直收购他们的毛皮，向他们出售武器和商品，并企图限制白人移民向印第安土地扩张。

在1776年秋天美国军队进入到纽约州奥尔巴尼以西的莫霍克族领地深处时，英国人用朗姆酒和各种商品动员易洛魁部落联盟与他们一起对付美国。莫霍克人的一个武士约瑟夫·布兰特曾经在数年前到过英国，他认为应当同英国结盟对抗北美人的扩张。在他的一再请求之下，莫霍克人的绝大多数部落都在1777年夏天参加了对美国的战争。易洛魁部落联盟中的塞讷卡人和卡尤加人也支持英国，并加入英军一方同北美人作战；但是奥内达人和塔斯卡罗拉人支持北美殖民者，而奥农达加人分裂成了几派。

易洛魁部落联盟的瓦解只是印第安人内部分歧的冰山一角。不是所有的东部印第安部落都在独立战争中站到英国人一边，除了易洛魁六族联盟中的两族外，斯托克布里奇人和卡陶巴人也都为北美革命者提供了战士和侦察兵。在南方更远的地方，当肖尼族在1774年对弗吉尼亚西部边民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时，几乎在印第安人中找不到任何支持者，为此败给弗吉尼亚民兵，被迫向白人移民割让更多的土地。切罗基人在1776年对白人移民发动的战争也没有得到其他印第安部落的支持。

奥里斯坎尼战役之后一年里，亲英印第安人与英国军队以及亲英效忠派一道发起了一系列针对白人移民的袭击和屠杀行为。1778年7月3日，来自康涅狄格的效忠派军官约翰·巴特勒（他被英军授予中校军衔）带领110名被称做“巴特勒游骑兵”的效忠派民兵，以及约瑟夫·布兰特率领的464名莫霍克族印第安人，突然袭击了宾夕法比亚东北部，位于萨斯奎哈那河怀俄明谷的康涅狄格移民定居点[注]。那里驻有一支360人的北美民兵部队。巴特勒部队先杀死了三名在田里耕作的农民，然后发动突然袭击。北美民兵被打得措手不及，惊慌失措，四下逃散，结果遭到印第安人的血腥屠杀，360人中只有大约20人成功逃生，其余的人全都被杀死。340名死者中有227人被剥了头皮。

“怀俄明谷屠杀”在宾夕法尼亚西部和纽约北部引起大规模恐慌，当年11月，在巴特勒部队和莫霍克人攻打纽约北部的樱桃谷时再次发生屠杀事件，14名北美民兵和30名平民被剥了头皮。无数移民抛弃家园逃往东部地区避难。宾夕法尼亚的一个民兵军官沮丧地报告说“我的家乡几乎已经到了毁灭的边缘了！这里一片荒凉，到处是大火和烟雾”。

但是北美人的报复接踵而至。1779年的夏天，在乔治·华盛顿的命令下，约翰·沙利文将军领导了一系列针对莫霍克人和其他易洛魁族印第安人的惩罚活动，摧毁了40多座易洛魁人村庄和20多座效忠派的农场。他们进入易洛魁人农村后，按照印第安人的战争法则以牙还牙，杀死所有的人，甚至连小孩都不放过，然后踩躏大片的玉米田，把整个村庄放火烧掉。沙利文的部队在这次远征中虽然放过了奥内达人和塔斯卡罗拉人的村庄，但是英国人以及他们的易洛魁盟友对这两个部落的人却毫不客气，发动了反袭击。有三个世纪之久的易洛魁联盟从此变得四分五裂。“沙利文远征”严重摧毁了易洛魁部落联盟的聚居区，导致大批易洛魁人北上逃亡加拿大，许多人就永远定居在了那里。

对北美印第安人来说雪上加霜的是，在1773年到1780年期间发生了全球天花大流行。在美洲，这种依靠空气传播、死亡率高达40%的致命病毒是从墨西哥传入北美的。大多数出生在北美的白人远离这种疾病好几代人之后，像印第安人一样对它几乎没有抵抗力。1777年冬天，当天花一出现在福吉谷，华盛顿将军（他在小时得过天花）就紧急决定在大陆军当中实行接种计划。由于当时还没有发明牛痘接种技术，因此华盛顿采用的是一种高风险的人痘接种法，这是从非洲奴隶那里学来的：从天花病人体表脓包中采集脓浆，在健康人皮肤上划开口子，将稀释后的脓浆抹在创口上。接种者若想生存下去，自身免疫系统的反应速度必须快于病毒扩散的速度。在福吉谷，大约每五十个接种者里有一个人丧命，但是其余的人都对天花获得了终生免疫力。华盛顿的赌博赢了，天花的新增病例从几千人下降到几十人。

由于大量的英军士兵和那些出生于欧洲的大陆军士兵以前接触过这些疾病而具有免疫力，再加上华盛顿对大陆军的接种，所以这次瘟疫总的来说对交战双方军队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由于打几个月仗之后回家的民兵带回了病原体，导致天花横扫了新英格兰和中部各州，并导致对天花没有免疫力的印第安人大批死亡。虽然出生在北美的白人和从非洲运来的奴隶当中也有很多人因为这次天花大流行而致死致残，但是损失最重的还是印第安人。在密西西比河以西，从事农业的曼丹、希达萨斯、阿里卡拉等部落几乎完全毁灭，而剩余的人面对凶悍好战的苏族印第安人的入侵只能坐以待毙。



1778年11月11日“樱桃谷屠杀”中即将被莫霍克族武士剥去头皮的白人妇女简·威尔斯，她正在向凶手求饶，一名白人邻居试图救她。远处的民居已经被纵火焚烧。参加这次袭击的有321名效忠派民兵和442名印第安人，杀死了当地的14名民兵和30名居民

【注】康涅狄格殖民地长期以来一直依据其“大海至大海”特许状对宾夕法尼亚北部提出领土要求。在怀俄明谷，来自康涅狄格的移民与宾夕法尼亚移民从1769年起爆发了被称为“扬基－宾州人战争”的冲突，宾州移民因势力不敌而离开，结果该地的康州移民也变得势单力薄，在1778年成了大屠杀的牺牲品。在宾州北部，当地人与康州移民的零星冲突后来一直持续到1807年。1809年，苏格兰诗人托马斯·坎贝尔创作了一首名为《怀俄明的格特鲁德》的诗歌来描述怀俄明屠杀，并在诗中把约瑟夫·布兰特称为“野兽布兰特”。这首诗后来在美国变得家喻户晓，当1865年美国在西北地区建立一个新的准州时，在俄亥俄州众议员的提议下，将其命名为怀俄明，即今日的怀俄明州

早在《独立宣言》发表之前，大陆会议就派代表前往欧洲各国首都，试图与其签署商业贸易协定，这些协定自然要求欧洲政府承认美利坚合众国是一个独立国家。其中最具合作前景的是法国。早在1774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就通过他的外交大臣德韦尔热讷伯爵与北美人暗结珠胎。经过一系列暗中交涉、虚设公司和互派密使，法国开始为北美人提供大量紧缺物资，但法国政府仍没有给予美国其最想得到的外交认可。最后，大陆会议不得不在华盛顿屯兵福吉谷的那个冬天派本杰明·富兰克林代表美国出使凡尔赛宫廷。

作为发明家、作家、科学爱好者、自由思想家和才子，富兰克林的名声早已传遍法国。他的电学试验是法国科学家都知道的，而他用“穷理查”的笔名写的那些朴实的警句也触动了法国的第三等级。当他与伏尔泰在法兰西科学院亲吻的时候，全法国都为之激动不已。此时已步入波旁王朝末世的法国正对卢梭的自然主义——一种对极端矫揉造作的洛可可式宫廷生活的强烈反弹——着了迷，因此这位头戴海狸皮帽、衣着朴素、草根妙语层出不穷、代表一个商人和农民的共和国的和蔼老头儿顿时使得法兰西轰动起来，甚至连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也因为鼓励这位“我们亲爱的共和主义者”而在无形之中玩了火。当著名的法国雕塑家让－安托万·奥顿为这个美国人的大理石半身胸像揭幕时，路易十六的财政大臣杜尔哥为其写下了两句精辟的、带有预言色彩的拉丁文格言：“Eripuit Coelo Fulmen, Sceptrumque Tyrannis”（从天空中抓住闪电，从暴君处夺下权杖）。

不过，尽管富兰克林几乎为不分阶级的所有法国人所喜欢，但他在凡尔赛敦促法国人公开结盟时，对方还是犹豫了一年。路易十六在支持国外自由事业的问题上犹豫不决，因为他在国内压制这个事业。另一方面，许多美国人也担心法国为了对英宣战而索取高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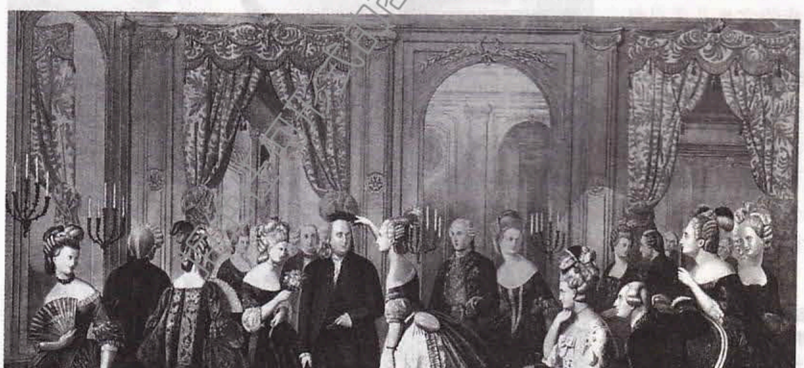
英军在萨拉托加投降的消息是在1777年12月2日传到伦敦的；两天后，从美洲来的一位专使带着“贝高英及其全军被俘”的消息冲进传到巴黎近郊佩西区富兰克林的寓所。当时路易十六的宠臣、著名的喜剧作家皮埃尔·奥古斯丁·博马舍正在与富兰克林共进午餐，他懂得这份报告的含义，立即匆匆地赶往凡尔赛宫，结果翻倒了马车，博马舍的一只手臂脱臼。

路易十六也为博马舍带来的这一消息打动，他看到时机已经到来，不用再保守秘密，可以同美洲人民一起进行反对大不列颠的斗争，可以一雪七年战争之耻了。经过对盟约条款的一些争论，1778年2月6日，富兰克林和法国签订了美法同盟条约。法国承认合众国的独立，双方结成了防御同盟，拟订了联合军事行动计划，接着路易十六对英国宣战。

当美法结盟的消息传到北美后，豪将军辞了职。英国政府对他的厌战态度可能已有所闻，因此接受了辞呈，并指定由亨利·克林顿将军接任。后者对这场战争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用两军对垒、攻占城池的欧洲战略对付此起彼伏的民众武装是永远不会取胜的，可行的办法是占领并分兵驻守所有的地区。他还改变了战略重点，决定放弃北方攻势，从征服南方入手。北美殖民地的大部分人口和财富集中于梅森－迪克逊线以南，从欧洲大陆运来的物资也多半堆积在那里，南方各州还有许多效忠派分子。



亨利·克林顿（1730—1795），英国军人，1778年起接任北美英军总司令职务，在这之前与许多其他北美英军将领一样在七年战争中参加过在北美同法国人的战斗。1782年康华利将军在约克城投降后，其职务被居伊·加勒顿爵士取代，克林顿返回英国，被任命为直布罗陀总督



出使凡尔赛宫廷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右边坐着的是路易十六和他妹妹伊丽莎白公主，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正在好奇地研究富兰克林的海狸皮帽子

由于离纽约太远，英军需要在南方另选一个基地。克林顿看中了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和乔治亚的萨凡纳。但是萨凡纳距离纽约有五十天的行军路程。在此之前英军掌握着制海权，可以从海上运兵，但是法国的参战及其海军的介入使形势发生了变化。克林顿不久便认识到英国的制海权面临严重的挑战。1778年4月，12艘法国战列舰和它们的巡航舰从土伦出发，整支舰队载有800多门大炮和4000名士兵。

克林顿接到这一消息后在6月放弃了费城，率领一万名部队北上，以防守他的大本营纽约城。华盛顿率领一支人数与其相近的部队和英军平行前进，两军在蒙茅思县打了一仗，克林顿击退了大陆军，不过伤亡很大。他赶到纽约后不久，法国舰队就在纽约港外面出现了。威廉·豪将军的兄弟理查德·豪指挥一支英国舰队上前迎击，在港口外角逐了十天，最终双方都被风暴吹散。法国舰队随后前往波士顿修理破损的船只，随后前往西印度群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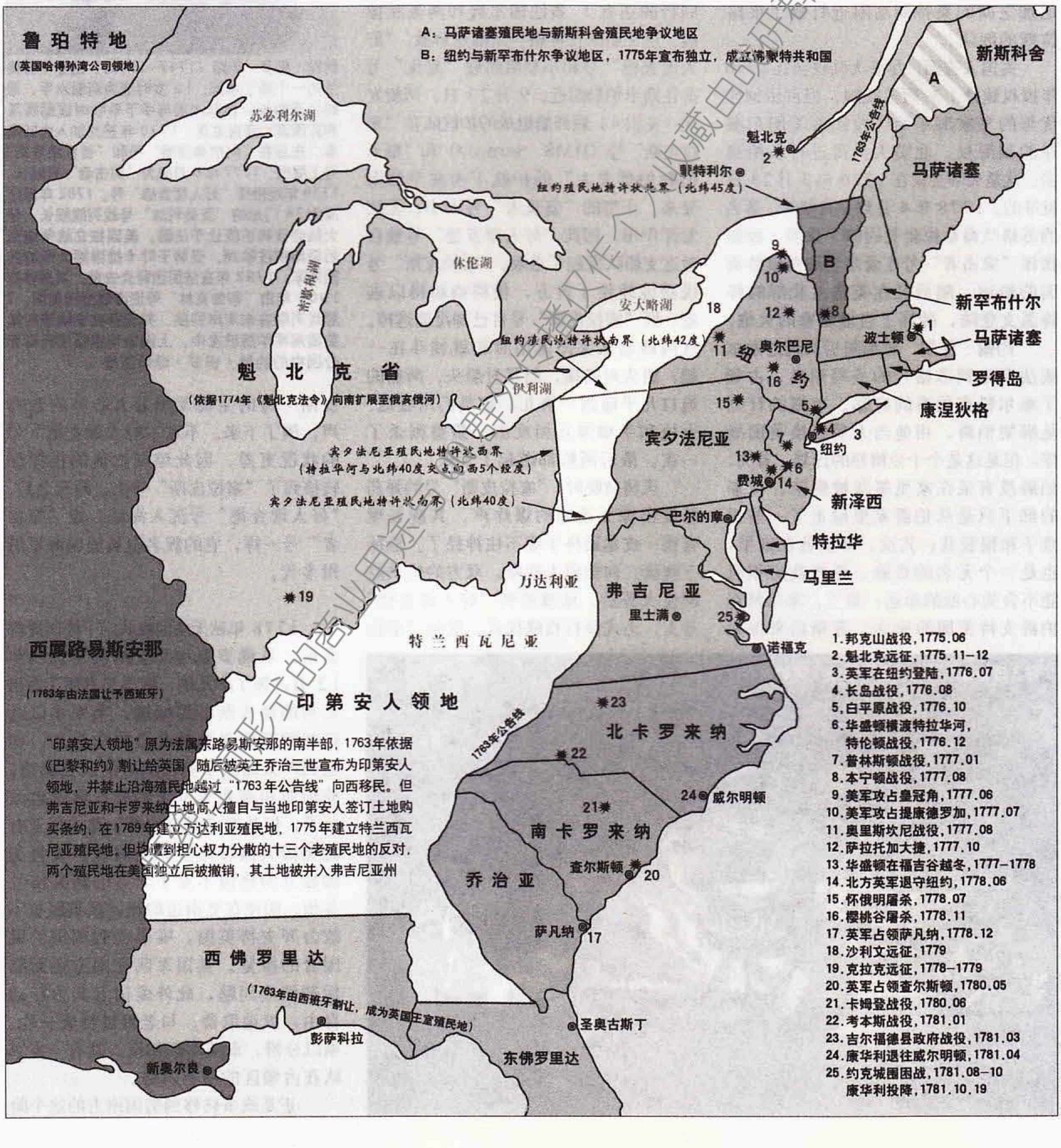
法国的参与使得美国独立战争变为一场国际战争。虽然大陆会议派往马德里的使节约翰·杰伊不懈地努力工作，却一直未能使西班牙王国同合众

国联盟。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三世和首相德·费罗里达布兰卡公爵拒绝承认、而且在战争期间始终没有承认美利坚合众国的独立。在他们看来，共和国这种政治制度是不应当加以鼓励的。卡洛斯三世除了想到在其美洲领地东边出现一个民主国家就害怕外，也不想为俄亥俄河和密西西比河流域的贸易开放新奥尔良港。

然而，卡洛斯三世好歹还记得英国曾经摧毁了西班牙的海上力量，蔑视西班牙的殖民地垄断地位，并且从直布罗陀要塞控制着地中海。经过多方权衡，同时也是在法国外交活动的努力下，卡洛斯在1779年6月21日同法国缔结了一项条约，使他的国家承担参加对英作战的义务。

像西班牙人一样，荷兰人对大不列颠的态度也是很不友好的，他们也念念不忘自己所控制的殖民地被英国势力摧毁的往事。派往海牙的特使约翰·亚当斯没能缔结美荷同盟，但精明的荷兰人从北美革命战争一打响就急忙同反叛的殖民地进行有利可图的贸易，把一船船的军火运到圣尤斯特歇斯岛，从那里转运到合众国。这种贸易活动虽然严格遵守国际礼节的准则，但是在英国人看起来还是大为痛心的——他们的老对手在美洲贸易中大发横财，为华盛顿的军队制造弹药和弹壳。当发现这种买卖不能用搜查商船和没收的办法来制止后，英国就在1780年对荷兰宣了战。在这之后，亚当斯比较容易地从荷兰人那里获得了一项有利的条约，而且设法诱使荷兰银行家不考虑合众国在欧洲金融市场上的低下地位，给了挣扎中的合众国一大笔贷款。

法国参加北美独立战争的用意不仅在于支援北美的革命，而且在于掠夺英国在加勒比海的领地。在1779年一年里，法国舰队在天才的海军将领德斯坦和德格拉斯指挥下夺回了多米尼加、



阎京生绘制 Illustrated by Yan Jingsheng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达。胡德上将和罗德尼上将指挥的英国海军与之苦战，但是罗德尼生性贪财，将对金钱的追逐置于战略需要之上。他分兵袭击荷兰人的圣尤斯特歇斯岛——这里是美洲最大的自由港，也是对北美独立分子运送军火的巨大中转站，财富云集。罗德尼秉性难移，留在圣尤斯特歇斯岛监督战利品的出售，结果英属圣基茨岛、多巴哥岛、蒙特塞拉特岛和尼维斯岛全都向法国和西班牙的联合舰队投降了。就在这紧要关头，罗德尼从英国带来一支新的舰队，和胡德的舰队合流，于1782年4月在瓜德罗普与多米尼加之间的桑特斯岛附近打败了德格拉斯的舰队。

美国人方面，尽管大陆议会在1776年授权建造13艘巡航舰，但占压倒性优势的皇家海军始终控制着美国东海岸的制海权，北美人只得进行私掠袭击，这是大陆会议在1776年3月23日批准的。1778年4月到5月期间，著名的苏格兰裔私掠船长约翰·保罗·琼斯指挥"突击者"号在爱尔兰海面威胁英国的船运，随后又在英格兰北部的怀特黑文登陆，破坏了当地要塞的火炮。

约翰·保罗·琼斯随后又越过索尔威法斯来到苏格兰的圣玛丽岛，占领了塞尔科克伯爵的府邸。琼斯的计划是绑架伯爵，用他当人质交换美国战俘，但是这是个十分糟糕的计划。首先，伯爵没有呆在家里等待被绑架，琼斯的部下只是从伯爵家里偷走了一些银盘子和银餐具；其次，即使他在家里，也是一个无名的贵族，伦敦政府很可能不会关心他的命运；第三，塞尔科克伯爵支持美国的独立。琼斯后来得知这一点后，用自己的钱从手下那里赎回了那些银器，把它们连同一封道歉信一起还给了伯爵。

无论如何，琼斯的登陆是自诺曼人入侵以来英国本土第一次遭到外人入侵，使得英国陷入恐慌状态。尔后琼斯巡航到北爱尔兰，与皇家海军炮舰"德雷克"号进行了一小时的战斗并将其俘获。"突击者"号躲过其他英国军舰的追击，带着战利品和133名战俘返回法国。

第二年9月，琼斯指挥另一条船，42门炮的"好人理查德"号（Bonhomme Richard），再次出现在欧洲海域，和他同行的还有3条法国军舰和两条私掠船。这支船队在苏格兰东海岸解散，"好人理查德"号和小型海防舰"复仇"号前往斯卡伯勒附近。9月23日，两舰发现一支由41艘商船组成的护航队在"塞拉皮斯"号（HMS Serapis）和"斯卡伯勒伯爵夫人"的护航下由波罗的海驶来。小型的"复仇者"号太小，无法发挥作用，因此"好人理查德"号独自对这支船队发起了进攻。"塞拉皮斯"号成功地缠住了对方，使得商船得以逃走，但"塞拉皮斯"号自己却没能逃掉。这两艘船从太阳落山时起就缠斗在一起，船头对船尾，船尾对船头，两船的炮口几乎碰到一块儿，船员们用舷炮、火枪和手榴弹互相攻击，整整厮杀了一夜。最后两船都燃起了大火。

天将破晓时，"塞拉皮斯"号的弹药舱发出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其舰长理查德·皮尔逊终于绷不住神经了。他扯下舰旗，向美国人投降。双方的船员控制住火势后，他被带到"好人理查德"号上，正式举行投降仪式。这时"塞拉皮斯"号的主桅发出裂人心肺的悲鸣声，倒了下来。不过"好人理查德"号的状况更差，因此琼斯把他的指挥部转移到了"塞拉皮斯"号上。两天之后，"好人理查德"号沉入海底，像"突击者"号一样，它的舰名也被美国海军沿用多代。



约翰·保罗·琼斯（1747—1792），出生于苏格兰的一个园丁家庭，13岁时成为商船水手，最终升至船长，但某次因与手下争吵时拔剑将其刺死而逃亡弗吉尼亚，1775年签约加入大陆海军，先后在"阿尔弗雷德"号和"普罗维登斯"号上服役，1777年6月成为"突击者"号舰长，1779年起指挥"好人理查德"号。1782年原定成为74门炮的"亚美利加"号战列舰舰长，但大陆会议将该舰让予法国。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琼斯前往欧洲，受聘于叶卡捷琳娜大帝的俄国海军。1792年在法国因肾炎去世。其遗体在1905年由"布鲁克林"号巡洋舰运回美国，7艘战列舰在东海岸迎接，并安葬在安纳波利斯美国海军学院教堂中。上图为华盛顿波托马克公园中的约翰·保罗·琼斯塑像



"好人理查德"号与"塞拉皮斯"号的战斗

1778年秋天法国舰队南下西印度群岛后，从佛罗里达北上的英军在当年12月占领了萨凡纳，随后又占领了乔治亚州的奥古斯塔等城镇。英军本以为红衫军所到之处叛乱会完全平息，但他们严重高估了美国南方的亲英情绪。乔治亚和南北卡罗来纳有许多效忠派分子，但是在"老自治领"弗吉尼亚有比英国人预计得多的爱国者，支持美国独立的热情不亚于北方的新英格兰各州。即使在更南边的州，亲英派也不敢公开支持英国，唯恐受到周围的爱国者的报复。英国军队在南方还面临后勤供应问题，此外爱国者兵力行动自由，就地取食，与老百姓打成一片、难以分辨，而英军则相反，具有一支军队在占领区的所有劣势。

正是战争转移到美国南方的这个阶

段，才让美国独立战争真正有了“革命性质”，这是因为它动员和唤起了最初不愿参战的大部分民众。战争扩展到原先与世隔绝的地区，普通平民不管情愿与否都必须参战。美国的政治气候变得比以往更加热烈，与英国期待的正好相反，南方各州支持独立的势力不是在削弱，而是增强了。这就是美国独立战争最后几年的主要背景。

在大批英军驻扎的北方，战争出现相对僵持的局面。克林顿将大批英军撤回纽约，处于华盛顿军队的包围和监视之下。美军在此阶段几乎无仗可打，只是派兵西进，对那些袭击白人移民的印第安人部落发动报复性反攻。1778年冬天，听命于弗吉尼亚州议会（而不是华盛顿或大陆会议）的乔治·罗杰斯·克拉克率领弗吉尼亚民兵翻越阿勒根尼山，发动远程奔袭，占领了英军驻守的文森斯要塞，并从英国人的印第安盟友伊利诺伊人手中夺得了包括今日的俄亥俄、印第安纳和伊利诺伊各州在内的大片地区。这次军事行动规模不大，但战略影响极其深远，它使美国在后来的和平条约中获得了从阿勒根尼山脉直至密西西比河的广大领土，其面积超过了原有的十三个殖民地的总和。

1779年冬天，法国舰队在西印度群岛被罗德尼打败的消息令克林顿精神振奋，决定再碰碰运气，去征服南方。他决定占领查尔斯顿，遂于12月26日率领八千人乘船前往南卡罗来纳。不过恶劣的天气耽误了他的时间，主要的攻坚战到1780年3月底才开始，查尔斯顿在5月陷落，5000名大陆军投降。此时克林顿风闻又有法国舰队横渡大西洋向美洲奔来，便急忙赶回纽约，只留下副司令官查尔斯·康华利将军，让他在南方尽力而为。

查尔斯顿的陷落是独立战争以来美国人最惨重的损失。然而恰恰是从这时起，英军开始走背运了。他们获得了一个重要基地，却开始面临一场全民战争。美国南方的英军受到托马斯·萨姆特（引发美国南北战争的萨姆特要塞即以其命名）、安德鲁·帕金斯和“沼泽之狐”弗朗西斯·马里恩（著名的反英影片《爱国者》就是以他的事迹为蓝本拍摄的）为首的北美游骑兵部队【注】的不断骚扰。

在整个美国独立战争的过程中，英国的军官对于北美人那种“血战到底的激情”极为震惊。美国人的冷酷无情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也是一场内部战争，不光美国人和英国人打，美国内部的爱国者和效忠派也要打。在贝高英将军从加拿大发动的袭击、以及英军攻占萨凡纳和查尔斯顿的战役中，效忠派分子起了重要的帮凶作用。当印第安人武士横扫纽约中部、宾夕法尼亚和卡罗来纳农村、屠杀白人边民的袭击中，也可以看到被北美人称为“托利党人”的效忠派民兵的身影。有人痛心地说：“由于我们内部不和而导致的敌对以一种令人震惊的速度蔓延。父子反目，兄弟阋墙，邻里之间也反目成仇。”

虽然不能详细确定到底有多少北美人在独立战争中对英王效忠，但是这批人数量很大，至少占当时美国总人口的五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当战争结束后英军撤出纽约、查尔斯顿、萨凡纳时，有成千上万的人跟着英军跑了。许多人逃到加拿大的新斯科舍，由于流入的人口相当多，因此在原属于新斯科舍的一部分土地上划分出一个新省份来，就是被效忠派称为“顶呱呱的保皇省”的新不伦瑞克。不过，也有一些效忠派分子宁愿认为战争没有发生过，选择留了下来。各地的效忠派势力并不相同，新英格兰的效忠派最少，而纽约城最多，所以英军在整个北美独立战争期间一直能在这里建立稳固的统治。


弗朗西斯·马里恩（1732–1795），祖父母是来自法国的胡格诺派教徒，定居于南卡罗来纳后成为种植园主。“法国和印第安战争”期间参加南卡罗来纳民兵，在边境地区保护移民，驱逐来袭的切罗基族印第安人。1775年成为南卡罗来纳议会议员，翌年9月成为大陆军中校，参加了萨凡纳和查尔斯顿保卫战、考本斯战役，1778年后率领手下在卡罗来纳进行游击作战，令英军头疼不已。1784年成为南卡罗来纳参议员。在今日的美国，有36个州以马里恩的名字命名县、市、学校、大学、车站和国家公园

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站在英王一边的往往是他任命的那些人，比如总督的顾问、海关官员、以及英国国教圣公会的牧师等等。效忠英王的情绪在那些对英国依赖较深的人当中也比较常见，比如卡罗来纳边区那些认为自己受到种植园精英不公正对待的垦荒者，以及中部各州害怕受制于英裔美国人的德国移民等等。以弗吉尼亚为例，在整个战争期间，该州沿海的种植园贵族和内地的小农场主一直在进行一场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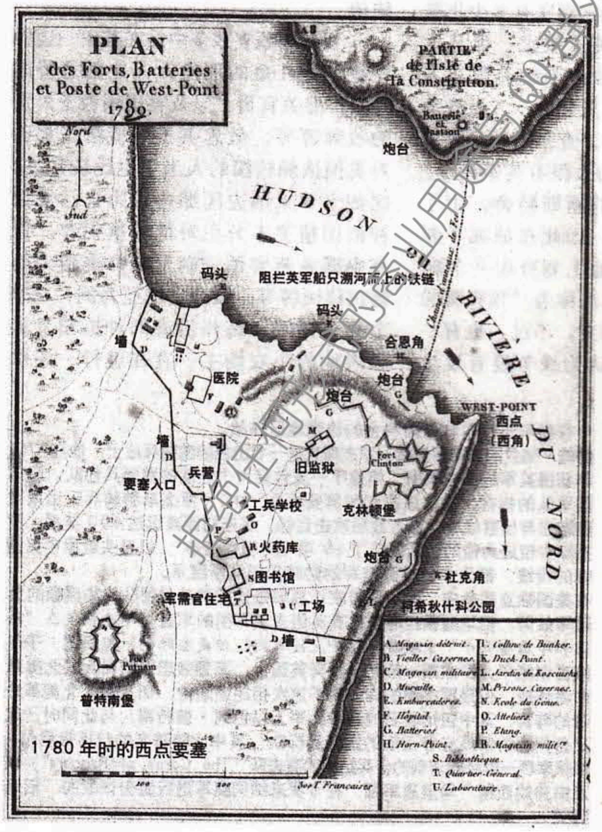
【注】游骑兵（Rangers），也称“突击者”，是一种有着悠久传统的北美军事组织，在十七世纪头二十年里，由于一些敌对的印第安部落经常袭击白人种植园，白人移民为了应付善于使用突袭等战术的印地安战士，组成小型的骑马侦察部队，在屯垦区周围巡防，以观察敌人活动并提供早期预警。由于其巡防范围被称为“Range”，因此这种巡防队的士兵被称为“Ranger”。早期的游骑兵由拓荒者兼任，战时作战，平时种地，类似民兵。
北美殖民地第一支常备的游骑兵部队是1676年由普利茅斯殖民地总督约书亚·温斯洛下令组建的，指挥官是本杰明·彻奇上校，在“菲利普王战争”、“威廉王战争”和“安妮女王战争”中，这支部队参加了同印第安人的交战。此时游骑兵的作战方式已不限于骑马侦察，而是采用由友善的印第安部落传授的印第安式战术，包括埋伏、潜行、伪装、远程突袭、挖掘陷阱和丛林生存等等，有时甚至化装成印第安人。
彻奇手下的两名游骑兵后来分别生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孙子，即十八世纪著名的北美游骑兵指挥官约翰·洛威尔和约翰·格兰。前者在1722–1725年的“洛威尔战争”中率领游骑兵在新英格兰地区同瓦巴纳基族印第安人作战，后者在“乔治王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北美战场）当中在新罕布什尔和新斯科舍的边疆地区作战。
约翰·格兰的表弟罗伯特·罗杰斯也是一名出色的游骑兵战士，他在1751年获得英军的少校军衔，组建了一支包括九个连队的游骑兵部队，受英国军队的指挥。在“法国和印第安战争”中，“罗杰斯游骑兵”运用快速游击与侦察战术，潜入敌后攻击目标，其巡防距离远达400英里。罗杰斯少校还为他的部队制订了19项“游骑兵信条”，以及头戴黑色贝雷帽的传统，都为今日美国陆军的游骑兵部队所继承。
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罗杰斯曾表示要率领他的游骑兵部队为华盛顿的大陆军效劳，但华盛顿担心这位有英国永久军衔的军官（华盛顿虽在“法国和印第安战争”中被英军授予上校军衔，但是临时的）是间谍，于是婉言谢绝了。罗杰斯一怒之下投奔英国人，率领效忠派的民兵同北美革命者作战。但是罗杰斯的许多手下这次拒绝追随他，而是投入北美革命者的阵营，其中包括著名的游骑兵军人以色列·普特南。与此同时，起义各州也纷纷成立非正规的游骑兵部队，其中比较著名的包括丹尼尔·摩根率领一群经验老到的步兵组成的突击队“The Corps of Rangers”，以及由弗朗西斯·马里恩率领、在卡罗来纳同英军进行游击作战的“沼泽狐狸”。

死的斗争，这场斗争的性质差不多等于是在弗吉尼亚对社会制度及其英国国教和地主贵族的一次革命。其结果是，弗吉尼亚沿海平原许多种植园贵族世家痛恨托马斯·杰斐逊和帕特里克·亨利的程度，要远远超过他们痛恨英王及为其效劳的那些官员的程度。还有一些人选择效忠英王，是因为他们认为反抗英国不会有什么效果，或者认为革命者不可能取得独立。

还有一些北美人是出于理念的原因选择效忠的。他们主张以理性和法律来解决问题，而反对革命的无序状态。其中一些人认为，革命是玩弄群众的无知与热情的少数诡计多端的阴谋分子挑拨起来的。保王派作家把华盛顿说成是“拥护一项残暴的事业，欺君叛国，违犯法律，强制别人的良心，割断最神圣的联系”；托马斯·潘恩被说成“格拉布街（17世纪伦敦穷文人和雇佣文人聚集地）上的畜生”。大陆军是“衣衫褴褛的队伍……饥饿和疥疮伴随着他们，埃及所有的虱子都跟他们跑”，他们的统帅是“西哥特人和匈奴人的大首领”，士兵是“半野蛮人、扑灭灯火的讨厌昆虫”。

效忠派知识分子指责革命派宣布把自由作为他们的目标，然后用涂柏油、屠杀和横施暴政的办法来实现。一位保皇派诗人写道：“身涂柏油，沾上羽毛，囚车游街，就是因为喝了武夷红茶。武力和压制难道是强迫解放的手段？”纽约圣三一教堂的教区长也哀叹说“这些伪装反对压迫的人是最残忍的压迫者，他们的小指头比国王的生殖器还粗……在土耳其都比在大陆会议辖区有更多的自由。”

许多革命派都决心使得那些拒绝接受独立、并帮助敌人攻击他们的人丧失复仇能力。在战争期间，各个州的革命议会都通过法律，剥夺效忠派的投票权，没收他们的财物，并把他们逐出家门。被没收的包括佩珀雷尔爵士在缅因沿海绵延30英里的土地，包括佩恩家族在宾夕法尼亚价值500万美元的产业，包括费尔法克斯家族在弗吉尼亚州像殖民地那么大的一片庄园，以及菲利普斯家族在纽约州的大约300万英亩的地产。康涅狄格州在1776年通过严厉的惩罚性法律，规定倘若抨击州议会或大陆会议就会被罚款并关押起来，乔治亚州在1778年宣布有117名效忠派分子犯有叛国罪，并将他们放逐，胆敢回来就处以极刑。虽然真正被革命政权处死的人并不多，但是这些人的生计受到了破坏，家庭支离破碎，本人也经常受到人身攻击。



1780 年时的西点要塞

爱国者和效忠派的内战导致几千名北美人死于自相残杀，这种情况在南方尤甚。1780年12月，美国历史上头号叛徒本尼迪克特·阿诺德带领英军侵入了弗吉尼亚的詹姆斯河流域，把烟草连根拔起，征用奴隶，在白人之间制造恐慌。类似这样的袭击使得白人纷纷逃离沿海地区。在战争的最初几年里，美国中部和南部港口城市的人口减少了一半。然而也有一些内地人因为当地的效忠派与印第安人的血腥袭击而逃向东海岸寻求避难，从缅因到乔治亚都发生了这种内地居民向海边逃亡的情况，在纽约、宾夕法尼亚和弗吉尼亚尤甚。

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最残酷的内战发生在“沼泽之狐”马里恩的根据地南卡罗来纳州。夜间袭击、抢夺牲畜、私刑、暗杀、伏击，以及现代北爱尔兰常有的各种暴行，在南卡罗来纳无不一一具备。一名英军将领曾经写道，“辉格党人（爱国者）和托利党人（效忠派）之间的深刻仇恨使得他们的处境实为可悲，每天都有人成为这种仇恨的牺牲品，其残酷程度日甚一日。辉格党人似乎坚决要消灭托利党人，托利党人对辉格党人也是如此。如果不能制止屠杀活动，这里再过几个月就会成为人烟稀少的荒凉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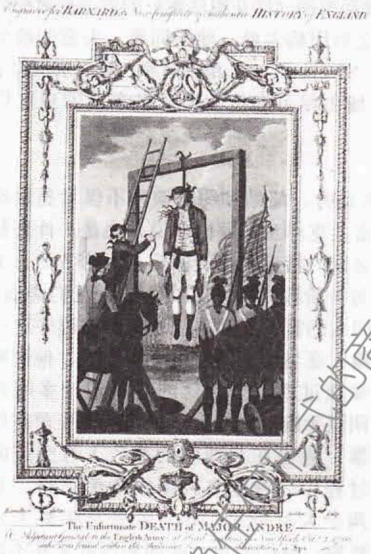
在相对平静的北方，1780年最令人吃惊的事件是本尼迪克特·阿诺德将军的叛变。这位独立战争初期的英雄如今对战争的进程日益感到失望。他对爱国者的行动长期感到不满，与一位效忠派的女士结了婚，还债台高筑，不久以前在军事法庭上因为盗用政府资金受到斥责。阿诺德向刚刚回到纽约的克林顿提出以2万英镑（大约相当于今天的219万美元）的代价出卖他手中的西点要塞。如果英军获得这个要塞，华盛顿不仅会丧失对哈得孙河流域的控制权，而且可能全军覆没。克林顿立即抓住这个机会，派遣他的间谍头子、年轻的约翰·安德烈少校去商谈投降事宜。

1780年9月21日，安德烈乘一只单桅小帆船向哈得孙河上游驶去，深夜在河西岸的斯托尼角与阿诺德碰头。阿诺德把西点要塞结构、装备、库存和驻军人数的草图、受到进攻时的行动预案、以及不久前一次军事会议的记录交给了安德烈。在归途中，安德烈在两军之间的无人地带碰上大陆军的巡逻人员，被带到附近的指挥官那里。指挥官从安德烈的靴子里搜出了情报，但是不相信阿诺德会叛变，便派人到西点去要求解释。阿诺德连夜带着妻子弃营出逃，后来在英王的军队中得到准将军衔，二十年后在穷困潦倒中去世，其名字在美国成为“卖国贼”的同义词。安德烈少校被视为间谍，判处绞刑，10月2日被绞死。四十年后他的遗体被迁葬回英国，安葬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英雄角”，与英国的历代国王和伟人为邻。

在南方，康华利将军一直被克林顿将军的命令死死拴在查尔斯顿，他为此暴躁不安。克林顿认为为守住南卡罗来纳是



其名字在美国遗臭万年、成为“卖国贼”同义词的本尼迪克特·阿诺德（1741–1801），原为康涅狄格商人，1775 年列克星敦战役后被康州议会任命为民兵上尉，指挥了袭击加拿大的远征，参加萨拉托加战役，最终升至大陆军少将（当时最高军衔）。1779 年在妻子影响下开始策划叛变，叛逃后被英王任命为准将，1782 年后逃往英国定居。在萨拉托加战场史迹公园的纪念碑上，三面刻有盖茨、斯凯勒和丹尼尔·摩根三位将军的塑像，第四面是空白的；在西点军校的一块纪念碑上刻有参加了独立战争的所有美国将军的名字，但本尼迪克特·阿诺德的名字没有出现，而是被称为“某少将，1740 年出生”。下图为英军少校安德烈被绞死的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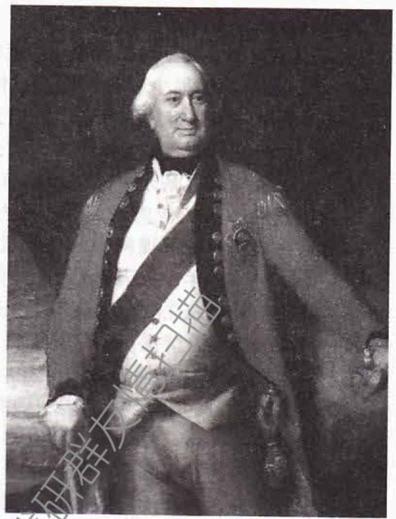


南方战场的主要目标，深入内地必须以海军控制海岸线为前提。但是康华利急于向内地推进。他认为弗吉尼亚是殖民地抵抗运动的心脏，应当全力征服并占领之，为此要先占领北卡罗来纳。这个设想无疑是错误的，南方的军事枢纽不是弗吉尼亚，而是查尔斯顿，在那里有南方唯一重要的港口。只有在那里，英军才能为自己补充给养，并防止敌人获得给养。英军从查尔斯顿不仅可以控制南边的乔治亚，而且可以在北卡罗来纳和弗吉尼亚的切萨皮克湾沿岸建立一些据点。

不过，康华利在1780年8月16日的卡姆登战役中打败了盖茨将军之后，其军事声望日增，英国政府支持他的北上计划。与此同时，华盛顿指定他的“右臂”纳撒尼尔·格林将军指挥南方军队。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因为格林对南方地区、以及如何在南方作战都比较了解。他做出了和华盛顿一样的决策，即尽力避免大规模的遭遇战。格林把手下的部队编为小而灵活的分队，运用如今被称为“游击战”的战术，利用一切机会偷袭英军以及当地的效忠派分子，然后迅速撤往内地。

1781 年1 月，康华利率领部队杀入北卡罗来纳。他早已领教过殖民地民兵的枪法，知道他自己的部队不善于使用火枪，因此转而依靠短兵相接的战术来发挥马刀和刺刀的作用。但是美国人拒绝用这种方式同康华利作战。1月17 日，丹尼尔·摩根准将指挥1000名民兵在考本斯包围了康华利的先头部队，1100人的英军部队被打死110 人，830 人被俘，而摩根的部队只损失12 人，63 人受伤。摩根随后与格林的部队会合，向北撤入弗吉尼亚，康华利在后面紧追。他在一路上击溃了许多游击队，可是在他走过之后，乡村间又出现了武装民众。由于格林拒绝与其进行决战，因此康华利没有可以打击的重点，辛辛苦苦的唯一收获就是毁坏了北美人可以用来同欧洲交换军火的大批农作物。

1781 年3 月15 日，始终在寻找与北美军队决战机会的康华利终于在北卡罗来纳州吉尔福德县政府大楼（Guilford Court House）逮到了一支美军部队。参战的英军有1900 人，而美军人数多达4400 人。但是由于民兵全体溃散，逃进了树林，结果让英国军队取得了胜利。总的来说这场战役给双方造成的损失差不多，美军79 人阵亡，185 人受伤，75 人受伤后被俘，26 人失踪；英军93 人阵亡，413 人受伤，26 人被俘。此时康华利的部队早已远离查尔斯顿的基地，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兵马，于是他在吉尔福德县政府大楼战役后只好掉头前往海边的威尔明顿，从那里要求皇家海军提供援兵。格林则在这场战役后放弃了北卡罗来纳的辽阔领土，火速南下前往南卡罗来纳，去帮助那里的爱国者消灭效忠派武装。



查尔斯·康华利（1738–1805），第一世康华利侯爵，出生于贵族家庭，先后在伊顿公学和剑桥大学就读，1757 年加入陆军，参加过七年战争。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于1786 年被任命为印度总督，后任爱尔兰驻军总司令

格林离开北卡罗来纳后，康华利带着残余的1500 人兵力重新向弗吉尼亚进军，英军每到一处便大肆破坏。华盛顿派年轻的法国志愿者拉法耶特侯爵带领增援部队前往弗吉尼亚行使指挥权，这支部队包括冯·施托伊本男爵训练的新兵和1200 名大陆军的老兵。而康华利的部队由于得到弗吉尼亚英军的增援，又扩充至8000 人。康华利急欲与拉法耶特作战，但拉法耶特避开了他，牵着英军在东弗吉尼亚兜圈子。

在英军奔突于南北卡罗来纳和弗吉尼亚的这几个月里，克林顿一直守在纽约。他担心康华利那支部队的安全，命令其在约克河与詹姆斯河之间的弗吉尼亚半岛顶端上待命，然后乘军舰撤退至纽约或查尔斯顿。康华利奉命在8 月撤到弗吉尼亚半岛的约克城，并开始在那里修筑工事。此时他手下的兵力有7000 人左右。

当年5 月，华盛顿在纽约附近的司令部里与北美法国远征军司令德·罗尚博伯爵举行了会谈，双方形成了共识，认为英军分散在纽约和弗吉尼亚两地，如果西印度群岛的法国海军司令德格拉斯能够切断这两处英军的交通，那么美法联军可以对任意一处的英军发动陆海联合作战，并将其歼灭。罗尚博派一艘法国巡航舰前往西印度，以转达华盛顿关于海上力量是制胜关键的指示。与此同时，罗尚博的部队从罗得岛的纽波特转移到纽约附近，与

华盛顿的部队会合。

在大多数历史故事中，乔治·华盛顿给人的印象是不善谎言【注】。可是恐怕很少有人知道，这位美国国父竟然是美国历史上最早的间谍组织的头子。在效忠派云集的英军大本营纽约，活跃着上千名为大陆军和大陆会议工作的间谍，其中有些人伪装成效忠派分子，比如成功的纽约商人罗伯特·汤森，他报名参加了效忠派民兵，还经常为效忠派杂志撰稿，但是在华盛顿的间谍网中，他的代号是“小库珀”。这一事实直到1939年才公诸于世。正是依靠其出色的间谍网，使得华盛顿在整个独立战争中获得了无数关于英军动向、兵力和补给路线的重要情报。一位英军将领后来说，是情报而不是军事实力，才让华盛顿赢得了独立战争。

1781年7月，在纽约盛传着一则消息，说一支法国舰队出现在罗得岛州海面，停泊在纽约港的英国舰队将出发前去截击。罗伯特·汤森用五倍子酸把这一重要情报写在了一份商业文件的背面，只有用硫酸亚铁才能显影。这份情报通过纽约的情报网传到了华盛顿手中。于是他向纽约附近调遣军队，形成兵临城下之势，迫使英国舰队留在港内。罗尚博派出的那艘巡航舰得以安然南下，向德格拉斯送去华盛顿的重要指示。

德格拉斯的舰队在8月13日启程北行，与之同行的还有3500名法国陆军士兵。他用30艘战列舰封锁了弗吉尼亚海岸，切断了康华利从外界获得增援和情报的渠道，也截断了约克城的英军从海上窜逃的退路。华盛顿获得这一情报后，留下2000人在纽约牵制克林顿的17000人，他自己率领美法联军（*9500名美军和7800名法军*）急速南下，奔往约克城。

康华利消极地等待了两个月，美法联军在九月底向约克城发动进攻。法军的攻城炮火摧毁了约克城外的土围工事，康华利的防御阵地瓦解了。10月14日打算孤注一掷地突围，但是被打得粉碎。到最后，英军只剩下一门可以发射的火炮了。10月19日，康华利指挥的七千名英军全部投降。他本人称病没有露面，由其副手向华盛顿交出了自己的佩剑。当时在场的军乐队吹响了一曲名为《世界天翻地覆》的小调。克林顿正是在这一天从纽约启航南下增援的，但他听到康华利投降的消息后便掉头返航了。

约克城战役意味着美国独立战争的尾声。除了少数局部冲突外，战斗行动至此全部结束。只是合众国仍未取得战争的胜利，英军仍然占领着纽约、萨凡纳、查尔斯顿和威尔明顿等港口。不久之后，罗德尼在多米尼加与瓜德罗普之间打败了德格拉斯的舰队，英国重新获得了制海权。不过，对于影响北美革命进程来说，这已经太迟了。康华利的失败在英国引起了要求停战的广泛呼声。



1782年3月20日，主战的诺思勋爵和他的托利党内阁终于垮台。乔治三世也处于个人失败的痛苦中，甚至说要退位返回汉诺威。英国全国对诺思勋爵和他的托利党群情激愤，使得国王无法成功地组织大选，只好同政治反对派和解。1765年担任首相时曾经取消《印花税法案》的罗金厄姆勋爵再度执政，但是不久之后因病去世。他的同事、失意的政治家谢尔本勋爵（Lord Shelburne）继任首相，从而承担起了从第一大英帝国的废墟中尽可能抢救出更多东西的艰巨任务。

当和平的机会来到时，缔结和约的谈判不仅对英国政府，而且对在巴黎的富兰克林及其同僚来说，也是一件伤脑筋的任务。根据大陆会议的指示和法美同盟条约的条款，美国代表必须在交涉的每一阶段都同路易十六的大臣们协商。性格随和而且喜爱法国人的富兰克林本来是会严格遵守这一准则的，可是这时约翰·亚当斯从马德里赶到巴黎，他刚刚领教过西班牙宫廷的各种诡计多端的阴谋手腕。约翰·杰伊也从海牙前往巴黎，他也在与精明的荷兰人打交道的过程中领教了各种新的政治策略。这两个人对于凡尔赛宫的外交手腕十分机警。他们知道，法国和西班牙并不是为了要在西半球建立一个强大的共和国而流血牺牲和耗费自己财力的。除了拉法耶特侯爵这样的少数理想主义者外，无人希望在美洲建立一个共和


1781年9月的弗吉尼亚角海战，画面左侧是德格拉斯指挥的法国舰队，右边是托马斯·格雷夫斯指挥的英国舰队。海战结果是英军5艘战舰受损，1艘凿沉，346人伤亡；法军2艘战舰受损，220人伤亡，取得海上优势并继续封锁约克城

【注】这种说法的始作俑者是华盛顿的传记作者梅森·韦姆斯。在华盛顿去世后不久，韦姆斯出版了一部文学性多于纪实性的华盛顿传。在这部作品中，韦姆斯除了把喜好安逸享乐、生活方式颇有南方种植园贵族风度的华盛顿描述为朴素的革命者之外，首次创作了著名的“少年华盛顿与樱桃树”的故事

国，路易十六的大臣早就警告过他，这可能会动摇他的绝对君权。此外路易十六仍然怀有扩大帝国的梦想，他渴望收回五大湖和密西西比河流域，重建“新法兰西”，这不是一个难以识破的秘密。

西班牙也有它的目的和手腕，这也是谁都知道的。它明确反对北美十三殖民地的独立，而它之所以参战，是因为法国答应帮助它收复直布罗陀。十三个殖民地的叛乱使得西班牙的海外属地也出现了麻烦，而且直布罗陀并未到手，因此它要求在北美获得大量补偿。总之，两个波旁大国一致认为美国人应满足于占领阿巴拉契亚山脉以东的沿海地区，准备阻碍美国把俄亥俄河流域、五大湖和密西西比河流域这样的内地地区包括在其领土之内的计划。

富兰克林、亚当斯和杰伊这三名美国代表受命在和英国的谈判中与法国通力合作。但德韦尔热讷坚信法兰西不会同英国达成任何和平协议，除非它的西班牙盟友实现自己的战争目的——收回直布罗陀。美国人开始担心和法国人的联合会使战争无限期拖延下去。虽然此时英美两国之间已经没有大规模交战，但战争继续的可能仍然存在，争取独立的希望仍有可能以失败告终。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美国代表们开始背着法国人在巴黎与英国特使秘密谈判。

在谈判中，英国人同意把阿巴拉契亚山脉与密西西比河之间的领土交给美国，这时因为伦敦的新殖民大臣真诚地希望“根据最崇高的条件和采取气量最大的方法同美洲和解”。难以解决的是加拿大边界问题。富兰克林和其他人要求得到全部加拿大，但是谢尔本勋爵知道，如果同意这个条件，他的内阁就会倒台。

1783年9月3日，富兰克林、亚当斯和杰伊与英王代表戴维·哈特利在英国大使馆隔壁的约克旅馆签署了最终和约，英国承认北美十三殖民地的独立。双方划出一条边界，它从缅因地区与新斯科舍殖民地的边界开始，沿着北纬45度线到达圣劳伦斯河后向上游延伸，穿过五大湖区，直至它们的源头。在这条线以南，密西西比河以西，佛罗里达以北的广大地区全部成为美国领土。除此之外，英国还承认了新英格兰渔民在纽芬兰渔场的捕鱼权。

同一天英国与法国和西班牙的代表



约翰·特恩布尔为国会大厦中央圆厅创作的《康华利勋爵在约克城投降》。美国国旗前骑马者为华盛顿，由于康华利没有露面，受降仪式由画面中央的本杰明·林肯少将主持。画面左侧与华盛顿对称位置的是法军司令罗尚博伯爵；拉法耶特侯爵在美军行列中，为华盛顿身后左起第二人。国会为这幅画支付的酬金为8000美元

也在巴黎分别签订了和约，英国承认西班牙在战争中对西佛罗里达和米诺卡岛的占领，并将东佛罗里达也割让给西班牙，以换取巴哈马群岛。但最重要的是英国保住了直布罗陀，依然控制着地中海的入口（西班牙人试图用波多黎各来交换直布罗陀，但是在担心竞争的牙买加岛种植园主的游说下被英国国会拒绝）。法国人得到了在纽芬兰附近的捕鱼权，重新占领非洲海岸的塞内加尔奴隶贸易点，此外还得到了盛产棉花的多巴哥岛。除此之外，法国人再无其他物质收获。不过，其主要目标已经实现，十三个殖民地从大不列颠联合王国中分离出来，英国在七年战争后获得的优势地位受到了严重削弱。

英国在与美国的和约中还提出了两条要求，一是美国商人偿还战前拖欠英国商人的债务，二是保证效忠派分子的人身和安全。对于第一点要求，大陆会议只是作出了一项难以履行的圆滑保证，答应“不在（英国商人向美国债务人）收取正当债款的道路上设置法律上的障碍”，与此同时还提出了一项反要求，即要求英国归还英军在战争期间劫走的一切财产和奴隶。英国人虽然答应了这个反要求，但这也是一项易于承诺而难于履行的保证，因为有些英国废奴主义者一想到要把人送回去当奴隶就觉得毛骨悚然。

最棘手的是如何处理北美十三州的效忠派亲英分子的问题。大陆会议在巴黎和约中只是答应“尽力劝告有关的几个州保证归还效忠派的财产”，但是只有南卡罗来纳州对效忠派的财产持开明态度。有四五万名“联合王国的效忠分子”被迫到英国、加拿大或西印度群岛重新白手起家。虽然一些人获得了成功，但另一些人却陷于痛苦之中，而且再难恢复过去的生活。1783年，来自马萨诸塞的前富裕律师托马斯·丹福思在负责受理效忠派赔偿请求的英国官员面前描述了他效忠于英王的后果：“年近四十，过着被放逐的生活，回家就会被处死，与远在他国的亲人失去了联系，没有职业，甚至没有生存的愿望”。一些效忠分子从英国的赔偿委员会那里获得了对他们损失所作的补偿，但只是杯水车薪，聊具安慰意义而已。效忠分子的损失总额多达4000万美元（硬币），但是英国最终只补偿了1600万元。

“我们合众国的人民……”

1776年7月4日在《独立宣言》上签字的56个人身份很有意思，其中8名是商人，6名是医生，5名是种植园主，还有26名是律师。律师在北美的地位要比在英国高，英国的贵族和猎狐乡绅们仍然信守封建传统，把律师鄙视为一种伺候人的人，认为这种人在草拟遗嘱和文件时有用，但还不能同自己平起平坐。但是在美国没有贵族和猎狐乡绅，商人和种植园主们与律师们之间不存在这种不可逾越的鸿沟。埃德蒙·伯克在英国议会里列举那些使美洲危机四伏的势力时，特地把律师这个阶层放在特殊重要的位置上。他提醒其议会同僚，对法律的研究在北美洲比在其他地方更为普遍，从事这一职业的人为数很多，势力也很大。律师所受的法律训练令他们“目光敏锐，爱好钻研问题，行动机警，敏于攻击而

巧于防守，足智多谋”。

正是这样的阶级构成，使得美国革命最终成为一场有产者的革命，而非贵族革命或无产阶级革命。参加大陆会议的代表们几乎全都是在政治管理方面具有天赋才能的有产者，没有像尤利乌斯·恺撒那样急于想在动荡时代进行冒险活动的不安分的贵族子弟，没有像拿破仑·波拿巴那样伺机夺权的职业军人，也没有像丹东那样引导无产阶级以反对其同事的狂热政客。华盛顿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使自己成为时局的主宰，但这种做法同这位弗吉尼亚绅士的精神是格格不入的。当大陆会议有时把最高权力交给他时，他最后总是按时把它交还，不让它受到个人野心的玷污。

大陆会议的活动方式也不是引人注目的。出席会议的代表经常不超过二三十人，大多数是律师，他们经常用几周或几个月的时间来显示他们的辩论和推理能力，因此大陆会议更像乡村俱乐部里的辩论会，而非法国大革命恐怖时期的公安委员会。而且它举行会议的地点是只有两万多爱好和平的教友派居民的小市镇费城，而不是挤满了六十万军人、贵族、教士、商人、手工业者、粗野的无套裤汉、狂怒的无产阶级妇女和野心勃勃的职业革命家的巴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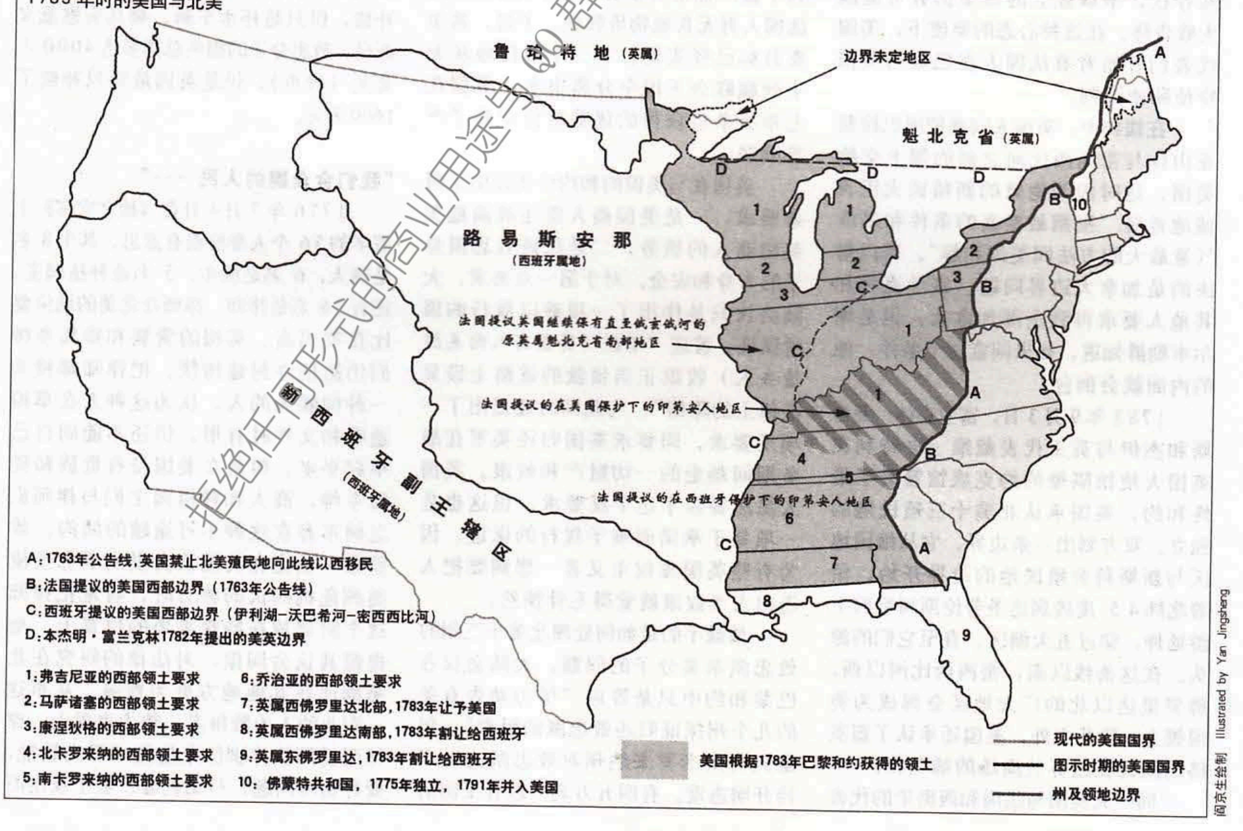
有一种观念，认为在美国打仗的将永远是“武装的农民”，这种想法来自美国早期生活的现实。在美国，军人就是武装的老百姓。军官阶级、军人独裁、宫廷革命、军事政变、军方和文职政府之间的争权夺利——所有这些在欧洲大陆政治生活中一再发生的事，在美国的政治舞台上却是看不到的。联邦宪法明确规定文职政府控制军队，这不过是确立了从殖民时代起就早已确立的一个传统。这一点与美国早期军事领导人的出身有关。华盛顿曾作为弗吉尼亚军队的一名上校在与法国人和印第安人的战争中出生入死，但他本人是一个种植园主。他手下的少数军官也曾经在“法国和印第安人战争”中听到过枪弹的呼啸声，比如霍雷肖·盖茨、丹尼尔·摩根和菲利普·斯凯勒，但他们的军事科学知识也是有限的。华盛顿手下的大多数军官直接来自平民。本尼迪克特·阿诺德在入伍前是康涅狄格纽黑文城的商人，纳撒尼尔·格林是罗得岛的农场主兼铁匠，安东尼·韦恩是宾夕法尼亚的农场主兼测量员，“沼泽之狐”弗朗西斯·马里恩是南卡罗来纳的种植园主，而令易洛魁人闻风丧胆的约翰·沙利文则是个律师，他对军事远不如对法律诉讼要点那样精通。

比军官更缺乏经验的是那些由未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上尉们率领的民兵。在宾夕法尼亚，在弗吉尼亚，在俄亥俄河流域，边远地区的农民也是手持来复枪的优秀射手，他们随时准备并能够保卫自己的家园。但在欧洲式的职业军队里，这些家伙都是难以驾驭的人。他们具有强烈的地方主义意识，拒绝在任何大的战略行动中进行合作。

另一方面，对于北美人说，在地方上当民兵比什么都好，一个马萨诸塞部队的民兵每天可以领到十又四分之一便士银币，而英国正规军不过每天四便士。民兵们不仅得到更多的薪饷，而且在服役一个夏季期满后便可以把战俘、毛毯和背包全部据为己有，甚至连来复枪也背回家去。他们还有糖、姜、朗姆酒和糖蜜的定量供应。逃兵只收到轻微的惩罚，士兵们在训练后随便放枪，在哨位上睡大觉，在行军途中随便开枪射猎物。那些被选任的军官怕不得人心，很少惩办违法乱纪的士兵。

在独立战争前和独立战争期间，美国地方军人的生活如此随便，以致于他们的指挥官有时都不知道他手下有

1783 年时的美国与北美



多少人。民兵们都愿意在离家近的地方驻防，这样一旦有事可以随时回家。当马萨诸塞州议会投票同意派遣军队到纽约州东北的皇冠角要塞时，明确规定"不应强迫他们开到奥尔巴尼以南、或斯克内塔迪以西的地区"。此外，短期服役也反映了大陆会议以及当时美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对常备军的恐惧，他们把常备军与专制和独裁联系到一起，认为一旦打赢了战争，军队就成为多余的了。其结果是，士兵往往在刚懂得如何开枪、如何听从口令之后就要回家去了，往往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不得不去征募新兵。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许多次失败都是由部队本身的这种短暂形式造成的。理查德·蒙哥马利将军在1775年底攻打魁北克时，他麾下的新英格兰部队全都是在12月31日午夜服役期满的，而他知道这些人连在部队里多待一天都是肯定不干的，这正是他惨遭失败的原因。

正是因为民兵的日子过得实在逍遥，因此华盛顿的大陆军在整个独立战争期间一直面临着与各州民兵争夺兵源的问题，而他明智地针对这种情况采用了循序渐进的作战策略——首先在新英格兰，然后在中部各殖民地，最后在南方——而不是当年对法国人和印第安人作战那样，在所有地区一同开战。这样一来，分散于各地的民兵就更能发挥作用。但这也是相对的而已，因为许多场合下都是刚一交火，大批民兵便惊惶逃散，溃不成军，把大陆军撇在那里四面受困，后者只得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挣扎，目的是为了保命而不是争取胜利。1779年3月在萨凡纳是如此，1780年8月的坎登战役是如此，1781年10月的约翰斯顿战役也是如此，真是不胜枚举。

但这样一支混杂不齐、纪律松弛的军队，为什么能战胜训练有素的英军和黑森雇佣军呢？在美国的历史教科书里，充满了英雄主义、勇敢无畏和自我牺牲的故事。来自法国的拉法耶特侯爵和德·卡布男爵，来自普鲁士的冯·施托伊本男爵，以及来自波兰的卡西米尔·普拉斯基将军和塔戴乌斯·柯希秋什科将军帮着鼓励和训练来自农场和作坊的新兵。德斯坦和德格拉斯的舰队，以及来自路易十六金库的现款，为年轻的共和国提供了迫切需要的援助。非专业的美国将军们的非正统思想同英国指挥官那种专业性的严格头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倒给殖民地人民以意想不到的有利条件。

但是这些理由仍然很难解释为什么英国人在约克城战役之后很快就投降了。今天人们普遍接受的看法是，独立战争并非是美国人打赢了，而是英国人认输了，或者说英国人干脆自动放弃了，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的事业从长远来看是没有希望的。北美的辽阔领土、复杂地貌、加上殖民地人民居住分散，使得英国人找不到可以一击致命的要害。在独立战争的头四年里，虽然所有人口最多的城市都落入英国人手中，但这并没对整个战争产生什么决定性的影响。美国的中心可以说是无所在、又无处不在的，它存在于人们的心中。此外，法国人给美国民兵和大陆军带来了最具有关键意义的支援，而美国同法国长期结盟的前景也使英帝国深感不安。



玛丽·约瑟夫·保罗·伊夫·罗克·吉尔贝·杜·莫蒂埃（1757–1834），拉法耶特侯爵，出生于上卢瓦的一个贵族家庭，远祖吉尔贝·拉法耶特元帅曾在奥尔良战役中曾与圣女贞德一同作战。拉法耶特年轻时父母双亡，由祖母抚养大。他热衷于研究启蒙派思想，1777年带着富兰克林写的介绍信前往美国，参加反对英国王权的起义，大陆会议授予他无薪酬的少将军衔。参加了福吉谷越冬练兵、白兰地万因战役、蒙茅思战役等等，1779年返回法国与罗尚博协调法美联合作战事宜。1781年参加约克城战役，当年冬天返回法国。1789年选入三级会议，攻占巴士底狱后成为国民自卫军司令。法国革命初期作为"新旧大陆的英雄"名噪一时，但由于倾向于君主立宪制而遭到雅各宾派逮捕，不久逃亡荷兰，被奥地利逮捕，关至1797年。返回法国后不再过问政治，但1830年支持七月革命和奥尔良王朝。其妻子和女儿在1792年被雅各宾派逮捕，在美国大使詹姆斯·门罗游走下保住了性命，但其姐妹、母亲和外祖母都在罗伯斯比尔恐怖时期被送上断头台处死。



1781年北卡罗来纳吉尔福德县政府大楼战役中的马里兰第1团士兵

在这场战争中发生的最具有典型意义的要算大陆军的解散了。约克城战役之后，大陆军的官兵虽然长期无仗可打，却必须继续服役，而1781通过的《邦联条款》(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虽然授予大陆会议维持一支战时陆军的权力，却没授予其征税养活这支陆军的权力。1783年3月，一伙军官在纽约附近的纽堡（Newburgh）发表宣言，要求发放拖欠的军饷，并且允许士兵们解甲归田。最后华盛顿亲自赶往纽堡对这些老部下进行安抚，才最终平息了这场"纽堡密谋"。当年6月，在同英国实现最终和平的前夕，驻扎在宾夕法尼亚州兰开斯特的大陆军士兵再次发动兵变，叛乱的士兵占据了火药库和大陆会议所在的政府机关，要求发给薪饷，否则使用武力。这次兵变也是靠华盛顿劝说才得以平息。

正是在这样一种动乱的背景下，大陆会议仓促地解散了大陆军。1783年12

月4日，华盛顿在纽约市弗朗斯旅馆的大房间里挥泪向他的军官们告别。当那简单而动人的仪式完毕以后，这位统帅迈步走上街头，穿过士兵的行列和拥挤的人群，走向停泊在白厅渡口的专用船，这条船将载着他横渡哈得孙河，返回他在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里亚的家园——弗农山庄。当这位身材高大的弗吉尼亚绅士站在船上，光着头发花白的脑袋颔首表示最后的谢意时，纽约港内礼炮隆隆，钟声齐鸣，群众一片欢呼。在整个独立战争中，没有任何事件比这更富于美国特色了：武装的民众和他们的统帅在战争结束后都自行解散，重新回到民间中去。在这个事件中，以及此后美国历史上的许多次战争中，“结束战争”同“结束（解散）军队”成了同义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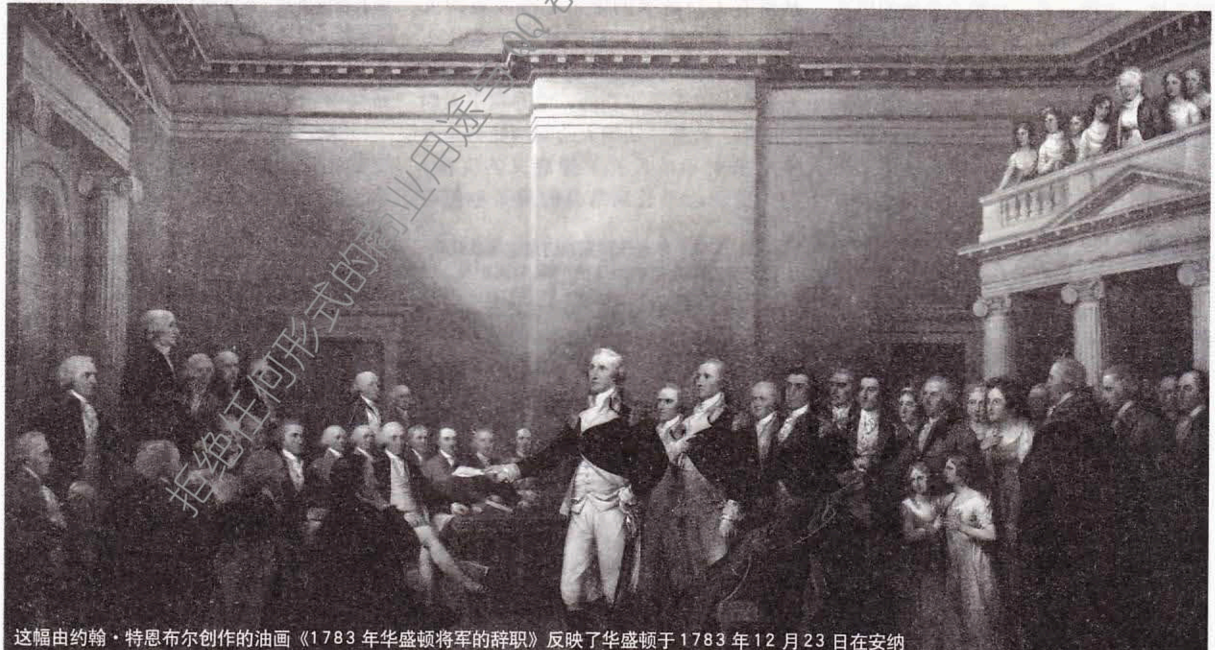
华盛顿为他之后的继任者开创了另一个榜样，即辛辛纳图斯将军的榜样、而非尤利乌斯·恺撒的榜样。众所周知，恺撒在他的高卢战争之后回到意大利，率领部队渡过卢比孔河，击败庞培和元老院的部队，最终成为罗马的终身独裁者和罗马帝国事实上的奠基人。而辛辛纳图斯这位罗马将军在为共和国效劳之后便解甲归田，回到他的农庄，写写回忆录，搞搞女奴隶。事实上退役的原大陆军军官们意味深长地把他们的联谊组织取名为“辛辛纳图社”，还请华盛顿出任这个组织的主席。俄亥俄河畔的辛辛那提城正是以这个退伍军人组织来命名的。

在华盛顿之后，以军人身份获得美国总统地位者大有人在，比如安德鲁·杰克逊，威廉·哈里森，扎卡里·泰勒，尤利西斯·格兰特，西奥多·罗斯福和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等等。这些人当中有好多在开始时并非正规军的成员，而是出身于地方民兵。他们的军事生涯说明，他们的成就是一个普通美国人的成就，而非专业化的职业军人的成就。正是由于美国没有职业军官阶层，一个公民兼士兵的人才能够比较容易晋身美国政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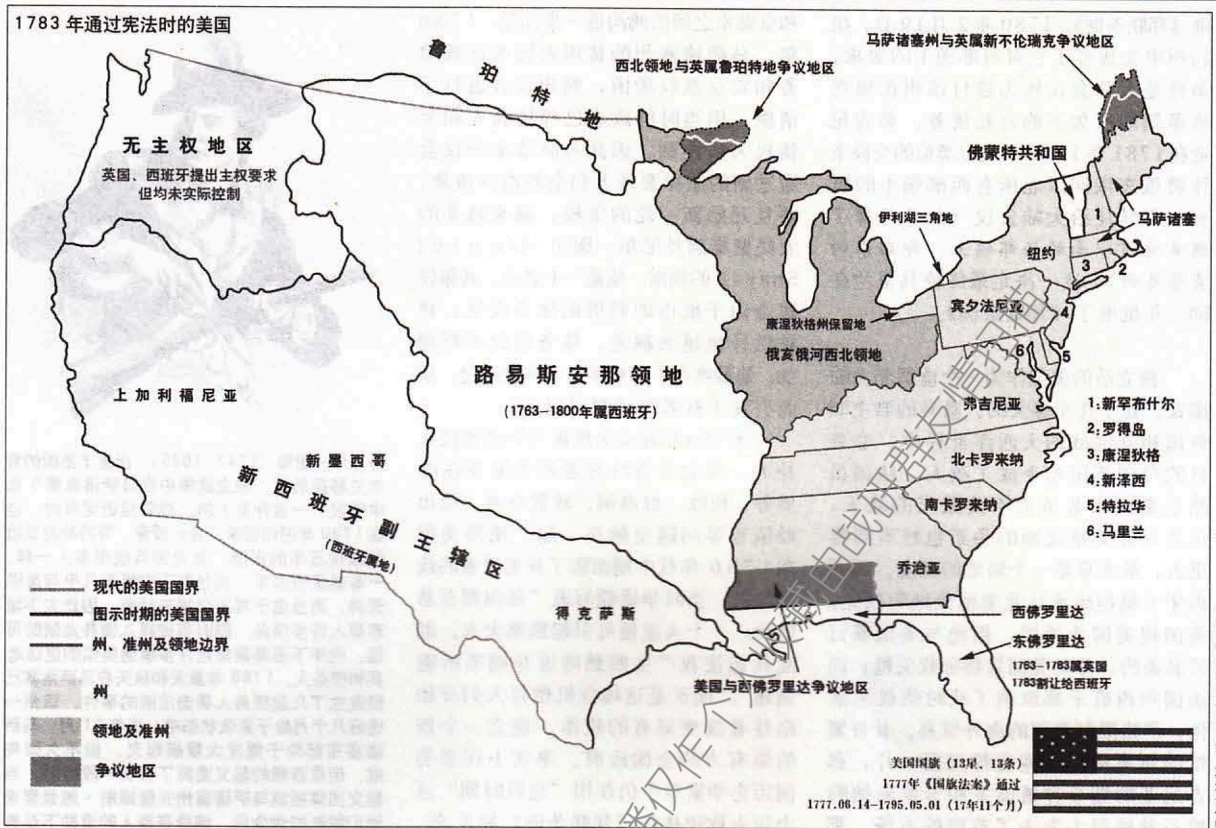
还在独立战争如火如荼的1777年，大陆会议就开始考虑组建一个长期的全国性政府的问题。这个任务有点令人望而生畏，因为各个殖民地在宣布独立以前曾经就边界、西部领土、债务、印第安人等许多问题发生过争吵。它们只是由于与英国的共同矛盾而走到了一起，大陆会议只是一种不牢靠的联合。当独立战争爆发前，同英国仍有希望进行和解时，大陆会议那不可靠的权威并没有暴露出太大的问题，但是自从发表《独立宣言》之后，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共同政府就成为迫切的需求了。

1776年6月，在《独立宣言》发表之前半个月，大陆会议任命宾夕法尼亚代表约翰·迪金森主持的委员会设计一个永久的联盟方案。但是限于形势所迫，委员会在一个月后就拿出了匆忙制订的《邦联条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而争吵也就开始了。是建立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国家，还是建立一个由十三个国家组成的松散的主权邦联？大陆会议的代表们就这个问题产生了激烈的争吵。迪金森委员会所设计的方案是一个妥协性的方案。按照其第九条的规定，各州同意将下述权力移交给邦联国会：处理对外事务，宣战，协调各州之间的边界纠纷，邮政，印第安人事务。此外条例还规定各州的公民在别的州享有与该州公民相同的“特权和豁免权”。

但是同时《邦联条例》也限制了邦联国会的权力。虽然国会负有保卫国家的庄严职责，能够宣战、能够招募陆海军，但是它不能直接征召一名士兵或水手，而只能按照一种分配的办法要求各州提供定额兵员——根据华盛顿的记录，直到约克城战役前夕，没有任何一个州曾经向大陆军派遣超过1/8的定额兵员来为革命效劳。



这幅由约翰·特恩布尔创作的油画《1783年华盛顿将军的辞职》反映了华盛顿于1783年12月23日在安纳波利斯的马里兰州政府大厦内辞去大陆军司令职务的情景。在华盛顿对面坐着的是大陆会议主席托马斯·米弗林，以及托马斯·杰斐逊、詹姆斯·门罗、詹姆斯·麦迪逊等大陆会议委员。画面中华盛顿的夫人玛莎和三个孙女站在他的身后，事实上这几个人当时并不在场。这幅画是美国国会在1824年委托创作的，和特恩布尔那幅著名的《签署独立宣言》一道陈列于美国国会大厦中央圆厅内。大厅内的另两幅画是《贝高英将军在萨拉托加投降》和《康华利勋爵在约克城投降》，也是特恩布尔受美国国会的委托创作的



阎京生绘制 Illustrated by Yan Jingsheng

毫无疑问，邦联国会有权拨款，但它无权向任何公民征收税款。纳入公共财政的每一分钱都必须求助于各州议会。当邦联国会决定任何财政年度或任何具体用途所需的金额时，它就根据各州的人口多寡、土地价值和富裕程度把总数分配给十三个州，由各州议会自由决定如何支付这笔金额，或者根本不付，视当时掌权的那帮人的心情而定。因此，邦联国会实际上必须在拒绝付款的这几个州的首府手拿帽子，扮演乞丐的角色。它的确体验到了乞丐的通常待遇：断然的拒绝多于愉快的施舍。邦联国会在任何一年如果能收到所要求的款项的四分之一，那就算是很幸运的了。在它存在的最后14个月，缴进国库的款项只有不到50万美元的纸币，还不够偿付外债的利息。

如果说邦联国会在军事和金钱等重大问题上都软弱无力的话，那么它在其他领域的软弱无力也就不足为奇了。国会无权像独立之前的英国那样控制各州的货币和银行业务，只能任由各州滥发纸币；国会也无权管制各州之间的贸易或对外贸易，因为过去英国在这方面管得太多了。事实上在任何方面邦联国会都没有控制各州的权力，它几乎完全依靠各州议会去筹措经费和士兵，去执行它的法律和命令，因此不能对这些州来硬的，不能强迫它们服从，不能课它们的罚金，不能废除它们的特权或用军事力量对付它们。即使有发生内战推翻当地政府的危险，国会也不能干预州的内部事务。

经过一年多的争吵，大陆会议在1777年11月批准了《邦联条例》，并把它交给各州议会去讨论批准。但这实在是不容易，因为条例的批准需要所有十三个州的一致同意。最大的障碍在于阿勒根尼山－阿巴拉契亚山以西总面积达95.84万平方公里的西部领土问题。有些州，例如弗吉尼亚、马萨诸塞、康涅狄格、南北卡罗来纳和乔治亚，在其最初的殖民地特许状中都享有“从大海到大海”的土地所有权，而有些州却没有，后一类包括宾夕法尼亚、特拉华、马里兰、新泽西、纽约、罗得岛、新罕布什尔这七个州。但是纽约州也对安大略湖以西、密歇根湖以东、田纳西河以北的西部地区提出了所有权要求。

当时是哪个殖民地控制着西部领土呢？事实是哪个殖民地都没有对这些土地建立实际上的统治。这些西部领土是“七年战争”之后在1763年的《巴黎和约》中从法国手里夺来的，而同一年英国当局沿着阿巴拉契亚山脉划定了一条线，禁止东部各殖民地越过此线向西移民，这实际上也冻结了各殖民地对西部领土的要求。此后在俄亥俄河流域有英国的驻军，以及一些法兰西人的移民点，但更多的土地归印第安人所有。由于人口有限，在独立战争爆发前，从人口拥挤的东海岸各州向西移民的白人最多只定居到阿巴拉契亚山脉的东麓。在北方，宾夕法尼亚的西部和西北部成为白人移民的边陲地带。

尽管乔治·华盛顿等成功的弗吉尼亚大种植园主在七年战争结束后曾成立了许多土地投机公司，准备从印第安人手里购买俄亥俄河、田纳西河、坎伯兰河和亚拉巴马河流域的土地，但却被英国的王室领地禁令所阻止。在独立战争期间，弗吉尼亚议会派遣乔治·罗杰斯·克拉克越过了1763年线，攻击这条线以西的英军要塞和亲英印第安人村庄，占领了俄亥俄河流域的一些土地，纽约和宾夕法尼亚民兵也发动过类似的袭击。

1778年12月，马里兰议会表示，除非将所有西部土地的归属问题都交给大陆会议来决定，否则该州将不会批

准《邦联条例》。1780年2月19日，纽约州率先放弃了它对西部领土的要求，条件是大陆会议代为偿付该州在独立战争期间所欠下的公私债务。弗吉尼亚在1781年1月2日也以类似的交换条件将俄亥俄河以北所有西部领土的所有权都转让给大陆会议（*但是保留了俄亥俄河以南的西部领土，即后来的肯塔基州*），这一决定最终使马里兰在同一年批准了《邦联条例》。

独立后的美国作为一个虚弱无力的国家，处于几个强大的、敌对的君主制帝国相互混战的大西洋世界中。它昔日的母国英国如今成了敌人。法国虽然长期以来是英国不共戴天的敌人，但是与北美殖民地的关系也好不到哪里去，最多算是一个骑墙的朋友。而西班牙干脆拒绝承认北美殖民地的独立。英国视美国为外国，拒绝与美国签订贸易条约，并对美国货物征收关税；而法国和西班牙都取消了战时的优惠条件，严格限制美国的海外贸易。昔日繁忙的新英格兰海港变得沉寂一片，弗吉尼亚的烟草种植园主和卡罗来纳的棉花种植园主失去了英国的市场，那些依靠造船和海外贸易为生的美国商人、技工、造船工匠、水手、码头工人和商贩的生活陷入困境，工商业处于萧条状态。

各州的商人也处于不幸的境地，他们手中没有币值统一的通用国币，只有一批重量不等、经过剪削、钻孔、伪造而降低橙色的光怪陆离的货币，以及随着新钞票不断涌出而价值持续贬值的纸币。当时十三个州均债台高筑，有些州甚至无情地把偿付其革命债务的问题抛弃脑后。而且由于滥发纸币造成通货膨胀，一美元硬币等于一千美元纸币，只好征收重税来补偿债务利息。比币制更糟糕的是设置在各州贸易之间的障碍。在地方势力的影响下，各州议会对来自邻州的货物像对外国进口商品一样征收关税，彼此进行报复性的商战，随着派系争论的起伏而抬高或降低税率。最极端的例子出现在纽约州，那里对从康涅狄格运去的木柴和新泽西运去的卷心菜都要征收关税。

由于战争严重破坏了经济，越来越多的平民为了养家糊口和缴纳税款而借债，各地的小农在贫困中纷纷破产。另一方面出现了在战争中大发横财的人，美国社会中债务人和债权人、农民和金融家之间的鸿沟进一步加深。1786年，马萨诸塞州的贫困农民为巨额债务和农业歉收所困，到州议会进行了请愿，但当时的政府已经被商人和大债权人所控制，因此马萨诸塞州议会通过新的法律要求人们全额偿付债款，并且开始新一轮的征税。越来越多的农民聚集到丹尼尔·谢司（Daniel Shays）的周围，他是一个老兵，其服役薪金由于纸币的贬值而化为废纸，耕种活计也越来越差，债务因此不断增加。他最终在1786年冬天率众而起，从而引发了有名的“谢司起义”。

谢司这场起义虽然被马萨诸塞民兵扑灭，但它与当时在各州普遍存在的债务、税收、奴隶制、政教分离、纸币贬值等等问题交缠在一起，使得美国在1780年代中期面临了异常严重的政治危机，当时华盛顿写道“每州都有易燃物，一个火星便可引起熊熊大火。混乱状态使我产生的愁绪远非拙笔所能描述”。而正是这场危机使得人们开始向往着改变原有的政体，建立一个新的强有力的全国政府。事实上许多美国历史学家至今仍在用“危机时期”这个词来称呼执行《邦联条例》的8年，通常把这个时期描述得很可悲，把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描述为正在朝着无底的深渊迅速滑下去，多亏英勇的宪法起草者们在关键时刻把它从深渊中救了出来。

当时的邦联国会也察觉到了国内危机的深远影响，它呼吁各州批准一项修正案，使国会有权为应付公共债务而开征一些进口税。但是由于国会的呼吁和努力都不起作用，在北美政治生活中居于领导地位的公民们开始发起一次政治和经济革命，建议召开一场立宪会议，来制定一种更为完善的施政宪章。

刚经历了“谢司起义”的马萨诸塞州对制订宪法的反应最积极，在各州中首先倡议对《邦联条例》进行改革，制订新宪法，特别是要增加国会的权力。当时北美十三州都已经制定了自己的宪法，康涅狄格和罗得岛保留了原来的殖民地宪法，只是删去了涉及英国王权的部分，而另外十一个殖民地都废除了原来的殖民地宪章，制订了新宪法。

宾夕法尼亚和乔治亚的宪法（*以及不久之后通过的佛蒙特宪法*）代表了革命中最激进的共和派的主张，它们的指导原则是“全体人民才是政府权力



丹尼尔·谢司（1747—1825），出生于美国的爱尔兰移民后裔，独立战争中在马萨诸塞第5团中服役，一直升至上尉。战争接近尾声时，他在1780年退伍回家，身心疲惫，等待政府发给他服役五年的报酬。但是像其他很多人一样，一等就是很多年，而且发下的纸币几乎与废纸无异。而且由于其农活越来越差，因此欠下城市商人许多债务，随时有被抓入债务监狱的可能。他手下逐渐聚集起许多境遇类似的退伍老兵和债务人。1786年夏天和秋天在马萨诸塞已经发生了几起债务人袭击法院的事件，该州一连好几个月处于紧张状态中。当年11月，马萨诸塞东部终于爆发大规模起义，但不久即失败，但是西部的起义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当起义团体拒绝马萨诸塞州长詹姆斯·鲍登要求他们解散的命令后，鲍登在商人的资助下召集了一支4400人的民兵军队。1787年1月26日，谢司率800多人攻打斯普林菲尔德火药库，与守军发生冲突，起义者被打死4人后后撤。随后几周内，民兵在全州搜捕参加起义的人，谢司只好躲到佛蒙特。2月底起义宣告失败，3月马萨诸塞州立法机构宣布除谢司和另3人外赦免所有的起义者，第二年在约翰·汉考克的呼吁下，这四个人也得到了赦免。谢司随后在纽约州定居，直至去世。由于他生前一直拒绝别人给他画像，因此这幅像是后人凭想象画的

的真正所有者”，政府越精简越好。宾夕法尼亚废弃两院制，建立一个一院制的立法会，议员一年一选，同时废除总督／州长的职位，以立法机关同时行使行政职权。原来以公民财产决定投票权的做法也被废除，全体年满21岁的白人男性都拥有公民权。此外宾夕法尼亚宪法还保证公民享有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其中最激进的要属重新分配财产这一条，它宣称“少数人占有社会的大部分财产对于人民的权力是十分危险的，对于人类的幸福是破坏性的。”正是这一条宪法条文使得对宾夕法尼亚宪法的讨论产生了分化，最后该州在1790年通过了比较温和、更加保守的新宪法。

马萨诸塞州的新宪法从一开始就比较小心谨慎，它的主要设计者约翰·亚当斯承认新政府的权力必须以人民为基础，但是他反对“不计后果的盲目试

美元的由来

独立之前的北美十三殖民地使用的主要货币包括英国铸造的各种硬币和西班牙银元(Spanish Dollar),以及来自法国、奥地利、荷兰、丹麦、以及德意志各邦的银币和铜币,此外各殖民地还发行了纸币。在五大湖流域等边远地区,海狸皮也曾经作为货币使用。

西班牙银元直径38毫米,重约1金衡盎司左右,一枚银元等于较小的八个里亚尔银币,因此也被称为"八字银元"(Piece of Eight)。这种银币最早是从1497年西班牙实行货币改革后开始铸造的,其英文名字直接翻译自西班牙语的Peso de Ocho——"八个(里亚尔)一块(的银币)"。这也是今日拉丁美洲和菲律宾的"比索"这一货币单位的由来。

至于"西班牙银元"中"元"(dollar)这个词的来历,要追溯到十六世纪的波希米亚,即今日的捷克共和国。当时该地铸造了一种名为"约阿希姆塔勒"(Hoachimsthalers)的银币,重量为451金衡谷,约合29.2克。"谷"(grain)是英美用于衡量贵金属、宝石、珍珠、药物、子弹、火药等物品重量的单位,相当于1/480盎司,接近一颗小麦或大麦谷粒的重量。一谷是64.79891毫克,一常衡磅为7000谷,一金衡磅为5760谷。

"塔勒"是德文"山谷"的意思,英文对应的单词是dale。这种银币最早是在一个叫圣约阿希姆山谷的地方铸造的(今日捷克西北部苏台德地区的雅希莫夫。顺便提一下,圣约阿希姆是圣母玛利亚的父亲,耶稣基督的外祖父,"约阿希姆"这个名字在希伯来语中的意思是"耶和华所创造的"),在正面铸有圣约阿希姆的头像,故而因此得名。"约阿希姆塔勒"这个名字后来简化为"塔勒",在英语中写成dollar。

由于其币值合当,塔勒因此很快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流行硬币。神圣罗马帝国的哈布斯堡家族取得西班牙王位后,也把这种大面值的银币带到了西班牙和西属美洲,当然,名字变成了"Peso de Ocho"。在十五和十六世纪,设在波托西、利马和墨西哥城的铸造厂铸造了大量的西班牙银元,正面是直布罗陀海峡的"赫拉克利斯之柱",以区别于西班牙本土铸造的银币,后者正面是君主头像。许多这种银币在美洲对华贸易中流入中国,在明朝和清朝前期流入中国的大多被熔化后重新铸成银锭了,而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流入中国的那些银币(大多铸造于墨西哥)直接成为流通货币,以其形状被称为"银圆",这也是后世中国及日本、朝鲜、韩国的货币单位"圆"的来历。

奥地利女皇玛丽亚·特蕾西亚从1751年起下令铸造了大批成色83.3%、重28克的塔勒银币,被称为"玛丽亚·特蕾西亚塔勒"。由于其成色固定、规格统一、币值适当,因此被英国、法国、教皇国、荷兰等国大批仿铸,奥地利的维也纳铸币厂一共铸造了4900万枚,而伦敦、米兰、罗马、巴黎、孟买等地的铸币厂一共铸造了3.89亿枚之多。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和世界贸易的发展,"玛丽亚·特蕾西亚塔勒"在埃塞俄比亚、波斯、也门、印度、波斯湾沿岸、以及直至莫桑比克的非洲东部地区都成为流行通货,而美国也在对欧洲的贸易中收入了大量的这种硬币,称之为"dollar",并且把当时在北美大量流通的、重量和尺寸与之相似的西班牙八字银币"peso"也唤为"dollar"。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西班牙银元基本上全是在墨西哥的墨西哥城和玻利维亚的波托西铸造的,所以正面的图案是被S形纽带缠绕的赫拉克利斯之柱,因此最初的美元货币符号是字母S加上两条竖线,后来又参照了波托西铸币厂硬币标识"PTSI"的最后两个字母,最终简化为$。

在美国国会通过的《1792年货币法案》中,设立了美国国家铸币厂,并以"dollar"作为美国的通货单位。该法案规定一美元银币重量在371又4/16金衡谷(24.1克)到416金衡谷(27克)之间,视银的成色而定。当时美国国家铸币厂铸造的是名为"美元",实际上却与西班牙银元别无二致的银币,重27.468克,成色为93.055%。直至1857年,美国国会才正式废除西班牙银元的法定货币地位。

《1792年货币法案》规定美国银币的面值包括1元(Dollar)、半元(Half Dollar)、四分之一元(Quarter Dollar,即后来的25美分硬币"quarter")、十分之一元(Disme,这是个法语词,意为"十分之一",后来拼写成dime)和二十分之一元(Half Disme)。用黄铜铸造重11本尼威特(pennyweight),即17.1克的1美分硬币,以及重5.5本尼威特的半分铜币。《1792年货币法案》还规定发行名为"鹰"(Eagle)的金币。一"鹰"等于10元,重量在247金衡谷到270谷(17克)之间,金币面值包括1、1/2、和1/4鹰。





左上图是一枚1739年铸造的西班牙银元,正面是拉丁文VTRA QUE VNUM(合二为一,指旧大陆与美洲西班牙帝国),以及赫拉克利斯柱和东西两半球;背面是西班牙王徽和"腓力五世,西班牙和印度国王"字样

左图是奥地利铸造的塔勒银币,下排中央为作为参照物的美国25分硬币

北美殖民地从十八世纪初开始发行自己的货币,包括硬币和纸币。各殖民地的货币单位均为镑,按照1镑=20先令、1先令=12便士的比例兑换辅币。下面列出的是各殖民地首次发行纸币的日期,实际上这些殖民地自行铸造硬币的时间要更早。至于其与英镑的兑换率,是独立战争期间大幅度贬值前的比率:

★**马萨诸塞镑**(1690–1749,1775–1793),与英镑比率约为4:3,即1马萨诸塞先令=9便士。美国独立后流通面值为元的大陆纸币和马萨诸塞州纸币,规定1西班牙银元(即1美元,下同)=6马萨诸塞先令

★**南卡罗来纳镑**(1703–1793),与英镑比率约为3:2,即1南卡罗来纳先令=8英国便士。美国独立后规定1西班牙银元=32.5南卡罗来纳先令

★**康涅狄格镑**(1709–1793),1康涅狄格先令=9英国便士。美国独立后规定1西班牙银元=6康涅狄格先令

★**纽约镑**(1709–1793),1纽约先令=8英国便士。美国独立后规定1西班牙银元=8纽约先令,但由于滥发纸币,最终跌落至1银元兑换1000纽约先令

★**新泽西镑**(1709–1793),1新泽西先令=9英国便士,美国独立后规定1西班牙银元=7新泽西先令6便士,最终贬值幅度与纽约镑相似

新罕布什尔镑(1709–1793),1新罕布什尔先令=9英国便士,美国独立后规定1西班牙银元=6新罕布什尔先令

★**罗得岛镑**(1710–1793),1罗得岛先令=9英国便士,美国独立后规定1西班牙银元=6罗得岛先令

★**北卡罗来纳镑**(1712–1793),1北卡先令=9英国便士,美国独立后规定1西班牙银元=8北卡罗来纳先令

★**宾夕法尼亚镑**(1723–1793),1宾夕法尼亚先令=9英国便士,美国独立后规定1西班牙银元=7宾夕法尼亚先令6便士

★**特拉华镑**(1723–1793),币值与宾夕法尼亚先令相同

★**马里兰镑**(1733–1793),1马里兰先令=9英国便士,美国独立后发行了两种纸币,1西班牙银元=红色纸币4马里兰先令6便士=黑色纸币7先令6便士

★**乔治亚镑**(1735–1793),1乔治亚先令=9英国便士,美国独立后规定1西班牙银元=5乔治亚先令

★**弗吉尼亚镑**(1755–1793),1弗吉尼亚先令=9英国便士。在独立之前就流通西班牙银元,1645年规定1西班牙银元=6先令,1655年改为1银元兑换5先令。美国独立后规定1银元=6弗吉尼亚先令

有一点需要澄清一下:作为英国及北美殖

验”，而且认为宾夕法尼亚的宪法太过民主。他认为两院制的立法机关和独立行政机关的相互制衡是保证自由的基础。亚当斯认为，人类社会将不可避免地分裂为较贫穷和较富裕的两个阶层，它们分别代表“民主的”和“贵族的”两种力量，所以他把二者分开到独立的立法机构中，以便使双方都能保证自己的利益。马萨诸塞州议会分为一个一年一选的众议院和一个按照财产状况分配席位的参议院。宪法还保留了一个独立的州长，他有权否决立法、任命官吏、指挥民兵、管理州内开支。后来的美国宪法在很大程度上参照了这部宪法所反映的精神。

1787 年 5 月 25 日，来自十二个州的代表（除罗得岛之外）齐聚费城的独立会堂，召开制宪会议。各州一共委派了 62 名代表，其中 55 名或多或少地出席了所有的会议，39 人在最终的宪法草案上签了字。在这些代表当中有 8 名是《独立宣言》的签署者，7 人当过州长，至少 28 人在大陆会议或邦联国会中供过职。当这些代表们来到费城时，整个城市都沸腾了，代表们签到的名单仿佛就是当年革命的光荣榜。弗吉尼亚州代表乔治·华盛顿被全体代表一致推选为制宪会议主席。宾夕法尼亚州代表有德高望重的本杰明·富兰克林，邦联国会主席托马斯·米弗林，还有罗伯特·莫里斯，此人或许是当时美国最富有的人。

纽约州派来的代表意见并不统一。州长乔治·克林顿与制宪会议的发起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积怨甚深，为了维护纽约州的自治权利和他自己的政治权力，克林顿费尽心机把几个州权主义者塞进了纽约州代表团，但是他们根本不是汉密尔顿的对手。这位风流潇洒、才能不凡的人是西印度群岛一个苏格兰商人的私生子，受人资助前往纽约后进入华盛顿参谋部供职，其地位迅速上升。由于聪明绝顶而又有左右逢源的魅力，汉密尔顿很快就爬到了社会的上层，娶了一位富有的女继承人。

1774 年那场疾风暴雨的革命中的激进分子一个也没有出席制宪会议：弗吉尼亚州的托马斯·杰斐逊被派往法国当公使，而帕特里克·亨利虽然当选为代表但拒绝出席，因为他坚持州权至上的原则，对制宪会议将要做的事深感担忧，因此敬而远之；马萨诸塞州的塞缪尔·亚当斯没有当选，他的堂弟约翰·亚当斯则被派往英国，担任驻圣詹姆斯宫廷公使；托马斯·潘恩去欧洲展出他的一座铁桥设计，并且留在法兰西，参加了法国大革命。

因此，费城会议的出席者不是左翼理论家和激进的革命家，而是由拥有土地和奴隶的大种植园主、握有大量大陆公债和各州公债的债权人、商人、律师和土地投机商组成的。为了避免会场外的革命者用鼓动群众的方式刺激代表或施加压力，制宪大会是关起门来秘密进行的，不向企图旁听的群众开放。会议上的辩论不做正式记录，为了防止泄密，他们甚至派了一名谨慎的官僚陪同富兰克林参加费城的各种交际宴会，唯恐这位和蔼的老年人一时不慎向外界走露消息。制宪会议内部辩论的正式记录在会议结束之后全都被销毁了，如果不是少数代表，特别是詹姆斯·麦迪逊，在其去世时留下的日记和私人文件把人们在会上发表的讲演记录下来，后人可能永远也不会得知美国的“建国之父”们曾经为制订美国宪法进行过那么激烈的争吵。

民地货币单位的“镑”（pound），最初是一种虚货币，用于记账、收税等场合。在英国，最早规定 1 英镑等于 1 磅重的白银（纯银，sterling silver，英镑的附加称呼 sterling 即来自于此）。英镑的货币符号£是在字母 L 上加一道横线，L 是拉丁文 libra（磅）的字头。这个符号来自古罗马货币进位系统。在公元四世纪时，1 古罗马磅（libra，327.168 克）的黄金铸造 72 枚 solidus 金币，一枚 solidus 金币等于 12 枚 dinarius 银币（今日中东国家货币单位第纳尔即来自这个单词）。

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查理曼大帝规定 1 磅（livre）纯银等于 20 苏（sous），1 苏等于 12 但尼（deniers），“苏”和“但尼”的名字都来自古罗马的 solidus 和 dinarius 这两种硬币，而 livre 被翻译成“里弗尔”、“锂”或“法镑”。中世纪的英国、意大利、德意志南部、西班牙和葡萄牙都实行过这种 1∶20∶240 的货币进位系统，并按照货币单位的首字母称之为 LSD 系统。英国虽然将镑称为 pound，将苏称为 shiling，将但尼称为 penny/pence，但是在用货币符号标价时都用£、s 和 d 来表示价格，比如某件售价 1 英镑 5 先令 6 便士的商品，其价签会写成 1£ 5s 6d。

在十四世纪以前的英国，镑是相当值钱的货币单位。在诺曼人入侵之前，“忏悔者爱德华”的地产总价值只有 5950 英镑，而英格兰首富戈德温家族的财产为 8400 英镑。在十四世纪时，1 英镑的白银可以买到 4 头母牛或 2.5 头公牛；一座贵族庄园一年的收益在 8 镑至 12 镑左右就被认为是相当成功的。除了镑之外，在古代欧洲还有一种货币单位叫“马克”，大多数场合下相当于三分之二镑。英国的“狮心王”理查一世在参加十字军后回国时在奥地利被俘虏，最终就是交付了 15 万马克白银的赎金后才获释的。

由于镑的币值过大，因此在中世纪英国的日常生活中流通使用的是币值不足一镑的银币和铜币，金币很少，主要是从欧洲大陆流入的弗罗林金币（最早由佛罗伦萨共和国铸造故而得名，1 弗罗林等于 6 先令）。老百姓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最大货币是 1 先令、6 便士、1 格罗特（等于 4 便士，即三分之一先令）、3 便士、半格罗特（2 便士）、以及 1 便士的银币。一枚 1 便士银币的重量被定为 1 个“本尼威特”（pennyweight），相当于 1/240 金衡镑、或 1/20 金衡盎司，约合 1.555 克。比便士更小的硬币还有面值为半便士和 1 法辛（四分之一便士）的铜币。

只是当中世纪末期欧洲社会财富普遍增长、金银大量流入欧洲、货币相对贬值的时候，英格兰才在都铎王朝开国君主亨利七世在位时期首次发行价值相当于 1 英镑的金币，名为苏弗林（Sovereign），意为“君权”，因为金币上铸有在位君主像，以及都铎王朝的双玫瑰纹章和王室徽记。1 枚苏弗林金币为成色 23K（95.83%）的黄金 240 谷（15.552 克）。亨利八世时期将成色削减为 22K（91.67%），此后成为英镑金币的标准成色，美国在十九世纪实行金本位后铸造的美元金币也采用同一成色标准。亨利八世还铸造了面值为克朗（Crown）的金币，由于背面有都铎王朝的双玫瑰纹章，因此也被称为“双玫瑰”。1 克朗等于 5 先令，即四分之一英镑。

除了上述这些硬币外，斯图亚特王朝国王詹姆斯一世在位时为纪念英格兰与苏格兰的联合，铸造了名为“联合”（Unite）的金币，以及“月桂”（Laurel）金币；查理一世铸造过“查理”（Carolus）金币，这些硬币的币值也等于 1 英镑。1663 年，英国首次铸造了名为“畿尼”（Guinea）的金币，因为铸造第一批这种硬币的黄金来自西非的几内亚而得名。1 畿尼最初等于 1 英镑，但后来改为 21 先令，即 1.05 英镑。在最终废止之前，它是医生、律师、作家、侦探（比如福尔摩斯）等中上等职业阶层计算报酬的单位。除此之外，十七至十九世纪的英国还铸造过各种大面值金币，比如皇家玫瑰（1.5 英镑）、双镑、双畿尼、五十先令（2.5 镑）、五镑、五畿尼等等，但是由于面值过大、使用不便，因此只是用于君王赏赐、银行结汇、不动产买卖等大笔金额交易。

1816 年英国颁布法令厘正货币制度，规定 1 金衡磅的标准成色 22K 黄金等于 46 镑 14 先令 6 便士。英镑金币仍被称作“苏弗林”，但是在纸币上使用的货币名称是“镑”。与此同时实行金银双本位，但银币只能用于支付 2 英镑以下的交易。银币规格统一为 1 克朗、半克朗和 1 先令，过去的弗罗林、格罗特、3 便士，半格罗特、以及 1 便士银币全部停止流通，便士改用铜币。1972 年英国再次实行货币改革，废除 LSD 货币体系，改以 100 便士等于 1 英镑。如今英国和澳大利亚依然在铸造苏弗林金币，其成色和重量与 1817 年面值 1 英镑的苏弗林金币相同，但已不是流通货币，而是像加拿大枫叶金币或中国熊猫金币一样的收藏和投资品。由于数量有限，一枚 2005 年由英国或澳大利亚皇家铸币厂新铸造的、带有收藏证书的苏弗林金币价格在 140 到 270 英镑之间，而十九世纪铸造的苏弗林金币拍卖价格达一两千英镑。



《签署合众国宪法》是美国著名油画家和插图画家霍华德·克里斯蒂在1940年创作的一幅巨型油画，如今陈列在美国国会大厦众议院一翼。这幅油画是美国国会宪法150周年纪念委员会委托创作的，润格是3万美元，尺寸为20×30英尺（6×10米）。由于其尺寸巨大，不得不在华盛顿海军船厂的帆布工场内绘制。这幅油画中展现了签署宪法的55名代表中的39位，所有人物的面部都是参照了国会图书馆及其他地方陈列的相关人员的肖像创作的。在画面右边，站立在桌子后面的是弗吉尼亚州代表乔治·华盛顿，伏在桌子上签字的是北卡罗来纳州代表理查德·斯派特，他后面是北卡州的威廉·布伦特。在台子下面坐在椅子上、手拄拐杖的是宾夕法尼亚州代表本杰明·富兰克林，倾身与他说话的是纽约代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富兰克林左手边坐在桌子对面的是弗吉尼亚州代表詹姆斯·麦迪逊。

作为宪法的一个基础，代表们一致拒绝了托马斯·潘恩在《常识》中雄辩地批评过的君主制政体，此外还拒绝了作为君主政体基础的等级制。原有的谋求公职必须拥有财产的条件被废除，所有21岁以上并缴纳赋税的白人男子都拥有公民权。5月29日，弗吉尼亚代表埃德蒙·伦道夫提出了弗吉尼亚的方案，并成为制宪会议讨论的焦点。该方案设想成立一个两院制的国会，包括一个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下院和一个由各州立法机关提名、经下院选举产生的上院，或者沿用古罗马元老院的名字，叫“Senate”（参议院）。该方案还设想设立一个由国会任命的总统，并建立全国性的司法机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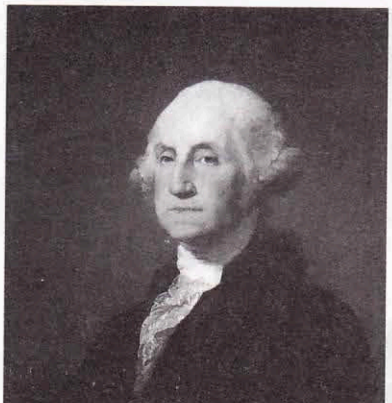
制宪会议上的一个主要分歧在于较小的州担心在十三个州的联邦中得不到平等的地位，于是坚决反对根据人口数量确定在联邦政府中的席位。6月15日，新泽西代表威廉·帕特森提出了新泽西的方案，提出保留《邦联法案》作为政府的基础结构，只是赋予国会以渴望已久的征税、征兵、处理外交和协调各州商务的权力。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则提出了一个截然相反的极其保守的意见，包括一个国会和一个民选但终生任职的总统，以及一个强大的全国政府，各州政府将不过是其行政代理机关。这个方案遭到代表们的一致反对。经过三天的激烈讨论，最后制宪会议以7：3的比率支持以弗吉尼亚方案作为今后讨论的基础。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制宪代表们不断在炎热的费城召开会议，讨论各种矛盾冲突：如何维持国家与州之间的权力平衡？如何处理大州与小州之间的利益？如何才能使行政机关实行有效治理而又不至于威胁人民的自由？而在奴隶制与奴隶贸易问题上，面对北方与南方之间，反对者和支持者之间严重的意见分歧，会议又能做什么？在这期间，不断有代表因不能取得一致意见而宣布退出会议。留下来的代表们则心灰意冷，对僵局感到情绪低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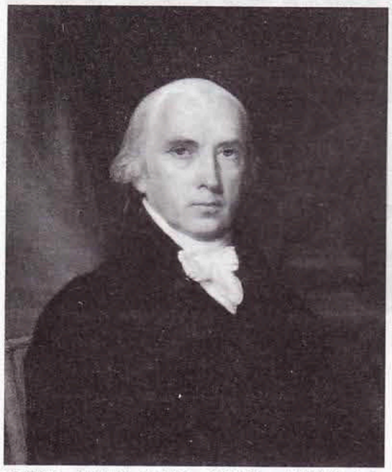
争执的一个焦点是众议院的人口比例问题。众议院席位是按照各州人口比例来确定的，南方种植园主们渴望依靠他们在众议院可能拥有的最大实力来获取在新政府中的战略优势地位，因此提议在按人口多寡分配众议院席位时把奴隶作为人口的一部分一并计算进去。同时，这些种植园主意识到他们本州的居民比北方商业州少，就又竭力主张在分摊直接税时仅按自由白人的人口计算。为了同样明显的原因，大多数北方代表想要提出同这两个建议截然相反的主张。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只有妥协才是最后一着。

7月12日，在富兰克林和其他一些代表们的努力下，各州代表们最终达成了一项名为“大妥协”的方案，同意下议院的席位比例应当按照各州全部白人人口加上黑人人口的3／5来计算。这个比例是基于一个奴隶的劳动效率是自由人口的3／5来计算的。印第安人如果不向美国政府纳税则不享有选举权。制宪委员会还决定各州在上院的代表席位均等，每州都可选派两名议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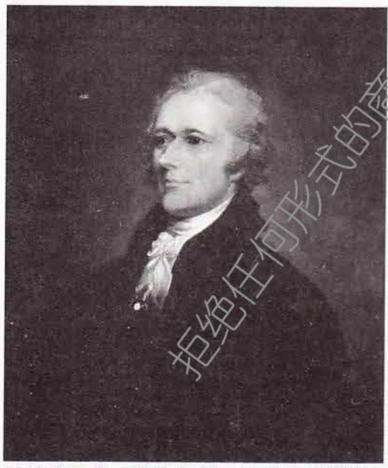
代表们还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就其他问题达成了妥协。把小小的特拉华州算在内，蓄奴州只有六个，在财富和人口方面都不能与北方七个商业州的资源相比。气候、土壤、传统和劳动力的供应，使得这些州注定成为棉花、烟草和粮食等原料的生产者，用这些农业产品交换工业品。鉴于南方各州对蓄奴制经济的依赖，大会同意新的立法机构——即美国国会——在未来的20年里无权禁止奴隶贸易，国会对进口奴隶征税不得超过每人10美元，同时不得对出口商品征税。代表们还用一种饶舌的方式保证逃亡的奴隶可以受到合法的抓捕，它最终写进了宪法第四条第二款：“凡依一州法律应服兵役或



乔治·华盛顿（1732–1799），依据合众国宪法选出的美国第一任总统



詹姆斯·麦迪逊（1751–1836），《联邦党人文集》作者，出生于弗吉尼亚种植园家庭，后成为律师，并被选为大陆会议代表。1787 年起草弗吉尼亚提案，成为美国宪法蓝本，随后又起草宪法前十条修正案。1801–1809 任国务卿，1809–1817 任美国总统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55–1804），西印度群岛一个苏格兰商人的私生子，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任华盛顿的副官和大陆会议代表，1789–1795 任美国财政部长，1796 年参加总统竞选，败于亚当斯，1800 年总统选举败给杰斐逊。1804 年在与副总统伯尔的决斗中身亡。今日10美元纸币正面头像即为汉密尔顿

劳役之人逃往他州不得依后者之任何法律或规章解除其兵役或劳役，而应根据其服役所未满之州之要求予以交出”。

一些代表认为允许蓄奴制继续存在违背了新国家的建国原则，特别是《独立宣言》中“所有人生而平等”的信条。奇特的是，一些南方代表也反对蓄奴制，例如弗吉尼亚州的乔治·梅森，他本身是奴隶主，却认为奴隶制只有罪恶，没有好处。他认为奴隶制挫伤人们（他指的是白人）对勤劳和钻研技艺的积极性，促使贫民轻视诚实的劳动，并抑制白人移民的进入，而白人的工作却能为国家提供实力和财富。他们之所以做出这一巨大而艰难的让步，是担心如不让步就会导致制宪会议失败。北方代表迁就南方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南方代表同意在西北领地禁止奴隶制。

1787 年9 月17 日，39 名代表在费城独立会堂最终签署了美国宪法草案，并完全赞同本杰明·富兰克林对此情此景表达的感受：“于是，先生们，我赞同本宪法，因为我对此感到满意，而且不相信本宪法并非最佳宪法。”

美国宪法是一份简明扼要的文件。它的开头段落简洁了当：“我们合众国的人民，为建立更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保障国内安宁，规划共同防务，促进公共福利，为使我们自己及后代得享自由之福祉，特为美利坚合众国制订和确立本部宪法。”

在接下来的七条正文里，宪法规定了新中央政府的权限，确定总统为最高行政长官、军队和政府的首脑。总统由州议会推举出的选举人直接选举产生，只对人民负责，完全不从属于立法机构，任期四年。总统有权否决国会法案，但可以受到国会的弹劾。众议院（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议员由年满25 岁、或入籍满七年的美国公民中选出，其议长的头衔是“发言人”（Speaker）。众议院的选举以人口比例为基础，每三万人口享有一名众议员名额，每两年选举一次。这是对民主原则的让步。然而宪法也规定由州议会选举产生参议员，从而部分地抵消了这一让步。

参议院（US Senate）每六年选举一次，它将限制众议院的任何“煽动性的宣传”，保护有产阶级的利益不受按人口比例原则选举的众议院的侵犯。参议员们可以作为个人投票，不受本州指示的约束。对参议员的年龄限制是必须满30 岁，这样年龄的保守效果就可以得到发挥。美国副总统兼任参议院议长，但是除非参议员表决时分成人数相等的对立双方，否则无表决权。

最高法院（US Supreme Court）居于这个体制的顶端，其法官由总统任命，须经参议院批准，终身任职。最高法院的职责是对国会和州议会颁布的法律进行强行监督，以确保这些法律同宪法的一致性。最后，宪法一旦经过三分之二的州的表决同意，就应当在全国生效。之所以不像《邦联条例》那样规定这部宪法草案需要得到所有州的批准，是因为这样的话宪法可能永远不会得到批准。

以上就是美国的“建国之父”们1787 年9 月在费城设计的联邦政治机器。当然，一部成文的宪法可能过于刻板，谁又能事先为不可预料的后事确定解决的方案呢？不管多么有远见的人，对此也是力不从心的。费城的代表们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做出了可以对宪法进行修正的决定。但是，修改宪法时必须遵循先驱们制定的指导原则，宪法修正案必须经讨论而通过，必须得到超过三分之二的州的批准。

1788 年初，除罗得岛之外所有州的议会开始讨论宪法草案，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对新宪法的辩论活动早已在州议会、群众集会、报纸专栏和一般谈话中普遍展开。有时讨论双方的情绪难以控制，甚至会出现对立双方互相斗殴的情况。至少在一个地方（纽约州的奥尔巴尼）出现了斗殴致死的情况。

支持宪法的人占有许多优势。他们比较有组织，而且他们有美国两个最著名的人物——华盛顿和富兰克林的支持。华盛顿就曾经公开说过，国家面临着要宪法还是要分裂的威胁。在当时的美国，支持建立一个强大的全国政府的人自称为“联邦党人”（Federalists），其代表人物包括华盛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约翰·杰伊、詹姆斯·麦迪逊等，他们都曾从事过大陆军或邦联国会的工作，而这些经历使得他们有了一种全国性的眼光。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华盛顿和麦迪逊来自弗吉尼亚，而杰伊和汉密尔顿来自纽约，没有一个人来自革命最初的爆发地——激进革命者云集的新英格兰。

从1786 年到1787 年，汉密尔顿、杰伊和麦迪逊这三位著名的宪法支持者

以“普布里乌斯”（Publius）的笔名在全国各地的报纸上发表了许多政治评论文章，阐述采纳宪法的意义和好处。这些论文后来以《联邦党人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的名字结集出版，被认为是美国民族对政治理论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在文章中，联邦党人认为政府权力并非自由的敌人，相反却是自由的保证。哪里的政府不够“精力充沛”和“高效能干”，煽动家和职业破坏者就会在哪里出现。

经过漫长的演变，联邦党后来发展为今日的美国共和党。而他们的反对者则被称为“反联邦党人”，其中最负声望的代表人物是托马斯·杰斐逊、帕特里克·亨利和理查德·亨利·李。从这几个人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反联邦党人”实际上是由许多互相矛盾的团体组成的，包括南方想要维持奴隶制的种植园贵族世家（比如李氏家族）；赞同奴役黑人但要求与种植园贵族分享权力的南方中下层白人；致力于政治民主的北方精英知识分子；要求政治平等的北方手工业者；热衷于向西占领印第安人土地的内地小农场主……这些差异最后导致反联邦党人的分裂，其中一部分人组建了共和党，经过一系列内部分裂、经受挫折和改变名称，变成了由托马斯·杰斐逊领导的民主共和党，即今日美国民主党的前身。

反联邦党人的一个主要观点是限制政府权力。他们认为政府权力如果离开公众的监督和控制，必将不断扩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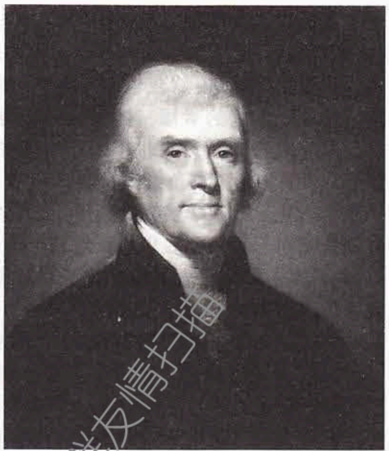
约翰·杰伊（1745–1829），出生于纽约，祖先是法国胡格诺派移民。1764 年自国王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从事法律生涯，作为纽约代表参加大陆会议，1778–1779 任大陆会议主席，1779 任驻荷兰公使，1784–1789 任邦联外长，1789 任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1795–1801 任纽约州长，退休后支持废奴运动

进而损害人民的自由。英国的统治把这种观念深深地铭刻在了美国人的心里。过分的自由可能导致政治的混乱，但是历史却仿佛总是告诉人们，麻烦不是因为政府权力过小，而恰恰是因为政府权力过大而引起的。可是如果政府权力受到限制，那么如何保持政治秩序？革命时代的人们给出了非同一般的答案。在共和国中，秩序不像以前那样由上层的中央机构——国王、常备军、国教教会——强加的，而是通过公民们的自我约束，特别是公民自愿把公共利益置于私人利益至上的行动实现的。

从本质上讲，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的争论是两种恐惧心理的斗争。联邦党人恐惧的是动荡、混乱和无政府状态；反联邦党人并非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同样意识到有效政权的重要性，但他们更恐惧的是国家机器而不是民众，更害怕的是中央集权的危害而非人民大众的威胁。后来被统称为《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的宪法第一至第十项修正案是在反联邦党人的强烈要求下提出的。这些人认为任何集权都不可避免地导致专制，他们要求制订《权利法案》正是基于这种信念：不能相信任何政府可以主动地凭借自觉性来保证其公民的政治自由，只有在宪法中清楚地列出人民的自然权利，才能谈得上这些权利不受侵犯。

美国国会在1789 年9 月作出决议，提出12 条宪法修正案，并提交各州批准。1791 年12 月，其中的10 条获得了三分之二州的批准，成为宪法修正案。这十条修正案保证了言论、出版和宗教信仰自由，规定了陪审团的审判权和诉讼程序，禁止对公民的“无理审查和扣押”，规定不能强迫被告自证其罪等等。宪法第二条修正案规定了在将来美国出现独裁暴君或军政府时人民的起义权利，它规定“一支纪律严明的民兵是自由国家的安全所需，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侵犯”。被否决的两条修正案当中，第一条是规定众议院议员比例和人数的，它被否决后再也未被加入宪法。第二条被否决的修正案是限制参议员和众议员任意提高自己薪酬的，它在1992 年5 月才获得多数州的批准，成为美国宪法第二十七条修正案。

尽管反联邦党人多方努力，但宪法的批准过程在1787 年底到翌年年初十分顺利。特拉华州首先以一直同意的



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反联邦党人首领，杰斐逊派（民主共和党）创始人。出身弗吉尼亚种植园主家庭，1768–1773 担任律师，1775 年被弗吉尼亚选为大陆会议代表，翌年起草《独立宣言》，1779–1781 任弗吉尼亚州长，1785–1789 任驻法公使，1790 年任国务卿，三年后由于与华盛顿和汉密尔顿政见不合而辞职。1796 年竞选总统失败，1801–1809 年任美国总统，1826 年7 月4 日美国独立五十周年当天与其政治对手约翰·亚当斯同时去世

比例批准宪法，随后是宾夕法尼亚。尽管该州反联邦党人的斗争十分坚决，但最后在投票中还是以失败告终。接下来新泽西、乔治亚、康涅狄格、马萨诸塞、马里兰和南卡罗来纳也依次批准了宪法。这样就轮到新罕布什尔和弗吉尼亚来竞争谁是第九个批准宪法、并使其在全国付诸实施的州。新罕布什尔在1788 年2 月召开了关于批准宪法的会议，联邦党人意识到缺乏必需的选票，遂将会议延期至6 月中旬，此后他们一直在进行狂热的游说工作。到重新开会时，他们只用了三天时间就得到了多数票。6 月21 日，新罕布什尔也批准了宪法。

新的联邦中还有两个巨大的空白：纽约和弗吉尼亚。很显然，新国家不能容许它们游离于联邦之外。在弗吉尼亚，联邦党人散布谣传说最主要的反联邦党人帕特里克·亨利已经改变了立场。尽管亨利对此坚决否认，但他还是未能抵挡住麦迪逊等人精心策划的政治攻势。6 月25 日，弗吉尼亚州议会以10 票的微弱多数批准宪法。7 月27 日，纽约议会也以30∶27 的结果勉强批准了宪法。在剩下来的两个州中，北卡罗来纳直至1789 年11 月才批准宪法，而罗得岛继续游离于联邦之外，直到新政府早已依据宪法运行了一年多，才于1790 年5 月加入到这个联邦中。

1789 年4 月16 日，乔治·华盛顿毫

无争议地当选为依据宪法选出的美利坚合众国第一任总统。他从弗吉尼亚北上到纽约举行就职典礼。出发前，他百感交集，在日记中写道："我告别了弗农山庄，告别了平民的生活，告别了家庭的幸福，怀着无以言表的忧虑不安的心情，动身前往纽约。虽然我非常乐意响应祖国的号召为国服务，但是却没有把握不辜负祖国的期望。"4月23日，纽约和新泽西港用礼炮欢迎华盛顿的到来，云集的市民和新当选的议员们争相向一脸倦容的华盛顿致意。街道上的拱门被装饰一新，身穿白衣的姑娘们用鲜花装点道路，当天晚上灯火通明，照亮了整个城市。

4月30日午后，华盛顿在一个可以俯瞰华尔街的阳台上宣誓就职。当纽约州大法官罗伯特·利文斯顿宣布礼成时，群众欢声雷动，港口礼炮轰鸣。总统向群众鞠躬致意，然后步入联邦大厦。这一天直到深夜，首都纽约的全城还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

尽管新政府的建立和新总统的就职让当时的美国人满怀希望，但是包括华盛顿、副总统约翰·亚当斯和国会议员们在内的政治家在新政府成立后的最初几个星期里却是异常紧张的。他们深知自己责任重大，知道要把共和体制付诸实施是何等地艰难。华盛顿提醒大家说："那些表面上或最初看起来不太重要的事，很可能产生非常重要并且有持久性的后果。"其中一个例子是如何称呼合众国首任总统的问题。副总统兼参议院议长约翰·亚当斯最初提出的头衔是"最仁慈的殿下"，还有人提议是"受选的陛下"，更为华丽的头衔甚至包括"殿下，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众生权利的保护者"，以及"强有力的阁下，美利坚合众国总统，自由的保护者"。但是詹姆斯·麦迪逊、托马斯·杰斐逊和其他认为共和国中不应有帝王式尊号的人对此极为不满。最后众议院通过决议，只称呼华盛顿为"合众国总统"和"总统先生"，这个称呼后来一直沿用至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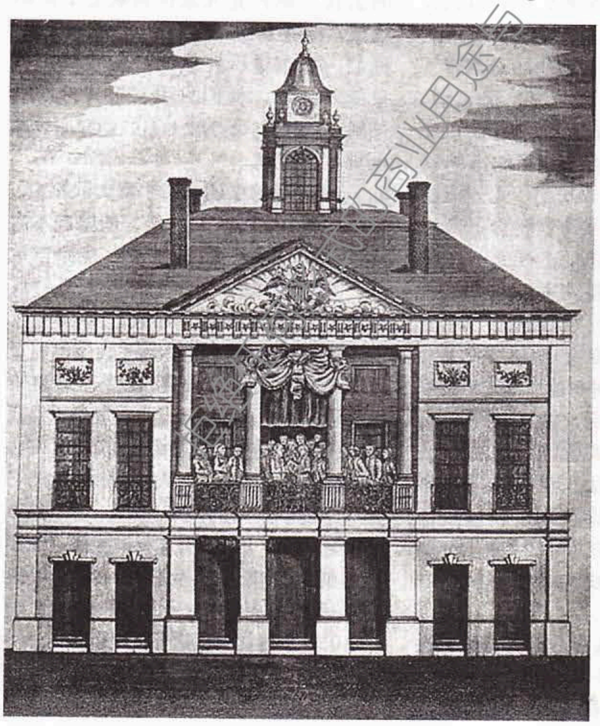
膨胀的星条旗

在北美独立战争开始时，只有数千名自由白人居住在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但是到1790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了12万人。独立战争结束后不久，美国东海岸那些较早成立的州当中的保守派便不安地认识到，他们的权力和影响不久将受到人口逐渐增多的西部地区的威胁。在俄亥俄河和阿勒根尼山脉以西有着比欧洲还辽阔的土地，在俄亥俄、肯塔基和田纳西，当地的居民已经出现了要求自己权利的主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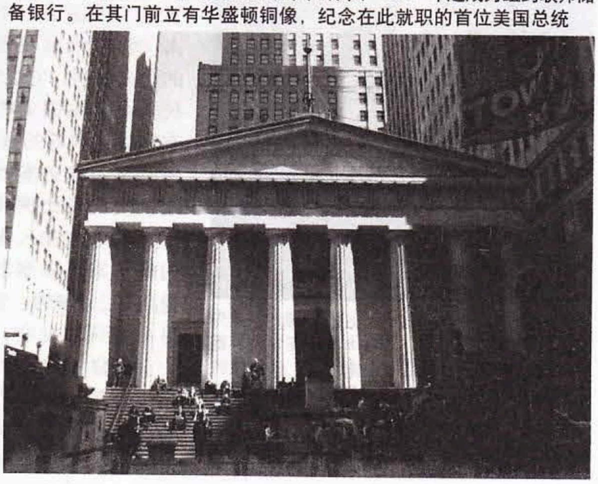
可是，如果让这些西部地区得到平等的权利，名扬四海的十三州将会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呢？毕竟是他们赶走了英国人，他们颇有理由地认为自己比这些人烟稀少的边缘地区的居民更懂得政治，更明白联邦的真正利益所在。这一点是正确的，大西洋沿岸各州有财富和经验，但是西部地区也完全有权利加入联邦。大陆会议的代表们最终没有阻止西部地区以平等的地位加入联邦，这是他们对美国所作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清醒地认识到，终有一天，美国的前途和力量将都属于西部。

纽约州和弗吉尼亚州在1781年让予邦联国会的俄亥俄河以西和以北的大片土地，其转让工作最终到1784年才完成。邦联国会在这一年颁布了弗吉尼亚代表托马斯·杰斐逊起草的法令，将这一大片土地分为10个自治区。从北纬三十一度向北，每个自治区的边界都规定为矩形，每个自治区包括两个纬度，东西边界则沿着经线走。由此划分出来的十个自治区每个都被杰斐逊起了一个假想的名称，包括"切尔松内索斯"（Chersonesus）、"西尔瓦尼亚"（Sylvania）、"波利波塔米亚"（Polypotamia）、"佩利西皮亚"（Pelisipia）、"华盛顿"、"萨拉托加"、"伊利诺伊亚"（Illinoia）、"密歇根尼亚"（Michigania）、"梅特罗波塔米亚"（Metropotamia）和"阿森尼西皮亚"（Assenisipia）。1784年法令还规定任何一个自治区在定居的自由人口达到现有州的最小人口时，便有权向国会申请作为一个州加入联邦，其地位和权力与原先的北美十三州完全平等。

1785年邦联国会通过另一部条例，规定将俄亥俄河以北的西部地区经过测量分成规则的矩形市镇，每个市镇有36



左图为纽约市的联邦会堂，原为建于1735年的纽约市政厅，1785年起成为邦联国会所在地，1787年后成为美国国会会址，并由法国建筑师皮埃尔·朗方协助改建。1789年华盛顿在此宣誓就任总统职位。1790年美国迁都费城后重新成为纽约市政厅，1812年拆除。1842年在原址建起海关大厦（下图）。1862年美国海关迁往新址后，这里成为联邦财政部的六个国库之一，存有大量金银币和纸币，1920年起成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在其门前立有华盛顿铜像，纪念在此就职的首位美国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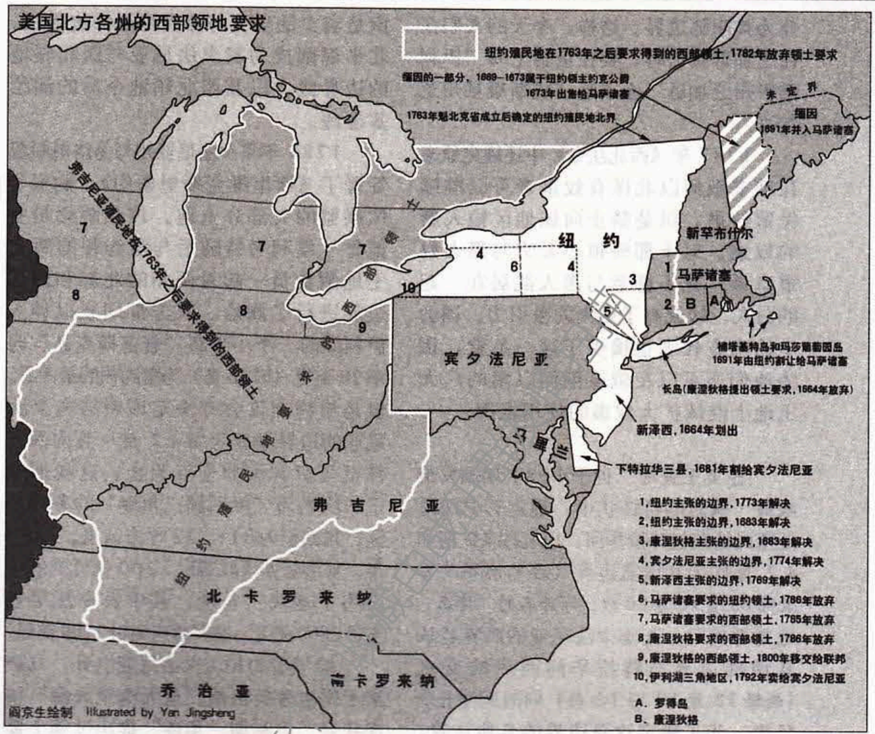
个区，每个区的面积是640英亩（1平方英里）。其中4个区归国家政府所有，其他32个区中一个区的土地销售额用于建设公立学校。各区以拍卖形式出售，每英亩售价不低于1美元。所以土地购买者至少要有640美元，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许多人组成土地公司来购买土地，然后分成更小的方块出售给移民。

这个过程导致土地投机和地价混乱，因此1787年颁布了另一项新条例，即使《西北法令》（Northwest Ordinance）。它取消了1784年划分的10个方格状自治区，而将俄亥俄河以西和以北的土地作为一个整体，命名为“俄亥俄河西北领地”，简称“西北领地”（Northwestern Territory）。

1787年邦联国会颁布《西北法令》（Northwest Ordinance），规定了新州加入美国的办法：当某一领地的边界确定之后，国会将向该地派出一名任期三年的总督，一名秘书和三名法官，对该地进行统治。当该地区达到投票年龄的自由男性公民人数超过五千人时，该地区即成为准州，可组建一个立法会或议会，向美国国会派出没有投票权的代表。当该准州的自由人口达到六万时，准州立法会将制订一部州宪法，并将其提交给美国国会。一旦美国国会接受该宪法，且该准州议会接受《人权法案》，则它将作为一个州加入美国，可以自行选举州长、州议会、法官和其他所有官员，并享有与其他州完全平等的一切权利。

杰斐逊把西北领地划为10个自治区的方案遭到了他的年轻门徒詹姆斯·门罗的反对。当时门罗刚从“大西北”地区旅行归来，报告说在密歇根湖和伊利湖周围，以及密西西比河和伊利诺伊河沿岸见到的都是大片沼泽和低洼地，偶尔点缀着“一些辽阔的平原，在这些平原上多少年来连一棵小树的影子也见不着，将来也未必会长出小树”。因此杰斐逊把土地划分成小矩形的州的方案肯定行不通。华盛顿也反对杰斐逊的方案，担心这会造成一种人口分布更广更稀的局面。

1785年《西北法令》规定将来要将西北领地划为“不少于三个、但不多于五个”州。它反映了门罗的“州要少些但要大些”的观点。法令规定，如果将来成立五个州，则增设的两州要从“通过密歇根湖南部弯曲处或最南端所划



的一条东西向直线”以北的地区划分出来。伊利诺伊州和印第安纳州建州的时候都没有顾及这条简明的附文，这两个州的北部边界都伸展到密歇根湖南端以北。但是这条线却在俄亥俄州和密歇根州之间引起了一个长期的争端。

当1803年俄亥俄地区达到法定人口数、准备建州时，当地的政治家预见到如果西北法令规定的这条线从该州北部的莫米河流入伊利湖的河口，即莫米湾以南通过，那么该州就有可能失去宝贵的伊利湖湖岸地区。因此在俄亥俄州的宪法中加上了这样一条：“如果密歇根湖南端弯曲部分过于偏南，以致由此向正东划的直线不能同伊利湖相交；或者如果该直线在迈阿密河（莫米河）河口以东同伊利湖橡胶，则……本州北部边界将定为……从密歇根湖南端至迈阿密湾（莫米湾）最北角的一条直线”。1803年俄亥俄州加入联邦的条款包括对这一条文的接受。后来的一次测量绘出了俄亥俄宪法规定的这条线，即“哈里斯线”，就使得这一要求更加有了保障。这条哈里斯线于1818年经俄亥俄州立法议会批准，成为该州北部边界。

1805年当密歇根地区申请成为一个准州时，它以《1787年西北法令》规定的界限为其假定的南部边界。不幸的是这条线位于“哈里斯线”以南。虽然其差别很小，所包括的面积尚不足500平方英里，可是却由此产生了长期的激烈争执。密歇根人主张“西北法令线”应当胜过其他的一切规定，特别是因为莫米河口以南的“黑沼泽”构成了俄亥俄州西北部的“天然恰当的”边界。准州派往美国国会的代表说，南方的一英亩土地要胜过北方的几平方英里土地。俄亥俄州占有的是“我们最好的土地之一”，“若夺去这片土地，就会推迟我们加入联邦的时间”。最后联邦法院裁定“哈里斯线”以南的土地归俄亥俄州所有，作为补偿，密歇根准州在1836年得到了苏必利尔湖与密歇根湖之间的北方半岛作为补偿，那里在当时认为是一片经济价值很小的土地。

“1787年西北法令线”还在伊利诺伊州与威斯康星州之间引起了另一场土地争端。1818年伊利诺伊建州时并不曾遵守这条线的限制，该州加入联邦的《权能赋予条令》规定该州的北部边界为北纬42度50分，这就使该州获得了大约60英里长的沿湖地带，囊括了今日大芝加哥市区的绝大部分。当威斯康星在1838年成为一个准州时，它向国会申请根据1787年西北法令“恢复”其南部边界。伊利诺伊既然已在20年前抢先把土地拿到手，便保持不动声色的态度。这一争端最终在1848年威斯康星建州时得到解决，当时美国国会承认威斯康星加入联邦，并以北纬42度50

分为其南部边界。这样，今天的人们在往芝加哥寄信时，要在信封上写“伊利诺伊州芝加哥”而不是“威斯康星州芝加哥”。

1787年《西北法令》中还规定原来在俄亥俄河以北保有奴隶者可以继续保留奴隶，但是禁止向该地区输入新的奴隶。对于那些担心无力与黑人奴隶竞争、且不愿意与黑人混居在一起的白人，这就有了更大的吸引力。国会中的南方代表也接受了这一条款，因为他们还可以在俄亥俄河以南的广大土地上继续扩大奴隶的使用范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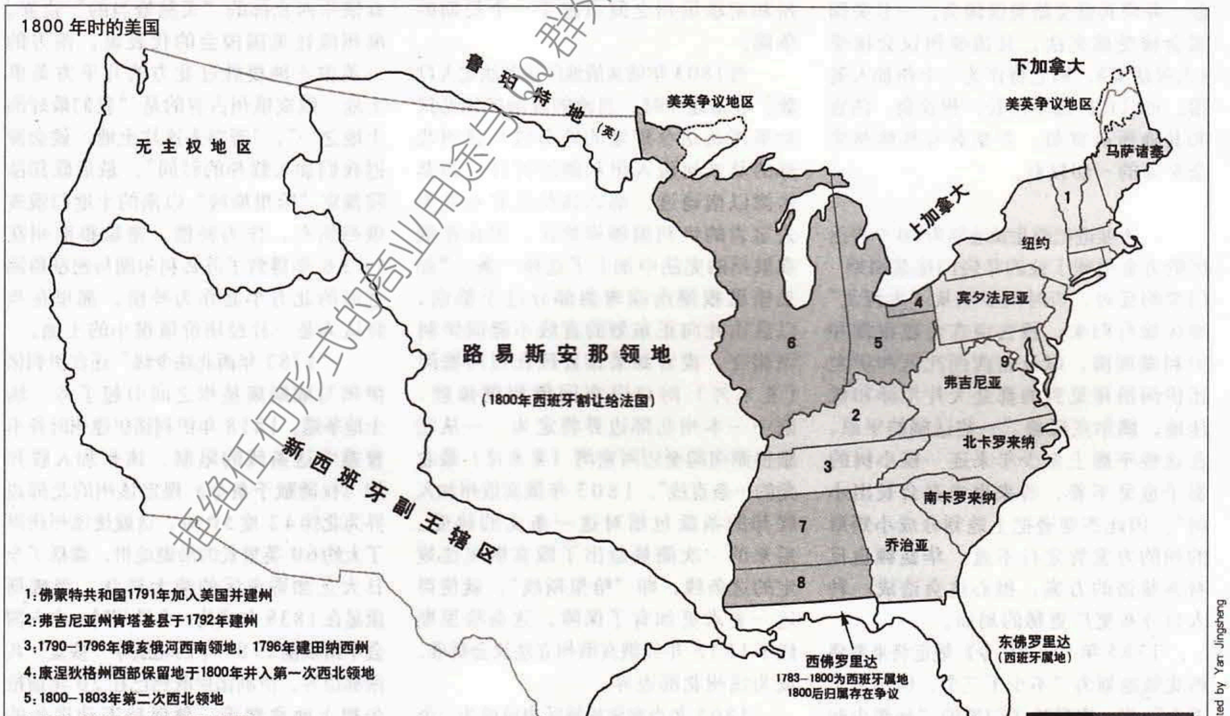
在英王查理二世于1681年颁发给威廉·佩恩的特许状中，规定宾夕法尼亚殖民地东起特拉华河，以北纬40度和42度作为其南北边界（后来南界改为北纬39度43分20秒，即著名的“梅森－迪克逊线”），而宾夕法尼亚的西界是从其南部边界与特拉华河西岸的交点（西经75度31分12秒）向西延伸五个经度。为了确定这条边界的具体位置，1785年夏天，来自宾夕法尼亚的测绘员安德鲁·埃利考特对宾夕法尼亚西部的土地进行了测绘，并确定了最终边界，即西经80度31分12秒。这条线被称为“埃利考特线”，它在俄亥俄河以南是宾夕法尼亚与弗吉尼亚的边界线，北半部则成为宾夕法尼亚与西北领地的边界线，以及西北领地今后的测绘基准线。

1784年宾夕法尼亚州与易洛魁联盟签署了《斯坦维克斯堡条约》，购买了该联盟的大部分土地。该州测绘员安德鲁·埃利考特随后与纽约州的两名土地测量员一起对两州的北部和西部边界进行了测绘。双方都同意以伸入伊利湖的一个小半岛“普雷斯克岛”向东20英里（32公里）为纽约州的最西界。但是纽约州议会却决定该州与宾夕法尼亚的边界沿着北纬42度一直向西延伸至与伊利湖的交点为止。这就形成了一块名为“伊利湖三角地”的争议地区，其面积为818.22平方公里。1789年，易洛魁部落联盟以3200美元的价格出售了这块三角地，其中宾夕法尼亚支付2000美元，联邦政府支付1200美元。

除了纽约和宾夕法尼亚之外，马萨诸塞州也曾经根据“从大海至大海”特许状对“伊利湖三角地”提出过领土要求。而康涅狄格州依据类似的特许状，对“三角地”介于北纬42度与42度02分之间的一窄条土地也有要求。在对“伊利湖三角地”有领土要求的四个州当中，只有宾夕法尼亚由于失去了滨海三郡（特拉华州）而成为一个内陆州，因此它要求获得这片沿湖土地，以便利本州的商业运输。经过协商和妥协，四个州在1792年达成共同协议，将“伊利湖三角地”交给联邦，然后联邦政府以151640.25美元的价格将其卖给宾夕法尼亚州。不过，该州虽然获得了这么一片湖岸地区，但那里的航运条件实在是太过险峻，因此获得了“船舶坟墓”的绰号。

马萨诸塞州在1784年11月13日、康涅狄格州在1786年5月11日也分别将其对西部领土的所有权转让给大陆会议。马萨诸塞放弃的是北纬42度02分与42度44分之间的土地，包括纽约州西北部的争议地区；康涅狄格州放弃的是北纬42度2分至北纬41度（这是康州本土最南端所处的纬度）之间的土地，包括它对41度以北的宾夕法尼亚州北部的领土要求。

但是康涅狄格与其他几个州不同的是，它在让与契约中保留了今日俄亥俄州东北角的一块土地，其南边以北纬41度为界，从宾夕法尼亚的西界向西延伸四个经度，北至安大略湖。这片土地的总面积为3366921英亩（13625平方公里），与康涅狄格州本土的大小差不多，被称为“康涅狄格西部保留地”



阎京生绘制 Illustrated by Yan Jingshe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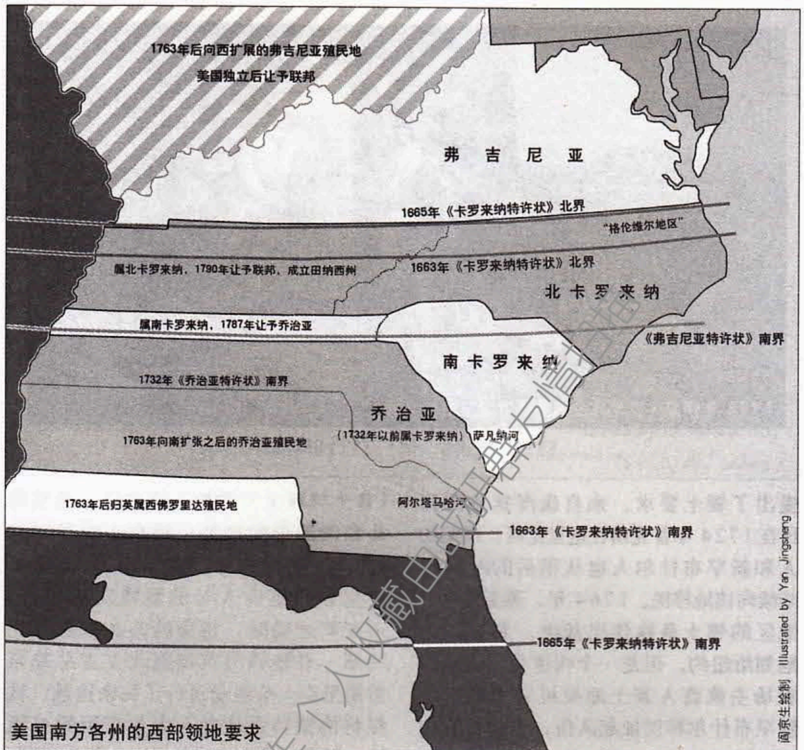
或“新康涅狄格”。

西部保留地建立后不久，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格林威治、里奇菲尔德、东黑文、新伦敦等城镇的居民就申请对独立战争中由于交战炮火所受的损失进行补偿。1791年康涅狄格州将保留地西部约50万英亩的土地作为“受炮火灾害者的土地”或“炮火地”出售，出售所得用来补助上述各城镇的受害者。

“康涅狄格西部保留地”的其余土地也在1795年被出售给一群从事土地投机买卖的合伙人，所得的款项（120万美元）用来补助康涅狄格州的各学校，包括耶鲁大学。这些土地被分成200英亩的方块出售，每英亩售价1美元。这些合伙人成立了“康涅狄格土地公司”，其董事长名叫摩西·克利夫兰，今日俄亥俄州的最大城市克利夫兰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康涅狄格州在售地时保留了七个镇区作为政府所有的公共地产。每个镇区的面积是25平方英里，其中保留500英亩土地拨给学校，500英亩拨给教会，240英亩拨给各镇的第一任牧师。不过，1800年，康涅狄格州最终将“西部保留地”的主权转让给联邦政府，这片土地随后被并入西北领地。

1790年北卡罗来纳放弃了它对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大海至大海”领土要求，在这座山脉以西的北卡罗来纳土地转交给联邦，成为“俄亥俄河西南领地”，后来在1796年成为田纳西州。南卡罗来纳州早已在1787年把从其本土向西延伸的一条领土让予了乔治亚州，这块领地北至北卡罗来纳州南界，南界是萨凡纳河源头所在的纬度线，南北宽约12英里（这是当时由于测量技术落后而造成的误差，萨凡纳河真正的源头在北卡罗来纳州境内），向西一直延伸至密西西比河，由于过于狭长而不不便管理，这也是该州非常痛快地便将其交给乔治亚州的主要原因。

到世纪之交时，唯一仍然保有大片西部领地的州就只剩下乔治亚了。该州的西部领地问题还和美西边界问题纠缠到了一起。原来在七年战争之后英国占有西属佛罗里达的时候，曾经以查塔呼奇河为界将其分为东佛罗里达和西佛罗里达两个殖民地，首府分别设在圣奥古斯丁和彭萨科拉。西佛罗里达地区面积窄小，土壤贫瘠，因此英国在1764年将其边界从北纬31度向北推移至北纬32度22分，将土地肥沃的纳切兹地区划给了西佛罗里达。



美国南方各州的西部领地要求

1783年英国与美国签订《巴黎和约》时，曾规定以北纬31度作为美国的南部边界，而当稍后英国将东西佛罗里达地区重新割让给西班牙时，西班牙人对北纬31度以北、32度22分以南的领土也提出了要求。美国认为这片土地在1783年之前始终处于英国的统治之下，因此予以断然拒绝。经过十多年的激烈争吵，美国在1795年与西班牙签订《平克尼条约》，最终以北纬31度作为西佛罗里达的北界。

根据1795年1月7日的一项立法，乔治亚州把亚拉巴马河以西、密西西比河以东、西班牙旧边界以北的全部土地都卖给了四家土地公司，其中“田纳西公司”沿着田纳西河流域购买了一长条土地，“上密西西比公司”心满意足地买到了今日密西西比州的西北部，“乔治亚公司”得到汤比格比河以西和亚祖河河口以北的土地。剩下的土地全都归了“乔治亚密西西比公司”。这四宗“买卖”至少包括了2200万英亩土地，价款是50万美元。这四家土地投机公司随后立即把它们的土地所有权卖给北部和东部各州的土地投机商和个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一系列舞弊、诈骗、贪污和官商勾结，因此乔治亚州在1796年通过另一项立法，宣布原先的交易无效。

接下来又爆发了乔治亚州与联邦政府的土地纠纷，第一个争论的焦点是1795年《平克尼条约》收回的北纬31度至32度22分的土地，即“纳切兹地区”。尽管乔治亚州对这片新收回的土地提出了领土要求，但还是在1798年勉强同意将其让予联邦，随后在这里建立了密西西比领地。

第二个焦点是北纬32度22分以北的土地，1796年当“俄亥俄河西南领地”成为田纳西州后，联邦政府试图将其南边的这块土地组织成“第二次俄亥俄河西南领地”，但是乔治亚州对此强烈反对。直至1802年，乔治亚才最终同意将剩余的西部领地移交给联邦，条件是联邦政府付出一笔100余万美元的购地金，并将住在这片地区、对白人移民构成威胁的克里克、卡陶巴、切罗基和契克索等印第安部落驱逐出境。但事后联邦政府并没有如约履行驱逐印第安人的这一条款。

尽管联邦政府从1780年起陆续获得了大片的西部领土，但是合众国新增的第一个州却是出现在东部的。在殖民地时期，纽约与新罕布什尔这两个殖民地依据不同国王颁布的特许状，对界于康涅狄格河和尚普兰湖之间的一片多山地区提出了共同的领土要求，与此同时马萨诸塞和康涅狄格两个殖民地根据另外两部特许状也都对该地



1775 年伊桑·艾伦攻占提康德罗加要塞的情景

提出了领土要求。来自康涅狄格的移民在1724 年首先前往这里定居，而纽约人和新罕布什尔人也从稍后的时间起陆续向该地移民。1764 年，英王对这一地区的领土争执作出裁决，将这片土地划给纽约。但是一个叫伊桑·艾伦的农场主兼商人兼土地投机客率领一伙新罕布什尔移民扯起队伍，自称“青山仔”(Green Mountain Boys)，对来自纽约的移民农场发动袭击和破坏。

当北美独立战争爆发后，“青山仔”转而开始对付英国人，在1775 年5 月攻下了提康德罗加要塞。当年9 月，伊桑·艾伦还对蒙特利尔发动了一次失败的远征，被英国人俘虏。被关在皇家海军停泊于纽约港的军舰里，不久之后获得假释。艾伦随后返回老家，在1777 年1 月15 日，他与27 个镇的镇民代表宣布脱离纽约和新罕布什尔的管辖，成立“新康涅狄格共和国”。当年6 月，这个国家的名字改为“佛蒙特共和国”(Republic of Vermont)，佛蒙特是法语“les Verts Monts”的音译，意为“青山”。这个共和国仿照激进的宾夕法尼亚宪法颁布了自己的宪法，以温莎镇作为首都（随后迁往卡斯尔顿），铸造了自己的铜币，还以“青山仔”的军旗作为国旗。这是一面深绿色的旗帜，左上角是一块深蓝色的方形，上面不规则地排列着十三颗白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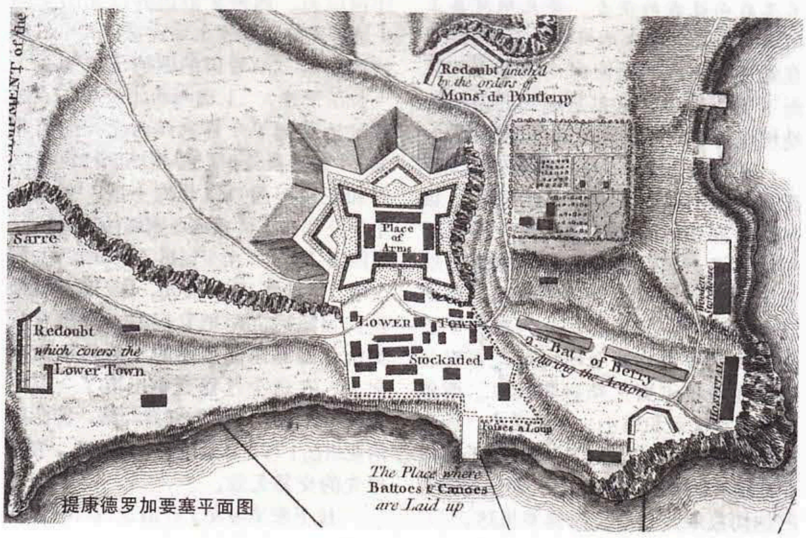
尽管“佛蒙特共和国”没有获得美利坚合众国的承认，但是双方在美国独立战争中一直采取合作的姿态，许多佛蒙特人参加了战斗，并将自己视为美国革命者的一员。“青山仔”参加了哈巴德顿会战、皇冠角战役、本宁顿战役。一些佛蒙特人将自己的家乡视为美国的第十四个州，在佛蒙特共和国的硬币上铸有“Stella Quarta Decima”（第十四颗星）的拉丁文字样，佛蒙特共和国的国徽也是一棵有十四根树杈的大树。不过，当1780 年英国人以及莫霍克族印第安人对佛蒙特发动袭击，杀死其边民时，佛蒙特共和国总督托马斯·奇滕顿与英属魁北克省总督弗雷德里克·哈迪曼进行了秘密接触，试探将佛蒙特重新并入大英帝国的可能性。伊桑·艾伦也参加了这次秘密谈判，但是当英国与美国在1783 年签署最终和约时，谈判就终止了。

1790 年佛蒙特共和国向纽约州支付3 万枚西班牙银元，后者最终放弃了对佛蒙特的领土要求。与此同时，佛蒙特开始与美国国会谈判，准备加入美国。在美国方面，由于弗吉尼亚的肯塔基县即将作为一个蓄奴州加入联邦，为了平衡蓄奴州与自由州之间的对比，北方各州都同意接纳佛蒙特加入联邦，南方的两个小州马里兰和特拉华也欢迎佛蒙特的加入，这样可以增加小州在众议院中的实力。

1791 年1 月10 日，佛蒙特共和国10 个县的代表在本宁顿召开大会，以105：2 的压倒性结果通过了加入美利坚合众国的决议。3 月4 日，佛蒙特共和国并入美国，成为年轻的合众国的第14 个州——这一天后来作为该州节日来庆祝。托马斯·奇滕顿留任该州第一任州长，“青山仔”则宣布解散。不过，在1812 年美英战争、美国内战和1898 年美西战争中，这支队伍多次重建，逐渐演变为佛蒙特州国民警卫队和佛蒙特空中国民警卫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佛蒙特国民警卫队“青山仔”被编入第43 步兵师，参加了从瓜达尔卡纳尔直至菲律宾的一系列战役，其中第172 团2 营获得了总统集体嘉奖。在2010 年，有超过1500 名“青山仔”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服役。今日的“青山仔”包括第86 旅级战斗单位（山地部队）和第172 装甲团，以及第158 战斗机联队（配备F-16 战斗机），总人数约2660 人。

对于直至十八世纪中叶为止的北美人来说，阿巴拉契亚山脉的绝大部分是非常险峻、无法翻越的。这座高峻雄伟的山脉由自西向东平行的三道山脉组成，最西边是阿勒根尼山脉，中间是山脉与河谷平行地区，最东边是蓝岭山脉。在四亿六千万年前的奥陶纪，原始阿巴拉契亚山脉的高度甚至超过了喜马拉雅山。不过由于造山运动停止，这组山脉在停止增高之后也就由于风化侵蚀的作用而被慢慢削低了，但是最西面的阿勒根尼山脉对于人类来说仍然险峻异常，无法攀越。不过在三亿年前，一颗有纽约中央公园那么大的



提康德罗加要塞平面图

小行星撞上了的阿勒根尼山脉，在惊天动地的烟尘散去后，形成了著名的坎伯兰关隘（Cumberland Gap），从而为后世向西迁移的移民开辟了一个比较容易通行的缺口。对于十八世纪的白人移民来说，越过这道关隘，就可以来到土地肥沃富饶的肯塔基地区。

“肯塔基”这个名字来自切罗基语，大致的意思可以翻译为“草原”。这也是美国第一个以印第安人的语言命名的州。在俄亥俄河以南的平原上生长着许多早熟禾（bluegrass），供养了大批野鹿、野牛和其他食草动物，因此肯塔基州今日的别名仍然叫“早熟禾州”。这片地区在成为美国第十五个州之前的历史可以概括为翻越阿巴拉契亚山脉的坚毅移民们拓荒和与印第安人打仗的历史，其间还点缀着在七年战争中攻打法国人据点和独立战争中攻打英军据点的历史。一个重要原因妨碍了白人移民前往肯塔基地区：定居在这里的几个印第安部落，比如切罗基人、肖尼人，以及偶尔来这里打猎的易洛魁人，全都是不好惹的好战民族。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只有少数白人狩猎者和贸易者偶尔前往阿勒根尼山脉以西的地区。

1773年，被誉为“肯塔基之父”的西部探险家、猎人和拓荒者丹尼尔·布恩（Daniel Boone）带着第一支白人移民队伍翻越坎伯兰关隘，来到肯塔基东部地区定居。但是第二年这些移民便遭到肖尼族印第安人的屠杀，所有人不分男女老幼都被剥去头皮。弗吉尼亚殖民地皇家总督邓莫尔勋爵带领弗吉尼亚民兵前去讨伐，打了一场“邓莫尔战争”。类似的情况在独立战争爆发后继续出现，布恩的女儿和另两个女孩在1776年7月被肖尼族印第安人掳走，布恩带着几个男人沿着这些印第安人的路线追踪了两天两夜，最终在这些“红棒子”停下来做饭时逮到了他们，发动袭击并夺回了这三名女孩。这件事后来给著名的美国作家詹姆斯·库珀提供了灵感，在他的小说《最后一个莫希干人》中加入了这个故事。


十九世纪时的坎伯兰关隘

1775年，一名北卡罗来纳法官成立了从事土地投机业务的“特兰西瓦尼亚公司”，雇佣布恩同切罗基族印第安人谈判，向后者购买了2000万英亩位于阿勒根尼山脉以西的土地，并将这片殖民区命名为“特兰西瓦尼亚”，意思是“穿过森林”。布恩随后带着一伙人每天在森林和山脉之间开凿几百英尺的道路，缓慢地拓宽穿越坎伯兰关隘的“荒野小道”，以方便赶着马车和牛车的移民向西迁移。这条小道在铁路出现前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是东部地区的白人向西移民的三条最重要路线之一。另两条移民路线一是从宾夕法尼亚西南部匹茨堡附近的俄亥俄河谷隘口翻越阿巴拉契亚山，另一条从坎伯兰关隘更南边的田纳西河谷穿越过去。


美国画家乔治·宾汉姆在1851年创作的油画《丹尼尔·布恩护送移民穿越坎伯兰关隘》

1776年弗吉尼亚议会宣布“特兰西瓦尼亚公司”与印第安人签订的购地条约无效，设立肯塔基县。1781年弗吉尼亚州把俄亥俄河以北的西部领土割让给联邦后继续保留了对肯塔基地区的统治权。但是有几点因素决定了肯塔基人注定与弗吉尼亚人发生冲突：矛盾首先在于，性格坚毅、吃苦耐劳的肯塔基拓荒者与控制着弗吉尼亚议会的那帮生活考究的种植园贵族在精神上和性格上是格格不入的；其次，由于路途遥远，肯塔基地区同弗吉尼亚首府里士满之间的联系微乎其微，从而增强了当地人的独立存在感。此外，弗吉尼亚州垄断了同西班牙人的贸易，禁止肯塔基人擅自沿着密西西比河顺流而下，前往新奥尔良出售他们的粮食和毛皮。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弗吉尼亚议会禁止肯塔基民兵与印第安人交战，若要开战必须得到议会的批准，肯塔基边民们对这条法令愤愤不已，认为限制了他们的自治权。

正是由于这些隔阂，使得肯塔基县的居民于1784年12月在首府丹维尔召开会议，准备制订宪法、独立建州。在接下来的六年里，肯塔基又召开了10次制宪会议，最终在1790年达成一致意见，通过了与美国宪法很相似的肯塔基宪法，规定了该州的政治体制、立法会议、选举制度、边界等重要细则。1792年1月1日，美国国会批准肯塔基宪法，从而接纳其成为美国的第十五个州。

美国众议院在1793年通过了《第二次国旗法案》，规定将国旗上的星星增加到15颗，条也增至15道。马萨诸塞州众议员本杰明·古德修提出，在佛蒙特和肯塔基加入联邦后，国旗上要增加两颗星和两根红白条，开创了一个不好的先例。他富有预见性地指出，新州的加入恐怕要持续一个世纪之久，而国旗的图案则应当是永久性的，以保证其严肃性。另一位马萨诸塞众议员塞缪尔·雷曼则认为拒绝在国旗上增加新的星和条恐怕会得罪新的州。佛蒙特众议员以色列·史密斯赞同雷曼的意见，但是也指出每新换一次国旗要花费他500美元，而每艘海军军舰要花60美元制作新旗。虽然这一次这部法案很顺利地在参议院三读通过，但是史密斯指出的事实也给议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此后的25年时间里，尽管田纳西、俄亥俄、路易斯安那、印第安纳和密西西比五个州陆续加入联邦，但美国国旗的图案却始终没有更改。

1818年4月，美国海军上校塞缪尔·里德的提议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它规定国旗上的红白条纹保持13道，以纪念最初的北美革命十三州，而星的数量随着新州的增多而增加。每次更换新国旗的日期都定为7月4日，即美国国庆日。

向西，向西

正当肯塔基州加入美国的同时，一场可怕的政治风暴席卷了法国。这场风暴开始于1789年春天，华盛顿总统就职之后几天。当时法王路易十六由于王室生活奢侈浪费和战费浩繁，包括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给予美国人的代价高昂的援助，而濒临破产的边缘。在试行了许多筹款计划后，他被迫向人民呼吁，要求帮助。在极端困难的处境下，路易十六在凡尔赛宫召开了已经有150多年没有召开的国民会议，即三级会议。但是由于国王愚蠢地对权力抓住不放，第三等级即资产阶级的代表们不久便抛开了贵族和僧侣这两个等级，自行召开国民会议。

惊人的事件随后接踵而来：7月14日，巴士底狱被袭击和捣毁；8月4日，贵族的封建特权被国民会议废除。几天以后会议宣布成立人民政权，在不朽的伟大文件《人权宣言》中一一宣布了公民的权利。在漫长的两年里，新法令一个接一个地从国民大会的会议厅中传出，最后终于出现了法兰西王国的第一部宪法。这部宪法把立法权交给由民选投票产生的一院制议会。1791年初，路易十六被下层民众吓得破了胆，又无路可逃，便接受了这一革命的最高文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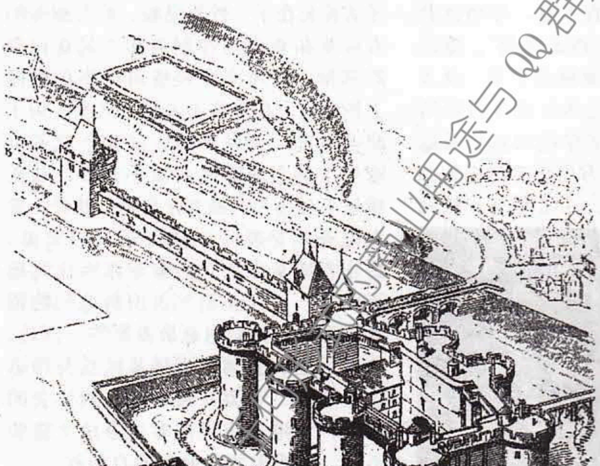
几乎所有的美国爱国者都为他们不久之前采纳的学说在大西洋彼岸得以应用而感到高兴。合众国的公民们怀着自豪感，把法国大革命的第一阶段多少看作是自己的政治智慧和进步思想的反映。1790年3月，当拉法耶特侯爵把被摧毁的巴士底狱的钥匙送给华盛顿总统时，华盛顿庄重地把它当作自由获得胜利的一件纪念品接受了下来（这把钥匙如今在弗吉尼亚州弗农山庄展出）。

然而几乎在同一时刻，谣言传到美国，据说那么顺利地开始的革命正在变成一场不祥的内乱。贵族和僧侣们由于失去特权而纷纷逃亡德意志，甚至路易十六也在批准宪法之前就企图逃离法国，只是因为在逃往边界的路上被一些目光敏锐的臣民发现才没有获得成功。与此同时，巴黎的工人和贫穷市民开始举行大规模示威，要求进行更彻底的改革，包括成人的选举权问题，最后遭到拉法耶特率领的武装部队的驱散。拉法耶特是一位开明的宪政拥护者，但并不同意平均主义的暴民政体。

这样，在到当时为止成功地指导了革命进程的资产阶级和一心想取得更彻底成就的巴黎群众之间展开了一场流血的激烈斗争。1792年，一群暴民冲进杜伊勒里宫，将国王处于软禁之下；7月，法国对普鲁士宣战；8月，路易十六被废黜；9月发生了第一次可怕的大屠杀，被关在监狱里的贵族和“反革命分子”，不管是否有罪，统统被处死。1793年1月，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国民议会经过选举而被大大扩充，法国政府的权力因而转到了一小撮以“公安委员会”之名著称的激进分子手中。

此后极端分子在法国的文职部门和军事部门中都掌握了权力，他们决心要消灭君主主义者，因而发动了巴黎的恐怖屠杀和各省的内战，出于睚眦必报的残忍天性，层出不穷地干出了许多暴行。丹东、马拉、罗伯斯庇尔，一派领袖继另一派领袖，以越来越高涨的激情执政，直至人类耐性所能达到的极限。然后，在1795年，一个出身科西嘉岛的矮个子炮兵军官拿破仑·波拿巴“在一阵葡萄弹的扫射中”赶走了革命的制造者，给法国带来了二十年的“国内秩序”，伴之以耗竭法国国力的二十年对外战争。

1792年之后发生在法国的一系列事件引起了美国人的关注，全国普遍掀起有关法国革命的辩论。托马斯·潘恩在他为法国大革命辩护的小册子《人权》当中赞许地写道“依靠在美洲点燃的星星之火，已经升起了扑灭不了的熊熊火焰”。他承认法国革命已经出现了混乱，但要求世人尽量耐心地等



←1789年时的巴士底狱。虽然这座建于十四世纪的要塞在法国革命时被视为专制压迫的标志，但是它在1789年7月14日被巴黎暴民攻陷时里面并没有政治犯，只关押着四名伪造假币者、两名精神病人和一名因猥亵男女儿童而被其父亲强制送进去的年轻贵族。臭名昭著的性虐狂人萨德侯爵本来也关在这里，但是十天前被转送到了另一处监狱

待。反联邦党人效法法国的政治俱乐部，以惊人的速度在美国各地组织了一系列民主主义社团和俱乐部，在各个城市中举行集会以庆祝法国大革命中激进派的胜利；在费城的一次盛大集会上，一位鲁莽的演说家甚至公开地为路易十六的被处死而关心鼓舞。极端分子照搬法国革命的经验，要求在合众国实行新的人人平等的原则，废除“先生”、“阁下”这一类称呼，代之以“公民”的头衔。波士顿的激进派人士把“皇家交易所巷”改名为“平等巷”，纽约人则把“国王街”改名为“自由街”。总统由于有时像平民那样在街上走动而受到赞扬，而副总统因乘坐六驾马车而受到批评。

联邦党人警惕地关注着国内和国外的这些动向。当法国极端分子在漩涡般的政治命运中登上顶峰、法国革命的矛头在1793年指向基督教后，联邦党人的惊恐情绪达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一家坚定的联邦党报纸写道“……1776年确定的革命原则与法国如今的混乱之间有什么联系？在美国，从未有暴行肆虐，未曾以头颅高悬、曝尸街头来炫耀武功。人们只有在战场上才英勇地流淌热血。”耶鲁大学校长提摩西·德怀特破口大骂说“难道要我们的儿子成为伏尔泰的门徒和马拉手下的暴徒吗？难道要我们的女儿成为共和主义秘密团体成员的娼妇吗？”另一位牧师用神秘的口吻声称，托马斯·杰斐逊和他的同党正在传播“法国革命那些无神论的、无政府主义的以及在其他方面不道德的思想”。还有些联邦党人要求不必啰嗦，立即对法国宣战，以便联邦党政府能够消灭它的国内批评者——这是把政敌罗织成卖国贼的一项简单建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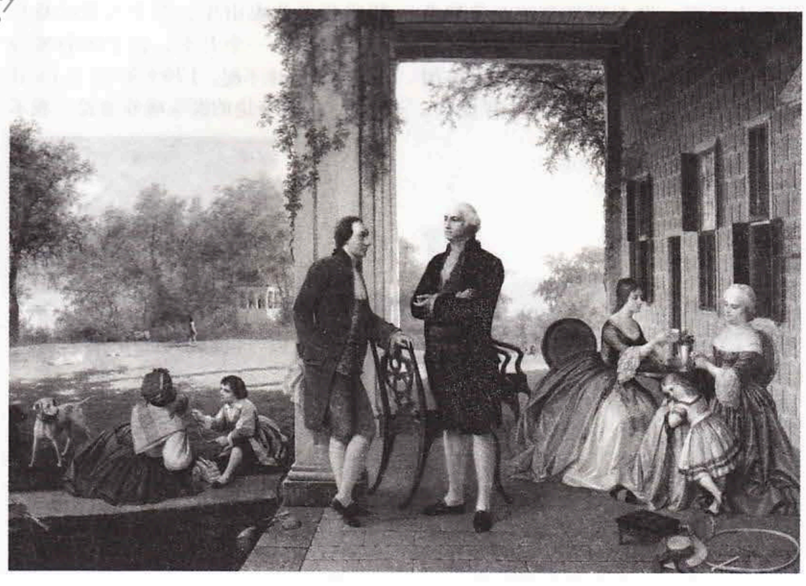
当法国在1793年1月最终同英国、西班牙、荷兰和德意志开战，英法两国海军在公海上的战争开始影响美国的商业利益时，美国国内这一关于革命的激烈辩论变得更加猛烈了。当时英法两国都力争进口美国商品，同时阻止对方和美国进行贸易，必要时他们甚至会拦截和征用美国商船来达到目的。英国军舰没收运载法国货的美国商船，并搜查美国船只以搜寻出生在英国的海员，迫使他们在英国船只上服役。另一方面，法国人的行动也不见得文雅一些，如果说他们对美国商业海运造成的损害比较小，那只是因为他们缺乏力量和机会，而不是因为他们更重视国际法的尊严和外交礼仪的美感。法国海军受到大革命的强烈冲击，实力不足，于是便颁发私掠船许可证，允许一大批比海盗好不了多少的武装民船去掠夺美国同英国的贸易。他们虽然不强迫美国海员为他们服役，但往往虐待那些落入他们手中的军官和士兵。

当所有关于海上掠夺的故事刊登在美国报刊上的时候，派性争端便相应地发作起来。联邦党人能够看到法国人做的每一件坏事，要求同法国宣战；反联邦党人能够看到英国人做的每一件坏事，要求同英国宣战。当革命中的法国援引1778年美法盟约的条文，要求美国像十五年前法国援助美国那样参加战争时，美国国内的分歧白热化了。毫无疑问，这个要求触到了美国的弱点，因为所有的美国人都没有忘记法国在美国独立战争处于最困难的境地时，为年轻的共和国所提供的那些援助。但是联邦党保守主义者的领袖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对此辩解说，美法盟约是同法国国王签订的，在波旁王朝被推翻后，美国对法国的义务就终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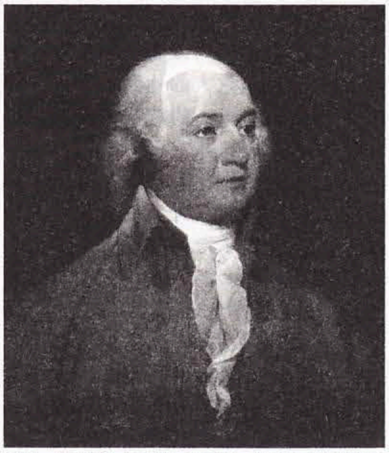
华盛顿也决心不惜任何代价使美国避免卷入战争。他在1793年向欧洲各交战国宣布美国保持中立，并且宣布联邦法院将对违反这一原则的美国公民提出起诉。虽然法兰西共和国的外交代表埃德蒙·热内公民在到达美国时受到了反联邦党人的热烈欢呼，但是华盛顿却不为大众的喧嚷所动摇，以刻板的正规礼节接待了这位公使。

当热内发现美国不愿遵守1778年同盟条约对英宣战时，便介入美国政治。他鼓动查尔斯顿的激进市民俘虏了港内的英国商船，向美国船只颁发在西印度群岛针对英国的私掠许可证，并企图在美国招募军队入侵西属佛罗里达。1793年夏天，要求华盛顿让国会通过支持法国的决议，他还狂妄地扬言，如果华盛顿拒绝这个要求，他就要直接向美国人民发出呼吁了。这些活动甚至使其反联邦党人支持者都陷于尴尬的境地。1793年8月，华盛顿要求法国政府调热内回国。热内公民对其祖国那锋利的斩首机早有耳闻，于是明智地同一个可以继承大量财富的美国女人结婚，在美国定居了下来。

总的来说，汉密尔顿和联邦党人代表的是美国北部和东部各州的意见，新英格兰的海外贸易主要是由伦敦的银行家资助的，纽约和宾夕法尼亚由于向英国出售工业品、南方各州通过向英国出售农产品，全都在战争中发了财，因此坚决反对与法国并肩作战的主张。但是西部领地的农民和拓荒者则支持反联邦党人的立场。对他们来说，英国才是敌人，因为它没有按照1783年的和约撤出西部边界的堡垒和要塞，反而使加拿大的皮毛贸易活动越过边界向南发展，并煽动印第安人反对美国拓居者，从侧翼威胁着美国人向西扩张的进程。英国也没有对美



在弗农山庄与华盛顿交谈的拉法耶特侯爵。尽管这位曾积极投身美国革命的法国贵族在1790年前往美国呼吁支持法国革命，但华盛顿和其他美国政治家出于避免卷入欧洲争端的审慎考虑而加以拒绝，这最终导致了1797年美法两国不宣而战的“准战争”



约翰·亚当斯（1735–1826），出身于马萨诸塞的清教徒家庭，16 岁时进入哈佛大学神学院，毕业后一度任教，随后成为律师，参加了1765年反印花税斗争。1775 年被选为大陆会议代表，是《独立宣言》签署人之一。独立战争期间出使西班牙和法国，美国独立后又出任驻英公使。1789 年参加首届总统选举失利，成为副总统，1797 年华盛顿退休后当选为第三届（第二任）美国总统，但由于任内颁布了不得人心的《敌国侨民法》和《反颠覆法》，因此只干了一届就被选下台

国独立战争期间夺走的奴隶和财产进行赔偿。英国的盟友西班牙在新奥尔良关闭了密西西比河，禁止美国商船通航；英国海军还对美国的商业造成严重破坏。联邦党人自然也反对美国的利益受到英国侵害，但是关于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一系列审慎考虑都促使他们反对同英王乔治进行第二次战争。

1794 年，华盛顿派遣首席大法官约翰·杰伊前往英国，以解决独立战争的遗留问题，并缓解日益紧张的美英关系。杰伊带回国的条约包括英国从西部要塞撤军、以及同意美国在英国及西印度群岛享有贸易优惠等条款，但是关于今后拦截美国船只和强迫美国海员服役等问题一句话也没有提到。《杰伊条约》还没有提到归还被英军带走的奴隶的问题，甚至在偿还英国债权人私债的问题上向英国屈服，从而重新揭开了旧的伤疤。这种债务有四分之三是由美国南方各州欠下的，它们原本指望在独立后可以把这些欠款一笔勾销，但如今却愤怒地发现不但要继续向英国人偿还旧债，而且被英国掳走的奴隶还不能归还。南方种植园主们原来以疑惧的心态看待杰斐逊和反联邦党人的思想，但这时他们开始相信，至少要把联邦党人撵下台，并且废除《杰伊条约》。

美国政府只是在争取密西西比河自由航行的问题上取得了比较大的成果。1795 年，托马斯·平克尼与西班牙签订了《平克尼条约》，西班牙第一次承认了1783 年巴黎条约中划定的美国边界，即西部以密西西比河与西属路易斯安那为界，西南以北纬31 度线与西属佛罗里达为界。西班牙还给予美国在密西西比河的自由航行权和在新奥尔良港存放货物的权利，为期三年，期满后再视情况而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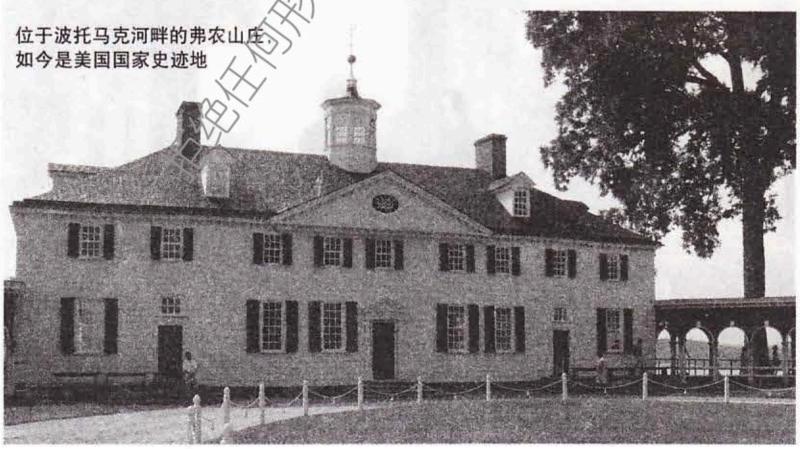
1796 年9月，华盛顿干满了第二任总统任期。此时他已经64 岁了，被种种政治分歧折磨得筋疲力尽，渴望回到弗农山庄去过弗吉尼亚乡绅式的退隐生活。华盛顿宣布拒绝第三次担任总统，从而为在他之后的美国总统开创了一个不成文的传统，这个传统直至1940 年才被富兰克林·罗斯福打破。在卸任前的告别演说中，华盛顿对美国的政治分裂表示悲痛，并最后一次提醒他的国人，不要轻易与别国结盟。华盛顿回到了弗农山庄，在十八世纪最后一年的最后一个月里，由于冰封寒冷的天气而卧床不起。1799 年12 月14 日晚上，他对身边的医生喃喃地说“我不怕死”，说罢不久便与世长辞了。

随着华盛顿离开美国的政治生活，竞争在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斐逊这两个政治对手之间展开。这两个人都在1780 年代加入军队，后来都出任驻外公使[注]，随后在1790 年代又一同供职，亚当斯担任副总统，杰斐逊出任国务卿。

虽然亚当斯和杰斐逊两人彼此赢得了对方的私人尊敬，但是在许多方面都截然相反。身材矮小的亚当斯看上去圆滚滚肥嘟嘟，像极了一只火腿。他生性挑剔，这与杰斐逊的高大身材和不修边幅形成了鲜明对比。高涨的政治野心和对生前身后名誉的计较，使得亚当斯总是尽力维护良好的声誉，而杰斐逊却是一个生性平淡的人，经常抽身回家享受私人生活。亚当斯出身于清教徒家庭，爱好集中在法律和政治方面，而杰斐逊的兴趣就广泛得多了。他把许多业余时间花费在为他那座当时全国最大的私人图书馆（后来成为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书的一部分）收集藏书上，还是一名爱好收集史前动物骨骼的博物学家、农业科学家、教育家、哲学家和建筑师。杰斐逊为自己设计了蒙蒂塞洛住宅，他设计的白宫方案在建筑评比中名列第二。

这两个政治家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对国家未来的基本构想上。亚当斯尽管忌惮汉密尔顿的政治野心，也不信任他对英国的迷恋，但仍然是一个坚定的联邦党人，对法国革命感到恐惧，害怕“过分的民主”，主张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杰斐逊尽管坚定地支持宪法，但反对联邦党人的一系列内外主张。在1796 年的总统选举中，两人得票数量非常接近，最后亚当斯以71：68 的

位于波托马克河畔的弗农山庄，如今是美国国家史迹地



【注】“公使”是政府之间的外交代表，而“大使”这一头衔相当于君主之间互派的外交代表，对外代表君主本人，因此不是轻易封赠的。在1860 年，英国只有三位大使，分别驻在巴黎、圣彼得堡和君士坦丁堡，法国派出的大使多一些，而美国直到1893 年为止还未曾派出过一个大使。美国人强烈的共和主义情绪使他们对“公使”这一称号更加安心，因为公使的身份使其只能和驻在国的政府打交道，而不能参加围绕宫廷举行的各种典礼仪式。十九世纪各国宫廷互派的大使都身穿光彩夺目的华美礼服，而美国特别规定驻外公使在外交场合只许穿“美国公民的朴素服装”。直到1893 年，美国才向英、法、德、意派出首批大使，四国也相应地将驻美使节升格为大使。到二十世纪，强国间互派大使、向弱国派出公使成为普遍规律，芬兰和瑞士直至五十年代仍只对外派遣公使。以色列建国后也想遵守这一共和主义原则，但美国派去了一位大使，因此以色列人关于简朴外交的美好愿望从一开始就破灭了

微弱优势当选为总统，杰斐逊依据宪法规定成为副总统，他的支持者嘲弄地管亚当斯叫“三票总统”。

法美关系从美国拒绝履行1778年条约之后就变得十分紧张，但法国人碍于乔治·华盛顿的巨大威望和名声一直隐忍未发。亲英的联邦党人总统亚当斯一上任，法国的对美政策很快就变得敌对起来了。1797年，法国督政府下令绞死从英国船上抓到的美国水手，运载英国货物的美国船只在被捕获后连货带船全部充公。不仅如此，法国还秘密派人挑拨美国西南地区的克里克族印度安人起事，法美战争一触即发。此时美国陆军的正规军总兵力约有3300人，拥有4个步兵团，附属炮兵和工程兵单位，还有2个适合执行边境警备任务的龙骑兵连。当时在与西属路易斯安那的西南边境上驻扎着9个步兵连、2个炮兵连和全部龙骑兵；在西北地区的底特律驻有5个步兵连，其他部队沿着大湖以东的美加边境部署，分散于边境上的12座要塞中。此外还有数支小分队守卫着西点、卡莱尔和皮特堡这些传统的军事要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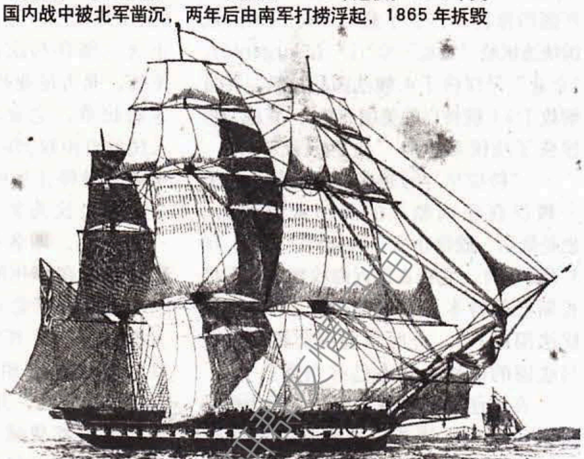
当法国一再攻击美国船只，并拒绝接受查尔斯·平克尼为美国驻法公使后，亚当斯要求国会召开一次有关国家防御的特别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亚当斯要求立即采取措施装备一支海军，他还提议改善港口防御，组建新的骑兵部队，为改善民兵的组织和训练而修改《1792年民兵法》。最后，尽管他自己也明白并非刻不容缓，但亚当斯还是要求国会授权自己在紧要关头征集一支大军。与法国的决裂迫在眉睫，但是从法国在欧洲的战争情况来看，法军入侵美国似乎不太可能。杰斐逊派的民主共和党人害怕一支常备军最终会被用来对付自己，面对他们的批评，亚当斯的想法也改变了。作为一个资深的老革命者，亚当斯也很清楚维持一支常备军的危险性。

美国国会最终不同意授权总统在紧急情况下临时征召1万人入伍服役3个月的请求，但是批准了亚当斯总统关于加强海军军备的提案，同时允许适当加强港口的防御设施。按照这一决议，美国东海岸的船厂在1794年开始建造6艘快速巡航舰，总造价688888.82美元。最先服役的三艘巡航舰是44门炮的“宪法”号和“合众国”号，以及36门炮的“星座”号。另三艘稍后建成服役的巡航舰是“切萨匹克”号、“总统”号和“国会”号。这六艘巡航舰成为美国海军的鼻祖，被称为“六元老”(Original Si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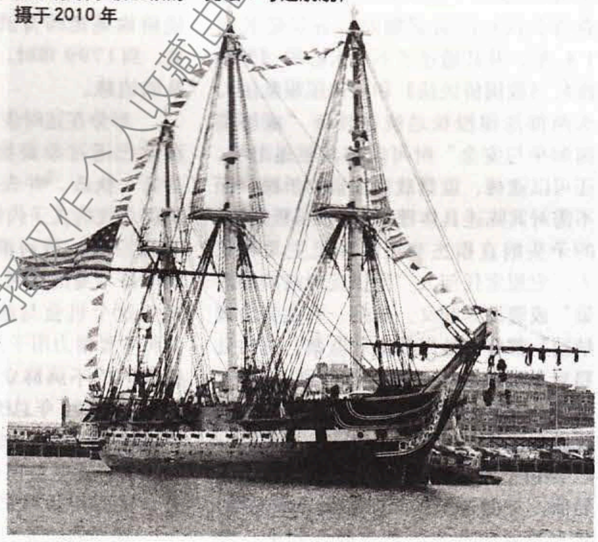
尽管亚当斯要求加强战备以防不测，但他和大多数叫嚣对法宣战的联邦党人不同，更倾向于通过外交谈判来解决美法争端。亚当斯派遣了一个代表团，代表团的成员包括那位被法国拒绝的平克尼，弗吉尼亚的联邦党人、第一任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以及政治立场倾向于民主共和党人的艾尔布里奇·盖里。

三名美国代表到达法国后，接待他们的是督政府的外交部长、大名鼎鼎的外交界老狐狸塔列朗。美国使者对塔列朗的印象非常糟糕，称他是“下流无耻的小人”。塔列朗先把美国代表团晾在一边好多天，然后才派出三名手下和美国人谈判。在代表团发回美国的急件中将此三人的姓名隐去，分别称之为X、Y和Z（三人的真实姓名是让·奥廷格，皮埃尔·贝拉米和吕西安·奥蒂瓦尔）。XYZ三位先生口口声声地许诺要尽快和美方达成协议，然而他们开出的条件却让三位美国代表吓了一跳：美国向督政府的五名执政官和塔列朗先生每人支付25万美元，并向法国提供1200万美元贷款，同时亚当斯总统必须为他对法国的不敬而道歉。

“合众国”号巡航舰，1798年服役，1849年退役。1861年美国内战中被北军凿沉，两年后由南军打捞浮起，1865年拆毁



永久停泊于波士顿的“宪法”号巡航舰，摄于2010年



马歇尔和平克尼这两个坚定的联邦党人愤怒地乘船返回了美国，盖里被迫留下，因为塔列朗暗示说如果三个使节全部回国，法国将对美国宣战。随后联邦党人向国会公布了此次出使的文件，不光令议员们为美国的荣誉被侮辱而大发雷霆，而且激起了此前一直对法国持有同情态度的普通美国人的极大不满。亚当斯总统不失时机地再次向国会提交了军备扩充案。在有可能爆发对法战争的阴影下，美国国会批准组建3个炮兵团，而非原先设想的骑兵团。对陆军部长麦克亨利（James McHenry）提出的建立具有水兵和步兵双重功能的步兵团的申请，国会投票决议组建美国海军陆战队，让麦克亨利遗憾的是，这支部队被编入了海军而不是陆军。

1798年5月，美国国会批准成立独立的海军部，并组建了1万人的正规海军。当年7月，国会正式宣布废止1778年美法同盟条约，从而使美法两国关系陷入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在接下来的两年里，这两国陷入“准战争”(Quasi War)的状态，双方的私掠船在加勒比海上互相攻击，美国还以支持海地黑人的起义来打击法国。

搭载17门炮的美国海军单桅帆船“特拉华”于1798年7月在新泽西海域俘获了第一艘法国私掠船“克罗雅贝尔”号（La Croyable)，将其带回美国本土，并改装为美国军舰

“报复”号。“星座”号巡航舰于1799年在西印度群岛俘获了载有36门炮的法国快速帆船“叛乱”号（L' Insurgente）。“企业”号俘获了4艘法国私掠船，并且解救了11艘被俘的美国商船。“宪法”号俘获了法国私掠船“桑德韦奇”号。

“特拉华”号是在“准战争”中第一艘俘获法国船只的美国武装商船，也是最后一艘停止战斗的船只。1801年3月20日，它在古巴近海收到了海军部长斯托德特本人发来的命令：“停止骚扰法国船只”，此时美国国会批准结束与法国的准战争状态已有六周。

在美法“准战争”期间，因为担心法国间谍和仇视英国的爱尔兰移民在美国国内发动反叛活动，由联邦党人控制的国会在1798年6月将外侨在美国获得公民权的居留期限从五年延长到14年，并且通过了不得人心的《外侨法》、《敌国侨民法》和《镇压叛乱法》。头两部法律授权总统在外侨“威胁美国和平与安全”时可以将其驱逐出境，还可以逮捕、监禁敌对国家的侨民，而不需对其陈述具体理由。《镇压叛乱法》的矛头则直指杰斐逊派和民主共和党人，它规定任何人“阴谋反对政府的政策”或资助“起义、暴乱、非法集会或结社”都将被处以罚款和监禁，这些处罚对于那些敢于“撰写、印刷、宣传、发行……不实的文字，恶意诽谤”总统、政府和国会的人也同样适用。

由于无法扭转联邦党人控制国会的局面，杰斐逊派转而向各州寻求支持。弗吉尼亚州和肯塔基州联合起来，率先向这三部不得人心的法律发起了挑战。肯塔基州的决议由杰斐逊本人起草，宣布《外侨法》、《敌国侨民法》和《镇压叛乱法》违反了《权利法案》，由于这三部联邦法律违宪，因而在该州无效。弗吉尼亚州的声明由詹姆斯·麦迪逊起草，它宣布当中央政府威胁了人民的自由权利时，各州“有权并且有义务倡导停止那些有害的活动”。这两个州的决议为美国的政治生活开创了一个先例，即各州可以宣布废止一些联邦法律在本州的实行。

由于联邦党人依旧我行我素，一些人准备进行公开的斗争。弗吉尼亚州议会要求在哈珀斯渡口建立兵工厂，重新征召民兵，并为这些措施征税。在当时的首都费城，联邦党人的治安员沿街巡逻，以保护政府官员不被愤怒的人群袭击。为了保障安全，亚当斯总统偷偷地把防身武器带进了自己的住处。到1799年时，美国已经处于政治动乱的边缘。

形势在这时发生了变化。拿破仑·波拿巴通过政变推翻了督政府，自立为第一执政，并表示愿意同美国和解。美国总统的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从欧洲回国，带回消息说法国外长塔列朗准备与美国谈判，签署协议。亚当斯抓住这个机会与法国实现了和解，准备将主要精力用于在1800年大选前安抚国内的不满群众。

在1800年总统选举中，联邦党人居于完全的劣势。他们面临着人们的种种指责，违宪滥用权力，镇压不同政见者，试图用联邦军队镇压人民……

选举的结果不出人所料：民主共和党的两名候选人托马斯·杰斐逊和艾伦·伯尔每人获得了73张选举人票，亚当斯只获得了65张，联邦党人惨败。不过，由于民主共和党的两名候选人得票数相等，不得不依据宪法在众议院再度进行选举。联邦党人认为伯尔比杰斐逊更加危险，因此最后选举杰斐逊为总统。为避免今后出现类似的僵局，下一届美国国会通过了宪法第十二条修正案，规定分开投票选举总统和副总统，从而使得这两个职位被获胜的党派全部占据，终止了此前由落选党派的总统候选人出任副总统的做法。

为了摆脱联邦党人的奢华传统，杰斐逊在1800年3月4日就职时策划了一个简朴的仪式，从他居住的单身寄宿公寓步行前往国会大厦举行宣誓仪式，没有马车和仪仗队。杰斐逊教养超群，精于世故，在公众面前总是以朴素单纯的形象出现，在入住总统官邸（当时还不叫白宫）后，每次举行国宴时都让客人随便就座，不拘礼节。

从身世背景上讲，杰斐逊是一个富裕的贵族庄园主，拥有100多个奴隶；但是他信奉的却是农业民主派思想，坚信自由权利只有在广泛的社会和经济平等的条件下才能实现。自给自足、勤勉、关心公益的自耕农，这才是能够运用民主权利的公民应有的素质。然而杰斐逊学说的前景并不容乐观，因为勤勉会产生财富，财富导致社会不平等，而不平等威胁着民主社会的基石。对于杰斐逊派来说，解决这个两难局面的办法在于快速扩张领土，向自耕农阶级提供更多的土地，把过剩的人口从东海岸拥挤的城市中解放出来。杰斐逊对英国教士托马斯·马尔萨斯在1798年提出的“人口论”不以为然，他解释说，在欧洲，土地及其出产食物的总量是固定的，所以过高的出生率会导致死亡率上升。但是在美国，广阔富饶的土地可以供给每一个愿意劳作的人，土地、食物和财富会随着劳动人口的增加而增加。

除了抽象的政治理念之外，受到杰斐逊派赞许的向西扩张行动还有一些现实因素：它可以保护边境领土免受英国和西班牙势力日益增长的威胁；此外，西部边民是持有反联邦党思想的，肯塔基和田纳西这两个农业州在1800年选举中都投了杰斐逊的票，当时人口正在剧增的俄亥俄也要在下届总统选举时拥有发言权了。今后新建的西部各州如果也采取民主的政治形式，将会加强反联邦党人的力量，巩固杰

美法准战争期间“星座”号与法舰“叛乱”号的交战，1799年2月9日，西印度群岛圣基茨岛海域



斐逊派对联邦党人的胜利。1803年，通过一笔意外横财，使得美国的领土面积扩大了一倍，从而加强了杰斐逊派的信心。

十九世纪初的美国中西部农业各州经济严重依赖于密西西比河的航运。俄亥俄、肯塔基、田纳西的商人把自产的玉米、小麦、烟草、猪肉、牛肉、大麻和木材顺着密西西比河运到新奥尔良港，从那里把这些产品运往东海岸或欧洲的市场。若要把这些体积庞大的农产品翻越阿巴拉契亚山脉运到东部地区，其运输费用之高使人望而生畏。只有枪支、火药、子弹、铁钉和布匹这些体积小、价值高的货物还可以从这条旱路运进运出。因此，西部各州若要生存下去，就必须使密西西比河和新奥尔良港对美国商人开放。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美国人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新奥尔良和西属路易斯安那——包括西属佛罗里达——的命运。这些领土掌握在西班牙人手里的时候，美国人是不担心的，因为西班牙这个曾在十六世纪使得欧洲和世界都对其威名感到恐惧的帝国已经陷入了一种从中央蔓延到四周的可怕的瘫痪状态。虽然庞大的西班牙帝国在1800年时从外表看上去依然堂皇显赫，但是昔日天主教双王、查理五世、科尔特斯和毕萨罗那种勇猛、强悍和从事伟大事业的才能已经消失，只留下虚弱无能的最高当局支配着马德里、外省和美洲殖民地。所以当1795年华盛顿要求西班牙君主承认美国人有权使用密西西比河和新奥尔良港时轻而易举地就获得了满足，而五年之后拿破仑暗中要求西班牙把路易斯安那归还给法国时，西班牙君主也是除了屈从之外没有别的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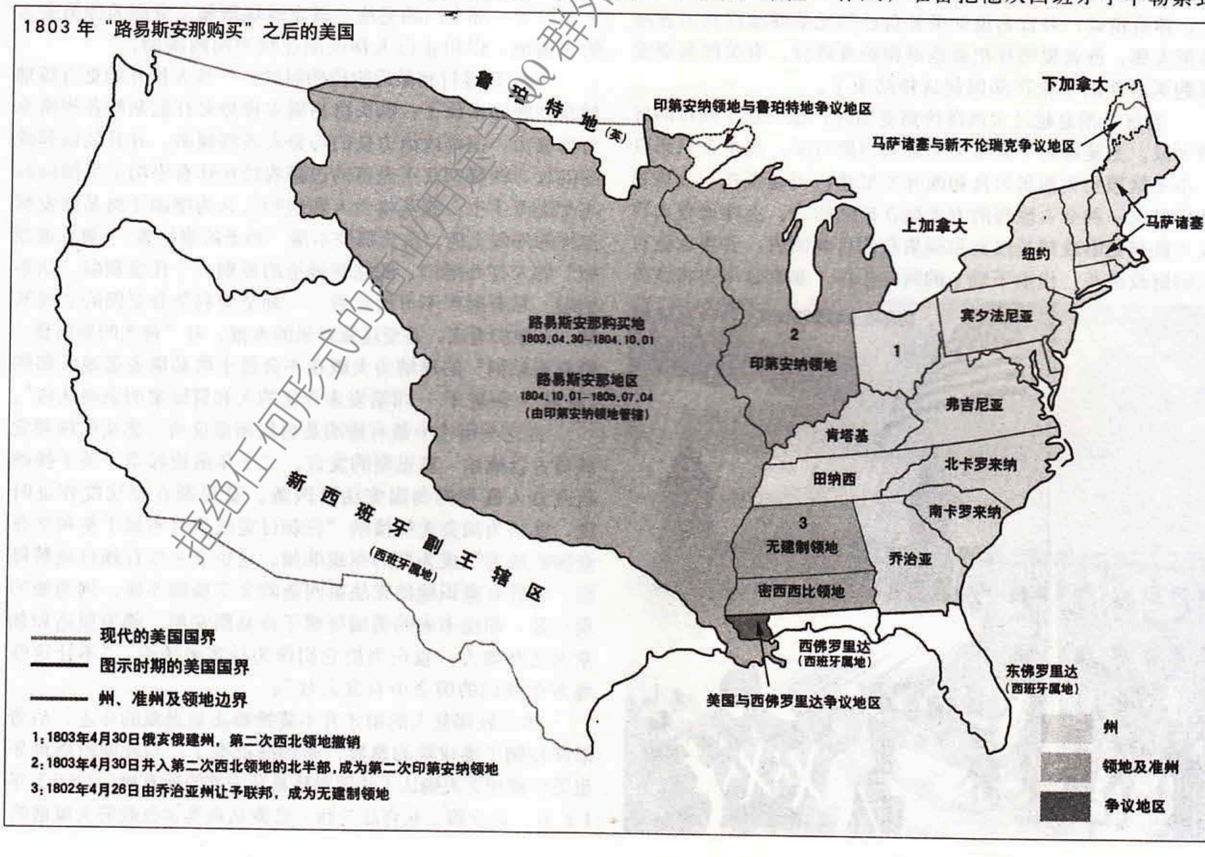
1802年夏天在密西西比河问题上突然又发生了危机：在法国的秘密要求下，西班牙国王下令封锁新奥尔良港口，不让美国产品通过。紧接着又从欧洲传来了另一个消息，证实了拿破仑已从西班牙手中夺走路易斯安那的谣传。法国人再次成为美国的威胁，就像它十八世纪在加拿大和俄亥俄对北美殖民地的威胁一样。一旦法国国旗在美国边界上升起，一个力量强大、野心勃勃的欧洲强国将会取代西班牙这样的弱国，成为美国向西扩张的障碍。

不过此时拿破仑还没有足够的兵力去接管路易斯安那，因为他正在海地同那里的黑人起义者卢维杜尔打得热火朝天。杰斐逊未雨绸缪地给驻法公使写信说："世界上有一个地方，谁控制它，谁就自然成为我们的敌人。这个地方就是新奥尔良。我们八分之三的农产品必须经过那里进入市场……一旦法国人占领新奥尔良……我们必须同英国舰队及其整个国家联合起来与法国人为敌。我们必须把全部注意力转向海上力量，使欧洲射出的第一颗炮弹成为……我们控制美洲土地为美英民族的共同目标服务的信号。这不是我们寻求或希望发生的事情，而是我们在法国一旦购买路易斯安那的情况下必然作出的事情。"

这是杰斐逊思想上的一个惊人转变。他过去一直敬佩法国，反对英国，但是政治观点必须在国际政治的现实面前让步。杰斐逊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是比较明智、比较重视实际的。

1803年1月，杰斐逊让驻法公使罗伯特·利文斯顿与法国政府商谈以1000万美元的价格购买新奥尔良和西佛罗里达的事宜（他以为西佛罗里达随路易斯安那一同归属法国了）。为了增强谈判的力量，并授予利文斯顿紧急行动权，杰斐逊还派遣他年轻的追随者詹姆斯·门罗前往法国去协助谈判。

利文斯顿与法国政府接触后，惊讶地发现拿破仑以其特有的出其不意的作风，准备把他从西班牙手中勒索到



阎京生绘制 Illustrated by Yan Jingsheng

的整个路易斯安那出售给美国。这位法国第一执政刚刚因为讨伐海地失利而损失了三万人马，而与英国签订的《亚眠和约》规定的休战期即将结束，拿破仑决意在欧洲重新掀起战争。一旦英法重新开战，法国海军没有一支可与英国匹敌的舰队，路易斯安那是肯定要丢失的。因此拿破仑放弃了重建法属美洲帝国的计划，节约一切可用的资源用于欧洲。

利文斯顿在最初的一霎那感到为难，因为他并没有接到授权让他购买一大片土地的命令，但是他的胆识足以应付这一重大的事件。他接受了这一建议，与此同时门罗也带着总统的授权书赶到了法国，他也对购买路易斯安那一事表示赞同。

1803年4月30日，美法双方代表在路易斯安那让予条约上签字。法国把它从西班牙得到的全部路易斯安那领地转让给美国，其代价是美国给予价值6000万法郎（1125美元）、年息6%的公债，此外美国政府代法国偿付美国公民要求法国赔偿的一些损失，其价值是1800万法郎（375万美元）。这样，购地价款总计为1500万美元，按照美元的历史购买力换算，大约相当于2010年的2.19亿美元，只不过大致相当于一架E－2C预警机的价格，甚至还比不上一架C－17运输机或是F－22“猛禽”战斗机。美国购买来的是214.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当时居住着大约9万白人。

当美国购买路易斯安那的消息最先在欧洲披露出来之后，西班牙怒气冲冲地向法国提出了抗议，法国报纸也大发雷霆。拿破仑的兄弟吕西安和约瑟夫要求觐见，以便规劝。当时拿破仑正在洗澡，见两人闯入浴室，愤怒地从澡盆里站了起来，斥责他们的无礼行径，并在跳回澡盆时把水溅了他们一身。吕西安还不甘心，絮絮叨叨地反对出售一片那么美好的领地。拿破仑以极不耐烦的态度把他的鼻烟壶扔在地上，摔得粉碎，并宣布说如果他自己的兄弟继续反对出售路易斯安那，他就要照样把他也砸得粉身碎骨。有关路易斯安那购买事件的争论在法国就这样结束了。

当这个消息越过大西洋传到美国时，也引起了同样的轩然大波。杰斐逊对于这笔交易最为目瞪口呆。他本来只想以一小笔款项购买新奥尔良和西佛罗里达，可是现在一大块领地已经以一种令人惊愕的方式抛在他的脚边。杰斐逊曾大声反对联邦党财政部长汉密尔顿累积的巨额国债，并要求他自己的财政部长、出生于瑞士的阿尔伯特·加勒廷尽力将债务


路易斯安那交接仪式，1803年12月

加以缩小，现在却被要求一次就增加1500万美元的负担。此外，杰斐逊曾宣誓要遵守宪法的条款，可是在宪法中却找不到只言片语规定联邦政府有进行这种交易的权力。

为了想要在手续上做到合法，杰斐逊甚至草拟了一项宪法修正案来认可这笔买卖。不过，批准宪法修正案要经过各州的漫长表决，而眼下有一件事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参议院必须批准这笔交易，以免拿破仑改变主意。

现在轮到联邦党人出场扮演冒牌法律学者和冒牌经济学家的角色了。他们对于购并土地的行为更是十分警觉，担心今后从路易斯安那地区分出去的州会坚定地支持杰斐逊派。

1803年10月，美国国会开始对购买路易斯安那事件进行辩论，这次辩论十分稀奇古怪，但却意义深远。由于这是美利坚合众国成立之后的第一次版图扩大，因此也是整个美利坚民族对领土扩张的看法经受的第一次考验。议员们提出了各种问题：拿破仑有出卖这些土地的合法权利吗？美国是否花了重金只拿到一张不合法的地契呢？宪法中没有关于允许扩展新领土的条款，这类扩展行动可能会导致对宪法的滥用和破坏。最后，不加区别地向西部扩张可能会导致美国的六百万人口危险地分散开，而当时他们已经很危险地稀疏散布在阿巴拉契亚山脉与密西西比河之间、比欧洲任何国家都要大出好几倍的地区了。

一些美国政治家认为，一个国家的实力不能通过其国土面积来衡量，而要通过其人口的集中程度和土地的有效占据程度来计算。有些人赞同一位法国地理学家的看法，把美国领土扩大一倍看成是“一种目前衰弱和今后分裂的根源”。杰斐逊也承认这一点，在他提交给国会的宪法修正案草案中，提出路易斯安那领地的“土地占有权和自治权只限于现有的印第安居民”，还为北纬三十二度以北的路易斯安那领土制订了一部专门的宪法，规定这块新领土全部为印第安人的保留地，以阻止白人移民潮过快地向西流动。

在辩论进行到最后阶段的时候，一些人便开始更直接地触及问题的本质了：购买路易斯安那势必打破东部各州所享有的权力，使得政治力量的均势向西部倾斜，并且使联邦政府的权力转移到双手老茧的边疆农民和怀有平均主义倾向的杰斐逊派手中。新英格兰人和纽约人认为增添了路易斯安那这样的外国土地，会为那些不懂“神圣的盎格鲁－撒克逊原则”的人打开闸门，而这些神圣的原则——代议制啦、陪审团啦、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啦——却是美利坚合众国的立国基础。在他们看来，甚至连荒野里的水獭，对“神圣的盎格鲁－撒克逊原则”的理解力大概也不会低于路易斯安那地区那些“法国－西班牙－印第安未开化的人和冒险家的杂凑队伍”。

在这些辩论中最有趣的是纽约州参议员、忠实的联邦党成员古诺维尔·莫里斯的发言，二十年前他起草了关于接纳新州加入联邦的美国宪法第四条。莫里斯在参议院作证时说，他认为国会无权接纳“在制订宪法当时不属于美利坚合众国的地方”成为新的州或准州。这位老先生自顾自地解释说，他曾有意识地使宪法第四条的文字模糊不清，因为他的观点是，即使未来的美国征服了路易斯安那、佛罗里达和加拿大这些地方，也应当把它们作为行省来统治，“不让这些地方在我们的国会中有发言权”。

然而联邦党人的辩才并不能挫败杰斐逊派的斗志，后者最终控制了参议院的票数，条约被批准了。与此同时西班牙也签字画押正式确认了法国对路易斯安那的所有权。1803年12月，合众国士兵将法兰西三色旗从新奥尔良政府大厦前的

广场旗杆上降下，升起了星条旗，

这样，美国一下子便得到了200多万平方公里的新土地——不过在当时没人知道这片土地具体有多大。当利文斯顿就这个问题询问法国外交部长时，他得到了含糊其辞的答复，这位部长和其他任何人都提供不出一幅正确的地图。唯一清楚的是它的东部边界是密西西比河，西边的边界起自雷德河（红河）河口，向西北弯弯曲曲地延伸至落基山脉，北边与英国哈得孙湾公司的私有领地"鲁珀特地"接壤，具体的边界要待来日勘测。当时无论法国人还是美国人都不知道得克萨斯的东部地区是否应当包括在路易斯安那领地的境内。

购买路易斯安那领地后，美国领土的扩张引起了联邦党人、特别是新英格兰各州联邦党人的愤怒反抗，因为领土越是向西扩张，加入联邦的州越多，联邦党的势力和他们控制的地区在美国所占的比例也就变得越来越小。马萨诸塞的一帮激进派联邦党分子最后得出结论，新英格兰唯一的出路在于脱离美国，另行成立一个北方联邦国家。

不过，这样一个国家若想稳固地立足下去，就必须包括纽约和新泽西这两个州。但是纽约的联邦党人领袖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拒绝支持这一分裂计划。密谋分子随后向汉密尔顿的劲敌、当时的副总统艾伦·伯尔求助。

伯尔在联邦党内是一个没有多大前途的政治家，因为杰斐逊永远不会原谅他给1800年总统选举带来的僵局。有传闻说他接受了新英格兰分裂分子的请求，于是汉密尔顿愤而批评伯尔阴谋叛变。与此同时，伯尔在1804年竞选纽约州长失败，将其归罪于汉密尔顿的恶毒攻击，于是提出进行决斗。汉密尔顿接受了这一要求，但是决定不向对方开枪。可是伯尔在决斗那天（1804年7月11日）不分青红皂白地开枪打中了汉密尔顿，后者在一天后去世。

为了避免谋杀的指控，伯尔不得不抛弃副总统职位，逃出纽约，投奔新奥尔良的美国驻军司令和路易斯安那领地总督詹姆斯·威尔金森将军。他随后与威尔金森发起一次密谋远征，策划从西班牙手中夺取墨西哥。当时在华盛顿议论纷纷，人人都传言说伯尔试图在北美洲的西南地区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西部帝国。

可是，当1806年伯尔真地带着一队武装随从，沿着俄亥俄河顺流而下时，威尔金森将军反戈一击，通知总统说伯尔正在密谋反叛，进攻新奥尔良城。杰斐逊立即下令以叛国罪的罪名逮捕伯尔及其随从，并将其送到弗吉尼亚进行审判。但是由于缺乏定罪证据，陪审团最后宣告伯尔无罪。不过他的政治生涯从此算是终结了。伯尔自我放逐，逃往欧洲，六年后才返回美国，在纽约当了一名很成功的律师。他后来又活了很久，亲眼看到了1836年美国移民的"得克萨斯共和国"从墨西哥分裂出去。这是他曾经发起的"解放"墨西哥运动的一项深远成果。

建设一座新首都

在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首都的选址一直是南北双方激烈争论的问题。有许多州都提出在本州建立美国新首都的提议，向国会建议的选址包括纽约州的金斯顿、新泽西州的诺丁汉、弗吉尼亚州的威廉斯堡、宾夕法尼亚州的雷丁、兰开斯特和日耳曼城、特拉华州的威尔明顿。纽约市和费城市也提出将首都继续留在本市的主张。南方各州希望把新首都从北方的工商业中心迁离，迁至梅森－迪克逊线以南，这样他们就可以控制首都的发展，并使它更多地和南方的农业利益相结合。北方各州出于同样的理由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作为妥协，有人甚至提出设立两个首都。而出身于南方的华盛顿总统和认为美国未来的希望在于成为一个农业国家的杰斐逊都希望把首都定在南方。


汉密尔顿－伯尔决斗事件，1804年7月11日

在1787年举行的美国制宪会议中，首都的选址问题也是各州代表们激烈争论的话题之一。代表们最终同意把这个重大决定的决策权交给国会。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款规定"国会有权……对于某些州让予合众国，并经国会接受成为合众国政府所在地的地区（不超过十平方英里），在任何情况下都行使专有的立法权；对于经州议会同意，由合众国在该州购买的用于建造要塞、军火库、兵工厂、船坞和其他必要建筑的一切地方，行使同样的权力。"

这一款当中的这几句话实际上意味着两层意思：第一，一些州将其土地让予合众国，成为联邦首都所在地，面积不超过十平方英里，国会在这里享有专门的立法权，因此该地区不得建立自己的代议制议会；第二，国会（即合众国）对于它从各州购买、用于建设要塞和船坞等军事设施的用地也享有专有权。几十年后导致美国南北战争的直接导火索，正是南卡罗来纳州进攻该州领土上这样一个主权属于联邦的要塞，即位于查尔斯顿港外的萨姆特要塞。

宪法经过批准后，美国国会开始考虑新首都的选址。当时有两个选择方案，其一是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交界处波托马克河畔的乔治敦附近，另一处是宾夕法尼亚州萨斯奎哈那河的莱特渡口附近。1789年9月众议院批准了萨斯奎哈那河方案，但是参议院加以否决，并指定宾夕法尼亚州日耳曼城靠近特拉华河的一个地点为新首都所在地。这样，美国首都的选址问题再次陷入僵局。

联邦党人的领袖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一直认为美国宪法不够高调，他决定给宪法指定一个正确的方向。当华盛顿任命他为美国首任财政部长时，他的机会来了。汉密尔顿认识到了这个职务潜在的重要性，决定按照联邦党人的原则改造这个国家。在他提出的首份《政府信用报告》中，汉密尔顿主张将美国和各州的债务按照同等面值兑换成新的债券。按照他的估计，当时美国的外债为1170万美元，内债是4040万美元。此外，他提议联邦政府承担战争期间各州所欠下的2150万美元债务。他希望这些做法可以稳定政府财政，并在海外金融市场上为美国建立信用，以吸引投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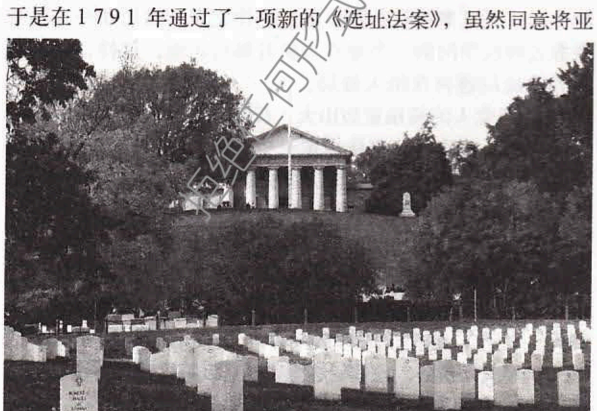
当汉密尔顿的报告提交国会讨论日程时，有关偿还外债的建议几乎没有引起任何争论。但是他关于联邦政府替各州

偿还债务的计划立即遭到了反对。当时欠债最多的州，比如马萨诸塞，觉得这真是一个妙不可言的计划，但是其他州，比如宾夕法尼亚和弗吉尼亚州，基本上已经偿清了全部债款，于是强硬地反对用全国性税款为其他的州偿债。不过，由于詹姆斯·麦迪逊和托马斯·杰斐逊的支持，国会最终批准了汉密尔顿的提案。汉密尔顿私下里与两人在一次晚宴上达成协议，以弗吉尼亚州赞同由联邦承担各州债务为交换条件，使北方各州同意首都南迁。汉密尔顿和杰斐逊商定，新首都的具体位置由华盛顿本人在波托马克河地区选定，政府将在新世纪到来时前往新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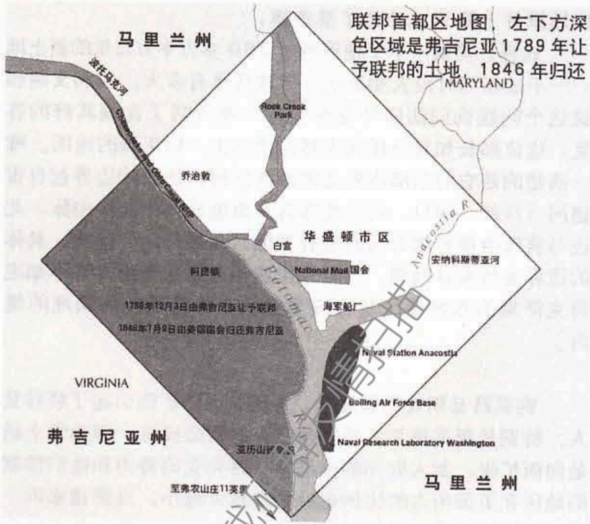
1790年7月6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建立合众国政府所在的临时首都和永久首都的法案》，即《选址法案》(Residence Act)，规定在弗吉尼亚与马里兰州交界处的波托马克河河口建设美国的新首都。纽约州和马萨诸塞州赞同该方案，但是像弗吉尼亚一样还清了战时债务的宾夕法尼亚州却提出强烈的反对意见，要求将《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的诞生地费城定为永久的首都。最后妥协的结果是，暂时将首都从纽约向南迁回费城，为期10年。宾夕法尼亚州同意这一妥协方案的原因是，它希望总统与国会议员们在这10年里会逐渐习惯费城的生活，并且厌倦迁都时的车马劳顿，这样首都就可以永久留在费城了

美国新首都的选址是经过审慎选择的。所考虑的几点是，第一，就当时的人口和领土来说，位于全国的中心，即弗吉尼亚州与马里兰州之间，换句话说在波托马克河流域；其次，位于波托马克河的瀑布线以下，许多人认为未来横贯全国东西的水陆国道将以这里为起点；第三，地面起伏，这样政府机构大楼可以建在能够眺望远近的山丘上。马里兰州议会于1788年12月23日通过一项法令，授权该州政府向联邦割让建立首都所需要的土地。弗吉尼亚州议会也在翌年12月3日通过了同样的法令。

1790年美国国会通过的《选址法案》规定新首都位于波托马克河河口，该河支流康科切亚戈溪与东支流（今日的阿纳科斯蒂亚河），其确切位置在今日哥伦比亚特区的西北边，马里兰州的哈杰斯顿与威廉斯波特之间。但是华盛顿家族在弗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德里亚县拥有一块面积600多英亩的地产，在他那厉害的妻子玛莎·华盛顿的要求下，这位妻管严的美国国父被迫同意将这些地产划入新首都的范围之中，以待来日升值。于是，美国首都的最终位置向下游移动了几英里。但是，联邦国会里的一些人识破了华盛顿家族的诡计，于是在1791年通过了一项新的《选址法案》，虽然同意将亚



阿灵顿国家公墓。远处为阿灵顿大厦



联邦首都区地图，左下方深色区域是弗吉尼亚1789年让予联邦的土地，1846年归还

历山德里亚县划入首都区，但是明文规定“禁止在波托马克河的马里兰这一侧之外的地方建设政府公共建筑”。这样，位于波托马克河南岸的那一部分首都地区处于被人遗弃的状态。1846年，在亚历山德里亚县全体居民的请愿下，美国国会同意把波托马克河南岸的联邦首都区领土归还给弗吉尼亚州，即今日的阿灵顿县和亚历山德里亚市。

华盛顿家族位于波托马克河弗吉尼亚这一侧的地产后来被其外孙乔治·华盛顿·柯蒂斯继承，他在这份地产上盖起了一座外观与白宫很像的“阿灵顿大宅”。乔治·华盛顿·柯蒂斯的独生女玛丽·安娜·柯蒂斯嫁给了弗吉尼亚著名的李家族成员罗伯特·爱德华·李，后者在美国南北战争中成为南方邦联军队统帅。1864年，阿灵顿地产中的200英亩土地被联邦政府没收，成为北方军阵亡将士公墓，即后世著名的阿灵顿国家公墓。

1864年联邦政府以“欠税”的名义将阿灵顿地产没收，以26800美元的价格抵充税款。1877年，罗伯特·李的长子柯蒂斯·李起诉联邦政府，要求归还家族产业。美国最高法院以5：4的结果通过了将阿灵顿地产归还给李家族的决定。柯蒂斯·李随后并在一个象征性的仪式中将其以15万美元的价格将其重新卖给联邦政府，林肯总统的儿子、陆军部长罗伯特·托德·林肯出席了签字仪式。

1791年年初，华盛顿任命曾经把纽约市政厅改建为大陆会堂的法国建筑师皮埃尔·朗方(Pierre L’Enfant)设计新首都，与此同时曾经测定宾夕法尼亚州西部边界的埃利考特测定首都所在区域的四至。朗方提出的计划很是宏伟，市区的中心是一条东西一英里（1.6公里）长、南北400英尺（120米）宽的绿地，即后来的国家林荫大道（National Mall)。国会大厦坐落于这条大道东端名叫“詹金斯山”的小丘上。在朗方的设计图纸中，国会大厦的名字是“Congress House”，但是托马斯·杰斐逊把这座大厦的名字改成了“卡皮托尔”(Capitol)，这是一个拉丁文单词，意思是“山巅之城”，得名自罗马城七丘中的的卡皮托尔山。由于这个缘故，“詹金斯山”后来也被改名为“国会山”(Capitol Hill)。

经由埃利考特的测绘，国会大厦所在的经度（西经77度0分21.9秒）被定为美国的本初子午线。这是美国本土的四条本初子午线当中最早的一条，另外三条分别是1800年确定

的“白宫子午线”、1850 年的“旧海军天文台子午线”和1883 年的“新海军天文台子午线”。美国西部的一些州，比如堪萨斯、科罗拉多、蒙大拿、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等等，在建立准州时是以“白宫子午线”作为其东部或西部边界所在经度起点的。直到1912 年，美国才以英国格林尼治皇家天文台子午线作为航海及座标的法定本初子午线。

总的来说，在朗方的设计中，新首都全市的街道布局模仿费城的式样，作简单的四方形网格状，同时夹以若干条斜向的林荫大道，通往圆形或方形的广场。市区以国会大厦为中心，被国家林荫道、国会山北大街、国会山东大街和国会山南大街分为东北、西北、东南、西南四个区，并向四周扩散。在四个区里，南北向街道用数字命名，比如“东北1 大街”、“西北1 大街”、“东南2 大街”、“西南2 大街”等等，街名以国会大厦为中心向两侧依次递增，越靠近国会山数字越低。西北区和西南区的第16 街是“白宫子午线”所在的大街，1804 年杰斐逊总统曾下令沿着这条大街设立9 块水准原石作为子午线标记。

四个区东西向的街道基本上以字母命名，其命名规律也是按照字母顺序，越靠近国会山和国家林荫道的，街名越靠前，但是北边两个区的B 大街后来被改名为“宪法大街”，南边两区的B 大街则被改名为“独立大街”。各区都没有J 大街，其原因据传是为了避讳与英国签订《杰伊条约》而遭到举国痛恨的约翰·杰伊（John Jay），但实际原因是按照当时的书法习惯，人们在书写大写的I 和J 时很容易将两者混淆。此外

皮埃尔·朗方设计的华盛顿市区



各区也没有X、Y、Z 大街，这倒不是受“XYZ 事件”的影响。

在未来市区向南北扩展、字母用完的情况下，将用两音节的单词命名新的东西向大街，但这些单词的首字母也将按照字母表的顺序排列。一旦这26 条街名也被用完，将继续用三音节的单词命名新的大街，比如西北区的“白兰地大街”（Brandywine Street）。也只有在西北区才出现了使用第四轮字母表的情况，不过这一次没有使用四个音节的单词，而是简单地用植物的名称命名，比如白杨（Aspen）、灰胡桃（Butternut）、雪松（Cedar）……一直排到马鞭草大街（Verbena Street）——这么看来的话，给南北向的新街道命名要省事得多，只要把数字继续排列下去就可以了。

此外，斜向的林荫大道以各州的名字命名，最初只有十三条以州命名的大街。从国会山辐射出去的四条主要林荫道分别以宾夕法尼亚、特拉华、马里兰和新泽西命名，其中连接国会大厦和白宫的大街以宾夕法尼亚州的名字命名，这是为了平息宾夕法尼亚人对于把首都从费城迁走的怒气。白宫的地址就是宾夕法尼亚大街1600 号。到后来随着新州不断增多，除了五十个州以外，连波多黎各领地的名字都用上了。

这幅绘制于1840 年的版画描述了当时哥伦比亚特区的荒僻景色。图中为国会大厦。当1800 年国会从费城迁至华盛顿时，这座大厦只建成了右边的参议院一翼，众议院不得不挤到里面与其共同办公。左边的众议院一翼直至1811 年才告落成。1850 年大厦进行扩建，南北添加增加了两院办公用楼，立面长度增加了一倍，为使整个建筑立面构图和谐，修建了新的中央圆顶。1904 年和1958 年两次重新改建了东面的主要入口（即图中这一侧）



朗方的设计可以说很完善，可是由于当时无法预知的一些新事物的出现——比如说铁路和车站，更不用说飞机场——而不得不在后来做若干必要的修改。最主要的是，朗方错误地设想未来的首都市区将向东面发展，因此国会大厦是座西朝东的，其主入口也设在大厦的东面。在后来的几次重建和改建中，不得不在国会大厦面向国家林荫道的西立面增加入口。

1791 年9 月，美国国会投票批准了朗方的设计方案，并且确定了新首都的名字——“华盛顿市”（The City of Washington），而首都所在的地区被称为“哥伦比亚地区”（The Territory of Columbia），随后在1801 年的《哥伦比亚特区法案》中将其改名为“哥伦比亚特区”（District of Columbia）。

“哥伦比亚”这个最早出现于1738

年的新词是“哥伦布”的拉丁文地名学变格，如同象征英国的“不列颠尼亚”一样，在诗歌和其他的雅称中用来指代美洲的新世界，并被独立后的美国沿用下来。英国在十八世纪出现了一首著名的曲调气势恢弘、歌词富丽堂皇的歌曲，即《统治吧，不列颠尼亚》，而美国也在下一个世纪出现了《欢呼吧，哥伦比亚》这首著名的爱国主义歌曲，成为美利坚合众国副总统出席重要场合时演奏的乐曲（美国总统的专有乐曲是《向领袖致敬》）。1784 年，纽约人将设在该市的国王学院更名为哥伦比亚学院，即后世的哥伦比亚大学；南卡罗来纳州在 1786 年将它的新首府命名为“哥伦比亚”；而一艘 1773 年建造于马萨诸塞的帆船也命名为“哥伦比亚”号，曾经对西北太平洋航道进行过多次探险航行，并在 1790 年成为第一艘环球航行的美国船只。搭载人类首次登上月球的阿波罗 11 号飞船“哥伦比亚”号轨道指令舱，以及美国建国两百周年前夕开始建造的“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都是以这艘美国海洋探险事业的先驱命名的。

1800 年 11 月，美国中央政府和国会从费城迁往位于哥伦比亚特区的新首都，这一新建城市从这一天起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永久首都。这一传统只是在 2002 年 9 月 6 日这一天被打破。当天，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时隔两百一十二年之后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在离世贸中心四个街区远的纽约市联邦会堂原址召开新一届国会，这是为了纪念前一年的 911 恐怖袭击事件。

当官员和政治家们在 1800 年抵达华盛顿时，几乎全都为那里的荒凉和偏僻所震惊。与原来的政府所在地纽约

华盛顿与共济会阴谋论

近年来，“共济会”这个名词随着一些外国小说和电影在中国变得越来越知名，并且伴生出许多阴谋论的调调，例如“共济会妄图统治世界”、“共济会试图发动全球战争”等等。实际上反共济会言论在西方古已有之。共济会起源于中世纪的石匠和教堂工匠行会，随着教堂建筑行业的不景气，一些石匠分会便开始接受名誉会员，以维持日益衰落的行会。近代的象征性共济会便是由这样的分会演变而来的，其会员秉承中世纪手工业行会会员的共济精神，其纲领强调道德、慈善、兄弟友爱、守法和互助，在外地的共济会落难会员凭标记（比如共济会戒指）和暗号可以得到当地会员的帮助，这和中国古代的洪门和青帮等秘密帮会差不多。在启蒙时代，共济会理念中加入了平等和人权的思想。成为共济会成员必须是宗教信徒，基督徒、犹太教徒、印度教徒、拜火教徒、佛教徒均可，只要信奉神的存在和灵魂不灭就可以（近年来也接纳无神论者加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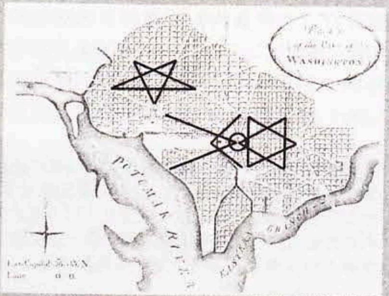
一个最主要的共济会阴谋论说法是“北美革命是共济会发动的，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共济会国家”。事实上在签署独立宣言的 56 名北美殖民地代表中只有 9 人是共济会成员，美国宪法的 39 名签署者有 13 人是。共济会成员只是在北美军队中的人数多一些，在大陆军的 77 名将军中有 34 名共济会员，包括冯·施托伊本、拉法耶特、以色列·普特南、理查德·蒙哥马利、纳撒尼尔·格林和本尼迪克特·阿诺德等人。只是由于在美国的“建国之父”当中包括了华盛顿和富兰克林这样的名人而引人注目罢了。实际上华盛顿、富兰克林和托马斯·潘恩、杰斐逊（均非共济会成员）这些人信奉的是自然神论（Deism）。这种起源于启蒙时代的英国的理论受到哥白尼、牛顿等人科学发现的影响，又经过笛卡尔和伏尔泰等人的系统阐述，它虽然也承认上帝的存在，但认为其是一个遥远的存在，创造宇宙之后便不再直接干预人类活动及其“原罪”。这种思想被宗教正统人士视为大逆不道。

由于共济会总的宗旨是主张平等和自由思想，因此特别吸引自由主义者和反教权人士的加入，并被欧洲专制君主和教会视为对人民进行统治的威胁。此外由于近代共济会向全球的传播是随着信奉新教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对外扩张引起的（从华盛顿到小布什，有 19 位美国总统是共济会成员，英王爱德华七世和乔治五世也是。顺便说一句，受伏尔泰的影响，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也是共济会员），再加上许多拉美起义领袖，比如西蒙·玻利瓦尔、圣马丁和海地的卢维杜尔等等都是共济会员，所以天主教国家和天主教会对共济会的攻击尤甚。在二十世纪的佛朗哥西班牙和纳粹德国等法西斯国家，其当局都对共济会进行攻击、查禁和迫害，并且编造了许多“犹太－共济会－共产党阴谋”的故事，迎合了今日美国的阴谋论者和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的胃口。有趣的是，某些拾人牙慧的东亚“智囊”也对这种陈年垃圾如获至宝，去掉其中攻击共产主义的部分，把剩下的东西拿来拼凑些《共济会的历史与真相》之类的文章。如果是为了骗钱骗眼球的话倒还好理解，如果真地相信这些，那么恐怕是失心疯了。实际上今日的共济会有些类似于扶轮社、狮子会这样的组织，或者说甚至也与某些政党的结构类似。其上层人物当中有许多控制金融、政治、媒体和军队的社会精英，但其中下层会员也包括了许多普通人。只是由于采取低调的、神秘主义的入会仪式而遭到许多人的误解。有趣的是，早期的布尔什维克在制订入党程序时也参照了共济会的入会程序，包括介绍人提名、提交入会申请、考察期、举行仪式宣誓入会，以及对外人保守组织内部的秘密等等。



上图是身穿共济会围裙、手持泥刀（石匠工具）的乔治·华盛顿，左上角头像为拉法耶特，右上为安德鲁·杰克逊总统

下图是阴谋论者在共济会员皮埃尔·朗方设计的华盛顿城街道平面图中发现的“共济会标志”，左上为魔鬼五芒星，而下边的六角星、共济会罗盘（石匠用的圆规和矩尺）构成了异教恶魔鲍芙默（Baphomet）的形象





左图是 1935 年美国财政部为新版 1 美元设计的背面图案，左侧为美国大国玺的正面，即美国国徽；右侧是大国玺背面，未完工的金字塔象征“未完成的功业”，其上面是共济会的“全能之眼”。这张图样的右下角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签名，他示意将金字塔与鹰的位置对调。

“犹太－共济会”阴谋论者认为这个图案设计大有深意：金字塔代表“大以色列”（Eretz Israel），上面的三角形是露西弗的标志，眼睛是古埃及的荷鲁斯之眼；“Novus Ordo Seclorum”（新时代降临）象征伪弥赛亚（救世主）的降临，鹰象征古以色列的但部落，即“伪弥赛亚”的部落。十三支箭象征“古以色列的十三个部落”（这是蠢话，实际上古代犹太人只有十二部落）。面值“ONE”上面有“我们信仰上帝”的字样，加起来就是“我们只信仰唯一神”（伪弥赛亚）。最后，把金字塔颠倒过来形成一个六角星的图案，其六个顶点中的五个正好指着 MASON（共济会）五个字母

和费城不同，这里缺乏舒适的食宿条件、优美的环境和通往大西洋世界的便捷交通。只有几处政府建筑部分完工，比如国会大厦的众议院一侧，而参议院一翼以及总统官邸都还在施工中。街道全是土筑的，一下雨就泥泞坎坷，无法通行。总统官邸和国会大厦竣工后，两者之间不是因为小河泛滥就是因为桥梁被淹而各居一方。

华盛顿市其余的地方都是一簇簇低矮的乡村式住宅，与周围的村庄看上去相差无几。没有国会议员把这座城市当成家，只是把它作为每年召开国会时的匆匆浏览之地，会议一完就迫不及待地离开。国会里没几个人在华盛顿买房，多数人住在国会山附近的寄宿公寓里。整个夏天所有上班的政府部门都打点行装离城外出，总统本人、内阁成员、整个国会和其他联邦雇员都在远离首都的地方舒适地度过夏季炎热的那几个月。

第一任美国总统华盛顿在纽约市内有两处官邸，第一处是樱桃街3号的塞缪尔·奥斯古德府邸，随后在1790年2月搬进了亚历山大·麦康布府邸，这里一度是法国领事馆。这两处官邸都是向原业主租用的，华盛顿自己出钱购买家具、地毯、窗帘和其他装饰品。在首都迁往费城后，费城市政府把该城首富罗伯特·莫里斯（也是美国宪法的签字人）位于高地街190号的一座住宅借给华盛顿作为总统官邸使用。华盛顿在此一直居住和工作到1797年3月第二届任期期满，其间宾夕法尼亚州政府在不远的地方新建了一座“总统宫”，但是华盛顿对原有的房子很满意，拒绝搬进去，于是这座新盖的“总统宫”交给了宾夕法尼亚大学。下一任总统约翰·亚当斯也住进了高地街190号的住宅，直至1800年5月迁往哥伦比亚特区。

在朗方的新首都设计图中，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官邸坐落于国家林荫道西端尽头的北面，面向一片开阔的草坪。托马斯·杰斐逊在1792年发起了一场设计方案竞赛，最终一共有九个建筑师投去了自己的设计，其中包括杰斐逊本人的一个设计方案。但是这些方案都太小，不足以为总统提供足够的办公和居住空间。华盛顿本人在前一年前往南卡罗来纳巡视时，参观了施工中的查尔斯顿县政府大楼，对其设计风格很是赞赏，于是邀请其爱尔兰裔设计师詹姆斯·霍班设计新的总统官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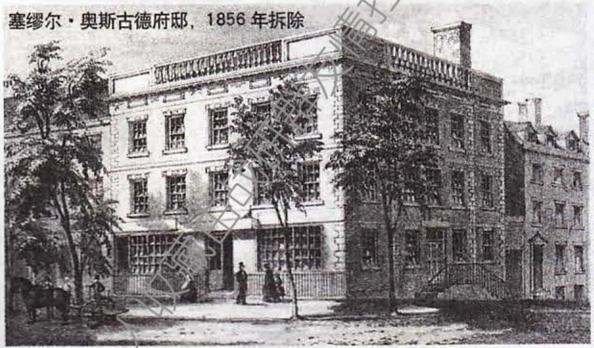
詹姆斯·霍班设计的新总统官邸参照了爱尔兰都柏林的莱斯特大厦（如今是爱尔兰共和国议会所在地），同时参照了爱尔兰其他几座乔治王朝风格的乡村大宅。它是一座两层建筑，底层还有一层半地下室，正面每层有11个窗户，门廊上方是三角形门楣，房顶采用坡式屋顶。大楼的建筑工作开始于1792年10月13日，建筑工人包括奴隶、获释黑人和还没有取得美国公民身份的欧洲移民劳工。整座官邸的造价是232371.83美元，大约相当于今日的280万美元。

由于缺乏金钱、人力和物力，这座总统官邸的规模只是朗方原先设计的“总统宫殿”方案的五分之一。原来的三层主体建筑被削减为两层，原来设计用花岗岩雕刻的窗楣、窗台和柱头也改用价格低廉得多的砖头。大厦的建筑材料是采自弗吉尼亚州阿奎亚溪的灰色砂岩，这种石头多孔粗糙，令整座大厦的外观呈现出浅灰色的色调。

在1812年战争中，英国部队于1814年8月在切萨皮克湾登陆，攻占了华盛顿城。为了报复前一年美国民兵焚烧和掳掠加拿大约克要塞（即今日多伦多城）的行径，在加拿大总督乔治·普雷沃斯特爵士的要求下，英国士兵于8月24日



纽约百老汇大街上的亚历山大·麦康布府邸，1821年后改为旅馆



塞缪尔·奥斯古德府邸，1856年拆除



詹姆斯·霍班在1793年设计的白宫原始方案，其斜坡屋顶在后来的设计中被取消

纵火焚毁了国会大厦和白宫。后来在修复白宫时，为了掩盖火烧的痕迹，工人们在外墙刷上了一层用石灰、白垩、米汁、酪蛋白和铅白调制的白色灰浆。此后首都市民管这座大楼叫“白房子”(White House)，也即白宫，但直到富兰克林·罗斯福当政之前，是它的官方名称是“总统宫”、“总统大厦”(Presidential Manson)或“总统官邸”(President's House)。

约翰·亚当斯在1800年11月1日搬进白宫时，这座大厦还未全部完工，许多房间没有配置家具、窗帘和地毯，墙上的灰泥还没有干，在空荡荡的东大厅中不得不点起柴火将墙壁烘干。在第二天写给他妻子阿比盖尔的一封信里，亚当斯写道“我祈求上苍赐予最大福份给这所房屋和所有此后居住的人，但愿只有诚实和智慧的人住在此屋檐下”。这句话后来被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下令刻在了国宴厅的大理石壁炉炉沿上。可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愿望美好、期望过高，但在现实中往往落空的企盼。（待续）

敬告：因本文作者时间安排原因，《从地图看美国历史》一文写作间隔时间过长，其第一部分刊登于《战争史研究》第34期上。在今后刊登本文第三部分前，预计将穿插刊登《地图中的战争史：袖珍小国与战争》，通过地图演变，概要介绍列支敦士登、摩纳哥、锡金、不丹等欧亚袖珍小国的历史与战争史，敬请读者关注（此安排或有变动，以实际刊登文章内容为准）



幸福的达契亚

——近世的罗马尼亚与战争（中）

○ 鹰扬

随波逐流

在扬·安东尼斯库与希特勒在1941年5月11日的会面中，希特勒首次向他透露了德国将在5月下旬进攻苏联的消息，并要求罗马尼亚承担德军通过其领土前往苏罗边境地区的全部费用，并且派出部队与德军一同作战。作为报酬，希特勒同意“罗马尼亚占领并管理苏维埃乌克兰南部地区，直到第聂伯河”。与此同时，希特勒还答应以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地区为交换条件劝说保加利亚把南多布罗加的一部分还给罗马尼亚，同时还对安东尼斯库暗示说，如果他参加对苏战争的话，德国有压迫匈牙利归还北特兰西瓦尼亚的可能。

到1941年6月初，进攻苏联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德国最高统帅部颁发了一份详细的时间表，规定德国陆军、海军和空军的部署与任务，以及对随同德军前进的罗马尼亚、芬兰、意大利和斯洛伐克部队的要求（没要求匈牙利出兵）。6月9日，希特勒下令在5天之后提出关于巴巴罗萨行动的最后报告。6月12日，安东尼斯库奉召去慕尼黑，希特勒几乎是把十天前他在勃伦纳山口会见墨索里尼时绝口不提的“巴巴罗萨”的所有细节都向这个罗马尼亚法西斯头子讲了。

罗马尼亚武装力量是在1941年6月5日实行总动员的。当时它的陆军兵力有68.6万人，其中参加“巴巴罗萨”行动的兵力有325685人，分别属于12个步兵师、1个装甲师、1个预备役步兵师、1个边防师、3个骑兵旅、3个山地步兵旅和2个要塞旅。

彼得·多米特列斯库中将（Petre Dumitrescu）指挥的第三集团军（包括山地部队和骑兵）部署在北方，进攻北布科维纳和北比萨拉比亚；坦克雷德·康斯坦丁内斯库指挥的第四集团军（含第3、5、11军）部署在南边。此外在多瑙河三角洲还有罗马尼亚第2军，担任防御任务。有5个德国师部署在普鲁特河西岸，和罗军一道行动。罗马尼亚空军的参战部队包括2个轰炸机师、1个战斗机师、1个侦察机师和1个远程侦察中队，它们的任务是保证罗马尼亚在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地区上空的制空权。

罗马尼亚的所有参战部队被统称为“安东尼斯库”集团军群，其中第三和第四两个集团军被归入瓦尔特·冯·赖希瑙的德国第六集团军的领导之下，隶属于冯·龙德施泰德元帅的“南方”集团军群。制订巴巴罗萨计划的主要负责人哈尔德将军认为普鲁特河对于德国的摩托化部队来说是一道天然障碍，因此“南方”集团军群的机械化和摩托化部队主要集中在波兰南部地区。但是罗马尼亚军队在6月22日凌晨开战后发动了几次大胆的突袭行动，迅速地占领了普鲁特河上几座完好无损的桥梁。

在北布科维纳地区边境线的那一边，部署着巴维尔·格利高里耶维奇·波内德林少将指挥的苏联第12集团军，隶属于西南方面军。比萨拉比亚地区部署着雅科夫·切列维琴科中将指



挥的第9集团军（含5个步兵师、1个山地师、2个骑兵师、4个坦克师、2个机械化师和2个摩托化师），在开战后不久又得到了从莫斯科军区调来的第18集团军的支援。切列维琴科把步兵和骑兵部署在紧邻普鲁特河的前线地区，坦克师和机械化师部署在普鲁特河与德涅斯特河之间的战略交通枢纽。

与苏联官方历史学家在后斯大林时代宣称的"斯大林对德国进攻毫无准备"的说法相反，苏联方面在1941年春天起便采取切实的对德备战措施，同时不放弃力求避免这场即将临头的大祸。早在当年5月7日，各国驻莫斯科的外交使团就接到苏联外交部的通知，告诫它们的成员不要在苏联的边境地区旅行，也就是说不要前往卡累利阿、黑海港口、巴库、克里米亚以及西伯利亚的某些地区。在同一天，斯大林根据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命令，接替莫洛托夫出任人民委员会主席。这一步骤改变了斯大林一直对政权采取间接控制的政治策略。5月9日，苏联外交部命令驻国外的苏联使团非常谨慎地向驻在国政府探寻，在万一发生苏德战争时，这些国家会持什么态度。从5月中旬到6月上旬，在苏联西部，特别是列宁格勒、基辅和敖德萨这几个军区，举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波罗的海舰队进入动员状态。到6月初，所有通往罗马尼亚的公路都埋上了地雷，立陶宛地区同德国的边境上桥梁都被破坏（但是没有破坏苏罗国界普鲁特河上的大桥）。苏联当局还疏散了边界地区的村庄。红军休假全部取消。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博物馆的珍贵文物也开始秘密向东疏散。

1941年6月22日凌晨3时，德国和罗马尼亚的侦察机飞越普鲁特河，对苏联地面目标进行侦察。3时15分，罗马尼亚空军的飞机开始轰炸比萨拉比亚地区的机场，在地面炸毁了100多架苏联飞机，但从航空照片中只能确认37架飞机的残骸。苏联黑海舰队多瑙河分舰队的1艘炮艇和1艘巡逻艇向多瑙河南岸的罗马尼亚村庄开了火，这是苏军的第一波反击，但很快被罗马尼亚海军的"比萨拉比亚"号和"米哈伊·科加奇切亚努"号内河炮舰击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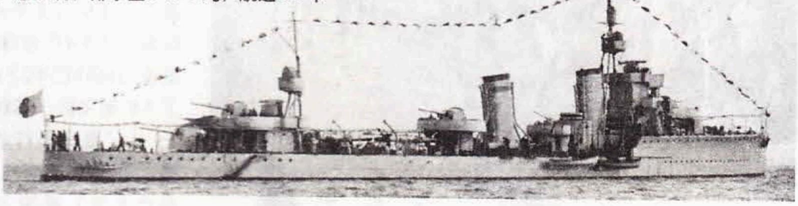
到6月22日24时，已经有5个罗马尼亚师和两个半德国师渡过了普鲁特河，在河对岸建立了稳固的桥头堡。罗军在战斗中的表现非常勇猛，第6近卫步兵团在当天晚上独自击退了苏军一个骑兵师的进攻。6月23日，从第一波打击中恢复过来的苏军轰炸机试图轰炸罗马尼亚境内的目标，但是由于没有护航而遭受了沉重的损失。当天上午，53战斗机中队的"飓风"飞机飞入由5架SB轰炸机组成的编队，在康斯坦察市附近击落了其中的3架。

6月26日，在黑海爆发了苏联海军与罗马尼亚海军的首次海战。苏联巡洋舰"伏罗希洛夫"号在6艘驱逐舰和其他一些战舰护航下前往罗马尼亚沿海，企图炮轰康斯坦察地区的岸防要塞，"巴黎公社"号战列舰编队跟在这支编队后面，准备实行第二次打击。当天凌晨，罗马尼亚海军的"海豚"号潜艇在海岸线以东90公里处发现了"伏罗希洛夫"号编队，立即向基地发出了紧急警报。康斯坦察的罗马尼亚黑海舰队军舰迅速投入战斗状态。

凌晨0358时，"莫斯科"号和"哈尔科夫"号驱逐领舰用130毫米舰炮对康斯坦察港进行试探性炮轰，轰炸持续了10分钟，两舰发射了350发炮弹，打中了港口油库和巴拉斯火车站，摧毁了一列军火列车和一些油罐。0412时，罗马尼亚海军的两艘驱逐舰"玛丽亚王后"号和"马拉什蒂"号在12海里距离上对苏联驱逐舰开炮。由于它们位于"莫斯科"号和"哈尔科夫"号的西边，其舰影隐没在图尔切亚地区高高的海岸线背景当中，而位于东边的两艘苏联驱逐舰的轮廓却被来自东方的仲夏曙光照得一清二楚。

0420时，"哈尔科夫"号被击中。不久之后，由德国军队操作的"提尔皮茨"炮台的280毫米海岸炮也开了火，在5次齐射后，苏联驱逐舰高速逃离罗

"玛丽亚王后"号驱逐舰，1930年建于意大利，排水量1400吨，航速30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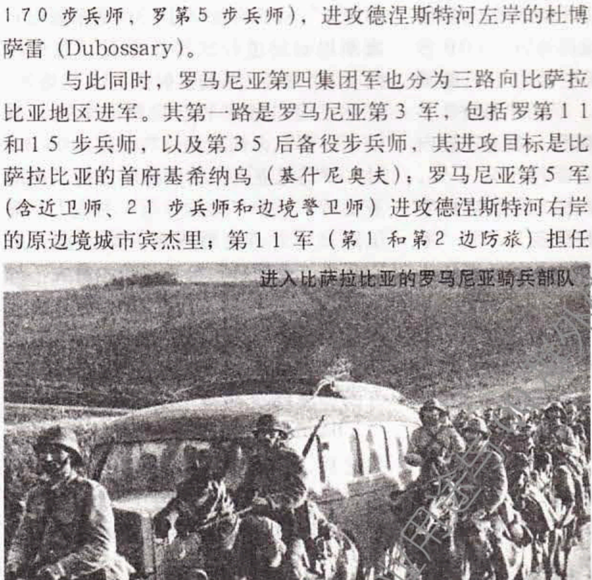
"马拉什蒂"号驱逐舰，1917年建于意大利，排水量1400吨，航速34节。最初罗马尼亚订购4艘，一战后购回2艘，另2艘转让给西班牙。二战后赔偿苏联，后归还，与同级舰"马拉塞什蒂"号一直服役至六十年代



马尼亚领海。“莫斯科”号中了1发120毫米炮弹，在一边做蛇形规避、一边撤退的时候，不小心驶入了雷区，被两枚水雷炸沉了。船上的400多名船员中只有69人获救。接下来又有两艘罗马尼亚鱼雷快艇试图攻击“哈尔科夫”号，但是被“伏罗希洛夫”及其护航编队（包括驱逐舰“灵敏”号和“乖巧”号）用火炮击退。一艘苏联军舰触发了另一枚水雷，爆炸时炸伤了“伏罗希洛夫”号巡洋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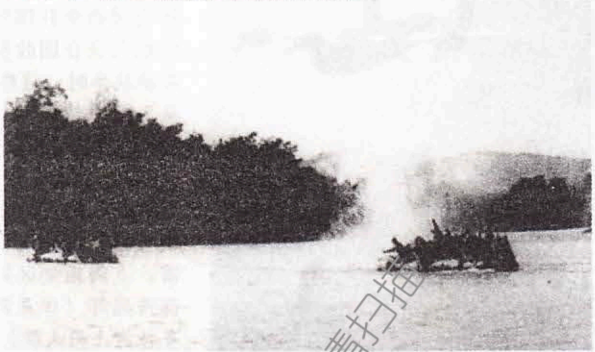
到6月30日“巴巴罗萨”战役第一阶段结束时，“安东尼斯库”集团军群一共有442人阵亡，659人受伤，374人失踪。从7月2日开始的第二阶段进攻行动被罗军总参谋部命名为“慕尼黑行动”，其目标是收复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地区。担任这次行动主攻力量的是德国第十一集团军。其兵力包括德国第11军（德国第76和239步兵师、罗马尼亚第1装甲师和第6步兵师）和罗马尼亚骑兵军团（第5和第6骑兵旅），进攻方向是位于乌克兰与摩尔达维亚边界上的莫吉廖夫－波多利斯基（Mogilev–Podolsky）；德国第30军（德198步兵师、罗第8、13、14步兵师），进攻比萨拉比亚北部重镇别利齐（Beltsy）；德国第54军（德第50、170步兵师，罗第5步兵师），进攻德涅斯特河左岸的杜博萨雷（Dubossary）。

与此同时，罗马尼亚第四集团军也分为三路向比萨拉比亚地区进军。其第一路是罗马尼亚第3军，包括罗第11和15步兵师，以及第35后备役步兵师，其进攻目标是比萨拉比亚的首府基希纳乌（基什尼奥夫）；罗马尼亚第5军（含近卫师、21步兵师和边境警卫师）进攻德涅斯特河右岸的原边境城市宾杰里；第11军（第1和第2边防旅）担任


进入比萨拉比亚的罗马尼亚骑兵部队


罗军第1装甲师的雷诺R35坦克列队开入基什尼奥夫

1941年6月22日清晨罗军强渡普鲁特河



后方警戒任务。罗马尼亚第2军（第9和第10步兵师）从多瑙河三角洲地区出发，沿着黑海的海岸向德涅斯特河入海口进军。最后，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负责收复北布科维纳，它下辖山地军（包括第8骑兵旅、第1、2、4山地旅、第7步兵师）。

“慕尼黑行动”的发起时间是7月2日凌晨4时。在布科维纳地区，经过10分钟的炮火准备后，罗第7步兵师开始向北布科维纳进攻，但两个小时后就遇到了苏联第十二集团军第17军的猛烈抵抗，当时这支部队正在向东撤退，以免被攻占洛夫诺城的德军从后方包围。罗马尼亚山地军军长乔治·阿弗拉梅斯库少将获知这个情报后，下令等到第二天苏军主力撤走之后再继续向前进攻。7月3日，罗军渡过锡雷特河，当天晚上第1山地旅的阿尔伯特·路德维希上校率领部队攻到切尔诺维策城近郊（他不久被授予三级“勇敢的米哈伊”勋章）。7月5日，罗山地军第1旅击退了切尔诺夫策城的苏军残余抵抗，在当天下午5点开入了原布科维纳省的首府。第2山地旅在7月7下午日收复了霍廷这座“大罗马尼亚”最北方的城市。

由于苏军总参谋部通过西南方面军司令部下达了向德涅斯特河左岸的旧国境筑垒地域撤退的命令，因此在比萨拉比亚地区的苏联第十二集团军其余部队从7月2日起也在向东后撤。但是他们在撤军途中对轴心国部队的抵抗要比北布科维纳地区的苏军猛烈得多。虽然罗马尼亚骑兵的先头部队到7月7日便近抵德涅斯特河畔的旧国境，但是德国第54军直到7月12日才占领别利齐，罗第1装甲师是在7月16日上午开入基希纳乌的。到7月26日，罗军已经收复了1940年国境以内的所有地区。在这次战役中，罗马尼亚方面阵亡4271人，12326人受伤，6168人失踪，损失了58架飞机。苏联方面有8519人阵亡，9374人受伤。

“慕尼黑行动”结束后，“安东尼斯库”集团军群被取消，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山地部队和骑兵）和第4军（4个步兵师）被编入德国第十一集团军的指挥之下。罗马尼亚总参谋部和安东尼斯库将军直接指挥的军队只剩下了“马腾克罗特”战斗集群（包括罗第1装甲师，第5、15步兵师），从第四集团军拨出来的近卫师、第11、21、35步兵师，以及作为后备梯队的第3、第7步兵师和一个骑兵旅。

1941年8月21日，米哈伊一世国王授予扬·安东尼斯库元帅军衔。除了霍亨佐伦王朝的三位国王（卡罗尔一世、斐迪南一世、米哈伊一世）之外，这个最高军衔只授予过两个人，即一战时的罗军总司令亚历山德鲁·阿维雷斯库和总参谋长康斯坦丁·普列赞。除此之外，安东尼斯库还被授予二级“勇敢的米哈伊”勋章、一级“勇敢的米哈伊”

二战当中的罗马尼亚武装力量编制和装备

一、步兵

共有1个近卫步兵师，19个步兵师，3个预备步兵师。1940年由于失去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地区，因此取消了兵源来自这些地区的第12、16和17三个师的番号。近卫师是一支精锐部队，它的编制与普通步兵师一样，但是对兵员的挑选十分严格，要求受过中学教育，身体条件要求很高，训练也比其他部队更加严格。

1941年时罗马尼亚步兵师是按照德国步兵师的模式组成的，其标准编制包括师部、师属战斗部队、3个步兵团和2个炮兵团，总兵力1.75万到1.8万人左右。

1、师直属战斗部队：包括侦察连、防空连、反坦克连（6门47毫米什耐德炮）、信号连、工兵营、宪兵排和卫生部队。

2、步兵团：包括1个团属指挥连、1个团属侦察连、1个团属重武器连、3个步兵营（每营下辖3个步兵连和1个重武器连。每连分3排，重武器连有一个配有81.4毫米勃兰特炮的迫击炮排、一个配37毫米博福斯炮的反坦克排和一个配47毫米什耐德炮的反坦克排）。

3、炮兵团：包括一个野战炮营（3个75毫米野战炮连）和一个榴弹炮营（2个100毫米榴弹炮连）。

一个按1941年编制满员配置的罗马尼亚步兵师拥有的武器包括15048支步枪、410挺轻机枪、148挺重机枪、54门60毫米迫击炮、18门81毫米迫击炮、48门轻型反坦克炮、36门野战炮和16门榴弹炮。罗军步枪的主要型号为7.92毫米的1924式ZB步枪（从捷克进口或由罗马尼亚仿制）、7.92毫米98K式毛瑟步枪、以及7.62毫米口径的1891式莫辛纳甘步枪。罗马尼亚在1941年向德国订购了10600支MP40冲锋枪和5800支MP41冲锋枪，分别在1942年和1943年交货。罗马尼亚步兵在战斗中使用的其他武器还包括9毫米贝雷塔38A冲锋枪、7.63毫米毛瑟冲锋枪和从苏联缴获的波波沙冲锋枪，以及德制长柄手榴弹。罗马尼亚军队使用的轻机枪主力为7.92毫米ZB-30布伦式轻机枪和相同口径的德制MG34轻机枪，重机枪则包括捷克的ZB-37机枪和德制M07/12机枪。

罗马尼亚陆军的步兵配置的武器比较现代化，但是其炮兵火力却相对不足，只相当于同等规模的德国师火炮数量的一半（但与当时苏军步兵师的火炮数量差不多）。罗军装备的火炮主要为75毫米及105毫米什耐德野战炮，75毫米斯科达野战炮，100毫米斯科达榴弹炮，105毫米克房伯榴弹炮，以及150毫米、152毫米和155毫米的克虏伯及斯科达火炮。山地步兵装备75毫米和100毫米的斯科达山炮，以及75毫米什耐德M1906山炮。火炮牵引车主要是菲亚特拖拉机（牵引野战炮及山炮），以及斯科达拖拉机（牵引重型榴弹炮）。

罗军的反坦克炮种类有37毫米博福斯炮、47毫米布雷达炮、以及德军1940年从法国缴获、随后卖给罗马尼亚的75毫米PAK反坦克炮。罗军防空武器包括13.2毫米和25毫米哈奇开斯机关炮、从瑞士购买许可证生产的20毫米厄利孔高炮、莱茵金属公司的38型37毫米高炮、从瑞典购买许可证生产的40毫米博福斯炮，以及从英国进口的75毫米维克斯高炮、捷克的76.5毫米斯科达高炮，还有著名的德制88毫米克虏伯高炮。其牵引车主要为捷克的塔特拉93T卡车和罗马尼亚的马拉克萨UE型拖拉机。

二、山地步兵

罗马尼亚的山地步兵部队创建于1916年11月，被称为"vanatori de munte"（山地猎兵），是一支精锐部队，其成员包括不少塞克勒人和健壮的喀尔巴阡山民。1941年6月22日时，罗马尼亚陆军有4个山地步兵旅，每个山地步兵旅约有1万到1.2万人，通常编为两个山地战斗群（每群3个营）和一个山地炮兵战斗群（2个炮兵营）。以第一山地旅为例，该旅在1941年6月22日拥有383名军官、319名士官和11628名士兵，装备有10069支步枪、331挺ZB-30轻机枪、90挺重机枪、80门迫击炮和27门山炮，旅属交通工具为4774匹马、624辆马车和116辆机动车。

1941年罗马尼亚参战时，第3山地旅驻扎在西部边境，随时准备抵御匈牙利的进攻。在总动员后组建的第4旅由于缺乏训练，其战斗力不如另3个旅。从1942年起，山地旅编为山地师。1944年罗马尼亚宣布停战时，有两个山地旅和一个山地师逃过了苏军的包围，随后被编入改编后的罗马尼亚军队，参加对轴心国作战。另两个刚从克里米亚半岛撤退回国的山地旅（第103旅和104旅）被停战后开入罗马尼亚的苏军包围并俘虏，其成员都投入了战俘营。

三、骑兵

共有6个骑兵旅，每旅有500名军官和士官，以及6900名左右的骑兵，配备步枪、约200挺ZB-30轻机枪、重机枪和迫击炮各50门，以及6辆R-1坦克。每个旅平均拥有6500匹马、500辆马车和120辆机动车。罗马尼亚陆军的骑兵旅也从1942年起改编为骑兵师。


1940年冬季的一名罗马尼亚步兵士兵

四、装甲部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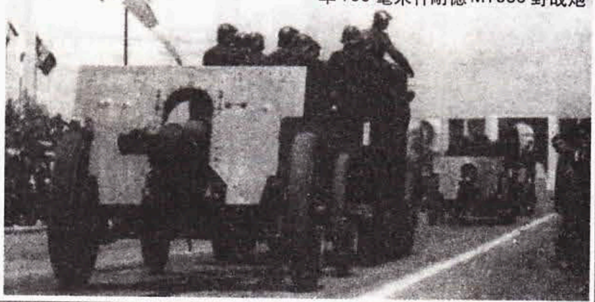
1个装甲师，即罗马尼亚第1装甲师。它下辖2个坦克团、1个机械化团、1个机械化炮兵团、1个特别武器营、一个摩托化先遣营、1个侦察营、1个信号连、1个卡车连、1个宪兵排，以及野战医院、后勤、燃料和维修部门。该师共有283名军官、433名士官、6017名士兵，武器包括5367支步枪、243挺轻机枪、39挺重机枪、36门火炮、126辆R-20坦克、75辆R-35坦克、17辆过时的FT-17坦克（用于训练用途）和725辆汽车。1944年罗马尼亚签署停战协议后，第1团和该师的其他单位都被解散，所有武器装备都被没收，一些军官和坦克兵被关入战俘营。只有第2坦克团在改编后得以保留，被编入苏联第27近卫坦克军，在1945年初参加了斯洛伐克和奥地利战役，在德国投降前损失了93%的坦克。

罗马尼亚陆军在1937年从捷克进口了15辆R-2轻型坦克（重10吨，搭载1门37毫米斯科达炮和78发炮弹，乘员4人，最高时速40公里），在1939年一共接收了126辆，装备给第1坦克团。1939年年中罗马尼亚试图从斯科达公司再订购382辆坦克，但是这笔订单被德国否决了。罗军在1942年的战斗中损失

1940年冬季罗马尼亚骑兵的拉练



由斯柯达6STP6L卡车牵引的罗军105毫米什耐德M1936野战炮



了26辆R-2坦克，德国提供了26辆基本上与其相似的35(t)坦克来进行补充。

1937年12月，罗马尼亚陆军试图让马拉克萨钢铁公司从法国的雷诺公司引进R-35轻型坦克的生产线，并计划生产200辆该型坦克，但是最终决定改为直接从法国购买。到1939年二战爆发时罗马尼亚一共获得了41辆R-35，不久又拘留了从波兰撤到罗马尼亚境内的34辆波军同型坦克，随后用这75辆雷诺坦克在当年11月组建了第2坦克团。在1941年6月22日罗马尼亚参战时，罗马尼亚总参谋部决定只派出装备较先进的R-2坦克的第1团随德军作战，而把第2团拨给第4军司令部，用于收复北布科维纳。

1942年德国向罗马尼亚提供了22辆III号坦克（罗方称为T-3坦克）和12辆IV号坦克（T-4坦克），结果在当年冬天的顿河攻势中损失了将近一半。1943年，罗马尼亚军事装备和战时生产部向德国订购了150辆T-3及T-4坦克和56辆自行火炮，但是由于德国优先安排本国的军事生产，拖延罗马尼亚的这批军火订货，到1944年8月罗马尼亚倒戈时，一共才接收了110辆坦克，其中不少是德军装甲部队用旧的二手货。此外在1943年5月到6月间，德国还提供了50辆磨损严重的捷克制38(t)坦克（罗马尼亚称为T-38轻型坦克）。

严重拖延交货时间，是那些轴心国小伙伴在向德国订购坦克、飞机等军事装备时遇到的常见问题。在1942年，罗马尼亚军事装备和战时生产部决定将罗军在苏联战场上缴获的175辆坦克和154门火炮“废物利用”。在苏制T-60轻型坦克的底盘上安装了苏制76.2毫米ZIS-3型野战炮，使用BT-7坦克上拆下的钢板保护乘员，制造出了TACAM T-60型自行火炮（这是Tun Antic ape Afet Mobil T-60的缩写，意为“T-60机动底盘自行野战火炮”），一共生产了23辆。此外罗马尼亚还在1943年初用R-2坦克的底盘、T-26和T-60坦克的装甲、以及缴获的苏军76.2毫米火炮，装配了21辆TACAM R-2自行火炮。

有趣的是，苏军在1944年10月没收了罗马尼亚陆军所有的TACAM T-60火炮，却允许罗军继续保留所有其他型号的坦克和自行火炮。这些德制坦克和罗制自行火炮随着罗马尼亚装甲部队参加了匈牙利战役，并在1945年初一直打到奥地利境内。直到战后罗军换装苏式武器时才退役，至今仍可以在罗马尼亚的一些博物馆中见到它们的身影。从这一点来看，也许苏联当局在当时确实把那十多辆使用苏联坦克底盘的TACAM T-60自行火炮当成了攸关苏维埃国家体面的问题。

五、边防军

两个要塞旅，每旅包括两个要塞团、1个要塞炮兵团和1个要塞重炮团。这两个旅在1941年8月6日分其至少会说俄语、保加利亚语、马扎尔语或波兰语中的一种，主要执行渗透和破坏等特种任务，配备ZB-24步枪、ZB-30轻机枪和毛瑟1932式冲锋枪。1942年和1943年又组建了两个伞兵连（第10连是重武器连，配备81.4毫米迫击炮和47毫米反坦克炮）。罗马尼亚停战后，其伞兵部队在苏联的要求下于1945年2月解散。

根据罗马尼亚总参谋部的统计，从1941年6月22日到1943年4月15日为止，罗马尼亚陆军在对苏战争中缴获了大量武器，包括11.6万支步枪、7817挺轻机枪、3650挺重机枪、1236挺反坦克步枪、1555门60毫米迫击炮、801门82毫米迫击炮、136门120毫米迫击炮、709门45毫米反坦克炮、693门76.2毫米野战炮及山炮、477门122毫米榴弹炮、148门152毫米榴弹炮。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德军还紧急向罗马尼亚提供了许多缴获的苏军武器，帮助其重建被歼灭的部队，后来这些苏制武器在1943至1944年被德制武器代替。



罗马尼亚军事博物馆陈列的TACAM R-2 76毫米自行火炮



罗马尼亚陆军的雷诺FT17坦克



罗马尼亚陆军的雷诺R35坦克

到1942年11月1日为止，罗马尼亚还缴获了175辆苏军坦克车辆，包括1辆KV-1“伏罗希洛夫”重型坦克、2辆T-34、2辆T-28M2、33辆T-26、2辆T-27A、1辆T-40、30辆T-60、19辆T-37、3辆T-38、32辆BT-7、36辆“共青团员”火炮牵引拖拉机和14辆STZ“敖德萨”坦克。在1943年苏军对库班和克里米亚地区的反攻行动中，罗军又缴获了4辆T-34、4辆T-38、1辆KV-1、4辆美制M-3“李”轻型坦克、4辆“瓦伦丁”坦克和19辆各种型号的英制维克斯坦克。

罗马尼亚王家空军（Aeronautica Regala Romana）

在1941年6月22日共有253架飞机，其中205架可以投入战斗。参加“巴巴罗萨”行动的罗马尼亚空军部队包括两个轰炸机师、一个侦察师、一个战斗机师和一个远程侦察中队。第一轰炸机师分为三个大队，即第1大队（71、72中队，装备SM-79轰炸机）、第4大队（76、77中队，装备P-37轰炸机）和第5大队（78、79、80中队，装备He-111轰炸机）。第二轰炸机师的规模小得多，包括一个大队（第2大队，装备法制波泰兹Potez-633B2轰炸机）和两个中队（分别装备法制MB-210及罗制IAR-37飞机）。侦察师下辖4个中队，装备IAR-38型飞机。

战斗机师也分为三个大队：第5战斗机大队（51、52中队，装备He-112B战斗机）、第7战斗机大队（56、57、58中队，装备Bf-109E战斗机）和第8战斗机大队（41、59、60中队，装备IAR-80A战斗机）。远程侦察中队装备的是英制布里斯托尔“布伦海姆”Mk.I轻型轰炸机。

除了前线部队之外，在罗马尼亚本土还有1个战斗机师（第3师）和3个战斗机大队（第4、5、6大队，第5大队配有He-112战斗机，另两个大队装备波制P-11和P-24E战斗机）。在多布罗加地区驻扎有配备

英式“飓风”Mk Ⅰ战斗机的第53中队（这些飞机是在南斯拉夫制造的，被德国转交给罗马尼亚），两个水上飞机中队（意制SM-55和SM-62水上飞机），及一个侦察中队（IAR-39）。

1923年在布加勒斯特成立的“技术发展协会”（SET）和1925年在布拉索夫郊区建立的“罗马尼亚航空工业公司”（IAR）是罗马尼亚两家最大的飞机制造商，前者研制和生产SET系列教练机。IAR公司的规模要大得多，它在二十和三十年代开发出了15种型号的战斗机，还从法国、波兰和德国引进生产许可证，生产出80架Pzl P-11型和50架P-24战斗机，75架梅塞施密特Bf-109G战斗机，16架萨伏亚-马蒂SM-79轰炸机，以及30架He-111轰炸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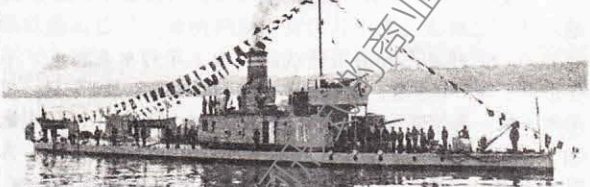
1939年9月，罗马尼亚扣留了飞入其境内避难的波兰飞机，并将其编入本国空军。这些飞机包括43架P-11战斗机、13架P-7教练机、波兰航空公司的1架DC-2、1架Ju-52和5架“伊莱克特拉”客机，以及3架波兰制造的卢布林-福克F-VII运输机。在1941至1944年期间，罗马尼亚空军还从德国得到了305架Bf-109战斗机、22架FW-190战斗机、80架Ju-88轰炸机、200架Hs-129轰炸机、160架Ju-87俯冲轰炸机，以及He-114和Ar-196水上飞机、Fi-156联络/侦察机、多尼尔Do-17侦察机、DFS-230型运输机，其数量从几架至数十架不等。德国空军还把在战争中俘虏的一些飞机转卖给了罗马尼亚，其型号包括法国的波泰兹631轻型轰炸机、南斯拉夫的“布伦海姆”侦察机和“飓风”战斗机等等。

罗马尼亚王家海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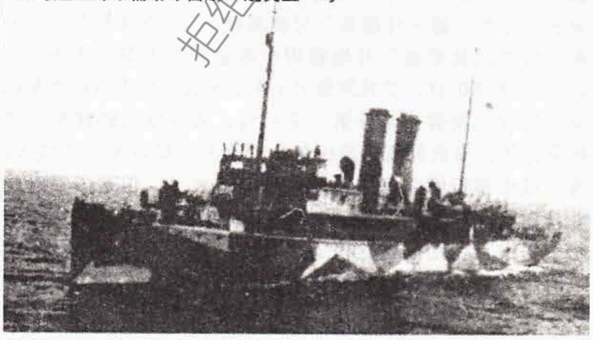
由于资金有限，因此罗马尼亚的军事经费主要投向空军和装甲部队。与这两个军种比起来，罗马尼亚海军就像是一个受到后母虐待的灰姑娘。不过罗马尼亚所处的地理位置也决定了建设一支大海军对它来说是无用的：这个国家只是在黑海拥有海岸线，这个海通向外界的出口，即狭窄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是受土耳其控制的，战时可以用海岸炮台和布雷区关闭，把黑海上所有的舰队都封锁在里边。保加利亚的海军可以忽略不计，而土耳其在二三十年代是对罗马尼亚友好的国家。

苏联在黑海的海军力量是最大的，虽然这支舰队的实力比波罗的海舰队薄弱。它在二战爆发前夕拥有1艘老式战列舰“巴黎公社”号（后改名为“塞瓦斯托波尔”号），4艘老式巡洋舰，2艘用意大利技术建造的新式轻巡洋舰，3艘驱逐领舰，14艘驱逐舰，47艘潜艇，15艘扫雷艇，4艘炮艇，两艘护卫舰，1艘布雷舰和48艘鱼雷快艇。黑海舰队海军航空兵有625架飞机，此外还有26个岸炮连和50个高炮连。罗马尼亚在1937年制订过一个海军发展计划，打算在四年里建造1艘

罗马尼亚多瑙河舰队浅水重炮舰“比萨拉比亚”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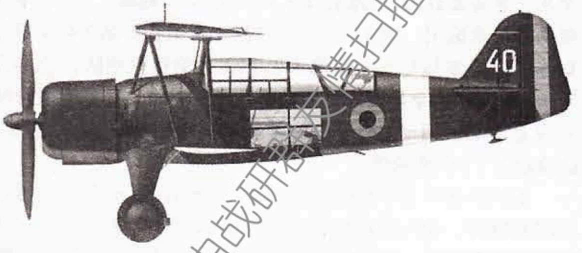


罗马尼亚海军辅助布雷舰“达契亚”号



罗马尼亚在三十年代自行研制生产的IAR-15和IAR-39（下图）飞机





5000吨级的轻巡洋舰（利用意大利和法国的设计、由罗马尼亚自行建造，其他军舰也是如此），4艘1300或1500吨级的快速驱逐舰，3艘潜艇、4艘布雷舰、9艘鱼雷快艇和一些辅助舰船。但是由于资金紧张，到1941年时罗马尼亚海军只获得了2艘潜艇、1艘布雷舰和3艘鱼雷快艇。

在1941年6月22日，罗马尼亚海军拥有41艘军舰，其中23艘隶属于黑海舰队，18艘属于多瑙河内河舰队。黑海舰队的主力是驱逐舰分队，拥有4艘驱逐舰，包括1928-1930年在意大利建造的“斐迪南国王”号和“玛丽亚王后”号，以及两艘更老的意造驱逐舰“马拉什蒂”号和“马拉塞什蒂”号，后两舰的排水量为1410吨，装有4门120毫米炮、2门37毫米炮和4具鱼雷发射管。黑海舰队的潜艇分队拥有1艘1928吨的潜艇供应舰“康斯坦察”号，以及1930年在意大利阜姆船厂建造的小型潜艇“海豚”号（NMS Delfinul）。当时由德国工程师指导、在康斯坦察船厂建造的“鲨鱼”号（NMS Rechinul）和“小鲸”号（NMS Marsuinul）潜艇也已经下水，不过由于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的工人地下组织的破坏活动，这两艘潜艇直到1943年才建成服役。

黑海舰队布雷舰分队拥有一艘现代化的新布雷舰——1939年服役、排水量812吨的“穆尔盖斯库海军上将”号，以及两艘奥匈帝国战后赔偿给罗马尼亚的小型布雷舰，此外还有4艘一战后从法国购买的炮舰，用作扫雷艇及护航兵力。1939年从荷兰引进许可证及图纸、在加拉茨船厂建造的3艘鱼雷快艇构成了鱼雷艇分队的主力，此外还有3艘老式炮艇和3艘原奥匈海军雷击艇。多瑙河分舰队拥有7艘内河炮舰、4艘老式蒸汽鱼雷艇、以及1939年以前原属于捷克斯洛伐克海关、被德国转卖给罗马尼亚的2艘巡逻艇和5艘摩托快艇。除了现役军舰外，罗马尼亚海军在参战后还根据国防动员法征用了罗马尼亚海运公司和多瑙河航运公司的一些货船、油船及拖船，作为辅助舰艇使用。两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改为辅助巡洋舰的罗马尼亚客船，“卡罗尔一世”号和“达契亚”号，也被再度征用，改为辅助布雷舰。

在1941年到1944年期间，罗马尼亚海军除了“鲨鱼”号及“小鲸”号潜艇外，还在加拉茨和康斯坦察的船厂建造了6艘鱼雷艇，从意大利获得了5艘CB型袖珍潜艇，从德国获得了3艘猎潜艇、3座自行浮桥和8艘拖船。多瑙河分舰队编入了1艘被俘获的苏联炮舰，以及5艘防磁性水雷拖船和7艘巡逻艇。到1944年8月罗马尼亚退出战争时，其黑海舰队拥有54艘舰船（29艘军舰和25艘辅助舰船），多瑙河分舰队拥有137艘各种舰艇。罗马尼亚海军的主要军舰（尤其是驱逐舰和潜艇）在1944年以后被苏联海军拘留，停泊于巴统和索契等港口，战后作为战争赔偿移交给苏联，但都在五十年代归还；多瑙河分舰队的内河舰艇也被苏军征用，并编入苏联黑海舰队的多瑙河分舰队，参加了1944-1945年的战役。

勋章。希特勒在8月6日亲自授予安东尼斯库以骑士铁十字勋章，以及一级和二级铁十字勋章各一枚。2004年，罗马尼亚最高法院判定安东尼斯库政权在1941年6月至7月间出兵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的行为是合法的领土收复行动。

“慕尼黑行动”结束后，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在德国第十一集团军的指挥下参加了乌克兰和克里米亚战役。此时它的兵力包括骑兵军（第5、6、8骑兵旅，以及一个半摩托化骑兵集群），山地军（第1、2、4山地旅），第7步兵师的野战重炮团、地52和57摩托化重炮营、第54反坦克炮连，以及罗马尼亚空军第19和21侦察机中队，总兵力74000人，司令是彼得·多米特列斯库中将。在德涅斯特河对岸是苏联第十八集团军的两个步兵师，若干重机枪营，以及超过150座碉堡。

1941年7月17日清晨，罗第三集团军的山地部队渡过德涅斯特河，攻入苏联领土。苏军的抵抗从7月19日起开始变得慌乱起来，向东撤退。8月5日，罗马尼亚军队切断了敖德萨这个大海港的对外联系。8月10日，罗军先头部队抵达南布格河，发现匈牙利陆军的另一支快速部队已经在河东岸的沃兹涅先斯克建立了桥头堡。罗军赶到这里后，把匈牙利的这支小股部队撵跑了——当时并肩参加反苏“圣战”的罗马尼亚部队与匈牙利部队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在攻入苏联领土之后发生了很多次小规模交火事件，以至于龙德施泰德不得不下令把南方集团军群的几个德国师夹在罗马尼亚军队与匈牙利军队中间，从地理上把他们隔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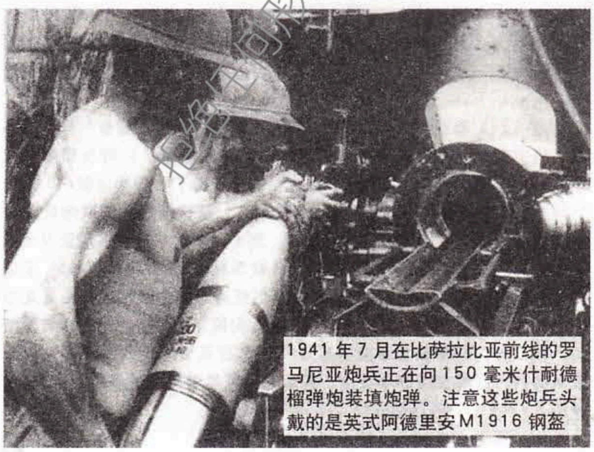


1941年7月视察比萨拉比亚前线的安东尼斯库元帅和米哈伊国王

8月19日，罗第三集团军攻占克里沃罗格，在那里俘获了12783名苏军战俘，缴获了450辆汽车和70辆坦克。随后这支部队奉命掩护德国第30军的侧翼，向第聂伯河进军。轴心国军队在第聂伯河地区遭到了苏军异常猛烈的抵抗，在当年9月的战斗中，一些部队的伤亡率高达50%，德国人不得不将伤亡最大的罗马尼亚第4山地旅撤离前线，由武装党卫军“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师接替其战斗任务。10月7日德军完全占领第聂伯河右岸地区后，将第三集团军部署在沿海地带，以防止苏军发动登陆行动。10月19日，罗马尼亚山地军随第十一集团军参加了进攻佩列科普地峡的作战行动，于10月28日攻入克里米亚半岛。从11月10日起，罗军部队开始和德军一道围攻塞瓦斯托波尔。

1941年10月在乌克兰南部的罗军装甲部队，图中有一名德国人，是德国提供给罗马尼亚的捷克制R－2坦克的维护技师





1941年7月在比萨拉比亚前线的罗马尼亚炮兵正在向150毫米什耐德榴弹炮装填炮弹。注意这些炮兵头戴的是英式阿德里安M1916钢盔

在战线的后方，罗马尼亚第四集团军对敖德萨展开了长时间的围攻。这座城市是乌克兰最重要的工业中心和商港，也是黑海舰队的主要基地之一。担任防守任务的是新组建的苏联濒海集团军，以及敖德萨海军基地（包括3个独立炮兵营、一支舰队、一个航空兵机群和其他分队）。苏军从6月27日起在城市外围建起了三道防线，在城里修筑了两百多个街垒，并且在敖德萨港和德涅斯特河口沿海区域布雷。

8月13日，罗第四集团军对敖德萨防线展开全面进攻，遭到挫败之后改为集中兵力突击城防两翼，但是在激烈的战斗中，苏联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由上岸的水兵组成）不仅击退了罗军的进攻，而且还不断发起反攻。8月17日，黑海舰队第一海军陆战团在希茨利村战斗中缴获了18门大炮和3辆轻型坦克；8月19日在卡加尔雷克村的战斗中，苏联水兵用白刃战击退了罗军的一个营，缴获9门反坦克炮、3挺重机枪和5辆汽车。与此同时，黑海舰队的“红色高加索”号巡洋舰，“邵武勉”号、“无瑕”号、“无情”号、“伏龙芝”号和“捷尔任斯基”号驱逐舰，“红色格鲁吉亚”号和“红色阿扎里亚”号炮舰用舰炮猛烈轰击罗军阵地。

8月20日，罗第四集团军在补充大量兵力后再度发起全面进攻，突破了城外第一道防线，战斗地点转移到了敖德萨近郊。安东尼斯库预计在8月23日能攻陷这座城市，连在城中举行阅兵仪式用的白马都运来了。但是罗军直到8月25日才在东部扇形防御区攻下切班卡和新多菲诺夫卡两个居民点。他们在这里架起重炮，轰击敖德萨港和“金色海滨”浴场的临时码头。在之后的一周内，黑海舰队调来了巡洋舰“红色乌克兰”号、“红色克里米亚”号和“共

产国际”号，以及驱逐舰“哈尔科夫”号、“塔什干”号、“活泼”号和“灵敏”号，试图增援敖德萨守军的力量，并把城中的疏散居民和各种物资撤往塞瓦斯托波尔。这些军舰在夜间航行，白天则躲在烟幕掩护的港口内。

到9月13日，敖德萨守军面临的局势进一步恶化，敖德萨防区军事委员会向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发电请求增援。9月15日莫斯科回电说请他们再坚持六七天。在此期间，一些援军从新罗西斯克和塞瓦斯托波尔乘船抵达敖德萨，但是要保卫这座城市，兵力还远远不够。9月21日，一支增援部队搭乘五艘运输船从塞瓦斯托波尔出发，在“红色克里米亚”号和“红色高加索”号巡洋舰、以及3艘驱逐舰的护卫下前往敖德萨港。当天下午，“伏龙芝”号驱逐舰在为这支舰队探查敖德萨港周围情况时，被德国空军第77俯冲轰炸机大队第3中队的“施图卡”飞机炸毁，为了避免沉没而在坚德罗夫沙嘴抢滩搁浅。同时被德机炸沉的还有一艘拖船和一艘炮舰。“无瑕”号驱逐舰遭到9架俯冲轰炸机的攻击，多处受损，失去战斗力；“无情”号驱逐舰遭到20多架飞机的轰炸，前甲板被炸毁，部分舱室被海水淹没。

到1941年9月底，敖德萨战线仍然没有被罗军攻破，城中的苏联守军开始准备秋冬季的战斗。但是此时整个苏德战场的形势发生变化，德军占领了基辅，突入顿巴斯工业区和克里米亚半岛，因此苏军最高统帅部在9月30日决定在最短的时间内撤出敖德萨防御部队，用于加强塞瓦斯托波尔的防御。从10月1日到10月16日，在陆军佯攻的掩护下，黑海舰队从敖德萨撤出了“濒海集团军”的近八万名军人、500门大炮、14辆坦克、5辆装甲车、1158辆汽车、500台汽车发动机、163台拖拉机、一万五千名居民、3500多匹马和25000吨的各种物资，以及敖德萨残留下来的全部工厂设备。10月16日清晨5时10分，最后一艘载着军队的运输船在军舰掩护下悄悄离开敖德萨港。当天中午，罗马尼亚部队开入敖德萨城。

在敖德萨战役中，罗马尼亚第四集团军从8月6日到10月16日一共投入了340223人的兵力，有17729人阵亡，63345人受伤，11471人失踪或被俘。此外罗军还损失了19辆坦克、90门大炮、115门迫击炮、336挺重机枪、956挺轻机枪、10250支步枪。罗马尼亚空军执行了5524次战斗飞行任务，投下了1429吨炸弹，损失20架飞机。苏联方面的损失是16578人阵亡、24690人受伤，损失了人口三十五万的敖德萨市（这座城市在1942年12月被苏联最高苏维埃授予“英雄城市”的称号）。

1941年8月19日，安东尼斯库宣布从德涅斯特河直至南布格河的苏联领土并入罗马尼亚。这片地区被称作“特兰西尼斯特里亚”（Transnistria），意思是“尼斯特河（德涅斯特河的罗马尼亚名称）对岸的领土”。这片地区被分为十三个县，总面积为四万二千平方公里，和“第二次维也纳仲裁”中割让给匈牙利的北特兰西瓦尼亚面积差不多。居住在这一地区的人口有232.6万，包括177.5万乌克兰人、19.8万罗马尼亚人和15万俄罗斯人，此外还有12.6万日耳曼人、2.8万保加利亚人和2.2万犹太人。

特兰西尼斯特里亚的犹太人，像罗马尼亚其他大部分地区的犹太人一样，在二战当中的命运非常悲惨。在1939年二战爆发时，整个“大罗马尼亚”境内大约有80万犹太人，其中一半以上居住在特兰西瓦尼亚、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等一战以后并入罗马尼亚的领土上。1940年罗马尼亚失去北特兰西瓦尼亚、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之后，留在其境内的犹太人人口大约为312972人。这些犹太人曾经被1866年的那部自由主义宪法赋予全部公民权，但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随着反犹主义的兴起而开始遭到迫害。1937年和1940年专门通过的两部法律剥夺了罗马尼亚犹太人的大部分公民权和财产所有权，犹太人被禁止参军，禁止拥有产业，禁止与有罗马尼亚血统的人通婚（但是像卢佩斯库夫人或扬·安东尼斯库的妻子这样的上层犹太人很显然没有受到这些法律的波及）。

在1941年初的铁卫军叛乱中，布加勒斯特的犹太人曾经遭到屠杀。当年夏天罗马尼亚对苏联宣战后，离普鲁特河边境只有几十公里的摩尔达维亚首府雅西成为前线城市，在那里爆发了屠杀犹太人的狂潮——在其战前人口中约有一半是犹太人。6月26日，苏联空军对雅西发动空袭，谣传说苏联伞兵已经在城市周围降落，并且在“犹太共产党员同伙”的带领下潜入了城市。6月27日，安东尼斯库打电话给雅西卫戍司令，要他“清理城中的犹太人”。战后安东尼斯库在审判他的人民法庭上坚持说他这个电话只是要求疏散和撤退雅西城里的犹太人口。但是当地警察局长却发布了紧急动员令，宣布说只要有一个罗马尼亚或德军士兵被“犹太共产党员”杀害，就要枪毙100名犹太人来偿命。与此同时雅西市

1941年8月后的罗马尼亚



政当局公然宣布说犹太人社团正在密谋进行破坏活动。

到6月28日和29日，雅西城中对犹太人的屠杀已经发展到失控的状态。罗马尼亚的警察、军人和暴徒团伙挨家挨户搜查犹太人，有八千多名犹太人在自己的家中被活活打死，或者从楼上扔下来摔死，还有些人被押到大街上，面对墙壁站好，然后被枪决。剩余的幸存犹太人被押往火车站，塞进运牲口用的密闭棚车，运往罗马尼亚南部的卡雷拉希（Calarasi）。那些走得慢的人也被当场枪毙。在第一批“疏散”的五千多名犹太人中，只有1011 人活着到达目的地，其余的人都死于口渴、饥饿和暑热。在发往波杜尤利埃的另一列火车上，2700 名犹太人只有700 人幸免。



1941 年6 月“雅西屠杀”中的犹太人（本图、下图）



根据罗马尼亚政府在1943 年的统计，一共有13266 名犹太人死于雅西屠杀，当地犹太人社团统计的数字为超过15000 人。但是也有一些罗马尼亚人勇敢地挺身而出，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加以纪念的54 名罗马尼亚“义人”当中，就包括在雅西大屠杀中给困在车厢中的犹太人送去水和食物的薇奥丽卡·阿加里奇，她是雅西附近一座名叫罗曼的小城镇的红十字会主席。

1946 年，罗马尼亚人民法庭对雅西大屠杀事件进行了审讯。被告包括1941 年时的雅西县县长和雅西市长、8 名将级和校级高级军官、4 名军人、21 名市民和22 名宪兵。起诉这些人的罪名包括蓄意杀害罗马尼亚国民，以及违反和平与人道的犯罪。165 名证人（大多是犹太人幸存者）出庭作证。法庭判处23 名被告以终生苦役，并处每人1 亿旧列伊的罚款。其余被告被判处25 年、20 年或15 年苦役。

不过，尽管有雅西大屠杀这样的事件，在旧王国“雷格特”地区的罗马尼亚犹太人处境还是好于比萨拉比亚、北特兰西瓦尼亚和北布科维纳地区的犹太人。尽管纳粹德国两次提出了强硬的要求，但安东尼斯库政府一直没有把本国的犹太人送入波兰的死亡集中营中去。罗马尼亚的犹太教堂被关闭，随后又开放了；犹太人被勒令戴上黄色六角星，不久又取消了这道法令。在战争中，犹太人中学仍旧开放，布加勒斯特的犹太人剧院和管弦乐队依然在继续活动。到1942 年底，罗马尼亚政府甚至开始帮助本国犹太人秘密移民巴勒斯坦。在整个二战中，“雷格特”地区一共约有2 万名犹太人被杀害。



“雅西屠杀”中被塞入火车运往外地的犹太人，许多人因中暑脱水而死



1941 年7 月被流放的比萨拉比亚犹太人

在比萨拉比亚、北布科维纳和特兰西尼斯特里亚，情况要糟糕得多。比萨拉比亚是有传统反犹倾向的地区，臭名昭著的1903 年俄国反犹大屠杀就是首先在其首府基什尼奥夫爆发的。在1941 年，随着德军和罗马尼亚军队的推进，当地的罗马尼亚人与乌克兰人仿佛听到了呼唤他们屠杀犹太人的号角，与党卫军的“特别行动分队”一道杀害当地的犹太人。特兰西尼斯特里亚的两万犹太人几乎全部被杀害；敖德萨沦陷后，罗军在10 月22 日到28 日之间杀害了25000 名当地犹太人。战前居住在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的27 万犹太人大多被驱出家园，关入特兰西尼斯特里亚地区的五座集中营中。从1941 年到1944 年，这些犹太人里有13 万到14.5 万被杀害。此外，当德军在1944 年3 月占领匈牙利全境后，居住在北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14.8 万犹太人几乎全部被送至奥斯维辛灭绝营，只有2.9 万人侥幸生还。

根据世界犹太人大会的统计，到二战结束时，在罗马尼亚全境有428312 名犹太人生还，其中包括13 万从匈牙利、波兰和特兰西尼斯特里亚逃过来的犹太难民。这些人后来大多去了巴勒斯坦。

斯大林格勒

安东尼斯库吞并了“特兰西尼斯特里亚”之后，在罗马尼亚国内开始出现了不满的迹象。国家自由党和国家农

民党的领导人们认为吞并德涅斯特河东岸地区没有什么意义，倒是应该把罗马尼亚军队派往特兰西瓦尼亚去监视匈牙利的军队。罗马尼亚人原本认为，在对苏战争的第一阶段中证明了自己是比匈牙利更可靠的盟国之后，德国就会修改第二次维也纳仲裁，把特兰西瓦尼亚还给他们。但是当这个希望落空之后，罗马尼亚人并不掩盖他们的失望情绪：11月8日，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了祝捷游行，当参加游行的罗马尼亚军队穿过一战后修建的那座大凯旋门时，人群当着德军最高统帅部代表威廉·凯特尔元帅的面高喊“还我特兰西瓦尼亚！”

1941年11月28日，在斯大林的反复要求下，英国政府向罗马尼亚、芬兰和匈牙利下达了最后通牒，要求这三个国家在12月5日之前停止对苏联的所有军事行动。12月6日，由于没有从这些国家收到满意的答复，英国对罗、芬、匈三国宣战。这个消息令许多罗马尼亚人感到惊恐，安东尼斯库也毫不掩饰他的失望情绪，他在对国民的广播讲话中，对于罗马尼亚数个世纪以来争取生存的斗争未能受到丘吉尔的充分理解而感到遗憾。12月12日，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要求下，罗马尼亚履行轴心国成员的义务，对美国宣战了，但是美国直到1942年6月5日，即《英苏条约》签订生效之前，一直没有对罗马尼亚宣战。

敖德萨战役结束之后不久，德军最高统帅部在12月7日宣布对苏战争的第一阶段“顺利结束”。罗军第5、6、7、9、11、13、14和15师在罗马尼亚本国和特兰西尼斯特里亚进行轮休和整编，而第1、2、4、10、18、19和20师参加了当年冬天在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刻赤－费奥多西亚战役，以及随后的塞瓦斯托波尔包围战。

从1941年12月底到1942年6月底，即占领整个克里米亚半岛的“猎鸨”战役和“鲟鱼”战役当中，罗马尼亚军队损失19000人，伤亡惨重，仅第4山地旅在塞瓦斯托波尔战役当中就有2600人（即四分之一的兵力）伤亡，其旅长乔治·曼尼利乌准将成为很少几个获得德国骑士十字勋章的罗马尼亚人之一。在德国第十一集团军损失的35559人当中有8454人是罗马尼亚军人（阵亡1597人，受伤6571人，失踪277人）。

另一方面，罗军部队在长达295天的克里米亚战役中一共抓获了95000名苏军俘虏，缴获了467门大炮、758门迫击炮、86门反坦克炮、69门高炮，给苏军造成的伤亡在5万到6万人之间。

克里米亚战役结束后，鉴于本国部队在对苏战争中伤亡惨重的现实，国家自由党领袖康斯坦丁·布勒蒂亚努和国家农民党领导人尤利乌·曼纽联名上书安东尼斯库元帅，


1941年冬天自敖德萨归国的罗马尼亚第一近卫师，摄于布加勒斯特北站。图中可见斯柯达75毫米野战炮


1942年罗马尼亚空军轰炸塞瓦斯托波尔的情景

恳请他尽快从苏联撤回军队，结束战争。安东尼斯库回答说，如果罗马尼亚现在撤出苏联，会导致德国武装占领并接管罗马尼亚。但是实际上安东尼斯库自己也在急于从苏联抽身，把军队转而用来对付匈牙利人。

此时罗匈两国的关系由于特兰西瓦尼亚问题和巴纳特问题（后一个问题是瓜分南斯拉夫领土不匀而导致的结果）而日趋紧张，罗马尼亚还唆使同样对匈牙利有领土收复要求的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一起向德国施加压力，其形势一如当年的“小协约国”。由于罗马尼亚国内的反匈牙利浪潮日益高涨和频繁，以致德军最高统帅部不仅在苏联战场上被迫把罗匈两国军队从地理上隔开，甚至还考虑过把特兰西瓦尼亚直接置于德国保护之下。1942年2月和3月，安东尼斯库元帅两次去觐见希特勒，赫尔曼·戈林元帅在其中一次就对他说过，“说到底，你为什么要为特兰西瓦尼亚问题同匈牙利争吵呢？实际上，这个地区的日耳曼人多于罗马尼亚人或匈牙利人。”

希特勒对特兰西瓦尼亚（以及巴纳特地区）有自己的盘算。在1941年7月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上，他就曾经对手下说过，“我们同罗马尼亚的关系现在是好的，但谁知道它将来怎么样。因此必须准备应付各种情况，其中包括疆界问题”。

希特勒并不掩饰在将来有可能把多瑙河流域的德意志人聚居区并入扩大了的德意志帝国的意图，因此无论安东尼斯库做出多么热烈的许诺和保证，也不能使这位德国元首应允“重新考虑”特兰西瓦尼亚问题。希特勒只是含糊地说，“一切问题”都应当等到对苏战争结束之后再去解决。匈牙利首相卡洛伊紧随着安东尼斯库也去见了希特勒。按照他回到布达佩斯后大肆宣扬的说法，希特勒似乎暗示过，等俄国人被解决了之后，匈牙利人立即可以“放手去揍”罗马尼亚人。

当年4月，罗匈两国之间位于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部分边界宣告关闭，两国之间的人员和通信来往完全中断。7月24日，德国驻赫尔辛基公使布吕歇尔向柏林回报说，芬兰政府获得消息，匈牙利正在准备进攻罗马尼亚，同时罗马尼亚、匈牙利和克罗地亚也在准备进攻匈牙利。在“反布尔什维克圣战”中理论上本应并肩作战的两个盟友之间竟然出现如此公然敌对的状况，着实出奇。

1942年夏天，20多个罗马尼亚师参加了德军的夏季攻势，这场攻势最主要的目的是占领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地区的油田。德国最高统帅部把罗马尼亚军队用在战线最危险的地段上，用他们“堵漏”，或是掩护德军撤退。安东尼



彼得·多米特列斯库（1882–1950），二战期间任罗第三集团军司令，1944 年罗马尼亚倒戈后继续任职，指挥对德作战。1948 年以在苏联境内的“战犯罪”被罗马尼亚军事法院起诉，但因无证据被无罪开释，1950 年病逝

斯库元帅无条件地执行希特勒的命令，由于这个缘故，在罗马尼亚的将领和高级军官中也产生了反对派。他们通过驻外武官这条外交渠道与同盟国建立了联系，希望以美英等国保证罗马尼亚的独立与边界为条件发动一场政变，推翻安东尼斯库政权。当时罗马尼亚政府以及自由党和国家党的领导人也分别通过各自的外交渠道同西方建立了同样的联系。

在同一时期，由于其军队在顿河沿岸遭到苏军的拼死抵抗，因此罗马尼亚的死对头匈牙利人也在积极地与西方盟国取得联系，设法退出战争。与此同时，两国驻瑞士和葡萄牙的外交官还竞相向当地的德国情报机构举报另一方与西方盟国的勾搭。如果说希特勒认为这两个小喽罗委实令人讨厌，其原因确实也不难理解。

1942 年夏天，罗马尼亚有 9 个师在顿河下游至高加索前线作战，包括部署在亚速地区、由科尼利乌·德拉加利纳少将指挥的第 6 军（第 1、2、18 步兵师），以及由彼得·多米特列斯库中将指挥、正在向库班和高加索地区进攻的第三集团军（此时包括第 5、6、9 骑兵师，第 2 山地师和德国第 298 步兵师），第 19 步兵师和第 3 山地师随德国第 5 军作战，其余的部队在夏末秋初的几个月里处于轮休、维持占领区秩序、或补充兵员的状态。罗第 6 骑兵师参加了塔曼半岛战役，第 5 骑兵师在 9 月 6 日至 11 日和德军一同占领了新罗西斯克。在这之后，第三集团军司令部和所属部队开始调往斯大林格勒前线，他们原来的防区由 5 个意大利师和 2 个德国师接管。

参加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罗马尼亚部队被重新组成“安东尼斯库元帅”集团军群，包括第三和第四两个集团军。第三集团军司令仍然是多米特列斯库中将，其兵力已经得到大幅加强，包括第 4 军（第 1 骑兵师、第 13 步兵师），第 5 军（第 5、6 步兵师），第 2 军（第 9、14 步兵师）和第 1 军（第 7、11 步兵师），第 2、4、5、8 摩托化重炮团，第 41 摩托化重炮营，以及一个装备 Do－17M 侦察机的远程侦察中队和一个联络飞行中队，第 7 骑兵师和第 15 步兵师作为后备兵力。在当年 11 月，第三集团军还得到德国第 48 军的加强（该军包括德 22 装甲师和罗第 1 装甲师），总兵力为 152492 名罗军和 11211 名德军。其防区沿着顿河西岸展开，从卢戈夫斯基（Lugovsky）延伸至苏霍伊－顿涅茨克（Sukhoy Donetsk），其左翼是意大利第八集团军，右翼是德国第六集团军，司令部设于切尔纳谢夫斯卡亚（Cernashevskaya）。

罗第三集团军的战线长 138 公里，一个师平均要防守 17 到 22 公里宽的地域。罗军在这里一共有 48 门反坦克炮，每门炮要负责消灭在 2.875 公里宽的战线里出现的 T－34 坦克和 KV 重型坦克，其难度可想而知。除此之外，苏军在西岸还有两处桥头堡，分别位于谢拉菲莫维奇（Serafimovich）和克列特斯卡亚（Kletskaya）。多米特列斯库曾经多次要求提供增援兵力以消灭这两处桥头堡，但是没有获得德军的许可。

罗马尼亚第四集团军的司令是康斯坦丁·康斯坦丁内斯库中将，防守区域位于斯大林格勒市区以南，从旧奥特拉达（Straya Otrada）直至萨尔帕湖（Sarpa）。该集团军包括第 6 军（第 1、2、4、18、20 步兵师）和第 7 军（第 5、8 骑兵师），司令部设在科托尔尼科夫斯基（Kotelnikovsky）。这个集团军防守的战线宽度在地图上长约 270 公里，实际上由于地形的缘故长达 300 公里，其中第 8 骑兵师的战线达 100 公里，第 1、4、18 步兵师防守的战线长度在 27 至 41 公里之间。此外，由于此前的战斗行动，该集团军的大多数师处于非满员状态，第 18 步兵师的兵力只有满员编制的 73%，第 5 和第 8 骑兵师分别为 57% 和 64%，其余各师的满员率都低于 50%，第 1 步兵师的兵力甚至只有预定编制的 27%。当苏军于 1942 年 11 月发动全面反攻时，该集团军的总兵力只有 75580 人。



1942 年夏天在顿河前线的彼得·多米特列斯库和第 6 军军长科尼利乌·德拉加利纳（右）→



1942 年夏天罗军在顿河俘虏的苏军士兵

罗马尼亚空军的第7战斗机大队和第5轰炸机大队在9月中下旬进驻斯大林格勒附近的野战机场，10月初又调来了第1和第3轰炸机大队、第8战斗机大队、以及第6战斗轰炸机大队。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防线的对面是苏联西南方面军（包括近卫第1集团军、第5坦克集团军、第21集团军），拥有5888门大炮、728辆坦克和790架飞机；罗第四集团军对面的苏军为斯大林格勒方面军（51、62、63、57集团军，4931门火炮，445辆坦克）。

11月19日0530时，正在零下20度的低温和刀子一样的刺骨寒风中昏沉欲睡的罗第三集团军阵地忽然被排山倒海的炮火所笼罩。经过两个小时的炮火准备之后，苏联西南方面军由彼·列·罗马年科中将指挥的坦克第五集团军从谢拉菲莫维奇桥头堡、伊·米·契斯季亚科夫将军指挥的第二十一集团军从克列特斯卡亚桥头堡同时向罗军发动了空前猛烈的进攻。虽然一些罗马尼亚第13师的士兵用地雷、手榴弹和燃烧瓶摧毁了25辆坦克，但是苏联坦克部队仍然以全速通过了罗军阵地，并占领其后方的村庄。第三集团军的右翼很快被击垮，罗军士兵开始狼狈后退或者被俘。

位于罗马尼亚部队背后的德军部队试图以猛烈的反冲击阻止苏军的前进，在克列特斯卡亚桥头堡，迅速调来了由罗马尼亚第1装甲师和德国第14、第22装甲师，以及罗骑兵第7师组成的预备队。但是重达52吨的苏军T-34坦克有很厚的装甲，罗军的37毫米和47毫米反坦克炮的炮弹都无法击穿它，因此罗军增援部队遭到苏军坦克第五集团军下属的坦克第1军和坦克第26军的沉痛打击，迅速被击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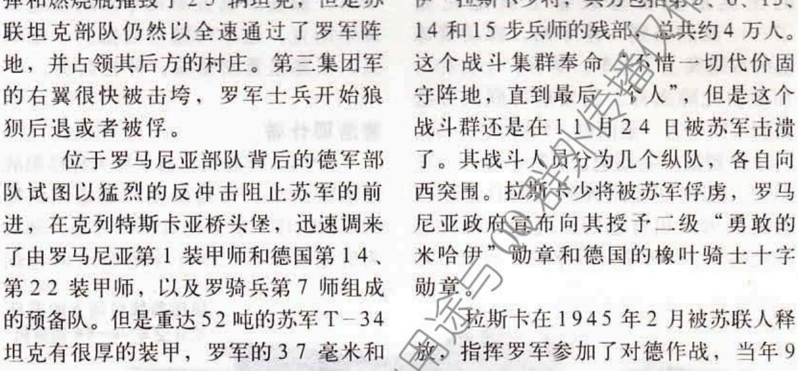
1942年秋天进驻斯大林格勒附近阵地的罗马尼亚部队



在反攻的第一天，苏军在罗第三集团军的正面防线突破并占领了宽16置18公里、纵深15公里的地域，在其右翼，即罗军与德国第六集团军的结合部，占领了另一处10到12公里宽、35到40公里深的地区。被快速前进的苏军坦克部队包在合围袋里的第三集团军的残部组成了“拉斯卡将军”战斗集群，指挥官是第6步兵师师长米哈伊·拉斯卡少将，兵力包括第5、6、13、14和15步兵师的残部，总共约4万人。这个战斗集群奉命“不惜一切代价固守阵地，直到最后一个人”，但是这个战斗群还是在11月24日被苏军击溃了。其战斗人员分为几个纵队，各自向西突围。拉斯卡少将被苏军俘虏，罗马尼亚政府宣布向其授予二级“勇敢的米哈伊”勋章和德国的橡叶骑士十字勋章。

拉斯卡在1945年2月被苏联人释放，指挥罗军参加了对德作战，当年9月成为第四集团军司令，1946至1950年先后出任罗马尼亚国防大臣及武装部队总监，1950年被勒令强制退役，1959年去世。

1942年顿河草原的罗马尼亚骑兵和侦察部队



11月20日，叶廖缅科将军指挥的两个坦克军和9个步兵师突破了罗马尼亚第四集团军的正面防线，其右翼随后迅速向北旋往斯大林格勒以西的卡拉奇方向，准备在这里与西南方面军的中央兵力会合，切断固守斯大林格勒城的德第六集团军的退路。21日傍晚，罗马尼亚第6军与德29摩托化第步兵师设法在斯大林格勒－科特尔尼科沃铁路一线阻止苏联第51集团军的进攻，但是由于缺少反坦克炮，这道匆忙拼凑出来的防线很快就被苏军击碎了，罗马尼亚第1、2、18步兵师在战斗中的伤亡率高达80%。11月22日夜间，西南方面军与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在卡拉奇－苏维埃茨基会师，斯大林格勒包围圈合拢。被围在包围圈里面的除了整个德国第六集团军外，还有罗马尼亚第四集团军的一部分，包括6个步兵师和1个骑兵师。

此后在1942年末到1943年初的两个多月里，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勉强着组成了一道漏洞百出的战线，其兵力包括逃出苏军包围圈的第7、9、11步兵师，第7骑兵师和第1装甲师的残部，总共只剩下83000人，组成了“霍德利特”战斗集群。苏联第三近卫集团军在1942年12月16日发动的“小土星”战役粉碎了意大利第八集团军的战线，“霍德利特”战斗集群又一次面临被包围歼灭的危险，不得不再度向西溃退，撤往切尔尼戈夫方向。

在南边，罗马尼亚第四集团军和空军部队在12月12日随德军部队一道参加了曼施泰因指挥的解救斯大林格勒德军的行动，德国坦克一度进攻到离斯大林格勒只有50公里的地方。但是苏军在北方发动“小土星”战役之后，由于意大利人全面溃逃，曼施泰因面临被包围的危险，因此南边的进攻

势头也停了下来。12 月24 日，苏军集中了14.9万人和635 辆坦克的兵力，在南方发起反攻，罗第四集团军全线溃败。

从1942 年11 月9 日到1943 年1 月7 日，罗马尼亚军队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损失了158854 人以及73 架飞机。损失的人数相当于16 个师的兵力，而参加斯大林格勒的罗军部队总共才18 个师（当时罗马尼亚陆军的总兵力为31个师，也就是说在斯大林格勒损失了一半的兵力）。到1943 年2 月2 日轴心国部队最终全部投降时，在斯大林格勒城中被苏军俘虏的91000 名战俘中有3000 名罗马尼亚军人，大多属于第20 步兵师和第1 骑兵师。

一位名叫尼古拉·罗曼的年轻军官（当时是罗马尼亚第6 步兵师的一名少尉）在他1991 年出版的回忆录《父与子：九年战俘生涯》中写道："（1942 年冬天，在顿河前线的戈洛夫斯基村）我们这些军人放下武器，举手投降。盲目的愤怒情绪在当时的苏联军人当中很明显，你能感觉得出来。我们听到过不少这样的事情：有许多罗马尼亚人在投降之后还是被苏军士兵杀死。我舅舅维吉尔·图列斯库，第五炮兵团的一名少校，就是被刺刀挑死的……十几岁的苏联兵比那些二三十岁的士兵危险得多，这些半大孩子经常用冲锋枪扫射战俘，并以此取乐。

"拉斯卡将军和马扎里尼将军，以及他们的参谋军官被立即押上几辆轿车，在当天夜里渡过了顿河。三个月后我们在克拉斯诺戈尔斯克战俘营里又见到了两位将军，在舒兹达尔见到了他们的参谋中校。至于其他的军官，包括我父亲，被赶到一座农场建筑里，苏联兵没收了我们的手表、戒指、钱包、皮夹克和靴子。我父亲的怀表被夺走时，他流下了眼泪。这是我奶奶留下来的遗物，是家里的无价之宝……

"第二天，大约四千名战俘被编为一支纵队，徒步向东出发。高级军官比较幸运，他们有卡车可坐……在沿途的村子里什么也没有。苏联当局提前疏散了居民和物资，'撤到了乌拉尔以东'。我想到了那些正在向斯大林格勒推进的德国军队。在他们面前是一片白茫茫的大地，没有居民，没有粮食，没有睡觉的房屋。一无所有。只有俄罗斯恐怖的寒冬和漫长无尽的征程……

"我注意到路边的小沟里有许多土丘一样的东西，从雪下露出了军服。罗马尼亚的军装。那些伤兵和走不动的士兵沿途被苏联警卫就地枪毙了……我们来到一座车站，挪动着冻僵的双腿爬上了火车。军官、士官和士兵被彼此隔离开。出发前苏联人分给我们每四个人一条面包，500 克。八天后才得到第二条面包。12 小时开一次车门，那些还能动弹的人用自己的饭盒盛满雪，用自己的体温把它融化之后能得到200 毫升的水……我们不知道在路上一共待了多少天。等我们到达坦波夫的第一处战俘营时已经是圣尼古拉节了。我父亲给我一小枝杉树枝，对我说：'这是上帝的慈爱给你的礼物'。就是靠这么一点希望，才支撑我活了下去……"

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麾下第6 步兵师司令部的另一名军官瓦伦丁·杜米特鲁在回忆录里说，1942 年11 月25 日，他的部队在向西突围时，在卢萨科夫村解救了60 名罗马尼亚战俘。这些可怜的家伙是第14 步兵师6 团的人，他们在冰天雪地里赤着脚，衣不蔽体，已经三天没有吃饭了。在前往切尔尼谢夫斯卡亚村的路上堆满了罗马尼亚第1 装甲师士兵的尸体，坦克把他们碾得七零八落。许多尸体没有了脑袋，他们是被哥萨克骑兵的马刀砍死的。第1 装甲师丢弃的车辆和零件到处都是。第二天苏军用大炮和喀秋莎火箭炮向切尔尼谢夫斯卡亚村，第6 步兵师最终设法突围，与一个罗马尼亚摩托化步兵师建立了联系，把伤兵搬上了坦克和卡车，撤往罗第五军司令部所在地米留申斯克。这个师随后后撤到卡缅斯克，在那里重新整编、补充兵员。

普洛耶什蒂

1943 年春天，自从斯大林格勒战役惨败之后，希特勒便开始意识到他的"新秩序"有分崩离析的可能。他因为害怕盟军在巴尔干半岛登陆而心烦



罗马尼亚空军的He-112B2 战斗机



俄国前线机场上的罗马尼亚空军 Ju-88 侦察机



斯大林格勒前线机场的罗马尼亚空军IAR-80 战斗机



1942 年冬天斯大林格勒前线的罗马尼亚空军 JRS-79 轰炸机（南斯拉夫生产的意大利萨伏亚·马切蒂 SM-79）

意乱，于是决定把4月这一个月完全用来镇压那些巴尔干仆从国中已经露苗头的叛乱倾向。他离开了东普鲁士的大本营，来到奥地利萨尔茨堡附近的克莱斯海姆宫（在他每年居住于阿尔卑斯山区的贝希特斯加登时，这里是纳粹帝国用来举行国事活动的“国宾馆”）。4月2日，他接见了保加利亚沙皇鲍里斯三世，4月7日到10日接见了墨索里尼和意大利外交次长巴斯蒂亚尼尼，这两个意大利人敦促他不失时机地与苏联媾和。4月12日，安东尼斯库元帅来到了克莱斯海姆。

扬·安东尼斯库元帅这位罗马尼亚的“领袖”在1882年出生于皮特什蒂的一个中上层军人家庭，并且继承了家族传统，进入克拉约瓦骑兵军校学习（他在那里的一个同学威廉·菲尔德曼后来成为罗马尼亚犹太人社团的领袖，二战期间菲尔德曼在安东尼斯库的帮助下确实拯救了不少罗马尼亚犹太人的性命）。在镇压1907年摩尔达维亚农民起义的战斗中，年轻的安东尼斯库崭露头角，由于一头红发和喜欢从背后攻击人的习惯而获得了一个叫“红毛狗”的外号。为了表彰他对加拉茨港社会主义者起义的成功镇压，卡罗尔一世国王特地派斐迪南王储去宣读嘉奖令。安东尼斯库随后开始在罗马尼亚军队中官运亨通，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作为第1骑兵师的参谋开入多布罗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安东尼斯库由于1916年在摩尔达维亚的默勒谢什蒂战役中阻挡德军攻势而声名远扬。一战结束后，安东尼斯库于1922年出任罗马尼亚驻法武官，其间与法国商定了一笔1000万法郎的军火贷款，随后又出任驻伦敦公使馆的武官。他在1926年返回国内后继续飞速晋升，在1934年成为上将，并出任总参谋长，其间又在1937年一度出任国防大臣。

扬·安东尼斯库曾经是一个强烈的反日耳曼主义者，他在年轻时曾经激烈地反对1918年与德奥单独媾和的布加勒斯特和约。由于常驻西方，因此他从骨子里来说是一个亲英法主义者。但是他不信任苏联。共产主义和布尔什维克的思想体系与安东尼斯库自幼接受的民族主义教育是水火不相容的。而且苏联侵占了比萨拉比亚，并且进一步施压，吞并了北布科维纳。英法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可能给罗马尼亚提供任何有用的援助，而德国已经在经济上和军事上控制了中欧地区，而且为了保住普洛耶什蒂的石油和瓦拉几亚的小麦，不惜对苏联摆出强硬的姿态，防止其进一步侵犯罗马尼亚边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罗马尼亚加入盟国、或者哪怕像比利时和挪威那样恪守自己的中立地位，也都必定会遭到德国的入侵和占领。除了投入德国阵营之外，罗马尼亚要保住自己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地位，已经已经别无选择了。


扬·安东尼斯库（1882——1946）

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扬·安东尼斯库在1940年7月觐见了卡罗尔二世国王，强烈反对不进行战斗便把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割让给苏联，同时要求国王授权他组建新一届内阁。卡罗尔二世为了避免发生军事政变，下令把安东尼斯库拘禁在比斯特里察修道院。但是安东尼斯库设法委托自己和妻子的律师米哈伊·安东尼斯库与德国官员取得了联系，答应向德国出让罗马尼亚的经济利益，特别是普洛耶什蒂的油田。德国人也看重安东尼斯库的才能，认为他是一个正直而有才能的政治家。在德国公使馆的要求下，卡罗尔二世在8月解除了对安东尼斯库的软禁，指望依靠他与德国人的良好关系来维持霍亨佐伦王朝的君主独裁。然而安东尼斯库被授予全权之后不到24小时，就伙同德国公使、农民党领袖尤利乌·曼纽和自由党领袖康斯坦丁·布勒蒂亚努等人逼迫卡罗尔二世退位，安东尼斯库随后攫取了完全的独裁权力。

此后他一方面由于通过德国人获得了权力而对希特勒感恩戴德，另一方面又通过消灭罪恶的“铁卫军”，使得自己作为一种保护力量置身于人民和真正的纳粹式暴徒之间。虽然有民间反犹暴徒自发发起的多起屠犹事件，


奥地利萨尔茨堡附近的克莱斯海姆宫，如今是一座豪华赌场


1941年6月对苏战争爆发前去贝希特斯加登拜访希特勒的安东尼斯库元帅

但是罗马尼亚用来关押犹太人的那些集中营并不像其他被占领国家那样最终变成死亡营。罗马尼亚的报纸也不许刊载纳粹式的反犹命令，罗马尼亚犹太人的最终死亡率只有大多数其他被占领国家的一半。

罗马尼亚部队在对苏战争中遭到巨大的损失，并不是因为这些人的战斗意志薄弱，而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装备没有德国人的精良，补给又往往被优先配置给德国部队。罗马尼亚士兵在南俄大草原上倍尝艰辛痛苦，克里米亚战役、高加索战役、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及俄国游击队的袭击，都使得他们受到很大损失。由于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当中的损失如此惨重、如此可怕，以至于连自“巴巴罗萨”战役开始以来一直积极追随希特勒的扬·安东尼斯库本人都无法再劝说自己的军队将领们积极参加对苏联的这场战争了。

在1943年春天，罗马尼亚政府和政党领袖们背着安东尼斯库本人，在瑞士、瑞典、葡萄牙和土耳其等中立国设法再度与西方接触，力求以归还特兰西尼斯特里亚为代价，保住1941年从苏联那里收复的领土，并退出对苏战争。但是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在当年3月明确地表达了英国对罗马尼亚的立场，即没有苏联的完全同意，西方盟国就不会有任何单方面的对罗和约。

对于罗马尼亚针对西方的的这些和平试探活动，希特勒已经从安卡拉、伯尔尼、里斯本和马德里的德国情报机关那里掌握了相当详尽的情报，因此于1943年4月在克莱斯海姆宫狠狠地斥责了安东尼斯库。但后者一方面对自己部长们的阴谋诡计一点也不知情，另一方面依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即轴心国应当同西方媾和，全力对付苏联。这和意大利人几天前提出的建议正好相反，这也许是由于罗马尼亚与苏联接壤、而意大利却与法国接壤的缘故吧。希特勒还对曼纽等罗马尼亚政治领导人几乎是按月寄给安东尼斯库的那些抗议信也了如指掌。在会谈中，他特别谴责安东尼斯库容许这些政治家自由地批评其政策的做法。希特勒咆哮着说：“我把我的政敌们都宰了。”安东尼斯库的元帅的回答简单明了：“我没有。”


1942年的布加勒斯特，胜利大街


三十年代钻井与储油罐林立的普拉霍瓦河谷。图中为戈尔拉·奥克切内伊油田

普洛耶什蒂近郊的罗马尼亚－亚美利加石油公司储油设施群



在罗马尼亚军队为了那些同罗马尼亚民族毫不相干的事业在斯大林格勒、顿河流域和克里米亚半岛流血死亡时，罗马尼亚自己却变成了德国夺取石油、粮食和各种原料的大仓库。虽然粮食危机笼罩着罗马尼亚，但安东尼斯库政府还是尽力从国内榨取农产品运往德国，而德国付给罗马尼亚的农产品价格只有国际市场价格的三分之一。但即使在这种掠夺性的贸易条件下，德国向罗马尼亚的出口总值还是不能抵偿从罗马尼亚进口的货物总值。因此，到1944年8月时，德国欠罗马尼亚的债务达到了940亿列伊。此外罗马尼亚还花费了670亿列伊来供养德国军事使团和驻扎在罗马尼亚领土上的德国军队。战争和德国的经济掠夺完全破坏了罗马尼亚的国家经济，工业部门严重缺乏原料和劳动力，交通运输业处于完全混乱的状态，农业情况也由于农民被拉去当兵而失去了必要的劳动力，马匹和大牲畜也严重不足。

在1942年夏天，布加勒斯特的食品配给量为每人每天750克黑面包（重体力劳动者为1500克）、1600克玉米面、250克猪肉或牛肉、350克黄油或植物油，以及150克甜菜糖。牛奶及乳制品、蔬菜、蛋类、禽类、羊肉和小牛肉没有列入配给品名单，但是市民只有在黑市上才能买到这些东西。不过，1942年秋天的大丰收令罗马尼亚的食品状况有所改善，市场上出现了白面包和鸡蛋这样的食品。因此尽管当年冬天罗马尼亚军队在斯大林格勒遭到了可怕的下场，但在罗马尼亚本土，人们仍然过着相对无忧无虑的生活，认为他们的国家没有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

但与此同时，战争，可怕的战争，也终于以从天而降的方式降临到罗马尼亚的本土上来——从1943年夏天起，美国陆军航空队的B－24战略轰炸机开始对罗马尼亚的油田、铁路枢纽和其他战略目标展开大规模轰炸，其首次轰炸行动的代号是“浪潮”（Operation Tidal Wave），轰炸的主要目标定为普洛耶什蒂（Ploesti）。

普洛耶什蒂位于布加勒斯特以北56公里的普拉霍瓦县。1856年，即统一的罗马尼亚王国出现之前，在普拉霍瓦河谷里就发现了第一口油井。当时采用原始的方法采油，即挖一口井，然后把一个坐在吊篮里的人放下去，让他用

铁锹继续挖，一直挖到井底出现石油时为止，然后像打水一样用吊桶把石油运出来。这种采油方法非常危险，许多工人因为被有毒的石油蒸汽熏而致残失明。

在二十世纪初，来自美国、法国和德国的投资纷纷涌入罗马尼亚的石油工业。到一战前夕，来自德国的资本战胜了美国的标准石油公司，利用普洛耶什蒂的石油提炼煤油和其他化工产品。在当时罗马尼亚石油工业部门1.7亿金列伊的总投资额中，有1.25亿是德国人的。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后，按照1920年4月协约国签署的圣雷莫协议，普洛耶什蒂油田中的德国资本被转让给协约国的石油垄断巨头们，比如英荷壳牌石油公司的子公司“阿斯特拉罗马尼亚”石油公司（Astra Romana），英国凤凰石油公司的子公司“罗马尼亚之星”（Steaua Romana），比利时石油公司的子公司“协和”（Concordia），以及美国标准石油公司的子公司“罗马尼亚－亚美利加”（Romana Americana）等等。这些石油巨头们沿着普拉霍瓦河谷建起了“伊莱克特拉”、“杰尼亚”、“特列阿扬努尔”等炼油厂和储油设施。

1940年德国根据与罗马尼亚签订的新经济协定重新控制了普洛耶什蒂油田。根据罗马尼亚的官方统计，1941年运往德国的石油及石油产品是270万吨，1942年是210万吨，1943年是250万吨，即德国石油来源总量的35%。此外，普洛耶什蒂还向意大利提供了其所需的几乎全部石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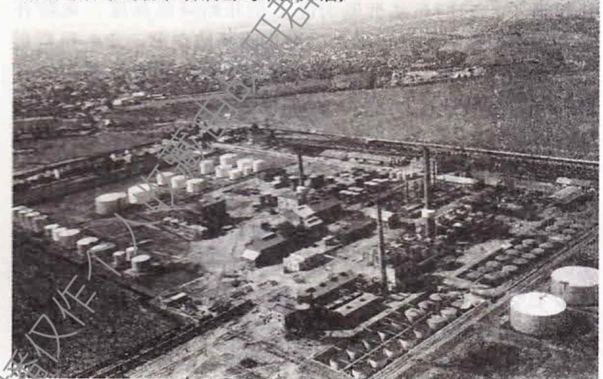
盟国对普洛耶什蒂的第一次空袭是在1942年。这年5月，25架B－24轰炸机从佛罗里达出发飞往中缅印战区，途中在苏丹的喀土穆机场停留加油。这时美国陆军航空兵司令阿诺德上将向这支轰炸机编队的领队发去电报，通知他们美国将在6月5日对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宣战，宣战之后这些B－24将去轰炸普洛耶什蒂的油田。6月11日夜间，美陆航389轰炸机大队的13架B－24从埃及的法耶德空军基地起飞。这是美军对欧洲大陆的第一次空袭。一架飞机在起飞后不久由于燃油泵冻住而返回埃及，另外12架飞机穿越希腊和保加利亚领空，从1000米高度上向被认为是“阿斯特拉罗马尼亚”炼油厂的区域投下了12吨炸弹，然后安全返航。不过，由于航程太远，其中6架飞机飞往伊拉克降落，两架降落在叙利亚，还有四架在中立国土耳其迫降，随后被扣留。

这次对普洛耶什蒂油田的空袭造成的损失不大，却使得德国人迅速认识到了保卫普洛耶什蒂油田的重要性，于是迅速加强了油田周围的防空力量。德国人在普洛耶什蒂及其周围地区布置了严密的高炮阵地（包括280门高炮）和

普洛耶什蒂的阿斯特拉－罗马尼亚炼油厂



普洛耶什蒂的协和石油公司维加炼油厂



普洛耶什蒂附近的高射炮阵地



早期警报系统，部署了250架防空战斗机和75000人的部队，此外还建立起一支500人的油田消防队。

1943年盟国在打赢了阿拉曼战役和中途岛战役、进入全线反攻阶段之后，再次讨论了轰炸普洛耶什蒂油田的问题。第九航空队司令尤扎尔·恩特准将（Uzal Girard Ent）为制订空袭计划花了将近一年的准备时间。美国陆军航空队的雅各布·斯马特上校（Jacob Smart）按照利比亚－埃及战役时获得的作战经验提出了攻击方案，包括以下几个要点：一、为了达到突袭的目的，事先不对空袭目标进行侦查；二、采用昼间超低空接近的方式实行轰炸；三、用飞机上的火力摧毁敌军防空阵地。美国第九航空队（第98和376轰炸机大队）担任主要的空袭力量，第八航空队（第44、93、389轰炸机大队）提供补充兵力。为了训练飞行员的低空飞行技术，在利比亚班加西附近的沙漠中搭建了普洛耶什蒂炼油厂的模型，还更换了从美国运来的防风沙发动机。

在普洛耶什蒂有五个轰炸目标，分别是罗马尼亚－亚美利加公司的炼油厂和油库（目标代号为白Ⅰ）、协和石油公司“维加”炼油厂（白Ⅱ）、标准石油公司“希望”炼油厂（白Ⅲ）、阿斯特拉罗马尼亚公司“猎户座”炼油厂（白Ⅳ）、哥伦比亚－阿奎拉炼油厂（白Ⅴ）；除此之外，坎皮纳镇的罗马尼亚之星公司（目标代号“红”）和布拉齐镇的矿业石油公司（目标代号“蓝”）也被列为轰炸目标。空袭日期定为1943年8月1日，参加空袭的有178架B－24轰炸机，机组成员1751人（包括随行的尤扎尔·恩特准将）。空袭的航线是从班加西出发，北上掠过地中海，经过科孚岛进入阿尔巴尼亚，然后再飞越保加利亚的山区。为了避开布

置在普洛耶什蒂西南方的德军高炮阵地，计划在飞过多瑙河平原之后继续向北飞行，越过特兰西瓦尼亚阿尔卑斯山脉，然后在特兰西瓦尼亚上空调头，然后从北向南并列地从西北方向朝普洛耶什蒂进攻。

8月1日清晨，178架B－24“解放者”轰炸机编为五个编队，依次从班加西的贝尼纳空军基地起飞。由于风沙肆虐的缘故，一些飞机的发动机出现了故障。一架“解放者”在起飞时坠毁，另一架着起火来。这是一个不祥的开始。在机群起飞后几分钟内，就有11架“解放者”由于机械故障而返航。接着，载有一名高级领航员的飞机坠入了亚得里亚海，这架飞机是由40架轰炸机组成的一个空袭机群的领航机，它的失事引起了许多混乱。

中午时分，机群飞到阿尔巴尼亚上空，在这里遇到了阴云，使得飞行更加困难，机群的队形在这里开始变得混乱起来了。它们在品都斯山区上空开始降低高度，此时在雅典的德军监听站已经破译出班加西基地在B－24机群起飞后发出的电报，并且通知了巴尔干地区的有关国家。在份机群飞临索菲亚上空时，保加利亚王家空军出动了16架Me－109战斗机迎战，但是由于保加利亚飞行员没有携带氧气，所以只好眼巴巴地望着那些B－24飞机从他们头顶上飞了过去。

当地时间11点30分，机群离目标只有20分钟的航程了。在前面领航的第九航空队的两个大队这时应该在皮特什蒂上空向西做第一次转弯，随后向特兰西瓦尼亚阿尔卑斯山飞去。然而由于首席领航员坠机，它们迷失了方向，在多瑙河上空盘旋了一会儿。从这时起，这些机群下降到几乎贴近地面的高度，离地面只有30英尺（10米），刚好从瓦拉几亚村庄教堂的屋顶上掠过。一些被飞机发动机巨大轰鸣声驱散了的罗马尼亚农民愤怒地把干草叉投向那些飞机。这些“解放者”飞得如此之低，以致于一些飞机返回基地时，机械师在机身底部的各种缝隙里发现了许多玉米梗和树枝。

迷路的机群在皮特什蒂上空转而向东，飞往特尔戈维什泰城，随后向东南专项，沿着铁路飞往普洛耶什蒂。由于事前已经分发了地图和沿途照片，因此没人有理由不知道他的目标，至少应该对自己要去的地方有个大致的轮廓。然而长时间的飞行、加上坠机事件和机械失误，已经使得

在普洛耶什蒂上空低空飞行的美军B－24“解放者”轰炸机



机群的驾驶员们精疲力竭，现在的混乱更让随机同行的恩特准将分不清南北。

当机群飞到特尔戈维什泰上空时，他们遇到了一条向南延伸的铁路，恩特和同机的第376轰炸机大队长基恩·康普顿上校判定这就是通往普洛耶什蒂的铁路线。但是两人乘坐的那架飞机的领航员哈罗德·维克隆德上尉认为这是错误的方向，将引导机群离开普洛耶什蒂。在这场辩论中，最后还是军衔而非理智获胜了：两名高级军官命令向南飞，后面跟着第九航空队的所有飞机，以及第八航空队389大队和93大队的60架“解放者”——另外三个大队的其余飞机意识到领队机飞错了方向，于是径直按照原定的路线向北飞去。

当B－24机群在布加勒斯特的城堡和教堂尖塔上空飞过时，恩特准将终于有了某种感觉，他犯了个错误，或许他应该听那个带着地图的小伙子的话。他下令打破了无线电静默，通知所有的飞机调头飞回普洛耶什蒂，从南边接近炼油厂。利比亚沙漠里长达数周的飞行训练这时全都浪费掉了，因为这些B－24是在向着普洛耶什蒂南方那可怕的德国防空火力网飞去。这时德军拉响了空袭警报。接着米切尔基地的第4战斗机联队出动了52架Me109和17架Me110战斗机，罗马尼亚空军的IAR—80战斗机也参加了迎击。



一架B－24飞越浓烟滚滚的“猎户座”炼油厂

中午12时，机群飞抵普洛耶什蒂上空。猛烈的高射炮火击落了一架又一架B－24，空中的混乱情况加剧了。第376大队原定的轰炸目标——“罗马

尼亚－亚美利加”炼油厂周围的防空火炮极其猛烈，因此康普顿的那架轰炸机在“维加”炼油厂上空扔下了炸弹，随即撤离战场。第376大队的其余飞机在普洛耶什蒂上空盘旋，试图找出正确的接近路线，第93大队的飞机在远离炼油设施的地方随意地扔下炸弹。此时恩特意识到整个空袭行动已经处于混乱之中，于是用无线电通知其他的飞机自行选择目标。

现在，有两组“解放者”，前后相差20分钟的飞行距离，分别从北方和南方轰炸普洛耶什蒂。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也是个幸运的错误，因为德国空军的Me－109和罗马尼亚空军的IAR－80战斗机机群正在普洛耶什蒂北方6000英尺的高度盘旋，准备迎击从特兰西瓦尼亚方向飞来的敌机。当恩特和康普顿所在的第一波机群从南方飞来时，在高空盘旋的52架Me109战斗机没有发现目标，就用报话机问指挥所：“战场在哪儿？”但没有得到回答，这时普洛耶什蒂城的一角已冒起了大火和黑烟。

康普顿上校的机群只遇到了罗马尼亚空军IAR—80战斗机的攻击，在空战中仅仅损失了1名机枪射手。等到德国战斗机飞到普洛耶什蒂南方上空时，按照正确的地图航向飞行的第二波轰炸机又从北方飞来了。

后三个机群飞到普洛耶什蒂上空时，发现整个地区已经被滚滚黑烟所笼罩。它们的第一个目标——“维加”炼油厂已经被炸毁，于是第98轰炸机大队长约翰·凯恩带着机群轰炸了“阿斯特拉罗马尼亚”和“哥伦比亚－阿奎拉”炼油厂。这些飞机以600公里的相对时速同康普顿的机群迎面而飞，许多飞机为了避免同对方迎头相撞而采取紧急规避动作，勉强逃脱了撞毁的命运，但是这样一来空中的形势就更乱了。第98和第44大队的许多飞机由于采取规避动作而错过了原定的轰炸目标，只好把炸弹扔到大火里，而远方仍有许多巨大的储油罐毫发无损。

第44轰炸机大队的21架“解放者”轰炸了普洛耶什蒂南方坎皮纳镇上的罗马尼亚之星炼油厂。考虑到防空火力都集中在普洛耶什蒂方向，这看上去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任务。但是由于奉命采取低空进场的战术，实际上操作起来是很困难的。笨重的“解放者”不得不沿着山谷向下飞行，一些部署在山坡上的德国高射机枪阵地甚至要向下开枪。

美国陆军航空队在“浪潮”行动中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在出发的178架飞机中，只有88架平安返回利比亚的基地，其中55架不同程度地被打伤，地勤人员在一架勉强飞回基地的B－24上发现了365个弹孔。有44架B－24被罗马尼亚、德国和保加利亚的飞行员击落，16架因为故障返航或坠海，还有一些“解放者”在英属塞浦路斯或土耳其迫降。在这次空袭行动中总共有440名机组成员阵亡，220人被俘或失踪，78人被土耳其拘留。有五名飞行员在这次空袭后被授予国会荣誉勋章（其中三人是被追授的），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整个空袭行动的惨烈。另一方面，尽管这次空袭使得普洛耶什蒂的石油生产能力一下子下降了40%，但是好些炼油厂在空袭中毫发无损，而且许多受损的炼油厂在几个星期之后就被修复了，修复后的石油生产能力甚至高于空袭之前。


轰炸之后的哥伦比亚－阿奎拉炼油厂


冒出滚滚浓烟的维加炼油厂


1944年美机轰炸布加勒斯特北站调车场的情景

“浪潮”行动是二战期间盟军对罗马尼亚规模最大的一次空袭，但不是最后的一次。到1944年初，从意大利南部起飞的B－24开始轰炸布加勒斯特和其他城市的铁路调车场、炼油厂和其他重要目标。4月4日，28架B－24炸毁了布加勒斯特北站的调度场，罗马尼亚首都城区的西部和

西北部有500多座房屋被炸毁，5000多人在空袭中丧生。这次空袭中还有许多炸弹落到了布加勒斯特最繁华的胜利大街上，炸毁了德国军事代表团驻地——豪华的“雅典娜宫”饭店、圣约瑟夫大教堂和布加勒斯特植物园的一些温室。这座林荫繁茂的“巴尔干的小巴黎”自1940年11月11日布加勒斯特－普洛耶什蒂地震后再度遭受了严重损失。

美方在这次空袭中损失了7架飞机，另有13架受伤。第二天，美国第十五航空队的230架B－24轰炸了普洛耶什蒂。4月15日，英国皇家空军的P－61“黑寡妇”夜间战斗机对布加勒斯特发动夜间空袭，扔下若干枚燃烧弹，烧毁了布加勒斯特大学的一栋教学楼。

1944年5月5日、31日，诺曼底登陆当天的6月6日和登陆之后的10日、15日、23日、24日、28日，以及7月9日、15日、31日，美国陆军航空队的B－24轰炸机在P－51和P－38战斗机的护航下反复轰炸了布加勒斯特、普洛耶什蒂、久尔久等城市，炸毁了布加勒斯特南站及其近郊的“普拉霍瓦”炼油厂和“泰坦”炼油厂，布拉索夫的IAR飞机工厂，克拉约瓦的铁路调度场和机车工厂，并且再度将普洛耶什蒂的“维加”、“罗马尼亚之星”和“罗马尼亚－亚美利加”等炼油厂的储油罐等关键设施炸毁。根据情报部门估算，这些空袭从德国人那里阻拦了180万吨的石油供应。当年9月苏联军队开进普洛耶什蒂时，报告说那里所有的炼油厂都闲置起来了，变成了废墟。

在1943年整整一年里，罗马尼亚空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和克里米亚战役中损失了大量战斗机、侦察机和运输机。罗马尼亚空军在1944年春天编为五个战斗机大队，包括驻扎在金巴夫－布拉索夫机场的第3大队（第44和50中队，装备IAR－80B和IAR－81A战斗机），驻扎在波佩什蒂－列奥德尼机场的第6大队（第61和62中队，装备IAR－81C战斗机），驻扎在彼佩拉空军基地、负责保卫普洛耶什蒂油田的第7大队（第56、57、58中队，也装备IAR－81C），以及负责保卫多瑙河下游和黑海沿岸的第4、第5大队。当年5月，原先的第49战斗机中队的人员从克里米亚半岛撤回之后，用修复的一些IAR－81战斗机重新组成了第67中队（原来的飞机全都丢在了克里米亚），随后编为第2战斗机大队，用于保卫布加勒斯特。

罗马尼亚空军的Bf－109G6战斗机。这架飞机是1944年8月罗马尼亚转换阵营时由一位贵族出身的罗马尼亚飞行员驾驶，飞往南斯拉夫的维斯岛向盟军投降的，为了避免被击落，出发前在机身上画上了美国国旗的图案





一架空袭罗马尼亚时被击中、迫降时翻倒的B－24轰炸机



罗马尼亚海军的意制袖珍潜艇（本图、下图）。战争期间意大利一共向罗马尼亚提供了5艘这样的潜艇，但是几乎没有参加任何作战行动



第1、5、6、7大队，以及第1夜间战斗机中队（装备Bf－109G战斗机）都参加了1944年上半年保卫罗马尼亚的空战，其中一些大队还试图拦截对德国进行“穿梭轰炸”之后飞往苏联降落加油的美国B－17轰炸机，但是没有取得战果。由于罗马尼亚生产的IAR－80和IAR－81战斗机远劣于美国的P－38和P－51战斗机，因此罗马尼亚空军在1944年春天曾计划用本国生产的Bf－109G战斗机替换，但是由于美国空军对罗马尼亚飞机生产设施的轰炸，在当年8月罗马尼亚向盟国投降前一共只生产了6架Bf－109。

B－24“解放者”对罗马尼亚的最后一次空袭是在1944年8月18日，第十五航空队第461大队的B－24再次轰炸了普洛耶什蒂的“罗马尼亚－亚美利加”炼油厂，这也是美军在二战期间对普洛耶什蒂的第七次轰炸，也是最成功的一次：飞到目标上空的19架轰炸机在100英尺（30米）的高度上投下了146枚五百磅重的RDX炸弹，其中45.6%命中目标，有4枚炸弹接连炸中中央储油罐，熊熊燃烧的石油冒起的浓烟高达五公里，这座炼油厂的分馏厂、锅炉动力厂和行政大楼也被炸毁。只有一架B－24被击落，另有13架不同程度地被地面炮火击伤，但是都成功返回了意大利南部切里尼奥拉的基地。

在1944年4月4日到8月18日这为时四个半月的空袭里，美国空军损失了223架轰炸机和36架战斗机，德国和

罗马尼亚损失了225架飞机，其中罗马尼亚损失了80架。8月23日和24日，布加勒斯特又有连续两个晚上遭到空袭，国家大剧院、王宫、维多利亚宫、罗马尼亚国立音乐厅和其他一些建筑被炸毁。空袭布加勒斯特的这些飞机是从位于这座城市北方15公里的奥波特尼机场起飞的，机身上涂着黑色的铁十字——这是德国人对罗马尼亚在8月23日逃离轴心国战船所作出的报复。

弃船

早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前，德国那些巴尔干仆从国们的贰心便由来已久，拿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来说，至少从美国卷入战争时就有了这样的念头。1943年4月的克莱斯海姆会议结束之后，这些国家“跳船逃生”的念头不但没有收敛，反而越来越严重。罗马尼亚人一般对德国并无好感，特别是对纳粹分子尤其是如此。这一方面是由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德国残酷占领的记忆，另一方面，从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罗马尼亚人就普遍而公然地对德国抱有敌对状态。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德军在从斯大林格勒和顿河流域撤退时，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残暴地从罗军部队（当然也包括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那里夺取燃料、运输工具、食物和弹药，并且毫不犹豫地杀死那些敢于抗拒的人。这些消息传回罗马尼亚国内之后，引起了罗马尼亚军队和人民对德国的普遍愤怒，针对德国和安东尼斯库的示威、罢工、怠工、破坏活动和地下出版活动急剧扩大。

罗马尼亚的内部抵抗运动不分阶级，不分信仰，把所有的罗马尼亚爱国者团结在一起，在兵工厂、冶金厂、造船厂、机车厂和铁路沿线频繁地展开破坏活动。早在1941年11月初，德国人就已经尖锐地意识到，破坏活动使得普洛耶什蒂的油田和炼油厂的产量减少了15%到20%。在生产坦克和火炮的马拉克萨兵工厂，以及生产飞机的IAR公司里，工人发明了一种技术性的破坏方法，他们使出厂的产品都带有一些小毛病，这些小毛病不久就会使得武器完全不能使用。1942年6月12日，特尔戈维什泰兵工厂发生大火；1943年初马拉克萨兵工厂的仓库也发生大火，损失了7万发炮弹。罗马尼亚农民把牲畜和谷物隐藏起来，以免被德国人强制征收。他们还收容和协助武装游击队、破坏分子，以及从德国和罗马尼亚战俘营里逃脱的盟军飞行员及苏军战俘。

1943年6月，由罗马尼亚共产党、“爱国者联盟”、“农民阵线”（这是1933年在特兰西瓦尼亚南部组织起来的左翼农民运动）、“匈牙利族劳动人民民主联盟”、社会民主党的某些基层组织组成的“反希特勒爱国阵线”在罗马尼亚成立。农民阵线的彼得·格罗查博士（Petru Groza）担任阵线的主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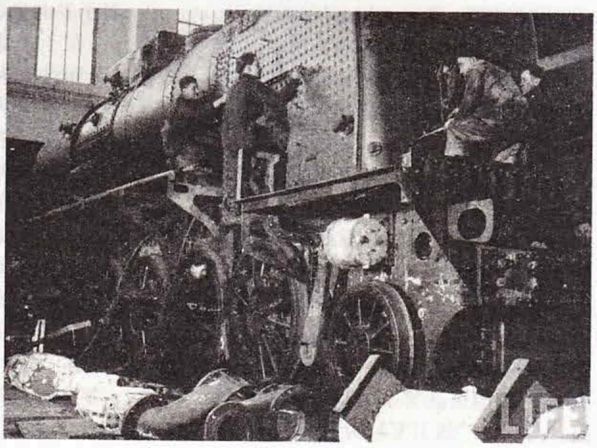
彼得·格罗查（1884–1958），出生于特兰西瓦尼亚的财主家庭，一战前是律师，战后成为罗马尼亚国家农民党成员，1933年在特兰西瓦尼亚组建左翼的“农民阵线”，被称为“红色布尔乔亚”。1945–1952任罗马尼亚总理和部长会议主席，1952–1958任大国民议会主席（国家元首）

对于罗马尼亚共产党（Partidul Comunist Roman）来说，这个联合阵线是它第一次正式登上罗马尼亚的政治舞台。在这以前它在罗马尼亚一直受到压制。原来，罗共在1921年成立之后奉共产国际的指示，号召“受到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希腊等帝国主义小国压迫的民族”搞独立。按照当时共产国际的决议，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应当归附于苏联，特兰西瓦尼亚和多布罗加地区则应该争取独立，从罗马尼亚分离出去。那些闭门造车的外国委员们怎么能相信罗马尼亚的工人和农民会接受这样一个与其民族感情相悖的计划呢？当时几乎所有的罗马尼亚政治力量都一致捍卫“大罗马尼亚”，在1917年到1918年间，成千上万的罗马尼亚无产阶级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英勇献身。正是因为无条件地执行共产国际的这个决定，罗马尼亚共产党在1924年被罗马尼亚政府宣布为非法政党，其党员在1923年到1937年间也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只有300人到1600人左右。

到1931年，在罗马尼亚问题上，共产国际总算开了窍，放弃了原先的政策，但是并没有放弃其民族问题的总的原则。罗马尼亚共产党员发现自己要接受共产国际指派的波兰共产党成员亚历山大·斯特凡斯基作为自己的总书记，而且其他大多数（约占78%）



布加勒斯特马拉克萨机车厂的工人正在制造电力机车和蒸汽机车（本图、右图）





安娜·波克（1893–1960），原名汉娜·拉宾森，出身正统犹太人家庭，1915 年参加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翌年参与组建布尔什维克派的罗马尼亚社会党（1921 年更名为罗马尼亚共产党）。二战后一度是罗共的非正式领袖，但在斯大林发动的反犹太运动中失宠下台



埃米尔·波德纳拉希（1904–1976），出生于奥匈帝国布科维纳省，是德国和乌克兰混血儿。他是二战后在幕后控制着罗马尼亚的实权人物之一

罗马尼亚共产党员也是外国血统，主要是一些马扎尔族和犹太族的知识分子，比如安娜·波克（Ana Pauker）。她是一个出生在摩尔达维亚的犹太女人，长相漂亮，但是知识浅薄，曾经和卡罗尔国王的情妇玛格达·卢佩斯库夫人是密友。1938 年，她丈夫马塞尔·波克和当时在苏联的罗马尼亚共产党干部一样，在大清洗中被处决，而安娜当时正被关在“罗马尼亚君主法西斯”的监狱里，得以幸免一死。

1941 年 5 月，安娜·波克被罗马尼亚当局移交给苏联，用来交换苏军入侵比萨拉比亚后被 N K V D 逮捕的政治家扬·科德里亚努——这是位老政治家，与那位“铁卫军”的创始人没有亲戚关系。他曾在 1918 年作为“摩尔达维亚人民共和国”的议会代表主持投票，将比萨拉比亚加入罗马尼亚。

另一位罗共成员埃米尔·波德纳拉希（Emil Bodnaras）的经历也很奇特。他的父亲是乌克兰人，母亲是日耳曼人。他本人曾经在雅西大学学习法律，毕业后进入蒂米什瓦拉的炮兵军官学校进修，随后成为罗马尼亚王家陆军的一名炮兵军官。他由于与一名王族成员发生冲突而葬送了在军队中的前程，被送往比萨拉比亚担任边防军军官。他在比萨拉比亚接触到了共产主义思想，于 1932 年越境逃往苏联，被红军情报部门格鲁乌招募成为特工。1935 年，波德纳拉希返回罗马尼亚为苏联红军刺探军事情报，但是在火车上被以前的一名军校同学认出来，随即被捕。他被判处 10 年监禁，关入多夫塔纳监狱，在那里同乔治乌－德治相识。1940 年，波德纳拉希在监狱中加入了罗马尼亚共产党，1942 年 11 月被释放，随后再度逃往苏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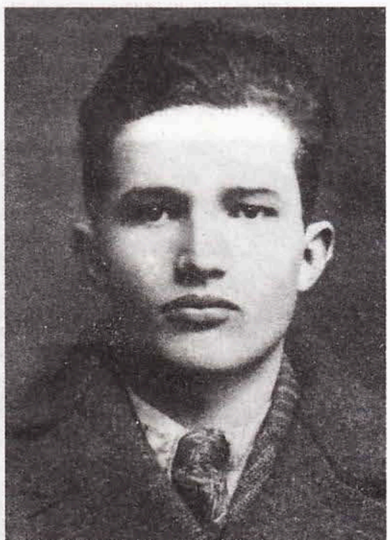
在三十年代，罗共逐渐分化为“强硬派”和“温和派”。“强硬派”完全按照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方针行事，而“温和派”反对那些他们认为有损于罗马尼亚利益的政策。“强硬派”发动罢工，制造布加勒斯特国会爆炸案，最终为了自己的安全逃亡苏联继续活动。

1937 年到 1938 年，斯大林对流亡苏联的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发动了大清洗，在这场浩劫中遇难的罗共领导人包括党的创始人亚历山德鲁·多布罗杰亚努、大卫·法比安、叶卡捷琳娜·阿波雷、伊姆雷·阿拉达、艾琳娜·菲利佩斯库、德米特里·格罗夫、扬·迪切斯库、尤金·罗兹万、前党的总书记亚历山大·斯特凡斯基、提摩泰·马林、埃莱科·科布罗斯等等。

对于罗共来说，苏联大清洗的最重要意义在于，党的领导阶层当中的马扎尔人和犹太人成分从此基本上被消灭殆尽。罗共从此变成一个主要由罗马尼亚族党员担任领导人的政党。当时罗共在组织关系上分为三派，即由流亡苏联、且在大清洗中幸存的几个罗马尼亚共产党人组成的“莫斯科派”；被关在多夫塔纳监狱和特尔古日乌集中营的党员形成的“监狱派”；以及在战争中仍保持自由的三名领导人——斯特凡·福里希（当时担任党的总书记）、罗慕斯·科夫勒和卢克雷蒂乌·帕特拉什卡努（Lucretiu Patrascanu）。由于罗共的党员不是在国外就是在监狱中，因此这三个人的权力不断地被“莫斯科派”和“监狱”派架空。“监狱派”以乔治·乔治乌－德治（Gheorghe Gheorghiu–Dej）为首，他是一位来自摩尔达维亚南部的工人，有一副可爱的长相，身材魁梧粗壮，高高的额头，厚厚的嘴唇。

乔治乌－德治在监狱中有一名虔诚的追随者，他身材单薄，有一双忧郁而明亮的眼睛，棕色的头发浓密而卷曲。这个年轻人 1918 年 1 月出生于德奥军队占领下的奥尔特河谷斯科尼切斯蒂村，名字叫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像同时代的许多同龄人一样，他只接受了几年小学教育，在 13 岁时就去布加勒斯特找工作了。这座拥有 30 万人口的熙熙攘攘的城市里，贫富分化一目了然。一方面是几条笔直的林荫道，两旁耸立着十九世纪风格华丽的巴洛克式宏伟建筑和私人府第，胜利大街的国家剧院上演着使齐奥塞斯库生厌的资产阶级法语戏剧，旁边的王宫里住着有外国血统的国王一家；另一方面，在色彩暗淡的市郊有无数拥挤肮脏的贫民窟和成片的简屋陋室，两旁拥挤着犹太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吉普赛人开设的破败的小铺子，蓬头垢面、衣着不整的孩子们在肮脏的泥土地上奔跑喧嚣。

像三十年前在维也纳街头踯躅的那位林茨年轻艺术家一样，年轻的齐奥塞斯库也对布加勒斯特这座光怪陆离而又矫揉造作的巴尔干都会感到极度反感（并且在掌权后对其传统风貌进行了大幅度破坏）。他痛恨那些靠石



年轻时的尼古拉·齐奥塞斯库

油和军火发了大财的工业巨头、痛恨那些无足轻重但口袋里有点钱的军官阶级，还有裹着剪裁得体的毛皮大衣的贵夫人。这些人在胜利大街的“内斯特”甜食店品尝土耳其咖啡，尝几口东方式的甜点或在维也纳和布达佩斯才能找到的那种烤土豆饼，或者在军事科学院附近的“卡普萨”餐馆就着苏打水吃鲟鱼、喝白葡萄酒……齐奥塞斯库对布加勒斯特这种懒散、嘈杂、附庸风雅、盲目追求西方生活方式的风气十分厌恶，对狂妄自大、不可一世的罗马尼亚富人阶级的奢侈、豪华生活怒火中烧。在这种强烈的刺激下，他在1932 年参加了罗马尼亚共产党组织的工人活动，翌年就因为参与罢工工人的街头斗殴而被逮捕了。

1936 年，由于被密探出卖，担任普拉霍瓦河谷地区的共青团书记的齐奥塞斯库再度被捕，判处两年徒刑，关入多夫塔纳监狱，1938 年释放。1940 年，齐奥塞斯库再度被捕，关入特尔古日乌集中营，再度与乔治乌－ 德治关在同一间牢房里。这一年对于罗马尼亚共产党人来说是暗淡的，主要原因是苏联强迫罗马尼亚割让了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乔治乌－ 德治对他的年轻弟子解释说，这首先要怪西方人。难道不是他们在1938 年的慕尼黑会议上对希特勒卑躬屈膝，才导致当前这场灾难的吗？斯大林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必须相信他。必须拯救社会主义的故乡，使苏联免受希特勒德国的侵略。

齐奥塞斯库勉强理解了乔治乌－ 德治对领土割让一事的解释，但理解并不意味着接受。直到晚年，他还时不时地发牢骚说“在（1940 年）关系到命运的困难时刻里，罗马尼亚人民是孤立的，没有任何外国援助，被欧洲的大国们抛弃了”。除此之外，在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斯大林与希特勒进入“蜜月”时期之后，许多罗马尼亚共产党员却仍然对纳粹德国抱有敌视态度，共产国际对此横加指责，这也加深了齐奥塞斯库对莫斯科、对外来干涉的怒气。另一方面，在1941 年初的铁卫军政变时，“资产阶级君主法西斯政权”的狱卒们奋不顾身地抵抗铁卫军对特尔古日乌集中营的武装进攻（这些铁卫军分子试图冲入集中营，杀光里面的共产党囚犯），并将这伙暴徒击退，成功地保护了乔治乌－ 德治和齐奥塞斯库等人的安全，这使得年轻的齐奥塞斯库对扬·安东尼斯库政权产生了一丝复杂的好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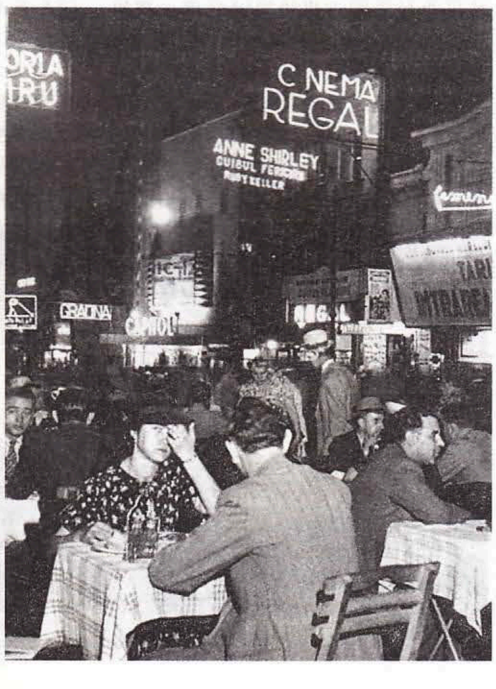
1943 年春天，罗马尼亚国家农民党领袖尤利乌·曼纽通知英国，他和其他罗马尼亚政治家准备发动一次由萨纳特斯库将军领导的军事政变，推翻安东尼斯库元帅。同年8 月，英国特种行动执行局（SOE）驻开罗的机构派遣一个工作组在被占领的南斯拉夫领土上空降，随后越界进入罗马尼亚。领导这个小组的大卫·拉塞尔少校不久被罗马尼亚边防军巡逻队杀害，他的无线电报务员死里逃生，继续向开罗发报要求增援。开罗的SOE 机关根据他的要求，在1943 年圣诞节前又派遣特供人员加尔德尼·德·夏特兰和艾弗·波特在罗马尼亚伞降，几天后拉塞尔的报务员向开罗报告说，这两名特工也被捕获，关进了布加勒斯特的军事监狱。伦敦这才知道曼纽在搞政变方面是个不可靠的门外汉，他所说的“军事政变”也许根本就不存在。

然而曼纽仍然没有放弃同西方单方面媾和的努力，甚至安东尼斯库本人也被德国人在7 月份提出的专横无理的要求所激怒：德国要求罗马尼亚提供180 亿列伊的款子，作为在摩尔达维亚构筑德军飞机场和进一步开发普洛耶什蒂油田的头子。安东尼斯库认为这个要求会削弱他本人在罗马尼亚的地位。经过反复的讨价还价，罗马尼亚人最终同意为这些项目拨出87 亿列伊的“贷款”。

就在这时，也就是1943 年7 月底，从意大利传来了墨索里尼垮台的消息。意大利在当年9 月8 日与盟国签订了停战协定，退出了战争。这对罗马尼亚人来说起到了示范性的效果，它的政治家们希望罗马尼亚也能摆脱自己的独裁者，从战争中脱身；安东尼斯库则依然对那些咄咄逼人的政治家寸步不让，并警告他的那些批评者说，希特勒一直在豢养霍里亚·西马那个走狗。一旦他安东尼斯库在某场军事政变中倒台，那么德国人很可能会立即占领罗马尼亚，并建立铁卫军政权，到时候这些私下搞阴谋诡计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一个也别想活命。

不过，到1943 年12 月，苏联人通过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总统爱德华·贝奈斯给罗马尼亚送去了口信：罗马尼亚应当与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恢复传统的友谊，共同对付





1943 年关押在特尔古日乌集中营的齐奥塞斯库（左二）。右图是1944 年夏天布加勒斯特伊丽莎白林荫大道的夏夜露天咖啡馆

匈牙利和德国；虽然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仍将留在苏联版图之内，但是苏联在战后的和会上可以支持罗马尼亚对北特兰西瓦尼亚的领土要求。贝奈斯把这些口信转达给了正在访问瑞士的罗马尼亚外长加芬库。与此同时，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还通过贝奈斯表示，期望罗马尼亚国内“出现更为切实的反德行动”。与此同时，德军在东线战场上的一连串军事失利和节节败退，使得安东尼斯库深信法西斯主义已经不再是保护罗马尼亚的可靠工具。

当年圣诞节，曼纽在准时按月寄给安东尼斯库元帅的抗议信中，抨击这个法西斯头子不肯跳下德国战车的政策正在使得苏联对罗马尼亚的军事占领变得不可避免。安东尼斯库在答复曼纽时向他指出，如果曼纽能够为罗马尼亚争取到更好的投降条件，那么他这个法西斯头子是十分乐意让位给这个国家农民党领袖的。曼纽回答说，如果要这么做，就必须让他同盟国直接接触。安东尼斯库最后同意他这样做。

曼纽在同米哈伊国王和国家自由党领袖康斯坦丁·布勒蒂亚努取得一致意见以后，挑选了巴布·斯蒂尔贝伊亲王作为派往盟国的使者。他于1944年3月1日抵达伊斯坦布尔，准备转道前往伦敦，可是英国人要他去开罗。斯蒂尔贝伊亲王在3月15日飞抵开罗；3月18日，苏军进抵德涅斯特河一线；3月19日，德国占领匈牙利。这样，罗马尼亚与盟国达成协议就变成一项极为迫切的任务了。在谈判中，斯蒂尔贝伊坚持要求英国向苏联转达保证罗马尼亚的领土完整的要求，但是苏联人把他们关于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的话又重复了一边，同时要求罗马尼亚立即同德国人断绝关系，以便同苏联人携起手来，而不是由苏联来全面占领罗马尼亚。

曼纽是一个梦想家，他要求地中海战区总司令梅特兰·威尔逊将军派遣两个空降师迅速占领罗马尼亚，保护其不受苏联侵犯。这显然是痴人说梦，因为丘吉尔和斯大林早已在德黑兰会议中商定，罗马尼亚在战后将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而希腊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而苏联人更愿意同安东尼斯库元帅打交道，而不是同曼纽打交道，因为虽然两者同样是顽固的“大罗马尼亚”民族主义分子，但安东尼斯库掌握着军队，同他打交道会有较大的军事价值。苏联与安东尼斯库政权的谈判于1944年3月到7月期间在斯德哥尔摩断断续续地进行着，苏方的谈判代表是驻瑞典大使科伦泰夫人，罗马尼亚的代表是安东尼斯库元帅的特使弗洛里安·内诺。苏联人开出的条件仍然是4月提出的那些：罗马尼亚对德国宣战，苏联保有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并允诺战后将保持罗马尼亚原有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不变，此外归还特兰西瓦尼亚。

1944年春天，仍然被关在特尔古日乌集中营里的那些罗马尼亚共产党员收到了从莫斯科发来的秘密指示。当年4月4日，在美军空袭布加勒斯特的混乱中，埃米尔·波德纳拉希、约瑟夫·朗盖茨和康斯坦丁·帕伏列斯库三人设法抓到了党的总书记福里希，用手枪逼迫他同意辞去党的总书记职务（95岁高龄的帕伏列斯库在1989年和另外五名罗共前领导人一同签署了另一封抗议信，对齐奥塞斯库的倒台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波德纳拉希随后化妆成医生来到特尔古日乌集中营，在监狱医务室同乔治乌－德治和基伏·斯托伊卡（Chivu Stoica）、扬·毛雷尔（Iong Gheorghe Maurer）等领导人进行了会晤，传达了莫斯科的指示，要求他们同自由党人和民主党人结成统一战线，这是不容迟缓的战术同盟。这次会议还宣布党的总书记福里希是“叛徒”，将其罢免，由乔治乌－德治接任总书记的职位，波德纳拉希、朗盖茨和帕伏列斯库组成“三驾马车”，在监狱外执行党的日常领导工作。



乔治·乔治乌－德治（1901－1965）

1944年春天，推翻安东尼斯库的准备工作在加紧进行，埃米尔·波德纳拉希作为罗共的代表负责协调各个环节，并为将来的起义者准备武器。在很短的时间里，罗共组织了许多“爱国卫队”，成员包括工人、党员、青年联盟成员和反安东尼斯库、反德国人的军人。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在罗马尼亚全国成立了150个“爱国卫队”的据点，其中有50个在布加勒斯特，此外还建立了武器和弹药基地。“爱国卫队”是按照军事原则组成的，每队分为两个小组，每组5人，拥有自动武器和半自动武器、步枪、手榴弹和炸药，这些东西都是通过爱国军官从罗马尼亚陆军的军火仓库或军队中弄来的。

在1944年夏天，“爱国卫队”在喀尔巴阡山和多瑙河三角洲发动了几起游击队式的突袭活动，包括用磁性地雷炸毁16列运送石油的火车，但是总的来说其表现不如其他国家的游击队活跃。罗马尼亚共产党甚至同宫廷建立了联系。年轻的米哈伊国王和他的母亲长期以来感觉自己像是安东尼斯库的囚徒，因此也渴望效仿意大利萨伏伊王室的榜样，推翻那个“领袖”。1944年6月13日夜间，在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秘密住所里召开了



1944 年美机对布加勒斯特的空袭，图为一枚炸弹在大学广场附近爆炸

由罗共、军队代表和王室代表组成的会议，研究了武装起义计划。宫廷代表提议由亲德的政治家季古尔图代替安东尼斯库，随后背着季古尔图和希特勒采取措施以缔结和约。这个建议被否决了，最后通过了共产党的建议：发动武装起义，推翻安东尼斯库政权，对德国宣战。6月20日，罗马尼亚最大的两个政党——国家自由党和国家农民党也放弃了劝说“领袖”与德国人断绝关系的最后希望，加入了密谋阵营，与罗马尼亚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共同组成了“民族民主同盟”。

起义的军事技术准备工作由“军事委员会”负责，波德纳拉希在罗共与罗马尼亚军队之间担任联络工作。参加起义的军官提供了德国军队的驻扎地点、电台和军火仓库所在地等情报。为了在起义时能占据有利的力量对比，罗马尼亚总参谋部从1944年4月起便开始利用各种借口拒绝把新的罗马尼亚军队派往乌克兰前线去作战。按照计划，起义应当在苏联军队在罗马尼亚战线发动全线进攻（即1944年8月的雅西－基什尼奥夫攻势）之后开始，那时德军指挥部将不得不把驻罗马尼亚的全部兵力投入前线，这样就无力镇压起义了。到1944年8月初，罗共在完成了起义的准备工作之后，便把关在特尔古日乌集中营的党的领导人救出来了。早些时候被释放出狱的扬·毛雷尔装扮成军官，用一份伪造的文件把乔治乌－德治带出了集中营，不久之后齐奥塞斯库也被正式释放了。

1943年罗马尼亚陆军在布加勒斯特举行检阅仪式，其装甲部队当时仅剩的一辆T－4坦克（德制Ⅳ号坦克）通过检阅台。后来德国又向罗马尼亚提供了一些该型坦克



1944年春天在雅西－基什尼奥夫防线上的德军和罗马尼亚士兵



1944年3月29日，苏联乌克兰第二方面军在占领了比萨拉比亚北部之后渡过了普鲁特河，从而抵达了1940年时的罗苏边界，接着又马不停蹄地渡河占领了雅西以北的一部分罗马尼亚领土。4月2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记者招待会上强调了这一战果，并指出苏联并不企图吞并罗马尼亚的领土、或者“改变罗马尼亚现有的社会秩序”。这项声明有两个目的，一是向全世界宣布比萨拉比亚是苏联的一部分，罗马尼亚未来的国境线将是普鲁特河而不是德涅斯特河，另一方面想使西方盟国不要为苏联的意图担心，或许也想安抚一下罗马尼亚政府和人民，因为看来他们已经不愿继续站在德国人一边作战了。



罗马尼亚陆军的斯柯达LT vz35轻型坦克



罗马尼亚陆军使用过的德制Ⅳ号坦克

从1944年4月8日到6月6日之间，苏军在从波罗的海经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直至克里米亚半岛的战线上发起过一次全线进攻，到苏军最终停止前进时，在北方解除了德军对列宁格勒长达两年多的包围，在中部将战线推进到波兰的维斯瓦河附近，在南方收复了克里米亚半岛。在罗马尼亚战线上，苏军的停战线从德涅斯特河口向北延伸至基什尼奥夫附近，然后从这里向西，经过雅西，直至喀尔巴阡山。包括比萨拉比亚的北半部、整个布科维纳地区和北摩尔达维亚在内的一大片罗马尼亚领土已经处于苏军的直接占领之下。在罗马尼亚战线与苏军对峙的是德国的南乌克兰集团军群，总数在64万人以上，在罗马尼亚国内还驻有57000人的党卫军和其他德国部队。不过，希特勒决定将南乌克兰集团军群近三分之一的兵力调往中央集团军群，以阻挡苏军对华沙的进攻。到6月30日为止已经调走了10个师，其中6个是急需的装甲师，还有一个师在8月的第二个星期调走。

到1944年8月，部署在罗马尼亚战线上的防守兵力有47个师，80万名士兵，其中27个师是德国师，还有20个疲于战争的罗马尼亚师。从喀尔巴阡山到雅西城附近的普

“六万”行动

1943年11月1日，费多尔·托尔布欣中将指挥的乌克兰第四方面军攻克了克里米亚半岛连接大陆的佩列科普地峡。与此同时，北高加索方面军于11月1日至3日在半岛东端的刻赤半岛登陆，从而把残留在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德国第十七集团军23万人（包括罗马尼亚的3个山地师、2个骑兵师和2个步兵师）封闭到了一个巨大的口袋里。轴心国部队配有约1000门大炮、20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与之相抗衡的苏军则拥有压倒性的优势兵力，包括46.24万人的兵力、5982门火炮、559辆坦克和自行火炮，以及1250架飞机。此外在克里米亚半岛还活跃着苏军的破坏小分队和游击队。

克里米亚半岛的轴心国守军要防守北面和东面两个方向。在北边是鲁道夫？康拉德少将指挥的德国第49山地军和第50步兵师，第336步兵师防守阿拉巴特狭长沙嘴与半岛之间的锡瓦什海（其实是泻湖）。隶属于第49山地军的罗马尼亚骑兵军防守这条战线的东部地区，包括第10和第19步兵师，以及德国第111步兵师的一部。在克里米亚半岛东端的刻赤地区与北高加索方面军对峙的是德国第5军，下辖德国第73和98步兵师，以及罗马尼亚第3山地师和第6骑兵师。在克里米亚半岛南部海岸担任防守任务的是雨果？施瓦布少将指挥的罗马尼亚第1山地军，包括第1和第2山地师。罗马尼亚第9骑兵师负责防守克里米亚半岛西部长达260公里的海岸线。

苏军在克里米亚半岛的总攻从4月9日开始。在强大的炮火和航空火力准备之后，乌克兰第四方面军的部队在锡瓦什海和佩列科普地峡两个方向上发起进攻。克列伊泽尔中将指挥的第五十一集团军在锡瓦什海地段突破了德军防线，这就决定了克里米亚半岛北部整个德军防线的命运。4月11日，苏独立濒海集团军也在亚速海区舰队护送下渡过刻赤海峡，占领了刻赤城。

在撤退之际，康拉德将军在辛菲罗波尔、阿克莫奈、布尔加纳克河谷和卡恰河谷构筑了防御地带，但这些地区一处也没能守住。4月13日，苏军攻克了费奥多西亚、辛菲罗波尔和叶夫帕托利亚，4月16日收复了雅尔塔，并于翌日进抵塞瓦斯托波尔郊区，攻占了巴拉克拉瓦。

此时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德罗军对已经放弃了大半个半岛，打算依靠被称为“石头腰带”的防御系统对塞瓦斯托波尔地区进行死守。与此同时，罗马尼亚总参谋部和德国第十七集团军司令部决定及时撤出半岛上的部队，避免被苏军围歼。为了拯救这些人，罗马尼亚和德国海军在4月中旬发动了一场海上大撤退行动，罗马尼亚方面称之为“六万行动”（Operation 60000，这是当时滞留在克里米亚半岛的罗军的大致人数，实际约为65000人）。

第一支疏散船队在4月11日下午离开康斯坦察港，它包括德国油船“普罗德罗莫斯”号和匈牙利货船“卡萨”号，由罗马尼亚海军的“吉库列斯库”号炮艇、德国海军Uj−115号猎潜艇和Rb−167号防空艇护航。罗马尼亚驱逐舰“玛丽亚王后”号和“马拉塞什蒂”号也与这支船队一道离港。4月12日，两艘驱逐舰与Uj−115号和Rb−167号护送三艘罗马尼亚货船离开塞瓦斯托波尔，船上搭载了4361人，包括700名罗马尼亚士兵、3197名德军、47名俄罗斯伪军和417名战俘。这支船队在4月13日上午遭到一艘苏联潜艇的攻击，后者发射了三枚鱼雷，但是无一名中，船队在4月14日清晨平安抵达康斯坦察港。



1944年4月在克里米亚半岛附近掩护撤退行动的“斐迪南国王”号驱逐舰

4月14日这一天，两艘德国拖船拖带着两艘武装驳船，在两艘轻型猎潜艇的护送下离开塞瓦斯托波尔，它们撤出了2038人，包括377名罗军、1543名德军、113名俄罗斯伪军和5名平民。同一天另一支船队从康斯坦察出发，包括“穆尔盖斯库海军上将”号布雷舰、3艘猎潜艇和1艘防空艇，以及罗马尼亚货船“奥伊图兹”号和三艘德国货船，船上装载着运给塞瓦斯托波尔守军的弹药和食物。4月15日这天，这支船队遭到黑海舰队航空兵的五次空袭，“穆尔盖斯库”号击落了其中两架飞机，但是船上的102毫米主炮和一门20毫米高炮被炸坏。这支船队抵达塞瓦斯托波尔港后，“穆尔盖斯库”号立即护送一艘油船和两艘运兵船返航，撤出了3973人。

4月16日，两支德国海军护航队离开塞瓦斯托波尔，船上搭载的绝大多数都是德国军人。第一支船队包括德国货船“金布恩”号、“劳顿”号、“卡尔大公”号和“特本”号，由8艘武装驳船和2艘猎潜艇护航，运走了5417人，其中德军3765人、罗军516人。第二支船队包括匈牙利货船“卡萨”号和“蒂萨”号，以及德国货船“罗拉”号，搭载的2561人中只有6名罗马尼亚人。这两支船队在离开塞瓦斯托波尔后不久就遇到一艘苏军潜艇的伏击，但是一架BVV−180水上飞机发现了潜艇的踪影，投下了炸弹。这艘苏联潜艇可能是L−6号，即黑海舰队在二战中损失的最后一艘潜艇。同一天“奥伊图兹”号货船单独前往苏利纳港，于翌日遭到黑海舰队航空兵6架佩−2飞机的空袭，船身被炸伤。

“六万行动”的第一起重大损失发生在4月18日，当时从塞瓦斯托波尔驶来的“阿尔巴尤利亚”号和“多瑙”号货船正在“马拉塞什蒂”号驱逐舰、“吉库列斯库”号炮艇，以及Uj−104和Rb−216号的护航下驶往康斯坦察。当天上午1100时，一枚鱼雷从船队前面掠过，“吉库列斯库”号迅速前去查看，并向海中投下了两枚深水炸弹。这时在空中为船队执行观察任务的德国水上飞机报告说在另一个方位发现了潜艇的影子，“吉库列斯库”号又投下了五枚炸弹。Uj−104号随后接替了“吉库列斯库”号的反潜任务，后者返回护航队中。1220时，这支船队又遭到4架伊尔−4的轰炸，“阿尔巴尤利亚”号险些被炸中。1237时，4架A−20轻型轰炸机再度飞到船队上空，在“阿尔巴尤利亚”号的船身上炸开了一个10米宽、6米高的大口子，船上有500多名苏军战俘被当场炸死。“阿尔巴尤利亚”号开始向右倾斜，船头沉入海中，螺旋桨露出了海面。船上的士兵和战俘在惊恐中纷纷跳到海里。

接到船队遭袭的消息后，“斐迪南国王”号和“玛丽亚王后”号驱逐舰和7艘水上飞机立即从康斯坦察海军基地出发，正驶往塞瓦斯托波尔的“奥萨格”号、KT−25号和KT−26号运输船也改道前往出事海域，打捞幸存者。Uj−104号试图拖带“阿尔巴尤利亚”号，但由于后者船舵失灵而放弃了努力。1330时，又有五架苏联的A−20轰炸机飞来，投下了鱼雷，但是无一命中，罗马尼亚船队的高炮打下了其中的两架飞机。

到1500时，“阿尔巴尤利亚”号上落水的船员已经全部获救。由于这艘船仍漂浮在海面上，因此从康斯坦察港派出了两艘拖船，试图将其拖回港内。但是，当这两艘拖船于1700时驶抵出事海域时，“阿尔巴尤利亚”号已经向右倾斜30度。营救人员套上了缆绳，开始拖带这艘瘫痪的货船，但是由于船舵失灵的原因再度失败。第二天天亮后“斐迪南国王”号派出一个小组，设法修复了失灵的船舵，“阿尔巴尤利亚”号的主机也可以再度运转了。这艘船在4月20日蹒跚驶入了康

罗马尼亚海军“穆尔盖斯库海军上将”号布雷舰



斯坦察港，比船队中的其他货船只晚了一天。

4月19日和20日，两支德国船队从塞瓦斯托波尔撤出了17000人。“斐迪南国王”号在4月21日遭到黑海舰队18架伊尔-2的空袭，被一枚炸弹击中，但炸弹没有爆炸，其船员只是几天后在康斯坦察港修理燃料舱时才发现被炸弹击穿的破孔。4月23日这天有4支船队离开塞瓦斯托波尔，24日有1支。后一支船队当中有一艘驳船在离港后不久就被苏军飞机炸沉，船上的1045人中只有750人获救。

4月27日，随着两支船队离开塞瓦斯托波尔港，撤退行动的第一阶段宣告结束。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德国和罗马尼亚海军从克里米亚半岛撤出了73058人，其中包括20779名罗军（2296名伤员）、28394名德军（4995名伤员）、723名斯洛伐克士兵、15055名“俄罗斯解放军”成员、2559名战俘和3748名平民。一艘德国油船和一艘驳船被炸沉，一艘罗马尼亚驱逐舰、两艘武装驳船和两艘德国猎潜艇被炸伤。德国和罗马尼亚海军在护航行动中击落了12架苏军飞机，炸沉了1艘潜艇和1艘鱼雷快艇。

从4月28日到5月7日，在第二阶段的撤退行动中，从康斯坦察港开出了14支船队，向塞瓦斯托波尔运去弹药和补给，运回部队人员和拆运的各种物资。5月3日，德国自航驳船“尤纳克”号被苏军的A-20轰炸机炸沉；第二天，另一艘德国货船“卡尔大公”号被一枚炸弹击中，船上的700名罗马尼亚士兵中有24人被炸死。5月6日，MFP-132号武装运输驳船和匈牙利货船“布达佩斯”号被12架伊尔-2炸伤。

5月5日，扎哈罗夫中将指挥的苏联近卫第二集团军从北面向塞瓦斯托波尔发起总攻。5月7日，苏第五十一集团军和滨海集团军的部队也展开了进攻。5月9日，德罗守军被迫撤出塞瓦斯托波尔城，向赫尔松内斯角方向撤退。与此同时，罗马尼亚海军加快了撤退部队的速度，在塞瓦斯托波尔失守前设法撤出了2887人，容克-52运输机也设法撤走了一些伤兵，从摩尔达维亚起飞的Bf-110战斗机为其提供护航，击退了前来拦截的苏军飞机。

在5月6日至13日的第三阶段撤退中，罗马尼亚海军遭受了两次非常巨大的损失：5月10日0930时，“图捷拉”号货船遭到21架伊尔-2的空袭，被3枚炸弹击中，与船上的5000多人（其中2000多名罗马尼亚人）一道沉入海底；同一天1445时，“特加”号货船被另一波11架A-20炸沉，也有5000多人随船遇难。这两起沉船事故中丧生的1万人几乎占到整个“六万”行动人员伤亡总数的90%。与此同时，苏军航空兵加大了对船队的轰炸力度，苏军炮兵也开始向开到赫尔松内斯海滩接运士兵的罗马尼亚船只直接开炮射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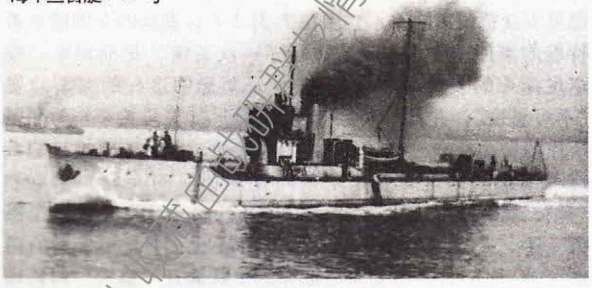
5月11日，货船“多瑙河”号和“罗马尼亚”号都因为船上搭运的弹药被击中而爆炸沉没，“斐迪南国王”号驱逐舰被一枚76.2毫米炮弹击伤，并且遭到岸上的152毫米加农炮阵地的轰击。“斐迪南国王”号舰长提多斯·萨姆森中校下令全速倒车，并且用舰上的120毫米炮向岸上还击。在混战中，这艘驱逐舰还被苏军飞机丢下的一枚炸弹击中，像4月21日的那次空袭一样，这枚炸弹也没有爆炸，但是再次把燃料舱砸穿了一个口子。当“斐迪南国王”号驶抵康斯坦察外海时，燃油已经泄露殆尽，只好由拖船拖带入港。

5月12日0800时，赫尔松内斯海滩的残军向苏军投降，其中包括罗马尼亚第2、第9和第10山地步兵营（92名军官、103名士官和2561名士兵）。在这之前的一个星期里，罗马尼亚海军从塞瓦斯托波尔港和赫尔松内斯滩头撤走了15078名罗马尼亚人、28992名德国人和3755名苏联人（包括伪军、战俘和平民）。有11000人（其中4000名罗马尼亚人）在撤退行动中死亡。此外“斐迪南国王”号有12名船员阵亡、28名船员受伤，“达契亚”号上3人阵亡、22人受伤，“吉库列斯库”号1人失踪、1人受伤。罗马尼亚损失了“多瑙河”号、“罗马尼亚”号和“杜罗斯塔尔”号三艘货船（总重4598吨），德国海军损失了5艘运输船、4艘猎潜艇、2艘驳船、3艘拖船（总重11196吨），此外还有两艘匈牙利货船被炸伤。

从1944年4月11日至5月13日，“六万行动”一共从克里米亚撤出了120853人和22548吨各种物资。被撤出的人员包括36557名罗马尼亚人（4262名伤员）、58486名德国人（12027名伤员）、723名斯洛伐克人、15391名俄罗斯伪军、2581名战俘和7115名平民。罗马尼亚海军在撤退行动中的英勇表现受到了德国海军元帅邓尼茨的高度赞扬，参与撤退的绝大多数船长都得到了三级勇敢的米哈伊勋章，整个行动的总指挥、罗马尼亚海军黑海舰队司令霍里亚·马赛尔拉里乌海军少将获得了罗马尼亚之星大十字勋章和德国的骑士十字勋章。

在1944年克里米亚战役的陆上战斗中，罗马尼亚损失了23397人，大多数是最富于战斗经验、装备最精良的山地部队。德国方面损失了31700人，此外还有大约2万名俄罗斯伪军没有来得及撤出，其下场可想而知。很显然，如果希特勒在1943年11月苏军发动佩列科普地峡攻势时，或者哪怕在1944年2月，即尼科波尔失守后，把第十七集团军从克里米亚半岛撤出，这些无谓的损失本来都是可以避免的。另一方面，苏军在为时一个多月的战斗里有17754人阵亡，67065人受伤，损失了171辆坦克、521门火炮和179架飞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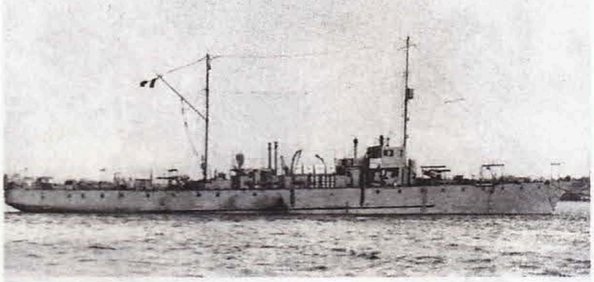
参加克里米亚撤退行动的罗马尼亚海军鱼雷艇74T号





罗马尼亚海军的鱼雷快艇

1944年参加克里米亚撤退行动的罗马尼亚海军炮舰“杜米特列斯库”号



1944年参加克里米亚撤退行动的罗马尼亚海军炮舰“欧根·斯蒂希”号



鲁特河由德国第八集团军和罗马尼亚第四集团军把守，从雅西向东是德国第六集团军和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德国人在这条战线上总共只有3个装甲师，坦克只有区区的120辆。德国的步兵师马匹充足，但机动车辆极其匮乏。新近从德国本土补充的兵力虽然弥补了数量上的不足，但大多数士兵要么年纪偏大，要么太年轻而战斗经验不足。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铁路系统一点也不发达，许多增援部队发现他们步行的速度要比坐火车快一些。运输物资的火车通常要两到三个星期才能从德国开来，而且有时还会迷路，德国空军的飞机不得不在高空给它们带路。

8月5日，安东尼斯库元帅前往东普鲁士的元首大本营“狼穴”，对希特勒进行了最后一次拜访。新任总参谋长古德里安就德国国防军军官团在7月20日发动的企图暗杀希特勒的事件同安东尼斯库进行了一次长谈，据他回忆，安东尼斯库的表情“非常吃惊”，反复念叨这样的军事政变“不可思议”，并且心灰意冷地感觉到“（罗马尼亚）为战争所作的努力彻底破灭了”。为了安抚他，双手不断颤抖的希特勒不厌其烦地对安东尼斯库提及德军的大炮、坦克和“神秘武器”，安东尼斯库也信誓旦旦地表示将继续站在德国一边，并发誓说罗马尼亚将是“最后一个背叛帝国的国家”。8月6日，当安东尼斯库的车队离开“狼穴”向机场开去的时候，希特勒激动地向前走了几步，大声喊道：“安东尼斯库！安东尼斯库！千万不要到王宫里面去！”

1944年8月20日，马利诺夫斯基上将指挥的乌克兰第二方面军和托尔布欣上将指挥的乌克兰第三方面军在雅西－基什尼奥夫一线发起了强大的攻势，其目的是占领比萨拉比亚全境，并迫使罗马尼亚退出战争。乌克兰第二方面军的任务是突破雅西以北的防线，阻止德国第六集团军退回普鲁特河西岸，第六坦克集团军随后将沿着锡雷特河向南快速进攻至福克夏尼一线；乌克兰第三方面军将在蒂拉斯波尔附近强渡德涅斯特河，建立桥头堡，然后向北发动向心进攻，在胡希－瓦斯卢伊地区与第六坦克集团军会合，从而包围并歼灭德国第六集团军。两个方面军的总兵力多达92.9万人，还有16000门大炮、1870辆坦克和2200架飞机。

1944年8月初撤出比萨拉比亚的德军和罗军士兵



罗马尼亚陆军的SdKfz9半履带运兵车



事实证明，无论什么力量也不能阻挡这样军队的强大攻势。苏军发动进攻后，虽然一些罗马尼亚部队站在德国军队一边参战，但绝大多数罗军部队连一枪都没有开就投降了。罗马尼亚第11步兵师的师长手里拿着鞭子，试图阻止那些洪水般向后方逃窜的士兵。他眼泪汪汪地向其德国上司汇报说，他的部下就这么一哄而散了。

8月21日，乌克兰第三方面军的一支纵队在渡过德涅斯特河后向南进发，将早已支离破碎的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隔离开来，并将之围困在黑海沿岸地区。托尔布欣的其他部队向西朝着普鲁特河前进，与此同时乌克兰第二方面军的坦克集团军正在快速南下。这曾经是德国装甲部队惯用的伎俩，在战争初期攻打苏军的战斗中获得过巨大成功。

8月22日，罗马尼亚第四集团军被孤立起来，与德国第八集团军失去了联系。再往南，苏军装甲部队正在德国第六集团军后方30多公里的地方移动，转眼之间就在胡希－瓦斯卢伊地区与托尔布欣的部队会合起来，包围了第六集团军。这一天，反对集团领导人与米哈伊国王举行了会晤，商定如果到8月26日安东尼斯库还不退出战争，就由王室和反对派联手发动政变推翻他的统治。

8月23日清晨，安东尼斯库元帅召开了政府紧急会议，试图挽救局势。他在会议上建议宣布总动员，在福克夏尼至加拉茨一线组织防御，把罗马尼亚的全部领土变为战场。为了使这个决定有威信，安东尼斯库希望国王发表一个相应的告人民书，为此他在当天下午与米哈伊·安东尼斯库一同前往王宫。年轻的米哈伊国王决定提前举事。他下令把两个安东尼斯库全都逮捕，关入他父亲为了集邮而修建的一个通风的保险库中。

1947年9月，美国《时代》周刊曾经根据当时的宫廷速记记录刊出了国王与安东尼斯库元帅的对话。谈话是当天下午3点在国王起居室旁边的小客厅里进行的，安东尼斯库身穿骑兵军装，国王穿着灰色法兰绒便服。当时在场的还有米哈伊·安东尼斯库和国王的亲信康斯坦丁·萨纳泰斯库将军。安东尼斯库的副官扬内斯库上校被留在了房间外面，王宫卫队的杜米特雷斯库上尉和三名士官监视着他。

安东尼斯库先是向国王通报了前线的危机状况，然后说除非提前通知希特勒，让德国提前做出准备，否则不会与盟国签订停战协定。国王说当前的军事形势已经容不得任何拖延了，苏军已经占领了一部分国土，必须立刻停战。当米哈伊国王问道如果派出代表与盟国谈判停战、元帅是否会站在一旁不加干涉时，安东尼斯库说“那绝对不可能。”国王随后退到隔壁的书房中，与在那里的四名王室顾问飞快地达成了一致意见，应当立即逮捕这位元帅。国王随后回到小客厅，告诉安东尼斯库说，考虑到罗马尼亚人民以及四个主要政党的意愿，他将带领国家脱离战争，以避免灾难。如果元帅拒绝服从国王的意愿，那么他将被免


1944 年时的米哈伊国王

职。接下来发生了下面的一幕对话：
安东尼斯库元帅（下文简称“元帅”）：“陛下万岁。”
米哈伊国王（下文简称“国王”）：“没有时间可供浪费了。你把整个国家带到了这样一种境地，除了立即（与盟国）停止敌对状态、驱逐德国人之外，别无他法可救。”
元帅：“你误会了。”
国王：“请更正你的称呼。什么叫‘你’？”
元帅：“你……您……陛下，陛下您今天过于紧张了。”
国王：“没错，因为今天早上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竟然像对待普通人一样和我说话（国王敲击桌子）。我不允许你剥夺我手下任何人的自由。难道你以为我会允许你篡夺我的权力，以为我会在我的国家垮台的时候像白痴一样坐视不管吗？”
元帅：“是谁在摧毁这个国家？”
国王：“你们这帮人。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似乎忙得没有时间跟这个国家的国王通话。”
元帅：“我是想告诉你，如果你以为停战就能拯救这个国家的话，那么你就大错特错了。”
国王：“我不是想征求你的意见或者看法。我叫你来的目的是要让你向联合国（即盟国）发去这份休战公报。”
元帅：“这是谁写的？”
国王：“问这个对你来说有什么用？你如果不同意的话，我可以自己来发这份电报。”
（米哈伊·安东尼斯库插话：“您怎么会认为元帅会背叛他的德国盟友，把他们丢给俄国人呢？”）
国王（大喊大叫）：“究竟是谁在背叛？你还是德国人？你难道向德国人保证了他们的边界不受侵犯吗？德国人保证了我们的边界安全吗？”
元帅（提高了声音）：“我没有聋。你嚷什么？”
国王：“没错，你聋了。否则的话你早就会听见这个国家到处充满了对你不满的怨言。长话短说，元帅。你究竟发不发这份电报？”
元帅：“不。再说一遍，不。”
国王：“你想怎么样？”
元帅：“我要和德国方面联系。”
国王：“什么？难道我们是在这里讨价还价吗，安东尼斯库先生？”
元帅：“安东尼斯库元帅。”
国王：“安东尼斯库先生。四年以来你一直在篡夺我的权力。我对你既不信任又不同情。这几个月来我一直在致力于拯救我的国家。你，我知道，把我当成一个傻瓜，一个口吃的小孩。我的罗马尼亚臣民会做出判断。但是如果你把我说成是一个背叛者，那么你就会彻底完蛋。我是国王，是你的国王。我希望拯救这个国家（吼叫起来，捶击桌子）没有人能阻挡我！”
元帅：“陛下还很年轻，经验不足。”
国王：“你错了。受苦受难也是一种经验。”
元帅：“你不能治理这个国家，如果……”
国王（打断对方）：“我是军队的总司令，我已经发出了命令。”
元帅（粗暴地）：“发出命令？什么命令？陛下难道不知道陛下会失去王权吗？”
国王：“你是在威胁我吗？你以为你还有权力来对任何人发号施令吗？从现在开始，我将为这个国家做出一切决定。你被捕了。”
（小客厅的门被撞开，杜米特雷斯库上尉带着三名士官冲进房间，手里拿着手枪，杜米特雷斯库抓住了安东尼斯库的胳膊）
元帅（板起面孔，问萨纳泰斯库将军）：“这是什么意思？”
国王：“废话。把他从这儿带走。”

当天傍晚，米哈伊国王把两个安东尼斯库都交给了由埃米尔·波德纳拉希领导的爱国卫队看管。布加勒斯特卫戍部队和爱国卫队随即按计划占领了一些最重要的目标和战略据点，包括电话局、电报局、广播电台和政府各部大厦。当天晚上，米哈伊国王前往电台发表广播，宣布废除法西斯专政，停止针对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军事行动，接受苏联政府在4月12日提出的停战条件，准备进行反对希特勒德国、解放自己国家的战争。

米哈伊国王随后任命了一个民主的罗马尼亚政府，由康斯坦丁·萨纳泰斯库将军领导，并且以曼纽、布勒蒂亚努、社会民主党人帕特列斯库和共产党人帕特拉什卡努为副总理。这个新政府通知德国公使基林格说，德国军队如果从罗马尼亚领土上和平撤退的话，将不会受到任何阻碍，罗马尼亚陆军总参谋长下令如果德国人不开火的话，不要对德国军队采取任何军事行动。但是德国人不愿意和平地退出罗马尼亚。在8月23日和24日，从奥波

1944 年8月31日开入布加勒斯特的苏军部队



特尼机场起飞的德国飞机两次空袭了布加勒斯特，直到盟军空袭这座机场后才停止。

在罗马尼亚的其他地方，德国军队也发动了猛烈的进攻，试图用武力推翻新政府。驻扎在本土的罗马尼亚第一、第二集团军，以及逃脱苏军包围的第三和第四集团军随即迎战，甚至连安东尼斯库的私人卫队都投靠到起义者一边。在从8月24日持续到28日的激烈战斗中，罗马尼亚军队和爱国卫队击溃并歼灭了布加勒斯特及其近郊的德军，俘虏了5437人，包括7名将军和358名军官。

8月31日，苏军开入布加勒斯特。两名安东尼斯库，以及国防大臣康斯坦丁·潘塔齐、特兰西尼斯特里亚总督乔治·阿列克西亚努、原宪兵司令康斯坦丁·瓦西里乌、布加勒斯特警察局长米尔恰·埃列夫特雷斯库等囚犯被“爱国阵线”移交给苏联人，随即运往莫斯科，关进郊外的一栋豪华住宅中，由直接听命于斯大林的苏联军事情报机关“消灭间谍”（SMERSH）负责看押。1945年5月德国投降后，这些高级囚犯被投进了卢比扬卡监狱，接受“消灭间谍”人员的审讯。

在罗马尼亚的其他地方，爱国力量也在政变之后迅速展开了行动。罗马尼亚军队占领了西北和西部边境的防御工事，以阻挡德国和匈牙利军队对特兰西瓦尼亚发动进攻，并防止被击溃的德军部队退入匈牙利境内。在迅速前进的苏军配合下，罗马尼亚军队和武装民众解放了罗马尼亚的中部和南部地区。普洛耶什蒂的石油工人和当地的卫戍部队一道顶住了城外德军的进攻，直至8月29日苏联坦克部队和罗马尼亚第18步兵师抵达这里为止。8月30日，苏军占领康斯坦察，并立即用其港口设备卸下从塞瓦斯托波尔运来的增援部队和装备。在布拉索夫，维克斯兵工厂的工人利用工厂里的大炮进行了英勇的战斗。

在8·23政变后为时八天的短暂战斗里，起义的罗马尼亚人一共俘虏了53159名德军战俘，其中包括14名将官和1124名军官，在交火中被打死的德军有5000多人。被关在布痕瓦尔德和达豪集中营里的铁卫军分子们被德国人释放出狱，他们的头头霍里亚·西马获准在电台里对罗马尼亚国民做一次反对米哈伊国王及其“巴多格里奥集团”的演讲。甚至到了当年12月，德国人还搞了一个以西马为首的“罗马尼亚国民政府”，不过这些都已经成为闹剧了。如今真正控制罗马尼亚的是苏联人，而不是德国人或者铁卫军。

最后的贵族

尽管尤利乌·曼纽和其他亲西方的罗马尼亚政治领导人在8·23政变后拼命地呼吁美国和英国派“至少三个”空降师迅速占领罗马尼亚，但他们盼来的只是美国第十五航空队的三十八架B-24飞机。这些飞机在布加勒斯特机场降落，运走了关在罗马尼亚的美英飞行员战俘。丘吉尔早在1944年5月就同斯大林达成谅解，罗马尼亚是苏联的势力范围，以换取英国在希腊的行动自由。当年10月丘吉尔与其“王储”安东尼·艾登访问莫斯科时，就这一势力范围的划分作出了进一步安排。苏联人答应，如果英国不得不在希腊采取行动镇压希腊共产党的武装起义的话，苏联将不予干涉；作为交换，苏联将得到英国非正式的保证，可以在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拥有无可争辩的优势”，并且在南斯拉夫得到与英国相等的控制权。



康斯坦丁·萨纳泰斯库（1885—1947），安东尼斯库下台后的首任罗马尼亚首相，1947年因癌症去世

安东尼斯库政权被推翻后，苏联在8月27日便宣布停止对罗马尼亚军队的战事，此时苏军已经俘虏了将近14万罗马尼亚军人，并把他们运往苏联境内的战俘营去做苦工。9月12日，罗马尼亚代表团在莫斯科签订了停战协议（尽管它在法律上同美英苏三国都处于战争状态，但实际上只与俄国人打过仗），马利诺夫斯基将军代表苏联和美英在停战协议上签了字。停战条款包括：罗马尼亚军队将在苏军指挥下参加对德作战；罗马尼亚承认苏联兼并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对苏联缴纳3亿美元赔款，在6年内以商品支付；允许苏军自由穿越罗马尼亚领土，并允许苏军司令部无限地征用物资和劳务以充军用；归还“战时从苏联领土上移走的贵重物品和物资”；交出属于德国的财产和军事设备；释放政治犯，以及遣返苏联战俘；苏联最高司令部还有权检查一切公共通讯，对报纸、期刊、文学、戏剧实行管制，以及逮捕被控犯有战争罪行的人。作为交换条件，除了前线50至100公里范围以内的地区外，罗马尼亚全国各地一律恢复民政机关的管理，苏联还答应



罗马尼亚海军潜艇“海豚”号，1930年由意大利建造，装备6具鱼雷发射管和1门102mm炮，水下排水量900吨，乘员40人。罗马尼亚投降后被苏联没收，但由于缺乏配件而处于废弃状态。1957年归还罗马尼亚，罗方试图将其改造为科研用潜艇，但在1970年改为建造专用潜艇，而将“海豚”号拆毁。其苏尔寿柴油主机陈列于康斯坦察的罗马尼亚海军博物馆



1944 年收复特兰西瓦尼亚后发行的纪念金币，正面是米哈伊大公、斐迪南一世和米哈伊一世的头像。文字“Ardealul Nostru”意为“我们的特兰西瓦尼亚”。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语名字是 Ardeal，匈牙利语名字是 Erdély，意思均为“山间密林”

把1940年被匈牙利兼并的北特兰西瓦尼亚归还给罗马尼亚。

在从米哈伊国王发动政变到签署停战协议后的几个星期里，罗马尼亚呈现出一片混乱景象，萨纳泰斯库将军和罗马尼亚总参谋部一直在忙于把苏联战线上的部队调到特兰西瓦尼亚前线去对付德国人和匈牙利人。苏联允许罗马尼亚陆军保留12个师参加同轴心国的作战，同时拒绝释放战俘、或归还苏军在8月24日以后缴获的武器装备。但是12个师毕竟还是太少，经过讨价还价，最终苏联允许罗方组建19个步兵师，但是师属炮兵团的数量减少到了1个。1945年欧战接近尾声时，参战的罗马尼亚军队（基本上都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共有15个师。第1、4、5、7、8、13、14、15和第20师永久解散了，第18山地步兵师改组为第18步兵师。

重新整编后的罗马尼亚第一集团军包括第4军（第2、3山地师、第10步兵师），第7军（第1、19步兵师、第9骑兵师）、第6近卫步兵团、第1、7独立重炮团，第36反坦克炮独立团，第9防空营和第35工兵营。罗马尼亚第四集团军包括第2军（第6、21步兵师，第1骑兵师，第2重炮团），第6军（第9、11、18步兵师，第3重炮团），第1、3步兵师，第8骑兵师（在1945年2月改编为摩托化师），边境反坦克炮营，第60独立炮兵营，第8防空团，第2独立装甲营，第30、31工兵营。

托尔布欣的乌克兰第三方面军在罗马尼亚境内仅稍作停留，就在9月8日渡过多瑙河开入保加利亚，随后向南斯拉夫进军。乌克兰第二方面军在9月的第三个星期在瓦拉几亚境内向西南方向挺进。10月初，他们穿过特兰西瓦尼亚阿尔卑斯山，向战前的旧罗匈边境推进。10月20日，苏军解放贝尔格莱德，德军退守蒂萨河一线。10月24日，罗马尼亚军队和苏军一道开入靠近匈牙利边界的萨图马雷城，罗马尼亚全境解放（这一天后来成了罗马尼亚人民军的建军节）。此后罗马尼亚第一和第四集团军仍然在乌克兰第二方面军的指挥下继续同德国人作战。他们后来又参加了1945年初的匈牙利战役和当年春天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战斗，转战一千多公里，从穆列什河一直打到布拉格城下，在占领德布勒森、布达佩斯、布拉迪斯拉发等城市的战斗中伤亡惨重。在1944至1945年随苏军作战的53.8万罗马尼亚军人中，最终有16.7万人阵亡、受伤或失踪。

在战线的后方，萨纳泰斯库将军的政府没过多长时间就开始发生内部分裂，即以自由党和农民党等“历史性政党”为一方、以共产党及其政治盟友为另一方的分裂。“历史性政党”认为自己遭到了美英等国的抛弃，对苏联在罗马尼亚的政策感到普遍的不满，因此很快变得满腔怨愤。另一方面，罗马尼亚共产党、农民阵线、社会民主党和其他一些左翼集团合作，在城市和乡村中组织力量来支持自己。到1944年10月初，他们就成立了“全国民主阵线”，要求在政府中分得更多的席位，并且废除早先的反犹法律，逮捕前“铁卫军”分子，以及在苏军配合下把特兰西瓦尼亚境内的日耳曼少数民族统统驱逐出境。

1944年12月，由于罗马尼亚共产党和自由党在由谁来控制内政部（也就是控制警察部队）的问题上发生争执，萨纳泰斯库政府垮台，在苏联人的同意下由尼古拉·拉德斯库将军继任首相，并接掌内政部。后者像萨纳泰斯库一样属于一个反德而又毫不同情共产主义的社会阶级。在他的配合之下，苏联占领军在1945年1月颁布了一道驱逐日耳曼人的法令，宣布将罗马尼亚全境的日耳曼族置于苏联占领军的军事管制之下。在罗马尼亚全国对17到45岁的日耳曼族男性和18至30岁的日耳曼女性展开兜捕，并把他们送到苏联去服苦役。苏军一共从罗马尼亚运走了75000名德意志人，分布在乌克兰和乌拉尔地区的85个强制劳动营中。这些人在1948年之后陆续获释，大多数经东德前往西方定居。

与此同时，“全国民主阵线”在各地加紧了夺取政权的行动，共产党和工会派人到农村去，带领农民没收和分配地主的土地。拉德斯库将军向各个县政府发去命令，要求用军队和警察去镇压这些行为，但这也无济于事。在苏联占领军的帮助下，罗马尼亚各



尼古拉·拉德斯库将军（1874—1953），1944—1945 任罗马尼亚首相，1946 年经英国大使馆护送流亡美国

“斐迪南国王”级驱逐舰是意大利那不勒斯的帕特森船厂在三十年代仿照英国“莎士比亚”级驱逐领舰建造的快速驱逐舰，排水量1400吨，功率52000马力，航速37节，搭载5门120mm炮、4门76mm炮、2门40mm高炮、2挺13.2mm机枪、6具533mm鱼雷发射管。二战后与同级舰“玛丽亚王后”号一道赔偿给苏联，“斐迪南”号改名“潇洒”号（Likhoy），“玛丽亚”号改名“挥发”号（Letuchiy）。1951年两舰归还罗马尼亚，改名D21号和D22号，六十年代解体。图为在苏联黑海舰队服役的“潇洒”号



地的地方政权几乎都转到“民主阵线”方面。还在拉德斯库内阁被推翻之前，罗马尼亚全国60个县中就有52个建立起了共产党政权。

1945年1月，当安娜·波克和乔治乌－德治访问莫斯科时，得到了直接指示，要求他们一回到罗马尼亚就发动一场由“全国民主阵线”独占全部国家权力的运动。他们提出的纲领应当包括“忠实地履行停战条款”、“清洗政府和军队中的法西斯分子和战犯”、把曼纽驱逐出政界、并进一步实施改革。为了进一步诱使罗马尼亚人民支持“全国民主阵线”，苏联答应说一旦该阵线执政，就把特兰西瓦尼亚北半部归还给罗马尼亚。

根据这一行动纲领，罗马尼亚“全国民主阵线”在1945年2月发动了一系列反政府的示威和罢工。由于大部分罗马尼亚军队此时都在匈牙利领土上作战，不在国内，因此拉德斯库将军只得试图利用他作为内政部长的权力、动用警察压制示威。2月10日，他不明智地威胁“工人爱国卫队”的代表说：“我要出动军队上街。我将开枪射击你们所有的人……我要像在希腊发生的那样干。”这时苏联直接出面干预了。2月24日，在布加勒斯特爆发了一次示威之后，苏联占领军直接帮助共产党人解除了首都的罗马尼亚军队的武装。苏联副外长维辛斯基直接进行了干预，声称“不能容许在红军的后方存在发生动乱的危险”。

拉德斯库将军在2月28日辞职，逃进了英国公使馆，然后乘美国飞机逃到国外去了。米哈伊国王反抗了几天之后，不得不在3月6日接受了由彼得·格罗查博士担任首相的全国民主阵线政府。为了履行“全国民主阵线”在夺取权力时对人民所作的诺言，苏联在3月9日将特兰西瓦尼亚北半部交还给罗马尼亚新政权控制，交还时有这样一个默契：要保护当地的匈牙利族不受迫害，要鼓励特兰西瓦尼亚境内不同民族的人和睦相处。

格罗查在苏联人的支持下稳固地掌握了政权。虽然共产党只占了其中的三个职位（内政大臣、司法大臣和国民经济大臣，最后一个职位由乔治乌－德治担任），但由于它是在苏联军队的武力支持下用几近政变的方式上台的，因此英美等国组成的盟国管制委员会直到1946年1月之前一直都拒绝承认这个新政府。格罗查本人和国王的关系十分紧张，米哈伊有好几个月的时间离开布加勒斯特，隐居在锡纳亚的山间行宫中，拒绝在格罗查政府通过的任何新法

1945年布加勒斯特街头的苏军士兵



律和法令上签字表示同意，并断绝了和政府的一切联系。直到格罗查让国家自由党和国家农民党中最桀骜不驯的那一派各派一名代表参加政府，米哈伊国王才结束“罢工”，而英美等国才承认罗马尼亚的新政府。

此时的罗马尼亚被战争破坏得千疮百孔，处于投机倒把、物价飞涨和经济混乱状态，赔款的负担十分沉重。在罗马尼亚境内驻扎有75万到100万苏联军队（这是英国情报部门的估计，罗马尼亚总参谋部估算的数字是150万左右）和2500架飞机。1944－1945年苏联大兵过境时，罗马尼亚像被蝗虫洗过一遍一样，全境遭到了洗掠。在港口城市康斯坦察，战前建造的海滨别墅和旅馆变成了一片废墟，苏联士兵甚至连地板的木条都撬走。除此之外，苏联还出兵前在国内印刷了100亿列伊的现钞，作为其士兵在罗马尼亚境内的薪饷花费，这更加剧了罗马尼亚的通货膨胀。当年冬天，由于缺乏食品和燃料，冻饿而死的老人和儿童不计其数。在摩尔达维亚，农民试图抢劫列车，或者爬车外逃，以逃离饿死的命运。

“全国民主阵线”政府上台后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宣布对银行和大企业实行国有化，并规定所有面积超过50公顷的私有土地一律没收。1945年4月29日，格罗查政府颁布了另一项新法律，把“具有亲法西斯思想”的军官清除出军队。德国投降后，原罗马尼亚原王家军队被解散，军官和士兵领到了退伍金之后复员回家。不久之后，各地派出所的民警就拿着退伍军人的名单按图索骥，兜捕那些曾经在东线服役过的前罗马尼亚军官，把他们送到监狱里，



1945年7月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宣布授予米哈伊国王以胜利勋章，以表彰他带领罗马尼亚脱离对苏战争的攻陷。这是苏联最高的军事荣誉，也是最值钱的一种：这枚直径72毫米的勋章用白金制成，用人造红宝石拼成五角星的图案，周围镶嵌着总重16克拉的174颗钻石。勋章的中央是银质的克里姆林宫救世主塔楼和列宁墓的镀金浮雕，两旁环绕着月桂和橡叶，背景是天蓝色珐琅。除了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罗科索夫斯基以及斯大林等苏联将领和领导人外，米哈伊国王是获得胜利勋章的第三名外国人，另两人是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艾森豪威尔把他那枚胜利勋章送到一名美国珠宝商那里去估价。后来当荷兰女王朱丽安娜的丈夫伯恩哈德亲王对这枚勋章的价值感到好奇，并表示说他自己也希望得到这样一枚珠光宝气的勋章时，艾森豪威尔不屑一顾地说“上面的宝石都是假的”。
胜利勋章一共有十七位获得者包括斯大林（两次）、格奥尔基·朱可夫（两次）、亚历山大·华西列夫斯基（两次）、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伊凡·科涅夫、罗季昂·马利诺夫斯基、费多尔·托尔布欣、谢苗·铁木辛哥、列昂尼德·戈沃罗夫、阿列克谢·安东诺夫、基里尔·梅列茨科夫；外国受勋人包括艾森豪威尔、蒙哥马利、铁托、米哈伊一世和二战期间的波兰东线军队领导人米哈沃·罗拉－兹米尔斯基。1978年2月，勃列日涅夫也恬不知耻地下令授予自己一枚胜利勋章，奖励1943年诺沃罗西斯克－塔曼战役中他作为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主任的“功绩”（这枚勋章在他死后被追夺了）。按照苏联最高苏维埃的法令，胜利勋章的苏联籍获得者去世后，勋章要上缴给国家。目前苏联受勋人的勋章都存放于克里姆林宫的珍宝馆里。艾森豪威尔的那枚勋章如今存放在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档案馆，而蒙哥马利的胜利勋章在伦敦的帝国战争博物馆展出。目前国际收藏家为胜利勋章开的价格在200万到250万美元左右，不过由于其数量稀少而处于有价无市的局面

或交给苏联的NKVD工作人员进行审问，其家属则被流放到多瑙河三角洲或者苏联境内。被逮捕的军人有13000人之多。在克鲁日等城市，一些从前线回来的罗马尼亚军人在11月8日，即国王命名日这一天发动抗议暴动，但是被苏联占领军镇压下去，死了不少人。一些罗马尼亚退伍军人由于提前得到了通风报信而带着家人登上火车，穿过那时还没有关闭的奥匈边境逃往奥地利。

格罗查政府鄙视并在某种程度上惧怕罗马尼亚三位最著名的老政治家，即国家农民党的尤利乌·曼纽和扬·米哈拉凯，以及国家自由党的康斯坦丁·布勒蒂亚努。三位政治家发现他们的党的活动遭到了成群结伙高呼口号的政治打手的阻碍。不论这些打手在政治上效忠于谁，但在手段上与铁卫军分子几乎毫无区别（也许他们在几年前确实就是铁卫军）。曼纽则公然不把格罗查政府放在眼里，极其蔑视其名义上的首相。1946年5月，两个安东尼斯库作为战犯接受审判时，曼纽在提供证词后，坚持要以特别引人注目的尊敬态度与前元帅和前外交大臣分别握手，还特地大声对前元帅说“我们是政治上的对手，不是同类相食的食人族。”

扬·安东尼斯库遭到的起诉罪状包括对苏联发动战争，下令罗马尼亚军队伙同德军一道制造1941年敖德萨大屠杀，向特兰西尼斯特里亚放逐犹太人，以及贪污腐败等等。玛丽亚王后和罗马尼亚的许多政治家为其求情，并试图把安东尼斯库引渡给纽伦堡战犯法庭，让其在英美司法体系下获得保护，但是没有成功。这不仅是由于罗共以及苏联方面的反对，而且米哈伊国王本人也极其憎恨安东尼斯库，认为他为了德国人的利益而出卖了罗马尼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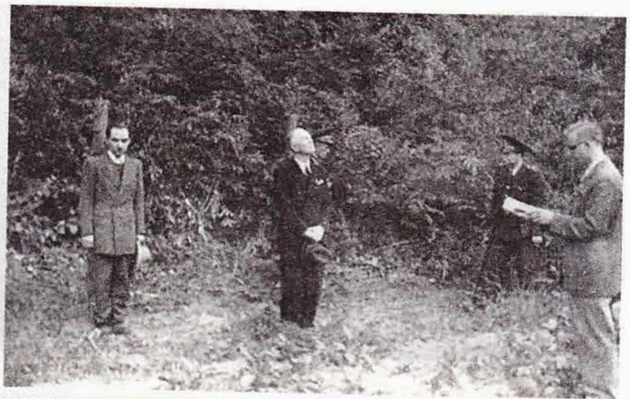
两位安东尼斯库最后都被判处死刑，米哈伊国王拒绝考虑对其签署赦免令。1946年6月1日在布加勒斯特郊区日拉瓦监狱附近的桃树谷（Valea Piersicilor）被枪决。一道被枪决的还有原特兰西尼斯特里亚总督乔治·阿列克西亚努和原宪兵司令康斯坦丁·瓦西里乌。当时在罗马尼亚民间议论纷纷，谣传说行刑队的士兵都拒绝向这位前军队统帅开枪，最后是由“一伙犹太人警察”执行的枪决。

根据行刑时拍摄的纪录影片显示，安东尼斯库元帅拒绝了蒙眼布，并且在开火的一霎那举起了自己的帽子。在写给其妻子的遗书中，这位前罗马尼亚“领袖”不忘刻薄地批评罗马尼亚人民及其国王对他的“忘恩负义”。


1946 年视察海军的米哈伊国王与彼得·格罗查首相

元帅的遗孀玛丽亚·安东尼斯库1946年从苏联释放回国（她是在1944年9月被“人民阵线”逮捕的），1950年和其他一些战犯一道再度被捕，罗马尼亚人民法庭指控她犯有“经济罪行”，并判处5年监禁。玛丽亚·安东尼斯库在1955年获释，流放到外地，1964年因心脏病去世。其他一些被判刑的前“战犯”也在五十年代中期陆续被释放，接受“社会重新安置”，其中甚至包括几名被判处终身监禁的将军和大臣。

两位安东尼斯库被处决后，曼纽继续在政治上活跃了一年。在1946年



1946 年 6 月 1 日处决安东尼斯库等人的档案照片。右上图中站在安东尼斯库元帅旁边的是米哈伊·安东尼斯库

11月的罗马尼亚新议会大选中，执政的“民主政党联盟”（包括罗马尼亚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农民阵线、以前王国首相塔塔列斯库为首的国家自由党一派、以安东·亚历山德雷斯库为首的国家农民党一派）一共获得348席，其中67席分配给罗共，70席分配给格罗查的农民阵线，而塔塔列斯库那一派的国家自由党得到了75个席位；在“历史性政党”中，国家农民党里追随曼纽和米哈拉凯的那一派得到了32席，国家自由党里追随布勒蒂亚努的那一派获得了3席。盟国管制委员会的观察员认为，在这次选举中存在着舞弊，但是斯大林有一句名言：“选举并不依赖谁投票或者怎么投票，而是看谁计票”。在那次选举过后，罗马尼亚民间流传着一个政治笑话，说“每一次曼纽走进投票箱，出来的都是格罗查”。现在罗共通过“民主政党联盟”实现了对政权的有效控制，但是西方盟国并没有对此提出异议，因为罗马尼亚的命运早在1944年10月就被决定了。

1947年7月，曼纽这个终于和国家农民党的其他一百多名成员被逮捕了，并被指控“阴谋发动叛乱”。司法部长卢克雷蒂乌·帕特拉什卡努对这起案件特别感兴趣，因为他本人急于洗刷自己身上的政治污点——由于在安东尼斯库时期没有被关入监狱，而在1944年险些被归入“福里希－科夫勒叛徒集团”一伙。

有证据表明，国家农民党的一些拥护者确实曾经轻率地和美国特务谈论过“对共产主义进行武装抵抗”的计划。尽管曼纽和米哈拉凯没有直接牵连在内，但却有人计划把他们空运出罗马尼亚，在国外建立一个“流亡政府”。1947年11月，这两位政治家出庭受审，审判他们的法官在安东尼斯库政权时期曾经担任监狱和拘留营的官员。在庭审中，曼纽高傲地为自己辩护，坚持认为格罗查政府非法，因为它破坏了和约中保证政治自由的那些条款。最后曼纽和米哈拉凯都以“密谋颠覆政府”的罪名被判处终身监禁和强制苦役。曼纽在1953年死于锡格特监狱，死因是长期饥饿，他的尸体被看守漫不经心地丢进了监狱院子当中的死人坑。

1947年11月，外交大臣塔塔列斯库被指控有玩忽职守罪，并被投了不信任票。他和国家自由党的所有成员都被清洗出政府，罗共元老安娜·波克成为新的外交大臣（这是世界上担任这种职务的第一位女性），犹太党员瓦西里·卢卡（Vasile Luca）接管了财政部。随后国家农民党及国家自由党都被宣布解散。12月，罗马尼亚国防部也开始由罗共直接领导，埃米尔·波德纳拉希出任国防大臣。

在老一代的西方式政党政治领导人纷纷被逮捕和清洗的同时，米哈伊国王和王室的处境也好不到哪去。1947年夏天，罗马尼亚共产党的领导人邀请铁托和南斯拉夫的一些领导人去喀尔巴阡山打猎，并招待他们住在锡纳亚的王室行宫里。在豪华的佩列什城堡，罗马尼亚的新统治者们为南斯拉夫人举行了晚宴，但是彼得·格罗查没有出席这次宴会，因为他的出身是特兰西瓦尼亚的地主，还担任国王的首相，因此对于参加在王室城堡里举行的宴会这类活动感到不自在。据出席这场宴会的德热拉斯回忆说，宴会很丰盛，有各式各样的罗马尼亚名菜，还有一些罗马尼亚吉普赛人热情地唱歌跳舞（罗马尼亚保卫人员后来从这些吉普赛人身上搜出了许多王室的银器）。第二天，南斯拉夫的保卫人员告诉铁托说，在他们举行宴会的同时，罗马尼亚王室的成员也呆在同一座城堡里，被关在楼上的房间里，不让出来。这让南斯拉夫客人感到很不舒服，仿佛是好像一伙擅自闯入别人家里的精干强盗的一员。

1947年11月，米哈伊国王终于获准离开罗马尼亚，去伦敦参加伊丽莎白公主与菲利普王子的婚礼，或许是希望他从此不再回来——实际上他本人也不想回罗马尼亚，但英国人和美国人都力劝他回国，丘吉尔叼着雪茄对他说“当一名国王就意味着要勇敢无畏”。在这次婚礼上，26岁的米哈伊认识了波旁－帕尔马王室的安娜公主，并且在与她订婚后返回了布加勒斯特。他发现政府不批准他与这位公主在罗马尼亚举行婚礼的要求，因为这将会进一步提高这位年轻国王的声望。

1947年12月30日，乔治乌－德治和格罗查调动“弗拉基米雷斯库师”（这个以1821年瓦拉几亚起义首领命名的师是苏联人在1943年成立的，由特别“进步”的罗马尼亚战俘组成，类





1947年8月罗马尼亚货币改革前发行的500万列伊（左上）和改革后的新币100列伊（左下）。当时的比例是100万旧币换50新列伊，企业主只能兑换相当于全体雇员两个月工资总额的旧币。其结果是流通中的50万亿列伊旧币只兑换了22万亿，罗马尼亚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储蓄全都作废了。注意旧币的图案是母狼为雷慕斯和罗慕鲁斯兄弟哺乳，这是罗马城的徽记，反应了当时罗马尼亚的拉丁文化认同

似由波兰人组成的“柯希秋什科师”）包围了王宫，将忠于国王的王室卫队成员全部看押起来。按照米哈伊本人的说法，格罗查用手枪威胁国王，还威胁说如果国王不退位，就立即枪毙1000名在此前几次声援王室的示威活动中被逮捕的“反动学生”。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导人恩维尔·霍查则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他后来和罗共领导聊到此事时听到的说法是，举枪的人是乔治乌－德治。不过，按照苏联情报部门档案中的说法，当时的苏联副外长安德烈·维辛斯基和国王进行了谈判，许诺支付一笔养老金，供其在墨西哥居住。

无论真实情况如何，总之米哈伊还是被迫在退位诏书上签了字，并且宣读了一份预先写好的退位声明。当天稍晚的时候，这份声明被送到电台广播，罗共随即宣布成立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1948年1月3日，米哈伊国王偕同他的母亲和28名王室成员离开罗马尼亚，前往他母亲的祖国希腊去避难。按照斯大林的指示（“这样能让他快点滚蛋”），罗共领导人除了给他50万瑞士法郎现金之外，还宽宏大量地允许米哈伊国王带走了愿意随其出国的所有王室侍从，一些黄金和宝石，他父亲积攒的珍贵邮票，四辆汽车，以及能带得动的任何王室艺术品收藏（他在参加伊丽莎白公主的婚礼时就把42幅珍贵油画带到了英国）。米哈伊离开罗马尼亚时带走的财产一共装了两节车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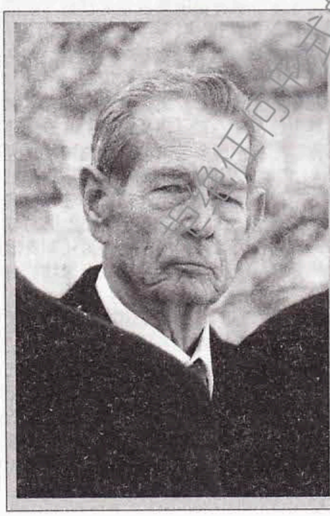
1948年6月，米哈伊和安娜公主在雅典举行了婚礼，随后前往英国和瑞士居住，两人育有五个女儿。罗马尼亚政府在1948年剥夺了前国王和所有霍亨佐伦王室成员的公民权，1989年罗马尼亚剧变后，米哈伊在1992年获准回国访问。但是他受到的热烈欢迎引起了扬·伊利埃斯库总统的嫉妒，因此在随后的五年里又被禁止入境，直到1997年伊利埃斯库下台才重新获得罗马尼亚公民身份。2002年，罗马尼亚国会通过了归还王室财产的法令，并在随后的几年里将布加勒斯特的伊丽莎白宫、锡纳亚行宫和其他一些王室城堡还给了米哈伊。

1947年12月30日，罗马尼亚成为人民共和国，并且通过了一部以1936年苏联宪法为蓝本的新宪法。“大国民会议”（Marea Adunare Nationala）成为国家最高的权力机关，其主席团由主席、书记和其他17名成员组成，在休会时代行其职责，大国民会议主席也是国家元首，其首任人选由世界著名的内分泌学科创始人康斯坦丁·帕洪博士担任。掌握罗马尼亚政府的“民族民主阵线”被更名为“人民民主阵线”，政府本身也仿照苏联把名字改成了“部长会议”，部长会议主席就是原先的首相。这一职务继续由对罗共忠心耿耿的彼得·格罗查博士担任。


1947年11月在法庭上受审的尤利乌·曼纽


流亡的米哈伊国王与安娜·德·波旁－帕尔马公主的婚礼，1948年6月，雅典

罗马尼亚共产党本身在1948年2月与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合并，更名为“罗马尼亚工人党”（Partidul Muncitoresc Roman）。这在当时的东欧各国是流行的政治趋势：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东德分支与德国共产党合并，改组为“德国统一社会党”；匈牙利共产党与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合并组成“匈牙利工人党”（后来改名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波兰工人党（即1942年重建的波兰共产党。第一代波兰共产


左为2007年时的米哈伊。根据1923年的罗马尼亚宪法，女性是没有王位继承权的。米哈伊没有儿子，他叔叔尼古拉也由于和铁卫军勾勾搭搭而在1937年被王室会议剥夺了王位继承权（他死于1978年，也留下了五个女儿）。米哈伊的父亲卡罗尔二世曾经在1918年和一位罗马尼亚将军的女儿齐齐·兰布里诺有过一次婚姻，齐齐生下一子，取名卡罗尔·米尔恰（有两个儿子，保罗和亚历山大），但是这次婚姻被罗马尼亚最高法院宣布无效，因此卡罗尔·米尔恰被视为私生子。不过，1955年一家葡萄牙法院裁定卡罗尔二世的婚姻合法，并允许卡罗尔·米尔恰冠上“霍亨佐伦”的姓氏；1995年罗马尼亚的法院也做出了同样的判决。

米哈伊国王退位后，曾经与其叔叔尼古拉和德国霍亨佐伦－锡格马林根家族的首领弗雷德里希亲王讨论过王位继承人问题。弗雷德里希的父亲威廉是罗马尼亚国王斐迪南一世（即米哈伊的祖父）的哥哥。当时流亡葡萄牙的卡罗尔二世在法国《费加罗报》上刊登声明表示支持弗雷德里希得到王位继承权，并断言说米哈伊将永远不能重新获得王位（这父子两人自1940年卡罗尔退位之后就再也没见过面，米哈伊甚至拒绝出席父亲的葬礼）。根据当时商定的结果，米哈伊之后的罗马尼亚王位继承人将依次是弗雷德里希及其长子弗雷德里希·威廉和长孙卡尔·弗雷德里希，并依照长幼顺序在弗雷德里希的男性后代中排列下去。

根据1923年罗马尼亚宪法的第78条和79条，在万一王室男性继承人全部绝嗣的情况下，最后一位霍亨佐伦君主将在西欧国家的王室中选定一名王子作为继承人。但是米哈伊在2007年根据欧盟法律中男女平等的条款宣布废除这条规定，指定自己的长女玛格丽特为“罗马尼亚女王储”；由于其没有子女，玛格丽特的妹妹伊琳娜公主和她1985年出生的儿子尼古拉·梅德福思－米尔斯将是罗马尼亚王位的顺序继承人（两人也有权继承英国王位，排序分别为第92和93位）。不过，其反对者指出，由于米哈伊不是专制君主而是立宪君主，因此只有罗马尼亚议会才有权通过这样的法令。

党在1938年被共产国际解散了，其流亡苏联的5000多名领导人和党员干部被屠杀殆尽）与波兰社会党合并组成“波兰统一工人党”……这种合并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二战以前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在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中占有优势地位，而共产党的人数却很少，而且由于盲目贯彻莫斯科时左时右的急转弯政策而在大多数场合下声名狼藉（比如说在罗马尼亚人民当中盲目鼓吹“特兰西瓦尼亚独立”、“南多布罗加独立”等不得人心的政治口号）。合并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欧洲国家的社会党／社民党与共产党的历史性恩怨【注】导致马克思主义的这两大派别在二三十年代势同水火，最终两败俱伤，令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上台。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使得苏联在二战后改变了对待社会党／社民党的敌视政策，并将东欧国家的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组成新的政党。


1948年在反对农业集体化的暴动中被安全部队击毙的一名摩尔达维亚农民

在1948年到1952年期间，罗马尼亚像其他东欧国家一样经历了一场摧毁旧有社会结构和价值观的巨大变革，并且按照苏联的斯大林模式建立了一个新社会。工业企业、银行、保险公司、交通运输业、电话、无线电广播、矿山、铁路都被收归国有，除了属于盟国公民的外国所有者之外，不付任何赎金。1948年通过特别法令把王室拥有的15000公顷耕地和136000公顷山林收归国有，翌年又消灭了1945年土地改革后给地主留下的50公顷以下的地产。紧接着罗马尼亚就仿照苏联那样开始了农业集体化运动，把所有的土地从私人手中剥夺走，成立集体农庄。在这一过程中，有大约八万名反抗农业集体化的农民被监禁，2300多名农民试图武力反抗集体化而被击毙。

为了巩固“人民革命”的成果，大国民会议在1948年8月授权成立了“人民安全理事会”（Rirectia Generala a Securitaii Poporului），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的罗马尼亚族少将格奥尔基·平蒂列成为其首任领导人。“人民安全理事会”是按照苏联的NKVD和“消灭间谍”（SMERSH）这两个机构的模式组建的，直到八十年代末为止，一直是罗马尼亚最令人生畏、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机构，被罗马尼亚人民简单地称为“安全部”（Securitate）。它包括技术行动部、反间谍部、监狱部、国内安全部、国家签

【注】在十九世纪末，随着科技及生产力的进步和社会形势的变化，加之俾斯麦等政治家为了避免革命而大力推行社会改良主义和全民福利制度，欧洲（特别是西欧和中欧）工人阶级的生活得到大幅度改善，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也由此发生了变化。晚年的恩格斯甚至在1895年3月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随着西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发展，将来无产阶级政党在民主国家可以利用议会民主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恩格斯去世后，伯恩施坦等人根据晚年的恩格斯主义思想，强调利用议会民主的手段“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在早年提出的“暴力革命”观点。伯恩施坦派的论点遭到列宁、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克拉拉·蔡特金等左翼社会主义者的批判。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导致社会主义者分为两派：1915年在瑞士齐美尔瓦尔德举行的第二国际（社会主义者国际）会议上，右派认为应当保卫国家和民族利益，支持本国参加战争；左派则认为一战是帝国主义之间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战争，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应该超越“狭隘民族主义”的立场，实行“革命的失败主义”，“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在本国发动无产阶级革命并夺取政权。第二国际从此正式分裂为两派，即“左翼”的科学社会主义派和“右翼”的民主社会主义派。

1918年，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七大上主张回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建党原则，把党的名字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派）”更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苏联成立后在1925年改名为“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即“联共（布）”，1952年改名苏联共产党）。此后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左派也普遍响应，纷纷另建共产党，并在1919年组建了共产国际（第三国际）。与此同时，各国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也组成了社会主义工人国际。

一战结束后，社会党／社民党和工党在德国、奥地利、英国、瑞典、丹麦等国通过多党选举、平等竞争的方式上台执政，执行社会改良主义路线，并且通过了一些增进工人和农民权益的法律。与此同时，当时欧洲实力最强大、人数最多的社会主义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推翻德皇之后成立了谢德曼－艾伯特政府，和军队一起用武力镇压了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等“斯巴达克团”（德国共产党前身）发动暴动夺取政权的行动，这被以布尔什维克为首的各国共产党人视为对革命的叛卖。与此同时，共产党人在巴伐利亚和匈牙利建立共产主义政权的行动也以失败告终。这些事件标志着西方共产党人与社会党人的矛盾陷入不可调和的状态。

在二三十年代，共产国际攻击社会党人为“社会法西斯主义者”，并且采取一切措施来破坏社会党的政治努力，比如斯大林在1925年就曾经说过，最重要的是应当让德国共产党来代表德国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因此德共的任务就是要压倒德国社民党，把它削弱为无足轻重的少数派，“没有这样的前提，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想象的……如果在工人阶级内部有两支旗鼓相当的对立派别，那么，即使在最有利的条件下，革命也不可能取得持久的、牢固的胜利。”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德国共产党曾经多次与纳粹党联手（甚至把1923年由于在鲁尔区从事破坏活动而被法国占领军处死的纳粹殉道者阿尔伯特·施拉格特封为“无产阶级英雄”），并对占政治多数地位的德国社民党发起攻击。德共和纳粹这两个政党拥有足够的创新精神和现代化的宣传技术，可以采用新型的群众鼓动工作，而德国社民党的老派政治家们却举止温和、严守传统，这对于争取那些已经倒向极左或极右的贫穷的德国无产阶级来说当然很不得力。在1932—1933年德国政治危机期间，德共再度与纳粹党联手挖魏玛共和国的墙角，并且提出了一种异想天开的“法西斯主义不可避免”论，即按照历史发展的必然（宿命）规律，希特勒主义将不可避免地会首先取得胜利，然后将暴露出它无力拯救德国，于是德国的工人阶级最后就会认清只有共产主义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德共的盘算是，先让希特勒上台，“他不到一年就会把德国搞糟的，然后到第二年秋天我们就可以夺权啦”——事实证明，其结果当然与德共所预想的相反。到第二年秋天，德共党员基本上全都进了集中营。

进入三十年代中期以后，共产国际吸取了德共与德国社民党鹬蚌相争两败俱伤、结果导致纳粹上台的教训，开始在法国和西班牙等国发起由共产党和社会党共同建立“人民阵线”的运动，但这一运动不久便随着西班牙内战的爆发和法国右翼政党上台而告终。斯大林不久就在本国发起了“大清洗”运动，各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在这次运动中损失惨重，到1943年连共产国际也被解散了；而西欧各国的社会党和社民党也由于纳粹德国的占领而遭到了残酷的镇压。

二战结束后，欧洲社会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宿怨大体上得以化解，六个东欧国家（不包括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的社会党全部并入共产党，其中波、匈、罗、东德四国的共产党还为此改变了党名；西欧国家的社会党和社民党则在1951年组成了社会党国际，为实现民主社会主义这个目标而努力。与此同时，在东欧各国执政的共产党也改变了对西欧社会党的看法，不再将其视为敌人，而视之为另一种有重大影响的社会主义流派，是应该联合团结的对象和借鉴学习的朋友。

1989年东欧剧变后，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也大多更名换姓，最终转变为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由科学社会主义路线转到了民主社会主义路线上来。由于主张在保留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基础上实行社会改良、促进社会正义，因而社会党国际所主张的“民主社会主义”在最近三十年里被许多政治学家重新界定为“社会民主主义”，也被称为“第三条道路”。

证与护照委员会等部门，还拥有一支多达两万人的“安全部队”，配有火炮和装甲运兵车。“安全部队”的任务是保卫党和政府的机构、国家领导人和要员的住所及行宫、电台及电视台等等，其成员都是千里挑一遴选出来的，享有优厚的物质待遇和特权。“人民安全理事会”第五部是保卫部，直接保卫罗马尼亚党政领导人的人身安全。最后，罗马尼亚的警察部队（仿照苏联改称为“民兵”）也归“人民安全理事会”管辖。

到1952年为止，有大约18万罗马尼亚人被“人民安全理事会”贴上了“对人民共和国怀有敌意”的标签，被判处苦役劳动。他们中的许多人被送去开挖臭名昭著的多瑙河－黑海运河。这项工程由苏联设计，从多瑙河河港切尔纳沃德通往康斯坦察港以北的纳沃达里，其目的是使15000吨级的苏联远洋货轮能够为了军事和经济目的直接抵达多瑙河，避开不便航运的多瑙河三角洲。到1953年最终放弃这一工程时，已经有大约10万名劳役犯人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丧生。后来齐奥塞斯库在1973年又恢复了这一工程，把终点改为通到康斯坦察港以南的阿吉加，最终在1984年完工。

1948年铁托与斯大林的决裂，致使苏联在其他东欧各国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肃清“民族共产主义”分子的运动。在波兰、捷克、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等国，“莫斯科派”共产党在苏联的支持下向“国内派”共产党发动猛烈的进攻。在斯大林（他年轻时受过东正教神学院熏陶）提出的政治魔鬼学公式中，最犯忌的是“铁托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和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经历——这些大思想罪有时一个人一条，有时一股脑儿地加到某个人头上；除了这些大思想罪之外还有一些世俗罪名，比如背叛、间谍、犹太复国主义、战时向盖世太保出卖同志、同英国情报机关、美国中央情报局及“较小”反动国家的安全组织有秘密联系等等。

斯大林反对“铁托主义”，是因为铁托元帅的独立宣言表明，“民族共产主义”按定义就是拒绝在共产主义事业中苏联的领导作用，而这反过来又对苏联在欧洲及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形成了根本威胁。因为苏联战后精心地在自己周围建立了一个新型的东欧卫星国集团，是不愿容忍“民族共产主义”对这个集团的侵蚀的。更何况“民族共产主义”在东欧的泛滥会给苏联本国的统一带来致命的打击。斯大林对在乌克兰人、克里米亚鞑靼人、亚美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立陶宛人及其他少数民族中闹民族主义的情况记忆犹新，特别是乌克兰人和鞑靼人在1941年曾经同纳粹入侵者站在一起反对“俄罗斯母亲”，因此苏


1951年埃米尔·波德纳拉希向罗马尼亚军事学院颁发院旗



四十年代末的罗马尼亚共产党政治集会。下图中的标语是“光荣归于斯大林和苏联人民”



联的国内民族问题具有极大的潜在爆炸性，而东欧的“民族共产主义”没准会成为引发这座火药库的导火索。

至于“托洛茨基主义”的指控，并不是因为被指控者有任何托洛茨基主义的倾向或言论，而是因为这顶帽子能使正统的信仰者在心理上把“民族共产主义者”与一个几十年来一直被说成是背叛马列主义的异端的人联系起来。“民族共产主义”公式中的第三个罪状是参加过西班牙内战，这有点令人迷惑不解，不过也不是一个随意的行动。二战结束后，许多在西班牙内战失败后先被法国、然后被纳粹德国监禁的东欧共产党志愿者获释回国，并担任重要职位。这些曾经在西班牙战斗过的共产党人曾受过较多的西方思想以及苏联称之为“世界主义”思想的熏陶，此外这些人大部分是理想主义的共产党人，而斯大林难以确定，在对苏联不大方便的场合下，这种理想主义会不会再度抬头。实际上斯大林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铁托主义出现之前，就一直在消灭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苏联人甚至东欧人（更不用说西班牙的流亡者了）。

在罗马尼亚，“莫斯科派”共产党人的代表人物是安娜·波克这个犹太女人，以及瓦西里·卢卡和埃米尔·波德纳拉希等人。但是罗马尼亚的情况有其特殊性：它在1944年8月发动了脱离轴心国阵营的政变，因此乔治乌－德治等“国内派”共产党人在波德纳拉希的配合下迅速掌握了政权。波德纳拉希本人迅速投入“国内派”阵营，这一伙人在“莫斯科派”乘着苏联飞机抵达布加勒斯特之后拒绝让位，只给其留下了一些不太重要的位子。但是，在苏南分裂后，为了配合斯大林消灭东欧“民族共产主义”的需要，德治等人还是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献祭品：1944年被废黜的那个倒霉的前总书记斯特凡·福里希。他在8月23



卢克雷蒂乌·帕特拉什卡努（1900–1954），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之一，1944年与波德纳拉希一道参加推翻安东尼斯库的政变组织工作。战后任司法部长，1948年由于“民族主义”立场被捕，1954年与被推翻的前“福里希－科夫勒叛徒集团”成员罗慕斯·科夫勒一道被处决



瓦西里·卢卡（1898–1963），出生于特兰西瓦尼亚的一个塞克勒族家庭。早年参加罗共政治斗争，1933年移居苏联，成为“莫斯科派”成员之一，曾参加西班牙内战。二战后回国担任领导职务，在“莫斯科派”与“国内派”的斗争中被乔治乌－德治清洗掉。由于卢卡有犹太血统，因此斯大林认可了这次清洗

日政变后被罗共人员逮捕并长期囚禁。在乔治乌－德治和安娜·波克等领导人投票表决同意下，于1946年6月9日被秘密处决，方法是用一根棍棒活活揍死（后来在1968年被齐奥塞斯库下令平反并恢复名誉）。1948年4月，卢克雷蒂乌·帕特拉什卡努也被逮捕入狱，罪名是“对特兰西瓦尼亚的匈牙利少数民族实行狭隘的民族霸权政策”。他最终在1954年被处决了。

讽刺的是，当帕特拉什卡努被囚禁的时候，年轻的尼古拉·齐奥塞斯库这个当时默默无闻的机关工作人员被选入了党的中央委员会，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而齐奥塞斯库最终竟成了苏联阵营中“民族共产主义”的最主要鼓吹者之一。年轻的齐奥塞斯库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卒，负责过党的青年工作，当过农业部副部长，而党内真正的大人物是乔治乌－德治、安娜·波克、卢卡、毛雷尔、波德纳拉希这些人。

但是齐奥塞斯库是一个很用心的人，他一直在密切地关注和分析各位领导人的优劣，以从中找到一个“保护神”，并将其变为自己的晋身之阶。他瞧不起帕特拉什卡努这个布加勒斯特大学法律系和德国莱比锡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认为后者太软弱：1947年罗马尼亚代表在巴黎与盟国和苏联签订最终和约的时候，容易动感情的帕特拉什卡努竟然哭了起来。齐奥塞斯库从这一脆弱表现中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一个靠不住的盟友。他最终把注意力转到了同乔治乌－德治的关系上，认为只有通过这条线才能被接受，并被视为知己。

与此同时，斯大林也在对乔治乌－德治进行试探。德治有极大的可能被提升到党的领导位置上，从而压倒他的对手，即那些“世界主义”的犹太人和知识分子。1952年春天，一贯满足于控制党内行政和国民经济的乔治乌－德治开始抓权。这是一个好时机，因为年老多疑的斯大林此时已经被所谓“犹太复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以色列的威胁缠住了，在苏联和东欧发起了一场反对犹太人和“世界主义”的运动。那个倒霉的犹太女人安娜·波克有一个兄弟在以色列，虽然波克本人不是以色列的同情者，但这个亲戚让她倒了大霉。

乔治乌－德治前往莫斯科，从斯大林那里获得了实行清洗的许可，回国之后立即召开党代会，把安娜·波克、瓦西里·卢卡这两个有犹太血统的老资格“莫斯科派”同时开除出党。卢卡被按上一系列“经济破坏”的罪名，最主要的是推行农业集体化时使用暴力手段。他被判处死刑，后来在党的领导人求情下又改为终生监禁，1963年死于强制苦役。安娜·波克先是被迫退休，随后在1953年2月被捕（当时捷克斯洛伐克刚刚绞死了犹太裔的前总书记鲁道夫·斯兰斯基）。但是斯大林在1953年3月的暴毙救了她一命，她在莫洛托夫的直接干预下被释放了，余生都过着隐居的生活。

清洗掉安娜·波克和卢卡之后，乔治乌－德治控制了整个党。波克和卢卡的支持者全部被清洗出党和政府，其中许多是犹太人。彼得·格罗查博士充当挂名的政府首脑已经有七年，如今获得有名无实的晋升，成为挂名的国家元首。乔治乌－德治本人在1952年6月成为部长会议主席，即政府总理，从而同时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权力。



扬·毛雷尔（1902–2000），父亲是特兰西瓦尼亚德意志人，母亲祖先是法国人。早年学习法律，后投身政治运动，并多次被捕。二战后出任罗马尼亚总理和大国民会议主席。1974年后权力逐渐被齐奥塞斯库架空，于是退休，但作为Nomenklatura（源自拉丁文“一小撮人（名）”的俄语词，形容苏联和东欧共产党的权贵统治阶层）的成员仍享有各种优厚待遇。1989年时反对六名老党员写给齐奥塞斯库的公开信

不过，由于赫鲁晓夫在斯大林去世后实行集体领导，因此乔治乌－德治也如法炮制，在1954年4月取消了总书记一职，改设由四个人组成的书记处，其中一人——信得过的追随者，乔治·阿波斯托尔（Gheorghe Apostol）——为第一书记。但是乔治乌－德治在不久之后便发现真正的权力在党组织而不在部长会议，于是在1955年10月辞去总理职务，并把阿波斯托尔从他十八个月前所授予的位置上撵了下去。对于齐奥塞斯库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他获得了提升，才36岁就当上了党的政治局候补委员，随后进入了书记处。

当然，如果把五十年代罗马尼亚的生活单纯地理解为一群政治寡头之间的权力斗争，是片面和错误的。罗马尼亚共产党在取得政权后曾真正地试图增加农业生产，修建有价值的运河与水电站，实现铁路现代化，扩大石化、钢铁、纺织等工业的规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罗马尼亚的工业发展尚处于萌芽状态，虽然有马拉克萨军火公司、IAR飞机公司和克拉约瓦铁路车辆厂等相对现代化的企业，但是只有炼油业和木材业这两种利润稳定的部门能吸引西方工业资本。在

1771 年即开始生产的雷希察钢铁厂，以及十九世纪末投入生产的洪尼多阿拉钢铁厂，工人们仍在使用年龄达一个世纪之久的高炉和平炉来炼钢。而新政权除了对罗马尼亚传统的布加勒斯特－普洛耶什蒂、克拉约瓦－皮特什蒂和雷希察－洪内多阿拉这三个工业区进行现代化改造外，还致力于在工业不发达的东部和东南部地区兴建大型工业企业。著名的加拉茨钢铁联合企业是一例，在其他地方新工厂的厂址也尽量选在农村，尤其是较不发达的地区。

到六十年代中期，罗马尼亚的工业总产值已经是1950年的六倍以上。除了原有的雷希察、加拉茨等大型钢铁企业外，还在布加勒斯特、布勒伊拉、罗曼、特尔戈维什泰等地设立了轧钢厂、中小型钢铁厂和特种钢厂。钢铁工业为机器制造、军火、汽车及电气等工业提供了基础，这些工业自从二战以来均有扩大，产品包括工作母机、涡轮机、发电机、柴油机、农业机械、钻井设备、卡车、精密仪器、军火武器和无缝钢管等等。1966 年罗马尼亚与法国雷诺汽车公司合作，投资8000 万美元，在皮特什蒂建立了达契亚汽车公司（Automobile Dacia）引进雷诺8型轿车的生产线，制造达契亚1100 型轿车。位于布拉索夫的罗曼汽车公司是罗马尼亚另一家主要的汽车生产企业，创立于1921 年，战后主要生产“红旗”系列卡车、“罗曼”系列重型卡车和工程车、DAC 系列军用卡车、以及公共汽车。



1968 年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在皮特什蒂的达契亚汽车厂试驾第一辆驶下生产线的达契亚1100 型汽车。这是引进法国许可证生产的雷诺8 型轿车。1969 年达契亚公司又推出了仿照雷诺12 型的达契亚1300 型轿车，随后又开发出旅行车、皮卡、两门轿跑车。包括其改进型达契亚1301、1310 在内，从1969 年到2004 年一共生产了约198 万辆，中国在八十年代曾经大量进口，车型包括轿车和皮卡车。如今达契亚是法国雷诺的子公司，也是东欧国家最大的汽车生产企业之一

罗马尼亚的石化工业以其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盐、黄铁矿等自然资源为基础。1938 年之前其化工中心只分布在普洛耶什蒂－布拉索夫－布加勒斯特地区，以及克鲁日，二战后在摩尔达维亚的巴克乌、苏恰瓦、雅西和加拉茨等地新建了许多新的化工企业。有四家工厂专门用沼气生产碳黑，产品用于出口。其他化工产品有化肥、苛性碱、苏打、硫酸、合成橡胶和塑料。特别重要的是药品的生产大为增多，主要产品包括水杨酸及其衍生物、抗菌素和糖精。特兰西瓦尼亚著名的橡树森林从十八世纪起就是主要的木材来源，到二战结束时基本上已经砍伐殆尽，战后的罗马尼亚加强了对森林保护措施的重视，在采伐后的林区重新造林，并在平原建造防护林带。多瑙河三角洲的芦苇代替木材，为造纸工业提供了绝好的原料。

底土肥沃的瓦拉几亚和巴纳特地区仍然是传统的农业区，但二战后罗马尼亚对多布罗加和多瑙河三角洲地区进行了大规模开垦与灌溉，扩大了种植面积。罗马尼亚最主要的农作物是玉米、小麦和大麦，其次是黑麦和多瑙河下游的水稻。马铃薯既作为食品、又作为工业原料，其种植面积迅速增加，像甜菜一样主要集中在罗马尼亚北部和特兰西瓦尼亚。向日葵、亚麻籽、油菜籽和大豆是食用油的重要来源，主要产于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境内。蚕豆、豌豆、棉花和烟草的种植面积略有增加，商业性的葡萄园集中于摩尔达维亚和喀尔巴阡山麓，巴亚马雷的苹果与梨、比斯特里察的洋李都是优质的出口水果。多瑙河捕获的鱼占全国渔获量的80%，黑海沿岸的咸水湖和多瑙河三角洲盛产梭子鱼和鲈鱼，黑海出产的鲟鱼和黑鱼子酱是高价值的出口产品。



五十年代的罗马尼亚工人。车间标语上的字是“庆祝颁布宪法草案”

除了工农业发展迅速之外，罗马尼亚共产党政权在取得政权后还致力于促进人民的医疗和教育。罗马尼亚的城市化人口从战前的21% 上升至战后的38%，布加勒斯特的人口超过了一百万。在锡纳亚和康斯坦察，昔日王室贵族和资本家的别墅成为专门接待优秀工人子女的疗养所。由于广泛接种疫苗，婴儿死亡率减少，人均寿命从三十年代的39 岁提高到了六十年代的69 岁，全国人口从1946 年的1576 万增至1966 年的1914 万[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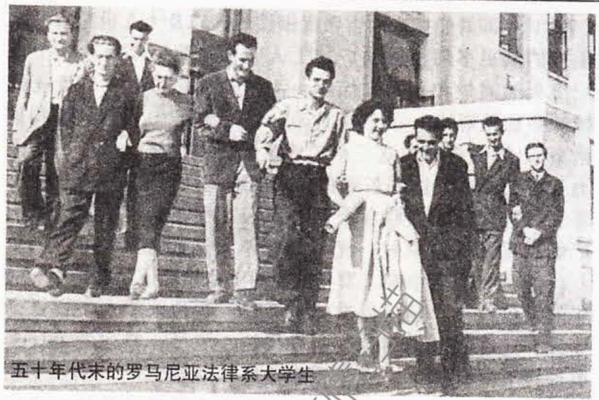
不过，在罗马尼亚逐渐迈向六十年代“黄金时期”的同时，罗共党内的一些知识分子，比如米隆·帕拉什沃斯基，也对罗马尼亚工人阶级新贵中的“新生布尔乔亚”现象提出了批判：“……在马马亚（黑海海滨疗养胜地），我有了一番前所未有的经历。我被安置在一家过去叫‘雷克斯’，如今叫‘五一旅馆’的饭店里，那里的房客大部分是

【注】1939 年时的“大罗马尼亚”人口为1993 万。它在1940 年的领土割让中损失了618 万人口，1945 年收复了260 万。直接在战争中阵亡的人数超过50 万。此外，74.5 万德意志族在战争末期和战后损失了30 多万，72.8 万犹太人几乎减少了80%，剩下的13.8 万在战后几乎全部移居以色列，到1992 年时罗马尼亚全国只剩下8955 名犹太人。

突击队的工人。这些新生的布尔乔亚阶级自私、冷漠、穷奢极欲，完全一副暴发户的嘴脸，真令人难以忍受。他们已经失去了任何自然美，佩金戴玉，大吃大喝，随波逐流。”像其他领导夫人一样，齐奥塞斯库的太太埃列娜对这样的批评大为恼火。她认为掌权的阶级有权吃好穿好，掌权者的夫人有权穿考究的时装，描眉画目，梳上高雅优美的发型，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齐奥塞斯库进入罗共中央书记处工作后，家里的日子开始变得优越起来，与其他贵人们相互间迎来送往，花天酒地，欢度着一个个良辰吉日。按照党的规定，齐奥塞斯库一家享有高干待遇，有特殊的医疗保健服务，还可以进出特供商店，那里商品充盈，市面上见不到的高级食品、洋酒、糖果、巧克力、进口化妆品应有尽有。齐奥塞斯库夫妇的长子瓦伦丁在专供党的高干子女就读的彼得·格罗查学校就读，这座学校设在布加勒斯特市郊，环境优雅，空气清新，距党的高干居住区奇斯列夫大街不远。

齐奥塞斯库夫妇的独女卓娅和他们最疼爱的宝贝疙瘩——小儿子尼库也受到无微不至的照料。营养学家按照科学方法为他们配餐，肉和水果每餐必备，进餐有固定的时刻，定期称量体重，对卫生也刻意追求。不过，埃列娜本人虽然刻意追求衣着的华丽，却像同龄的东欧妇女一样不大注意保持身材的苗条。资产阶级消失了，而他们过去享用的肉质鲜嫩、香气扑鼻的鲟鱼却不应从餐桌上消失。



五十年代末的罗马尼亚法律系大学生



一群罗马尼亚边防军军人在跳民间舞

齐奥塞斯库时代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秘密报告在东欧国家掀起了巨大的波澜，在这些国家掀起了“非斯大林化”的浪潮，原来的斯大林主义领导人纷纷下台。在罗马尼亚，斯大林的忠实信徒乔治乌－德治的处境也十分不妙，党内有人对他两年前处决帕特拉什卡努的行为提出了异议，并且试图让他下台。布加勒斯特军事学院的一些青年军官甚至策划组建一个民族主义的革命团体，并使罗马尼亚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在这场政治风波中，齐奥塞斯库坚定地站在乔治乌－德治一边。他认为，斯大林个人犯了错误，但党作为一个整体是无可指责的。“非斯大林化”的纠偏工作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而且只有党才能领导纠偏工作，否则人们就会随心所欲，局面就将变得难以收拾。

波兰和匈牙利的局势变化表明齐奥塞斯库的看法是很有道理的。匈牙利的拉科西也像乔治乌－德治一样抵制着改革者的压力，但最终被他的苏联保护人一脚踢掉了，由受到人民拥护的伊姆雷·纳吉取而代之，随后在匈牙利出现了一系列要求摆脱苏联体制的迹象。罗马尼亚领导人对匈牙利的事态极为关注，因为在边境的这一边，特兰西瓦尼亚的匈牙利族学生和市民也在克鲁日等城市举行了游行示威。乔治乌－德治主动提出同苏联人一起对匈牙利进行武装干涉，但是苏联决定独自出兵匈牙利。在苏军坦克过境特兰西瓦尼亚时，罗马尼亚提供了军事支援（同时苏联军队的出现也让当地少数匈牙利族狂热分子的头脑冷静了下来），不过一向以粗鄙著称的赫鲁晓夫事后却对对此开了一个不合时宜的玩笑：他在访问布加勒斯特时对乔治乌－德治说：“你们罗马尼亚人啊，1919年是站在反动派一边的，镇压了匈牙利的革命……”罗马尼亚的同志们出于国家的最高利益忍下了这种粗鲁的幽默，没有同他计较。

作为对在匈牙利事件中支持苏联的报答，乔治乌－德治小心翼翼地提出了苏军撤离罗马尼亚的问题。这支军队驻扎在罗马尼亚的名义是保护从苏联本土到奥地利苏占区的人员与物资运输路线。但是1955年盟国与奥地利的条约使得奥地利苏占区不复存在，于是罗马尼亚人开始巧妙地利用这一外交变化来为自己谋取利益。到1958年6月，赫鲁晓夫十分有把握地觉得罗马尼亚将继续支持他，于是便把自战后一直驻扎在罗马尼亚的全部苏军部队撤出了这个国家，或是渡过普鲁特河撤到比萨拉比亚，或是向西撤至匈牙利。在这之后，也就是说乔治乌－德治觉得苏联军队离开、自己的地位已经稳固之后，便发动了又一轮针对真



左图：1960年乔治乌－德治在布加勒斯特接待访问罗马尼亚的赫鲁晓夫

正的或想象的“斯大林主义者”的清洗运动，数万人被关入强制劳动集中营，或被判处死刑。

乔治乌－德治把工业化当作通向共产主义道路中的一项主要里程碑，并对此深信不疑。继1949年的两个一年计划、一个五年计划和一个四年计划，罗马尼亚在1960年开始了一项开发特兰西瓦尼亚矿藏和在多瑙河增建水电站的六年计划，并且在加拉茨建设一座大型的钢铁联合企业，乔治乌－德治二十几岁时在这里当过电车轨道修理工；还有一个项目是距布加勒斯特一百多公里的斯拉蒂纳铝厂。乔治乌－德治在党代会上宣布这些计划时，赫鲁晓夫在场并为此热烈鼓掌。但是两年之后，1962年8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经济互助委员会”会议上，这位苏联领导人却提出了一个新的东欧经济发展规划：在“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国际分工中，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将成为农业国家，罗马尼亚还负责提供石油、天然气和工业原材料，而把工业生产留给那些已经成为工业化国家的成员，比如东德和捷克。

乔治乌－德治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他遵循经济互助委员会（也就是苏联）的新计划，罗马尼亚将继续依赖苏联，这将破坏罗马尼亚人的民族主义感情，甚至可能会结束他自己的统治。其他罗马尼亚人对苏联人的专横也气愤不已，它无视罗马尼亚已经成为工业增长率最高的东欧国家这一事实，使罗马尼亚的六年计划、以及为此投入的大量资金和劳力全部泡汤；它忽视了那些未经开发的、到八十年代初将有可能使罗马尼亚成为一个像捷克斯洛伐克那样发达的工业国家的自然资源；罗马尼亚的共产主义是建在工业化和现代化基础上的，不能存在倒退和改变方向的问题。把那些来自农村并已成为一代新人的工人再赶回农村去是不可想象的。

在这种大气候下，派往经济互助委员会各个分委员会的罗马尼亚代表拼命反对这项建议，到1963年秋天，提出这些建议的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似乎已经把建议做了重大修改，甚至可能已经抛弃掉了。但是罗马尼亚人并没有忘记这笔帐，他们在反对经互会计划取得胜利之后继续对苏联表现出“独立性”，在国内事务方面，在教育、文化、甚至为街道广场命名这种事情上，各种反苏的刺激性小动作都得到鼓励。罗马尼亚开始与美国和西欧，特别是西德和法国的制造商联系，以建设筹划中的加拉茨钢铁联合企业。1962年11月，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宣布加拉茨钢铁联合企业的建设合同被授予一家英法合资财团，钢铁厂的一系列设施将在1966年竣工。



1965年乔治乌－德治的葬礼，前排左四为周恩来



1955年乔治乌－德治和波德纳拉希乘专列前往华沙，参加华沙条约组织签字和成立仪式，基伏－斯托伊卡为他们送行

与此同时，罗马尼亚在政治上开似乎向北京靠拢，因为那时中苏两党也发生了争吵和决裂。乔治乌－德治曾经试图以调解人的身份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斡旋，两个大国都接受了。虽然他的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但这却使得他在使罗马尼亚自身偏离苏联政策时得到了中国的大力支持。在其他经互会国家减少与中国的交往的时候，罗马尼亚却扩大了与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的贸易。罗马尼亚国内的报纸上公开发表了《人民日报》对赫鲁晓夫进行的批评的主要内容，部长会议主席毛雷尔在1964年2月访问了北京，而周恩来总理在1966年进行了礼节性回访。

另一方面，乔治乌－德治也不想同莫斯科彻底决裂，他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让赫鲁晓夫知难而退。北京可能对布加勒斯特产生影响这一威胁确实也使得赫鲁晓夫及其后继的苏联领导人容忍了罗马尼亚的“反苏小动作”，不过赫鲁晓夫在1963年曾经试图对访苏的波德纳拉希提出推翻乔治乌－德治的“建议”。波德纳拉希无动于衷，并在几年之后率领一个外交代表团访问贝尔格莱德和北京，表明他无意再次给苏联充当仆从。为了向苏联展示自己的自信，乔治乌－德治甚至在1963年春天实行了全国大赦，甚至连那些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家伙也获得了减刑。

1964年4月23日，罗马尼亚党报《火花报》发表了一份声明，确切宣布罗马尼亚的立场：它谴责经济互助委员会的超国家政策，重申每个东欧共产党国家都享有自己的国家主权，各共产党之间一律平等，强调所有国家都有决定本民族未来前途命运的权力，坚决主张任何一个党的政策都不应该听命于其他党。这份声明后来被称为“罗马尼亚的独立宣言”。

1965年1月，乔治乌－德治开始经常出现胸部憋闷、呼吸短促和连续咳血等症状，不久被诊断出患有肺癌。尽管齐奥塞斯库和党的其他高层领导人都在静悄悄地等着他完蛋，但气息奄奄、日薄西山的德治还在以超人的毅力与疾病搏斗。他十分想活下去。他十分留恋到那时为止还属于他的那个奢华世界：布加勒斯特豪华的宫殿，黑海岸边消魂的夏宫，喀尔巴阡山空气清新的山间别墅，还有那热闹非凡的狩猎场面……死神将把这一切都从他手中夺走，他对此十分气恼。

乔治乌－德治的病情对普通民众保密，但罗马尼亚是个小国家，消息很快流传了出来。市井间议论纷纷，有些

人甚至掩饰不住快意地说他是在访问莫斯科时被苏联人用放射性物质偷偷照射后致癌的。1965 年 3 月 19 日 17 时 43 分，乔治乌－德治离开了人间。有 33 个外国代表团出席了他的国葬仪式，其中包括 20 多个非共产主义国家，也包括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高扬和中国总理周恩来。在治丧的那几天里，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大楼中乔治乌－德治的办公室向老百姓开放参观，人人都泪流满面，但心里充满好奇。德治生前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个巨大的加拉茨钢铁联合企业的模型，代表着他的遗愿。

乔治乌－德治在临终前指定乔治·阿波斯托尔为他的继承人，但是阿波斯托尔的政敌扬·毛雷尔却对此心生嫉恨。在他的奔走活动下，罗共中央委员会在 3 月 22 日召开了全体会议。在政治局的推荐下，中央全会一致选举默默无闻的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担任第一书记。毛雷尔继续担任总理，基伏·斯托伊卡担任大国民会议主席（国家元首）。

不过，1965 年 9 月罗马尼亚领导人的苏联之行让齐奥塞斯库的推荐人毛雷尔看清了他的真面目，并为此后悔不迭。毛雷尔发现齐奥塞斯库是一个权欲熏心、贪图享乐、又十分工于心计的人。毛雷尔自认够圆滑的了，而站在齐奥塞斯库面前也自叹弗如——按照日程安排，罗马尼亚代表团除了莫斯科之外还要访问列宁格勒和伏尔加格勒（斯大林格勒）。齐奥塞斯库在列宁格勒发表了演说，纪念“苏罗反法西斯共同战争的伟大胜利”。但是，到了伏尔加格勒之后，他却把他的对手阿波斯托尔推出来讲话，因为他深知在这个城市里再发表类似的讲话，在罗马尼亚国内引起的反响就会适得其反，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许多罗马尼亚人同德国人一起将性命葬送在了这里。他的手腕真够高明，不过这一点并没能逃过他同事的眼睛。

齐奥塞斯库掌握第一书记的权力后，先是解除了其老对头阿波斯托尔国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职位，随后又粉碎了内政部头子亚历山德鲁·德勒吉奇再次拼凑亲苏派别的笨拙尝试。在党中央全会上，齐奥塞斯库愤慨地宣布当年被处死的帕特拉什卡努是无辜的，他的死是由于乔治乌－德治及其谋士德拉吉奇的错误造成的。全场为此欢声雷动，德治的追随者们都被镇住了。最后，在 1967 年，齐奥塞斯库从基伏·斯托伊卡那里接掌了大国民会议主席的职务，从而把党的首脑和国家元首的职位合并在一个人的身上。这是“齐奥塞斯库时代”的正式开始。


1965 年齐奥塞斯库接待出席罗共九大的中国代表团长邓小平和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


1966 年周恩来访问罗马尼亚，与波德纳拉希去外地参观

1966 年齐奥塞斯库与其他罗共领导人在马拉谢什蒂会战纪念堂参加这次战役 50 周年纪念仪式，这也是罗马尼亚在六十年代走向民族独立路线的标志之一



在剪除了政治异己之后，齐奥塞斯库确实也开始了一个变革的时代。罗马尼亚工人党在 1965 年把名字改回“罗马尼亚共产党”，这一年还通过了新的罗马尼亚宪法，把国名从“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改成了“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1952 年宪法中所规定的“匈牙利族自治区”（基本上由位于特兰西瓦尼亚东北角的三个塞克勒族聚居县组成）在新宪法中没有得到提及，而 1967 年罗马尼亚更改行政区划后更是把这个自治区取消了，全国变成了四十八个县，与卡罗尔二世在位时的行政区划极为相似。

匈牙利族自治区的取消与罗马尼亚民族主义的复苏几乎发生在同一时期。1940 年失去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之后的忿恨情绪在 1945 年之后首次被公开化了。罗马尼亚科学院在 1964 年发表了一篇卡尔·马克思未被编入文集的手稿，这篇文章抨击俄国人于 1878 年吞并比萨拉比亚，并在那里实施苛政。尽管马克思抨击的对象是沙皇暴政，但是沙皇的所作所为实际上与八十多年后的共产主义伙伴苏联的所作所为令人难堪地相似。

罗马尼亚官方一直注意避免公开流露要求修改 1947 年《巴黎和约》的情绪，因此齐奥塞斯库在 1966 年 5 月 7 日发表关于罗马尼亚共产党历史的长篇演说时，他只是强烈谴责昔日共产国际号召肢解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罗马尼亚、以及罗马尼亚在“不公平的条件下”根据第二次维也纳仲裁把特兰西瓦尼亚北半部割让给匈牙利，却让听众自己去判断，罗马尼亚同时被迫割让土地给苏联、并在战后确认其为苏联领土是否也不公道。齐奥塞斯库在演说结束时强调“为摆脱外国压迫的桎梏而奋斗了几个世纪、梦想自由

和民族独立”的罗马尼亚各族人民决不会甘心“放弃这些神圣的特权”，从而向人民表明了他自己与布勒蒂亚努家族以及死在人民共和国监狱里的尤利乌·曼纽一样，也是一位罗马尼亚的爱国者。

1968年8月20日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令齐奥塞斯库极为愤慨，特别是他在入侵之前几天还对布拉格做过拜访。苏联、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和东德的军队在一夜之间越过边界，并占领了布拉格，而罗马尼亚是华沙条约成员国中唯一拒绝参加这一干涉行动的（阿尔巴尼亚不算，它早在中苏分裂时就不参加华约的例行活动了）。一时间罗马尼亚全国舆论哗然，人情汹汹，大家都认为罗马尼亚有成为第二个捷克斯洛伐克的危险。内政部向齐奥塞斯库报告说年轻人准备去边界战斗，以阻止苏军的坦克前进。甚至流亡在国外的罗马尼亚人也打来电话，说他们准备回国，投入到卫国战争中去。齐奥塞斯库感到人民正期待着他出来主持正义，他必须站出来向人民讲话。



1968年8月21日齐奥塞斯库（身穿深色西服回头者）在共和国广场党中央大厦阳台上对群众发表演说，谴责苏联侵捷。21年后他在同一个地点被人民嘘下台

8月21日，齐奥塞斯库在共和国广场旧王宫的阳台上向全国人民发表了讲话。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心情复杂，既恐惧又怀着几分希望。齐奥塞斯库有点歇斯底里，声调尖利刺耳，一开口就谴责苏联人的侵略行径，说这是一次惨痛的错误，并“对欧洲的和平和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前景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人们被齐奥塞斯库的大无畏精神惊呆了，青年们开始向他欢呼。对着广场上的10万人群，齐奥塞斯库宣布：“我决定，从今天起，在全国建立由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组成的爱国卫队，以保护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独立。”他又说“选择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各个共产党和各国人民自己的事。”

罗马尼亚人既受鼓舞，又感到焦虑。第二天，齐奥塞斯库又在大国民会议特别会议上发表讲话，一开始就说“大国民会议的这次会议是在社会主义各国以及我们大陆上其他各国政治生活特别严重的时刻召开的。我们全党、全国人民一致认为，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干涉是极端错误的。”他的发言被议员们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打断。

这样，齐奥塞斯库不仅利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将罗马尼亚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在他的周围，而且在国际舞台上树立了面对苏联强权屹然不动的勇敢形象，令毛雷尔和波德纳拉希等人相形见拙（这些人不久之后就全都悄然隐退了）。为了鼓励罗马尼亚表现出来的“勇敢的独立自主政策”，美国总统尼克松、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和法国总统戴高乐都曾去拜访齐奥塞斯库。戴高乐对罗马尼亚的国事访问是在1968年5月14日至18日，罗方为此做了无微不至的准备，在戴高乐抵达那天，布加勒斯特全城放假半天，20万人倾城出动，夹道欢迎这位将军。罗马尼亚的报纸开始重新强调本民族古老的拉丁特色，并且热烈祝福连接巴黎和布加勒斯特的纽带。

齐奥塞斯库对戴高乐的接待规模超过任何一个别的华约成员国，但是有一点却让欢迎仪式的组织者束手无策，这就是将军那高达1.95米的身躯使齐奥塞斯库显得更加矮小。当时在布加勒斯特广为流传的一个笑话说，当戴高乐夫人伊冯娜走下舷梯，看到齐奥塞斯库的身材之矮小时，情不自禁地说“我的上帝啊”，这时会说流利法语的埃列娜转向她的丈夫，美滋滋地说：“听啊，他们管你叫上帝呢。”

1968年5月齐奥塞斯库与来访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向布加勒斯特市民挥手致意。这次访问后，布加勒斯特的一个新建广场更名为“夏尔·戴高乐广场”



罗马尼亚在六十和七十年代初推行的工业化政策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全国普遍加了薪，人民大众安居乐业，大量消费品出现在市场上，“赶快发财”的实利主义风气弥漫到社会的各个阶层。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一时期的文化也呈现出自由开放的特点。西方的电视连续剧被允许在罗马尼亚的电视台播放，而百事可乐的灌装工厂也在1968年落成。

在安东尼斯库时代出生的年轻一代正在长大成人，他们生活在一个可以发挥聪明才智、获得晋升和幸福的国度里。这些年轻人在技术方面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但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十分幼稚。他们会熟练地背诵马列主义课本中的关键段落，但入党对于他们来说只是尽快达到升官和发财目的的手段。他们无论是当工程师、技术员还是政府官员，个个都野心勃勃，但又不会忘乎所以。如果他们一时心血来潮，想买条牛仔裤穿穿，买包“肯特”香烟抽抽，或是买一块瑞士巧克力开开洋荤，他们完全可以在黑市上从玩得饶有兴致的外国游客那里换到外币，然后从专为外国人开设的商店里购得这些奢侈品。这一代人中的大多数会心甘情愿地跟随一个带给他们无限前途、帮助他们免遭父母那辈人过去厄运的人闯天下。齐奥塞斯库提出的宏伟计划很能迎合他们的胃口。


1970 年齐奥塞斯库与来访的中非总统博卡萨检阅仪仗队。1976 年博卡萨称帝后，罗马尼亚向他提供了一名年轻貌美的“云雀”舞蹈团女演员做妾，但其真实身份是罗马尼亚特工

齐奥塞斯库跨越了一个新阶段，现在已经成为在国内和国际上都举足轻重的领导人。他总是拿自己跟铁托相比，比较他们两人所取得的成果。不妙的是，与在整个铁托时代始终生气勃勃的南斯拉夫相比，罗马尼亚从六十年代末起逐渐开始表露出了社会停滞和僵化的迹象。虽说现在全国都跟着齐奥塞斯库走，但似乎不明白为什么跟他走。罗马尼亚的平民百姓并未像南斯拉夫人追随铁托那样对他们的“领袖”亦步亦趋。当然，一切都那么平静，没有任何造反的迹象，没有任何反对意见，人人都惟命是从，但是也没有可以振奋人心的全民族的宏图大志。技术官僚们不愿意搞大的项目，知识分子们也不老老实实地去做宣传教育工作，而只满足于在作家协会里闭门清谈。在基层，人们只满足于琐碎的小事。整个党和整个社会一道开始变得保守、僵化、墨守成规。


1971 年齐奥塞斯库夫妇访问中国


1971 年齐奥塞斯库夫妇访问朝鲜

1971 年，齐奥塞斯库夫妇对中国、朝鲜、越南和蒙古进行了访问，回程时还简短访问了莫斯科。这次旅行是这两个人生涯中的转折点。齐奥塞斯库夫妇在北京看到的是整整齐齐的建筑和街道，步行和骑自行车的群众很守纪律。中国的干部也骑车上下班，不愿被闷在可笑的“达契亚”牌小汽车里，而在罗马尼亚，小干部们却对这种轿车垂涎三尺。伊琳娜注意到中国的妇女群众穿着清一色的、朴素而简单实用的服装，与俗里俗气的罗马尼亚女人大不相同：后者受土耳其人历史统治的影响，弄不到只能用外汇购买的高级香水，就去争先恐后地抢购保加利亚香水。这种香水是用浓缩玫瑰油做的，散发着一种难以消失又有害健康的气味。另外，中国妇女个个身材苗条，她们不吃对身体有害的奶油“努扎”或蜂蜜蛋糕。

密切注视着北京一举一动的日本人在这次访问之后公布了中国提供给罗马尼亚的贷款的数字：2.44 亿美元。此外中国还同意向罗马尼亚派遣技术人员，这是中国专家首次为阿尔巴尼亚之外的东欧国家工作。此外，罗马尼亚国防部还向中国派出了军事小组，学习民兵战术——这是对苏联侵捷的另一个应激反应。

至于齐奥塞斯库夫妇在朝鲜的那一站，那简直是令人陶醉的特殊荣誉。平壤被设计成金日成现代传奇的纪念碑，而这个英雄的国家就像一个欢度节日的大兵营，给人一种兴高采烈的印象：盛大的游行和阅兵活动，穿着整齐制服的儿童，佩戴着金日成像章的人群，颂扬金日成的巨幅彩色宣传画……

看到这些令人难忘的壮丽场景，埃列娜和尼古拉相视而笑：社会主义的胜利是有可能实现的，只要坚定不移地用铁的意志强迫实行就行了。齐奥塞斯库永远忘不了朝鲜少先队员的形象，她们穿着蓝裙子、白上衣，戴着红领巾，秩序井然地打扫平壤的广场和大街。这一场面令齐奥塞斯库十分感动，并为在布加勒斯特做清洁工的年迈而肥胖的乡下妇女感到羞愧。她们衣衫褴褛，穿着后跟已经磨破的靴子，打扫着首都积满雪的人行道。

齐奥塞斯库 24 年的执政期可以清晰地划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 1965 年到 1971 年，这一时期的罗马尼亚到处充满着巨大的成就、繁荣、自由和希望；第二个

阶段是从1971年到1989年，这一时期的特征是持续的经济衰退、工业停滞、国际援助大幅度减少、国内日益严酷的政治控制以及人民群众和党员当中越来越多的不满、异议和失望，最终导致了1989年罗马尼亚的流血剧变和齐奥塞斯库时代的终结。这当中有一件事是明确的：去朝鲜前后的齐奥塞斯库判若两人。在平壤目睹的一切似乎使他失去了清醒的头脑，并且在回国之后开始大力推行个人崇拜。

这种转变也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他那野心勃勃的妻子造成的。在访问朝鲜回国之后，埃列娜·齐奥塞斯库曾自负地对丈夫说，罗马尼亚人民不配接受他的统治，因为对于罗马尼亚民族来讲，他"太伟大了"。埃列娜利用她丈夫多疑的性格，使其越来越依赖于她的意见，并通过这样的方式操纵齐奥塞斯库的决定，以加强她对权力的控制。

齐奥塞斯库回国之后发动了一系列伟大的社会改革试验，其中之一是增加人口的运动。其灵感来自当时在中国刚刚开始实行的计划生育运动，目的则截然相反，方法也很简单：完全禁止离婚、节育和流产；要求所有妇女每人至少生4个孩子；每月要做妇科检查，以确保她们没用避孕工具；对那些采取避孕措施的妇女和做流产手术的医生进行严厉的惩罚。罗马尼亚老百姓轻蔑地把执行这些强制命令的执法者称作"月经警察"。在无数个夜晚，许多绝望的罗马尼亚妇女在机关枪的扫射下冒着生命危险试图游过多瑙河或穿过边境的铁丝网，到南斯拉夫或匈牙利去寻求一个能做流产手术的庇护所（山东画报出版社，《愚昧改变历史》，P49）。

在增加人口运动实施之后一年内，罗马尼亚的新生儿出生数量翻了一番。不幸的是，齐奥塞斯库没有想到，妇产医院的设备以及照看婴儿的工作量也需要增加一番。随之而来的后果是，罗马尼亚严重缺乏妇产专家、产科医师、儿科医师，更不用说医用产床、婴儿用品以及奶粉等。仅仅一年内，罗马尼亚的婴儿死亡率就上升了145.6%。为了掩盖这种愚蠢的后果，齐奥塞斯库下令婴儿出生一个月后再发出生证，这样许多在满月前死亡的婴儿就不会被列入死亡统计数字了。

增加人口运动的后果不止表现在妇产医院里。在罗马尼亚的孤儿院和收容所里有许多被遗弃的孩子，他们的身体和精神状况令人震惊。进入八十年代后，为了增强新生儿的体质，齐奥塞斯库下令在新生儿刚出生时就为他们输


1974年齐奥塞斯库从大国民会议主席斯特凡·沃伊特切手里接受"总统权杖"

血。令人悲哀的是，他拒绝承认罗马尼亚有艾滋病问题，而由于医院缺少洁净的针头，导致血液被艾滋病毒污染，结果艾滋病开始在罗马尼亚的婴儿中蔓延。齐奥塞斯库死后罗马尼亚电视台播出的节目首度向欧洲展示了孤儿院的恐怖情景，那些由于出生后输血而感染了艾滋病的弃儿被抛弃在全国各地的养育院里，听任其自生自灭（《愚昧改变历史》，P49）。

随着地位的巩固，齐奥塞斯库变得越来越醉心于个人崇拜，越来越喜欢人们对他歌功颂德。1974年罗马尼亚设立共和国总统的职位，取代大国民会议主席成为国家元首。齐奥塞斯库当仁不让地成为共和国首任总统，还为此专门制作了一根酷似古代帝王权仗的"总统权仗"。

每次齐奥塞斯库到各地视察，群众都"被自愿"倾城出动，以最高礼节来欢迎他的到来。民众通常必须提前几个小时到场，即使风吹雨淋、烈日暴晒也要参加，还要当着齐奥塞斯库的面高呼"万岁"。这种状况持续了近二十年时间。罗马尼亚国内每次举行大会，每一位发言者，不管是总理还是部长，无一例外地先要赞扬齐奥塞斯库夫妇的功绩。罗马尼亚官方还安排保安部队成员坐在会场的头七八排，组成政治"拉拉队"。齐奥塞斯库讲话时，每隔二三分钟这些人都站起来鼓掌、叫好。这时出席大会的其他人也不得不数十次起立、长时间鼓掌，同时欢呼"齐奥塞斯库－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与人民"等口号。每次齐奥塞斯库和夫人过生日以及出访归来，或有重大活动，罗马尼亚各地和各部门都要纷纷致贺电、贺信，衷心拥护齐奥塞斯库的领导，这些"自发"的应景之作，每年还汇集成册公开出版。


1967年齐奥塞斯库视察锡比乌时，全城出动夹道欢迎

一切传媒手段也用来宣传齐奥塞斯库夫妇，罗马尼亚国内大量出版齐奥塞斯库的讲话文集和言论集，齐奥塞斯库夫妇的大幅照片则天天见诸报端。齐奥塞斯库还不惜花费大笔外汇，购买国外报刊的广告版面刊登颂扬自己的文章，然后在国内报纸转载，借以宣扬外国人是如何地敬佩齐氏的天才领导和伟大功绩。


1976 年前往黑海度假时视察康斯坦察的齐奥塞斯库夫妇

从1968年，即掌握国家元首权力的第二年起，齐奥塞斯库便开始筹划一个庞大的“改造”罗马尼亚民族的计划，称之为“标准化”。这种“标准化”的特点是完全消灭个人特点，限制个人自由，全部行为都纳入实现规定好的框框之中，甚至在日常用语方面也要做到整齐划一。应当尽一切努力保护人民，免得他们染上从西方传来的恶习，留长发、穿超短裙、伤风败俗。连从法国和西德来进行文化交流的留学生也被要求“着装整齐”。当然，领导人的子女拥有某些自由无伤大雅，因为在关键时刻他们还是靠得住的，对于老百姓，则需要在道德教育方面加以引导和约束。埃列娜·齐奥塞斯库在这一领域表现得特别坚决。为了全民族的利益，她全力以赴支持丈夫的这场文化战斗。

对于那些离经叛道之徒，齐奥塞斯库也有一套新的方法：他仿效苏联发明的做法，把提出批评的人都冠上“迫害妄想”、“被迫害妄想”、“偏执性格”、“老年痴呆”的“症状”，送入日益膨胀的彼得·格罗查医院，关进特护病房进行“治疗”。那些试图以绝食的方法摆脱“治疗”的人被强行注射镇静剂和扩张心血管的药品，心脏跳动次数减少三分之一，而脉搏在静止的时候也高达120次。这种“惩罚医学”还对“患者”大量使用磺胺嘧啶等药物，使用其他种类的镇静剂，实行胰岛素休克和电休克“治疗”（《非常病人》，P271）。

为了消灭反对的意见，罗马尼亚安全部的秘密警察获得了对全社会实行控制和镇压的无限权力，并逐渐成为世界上效率最高、最令人毛骨悚然的秘密警察机构之一。它到1985年为止雇佣了11000名间谍，大约有25000名安全部队军人，而告密者的数量高达50万，这在一个人口2200万的国家里是很瞩目的（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罗马尼亚史》，P199－200）。直属于内务部安全总局的安全部队在其顶峰时期竟达10万人之众，编为17个营，配备有装甲车和直升机，除了警戒齐奥塞斯库一家的住所外，还分驻在全国各要地。

为了收紧对思想和文字的控制，齐奥塞斯库在八十年代初颁布了《大罗马尼亚打字机法》，规定随意出租或出借打字机是非法行为。拥有打字机需要得到安全部门的许可，要成为打字员的人必须在公安局登记，把打字样品及他们需要这种机器的理由上报给公安局。如果打字机需要修理，那么修理之后的机器及其主人都必须获得新的许可证。任何通过遗产继承方式获得了这种危险机器的人，必须将其上交当局、或者申请获得其使用资格。损坏的打字机也不能被随意当作废品处理掉，而是要交给公安部门统一备案销毁。（《愚昧改变历史》，P51）

齐奥塞斯库在1982年制订了另一个宏伟的“乡村标准化”计划。恩格斯曾认为城乡的分离是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历史表现，齐奥塞斯库认为罗马尼亚现在要超越这个阶段，朝着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方向前进。在这个新社会里，不应该再有城市和乡村、两种生活方式和两种文化的区别。为了达到这个清一色的和谐，办法只有一个：摧毁农村，把农村改造成农工城市中心。

按照计划，到1995年为止，罗马尼亚1.6万个村庄中的一半以上要被摧毁掉，农民将被集中到像兵营一样的四层楼房中去。新华社驻罗马尼亚记者在八十年代中期在布加勒斯特近郊的莫古雷列村参观过为“乡村标准化”建造的楼房，发现这些用钢筋混凝土构件搭成的楼房全是粗制滥造的，有一栋楼的大梁竟是歪的。几幢楼的阳台歪歪斜斜，高层和低层的阳台水平并不平行。中国记者走进楼里拍了拍墙板，只听嘭嘭作响，说明楼板相当薄。墙皮上净是凹进去的地方。尽管住户尚未迁入，但门窗上的木框已经支离破碎。厨房里没有煤气管道，室内有电灯开关和电器插座，但是却没有暖气片。在有人住的居民楼里，家家都在屋里砌上了炉灶，否则就没法做饭取暖。过去农民的家舍有院子，可以自己种菜养鸡，但是实施了“乡村标准化”后连这些副业也没法搞了。农民谁也不愿放弃自己的家园，但上级强迫命令，不搬不行。你不搬，上级就派人拆房子（新华出版社，《风云突变——齐奥塞斯库垮台始末》，P23）。

讽刺的是，官方宣传“乡村标准化”的一个主要好处是“节约土地”，但在农村建设的住宅区对土地的浪费却非常漫不经心，道路宽达几十米，可以并行三四辆大卡车，在乡村住宅区的中心是可以容纳四五万人的广场。过去农民用来种菜养鸡的肥沃土地都被打上水泥，铺上了混凝土板子，变成了为齐奥塞斯库祝寿的场所。

除了消灭传统农村生活模式之外，齐奥塞斯库还要在“提高农村文化水平”的口号下培养一代农村新人，消灭传统的落后的农村家庭，驯服占罗马尼亚总人口48%、却对他的“现代意志论”无动于衷的农民。在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罗马尼亚的农民阶级曾经对“铁卫军”的政治运动采取了过于消极、甚至合作的姿态，齐奥塞斯库这样做的目的也许就是让他们以及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吃点苦头。

访问朝鲜回国之后，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的最大梦想之一是把布加勒斯特也变成一座干净、洁白、光彩夺目的城市，一个与伟大的他自己相称的伟大的首都。齐奥塞斯库对这座充斥着十九世纪巴洛克建筑和二三十年代现代建

筑物的大杂烩城市很不以为然，决定开辟通衢大道，把党的重要机关及其骨干们的9000座住宅集中到同一地区。摧毁古老的布加勒斯特，将其纳入“标准化”的体系，是他的重大抱负，而1977年发生在东喀尔巴阡山的里氏7.2级地震令布加勒斯特市中心的许多建筑物倒塌或成为危房，从而为这一行动提供了契机。

按照安卡·佩特列斯库及其率领的700多名建筑师设计的图纸，齐奥塞斯库要在布加勒斯特的市中心建设一座世界上最宏伟的、比法国凡尔赛宫还要豪华的宫殿——“共和国大厦”(Casa Republicii)。根据吉尼斯世界纪录，这座大楼是全世界体量第二大（仅次于美国五角大楼）、造价最贵的办公建筑。它宽270米，深240米，高86米，地下深度92米，整座大楼有1100个房间。齐奥塞斯库计划把这座宫殿变成既是自己的住宅、又是政府办公所在地（类似苏联的克里姆林宫）的地方，总统府、大国民议会、部长会议和最高法院都将安置在这座巨大的宫殿式大厦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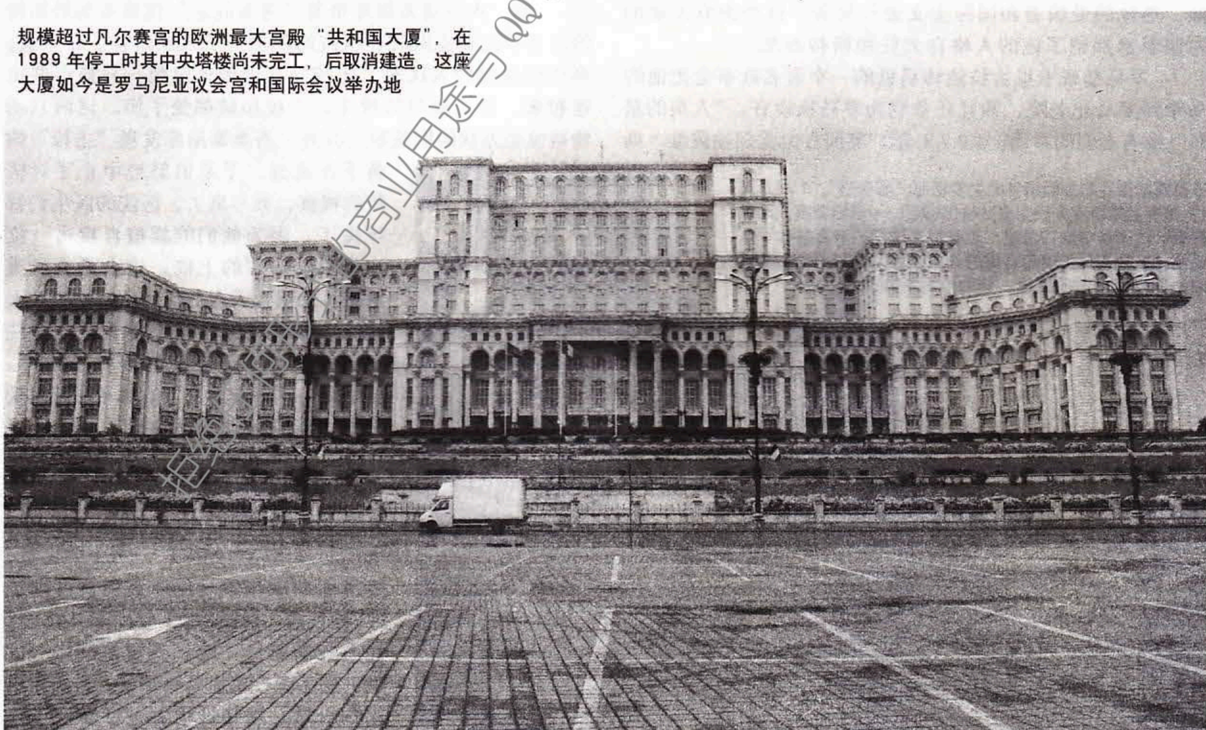
为了修建“共和国大厦”，罗马尼亚几乎调动了全国的建筑资源：100万立方米特兰西瓦尼亚大理石；用来制作480盏吊灯的3500吨水晶；70万吨钢和铜，用来制作大门和窗框；90万平方米的木板，包括橡木、胡桃木、樱桃木、榆木、大槭木等等；20万平方米的羊毛地毯，其中最大的那张地毯要由一台安放在大厦内的机器现场编织；上百吨重的丝绸和锦缎窗帘，以及无数镀金和镀银的建筑饰件，比如窗帘杆、门把手等等。

从1984年破土动工，到1989年建筑主体结构竣工，罗马尼亚为修建“共和国大厦”一共花去了大约62.2亿列伊（10亿美元），约占罗马尼亚外债总额的十分之一。花去这么多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齐奥塞斯库的瞎折腾，他在施工期间经常来视察，看到哪儿不顺眼就下令改建。建了拆，拆了建，许多部分都重复建设了好几遍。在齐奥塞斯库当政时，任何人都不能靠近“共和国大厦”，更不能进去参观。到他倒台时，大楼的完工程度只有70%。地面以上的12层主体结构和4层地下结构已经完工，一些大厅也完成了室内装潢。但是主楼中央的新古典主义塔楼（上面将安装四面大钟，展示罗马尼亚的标准时间）以及另四层地下结构都没有完工，后来被罗马尼亚的新领导人取消了。

齐奥塞斯库倒台后，“共和国大厦”已经竣工的部分向民众开放参观，其空间之辉煌壮丽、装潢之穷奢极欲，同布加勒斯特那些阴暗拥挤、肮脏破败、没有暖气和电力的居民区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对比。此后这座巨大的建筑一度长时间空置，偶尔举办一些会议活动。罗马尼亚众议院在1997年从大主教宫搬进了共和国大厦（改名叫议会宫），参议院也在2005年从原来的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大楼搬到了这里。2004年，在大楼的西翼创办了罗马尼亚当代美术馆，东南欧合作理事会（SECI）也把总部设在了共和国大厦。

除了修建“共和国大厦”外，齐奥塞斯库还在布加勒斯特大兴土木搞了许多树碑立传式的大工程，包括“科学、文化、教育之家”（到1989年时已用的投资额为13.2列伊，下同）、罗马尼亚共产党历史及齐奥塞斯库博物馆（20亿列伊）、政府各部委办公大楼（13.7亿列伊）、“全国‘歌颂罗马尼亚’文化创作中心”（3.45亿列伊）、国家图书馆（8.23亿列伊）、“革命民主各级会议中心”（5.98亿列伊）、国宾馆（6.32亿列伊）、科特罗秦尼高级宾馆工程（15亿列伊）、“青年社会主义教育、创作和文化中心”（1.65亿列伊）。到1989年12月，这些工程仅钢筋混凝土的造价就高达200多亿列伊。

以“革命民主各级会议中心”为例，它要开挖一个面积145公顷的人工湖，引来登博维察河的河水。湖畔将建



规模超过凡尔赛宫的欧洲最大宫殿“共和国大厦”，在1989年停工时其中央塔楼尚未完工，后取消建造。这座大厦如今是罗马尼亚议会宫和国际会议举办地

有一个1.5万席位的大礼堂、一个2000席位的礼堂和4个1000席位的小礼堂，这六座礼堂还有许多附设厅堂。这个建筑群将被一个巨大的穹顶覆盖，穹顶直径130米，从地面到顶端高78米，相当于25层楼的高度。会议中心还要建设一座面积50公顷的花园，以及可以容纳1000辆轿车的地下车库。为了建设这座会议中心，尽管罗马尼亚全国电力紧张，但工地却如同白昼，工人挑灯夜战。

为了修建这些大楼，建筑师们夷平了19座古老的东正教堂、6座犹太教堂、3座新教教堂，拆除了三万户的住宅建筑。还要开辟一条宽达120米的“社会主义胜利大街”，从共和国宫前面可以容纳50万人的半圆形广场通往登博维察河对岸的“社会主义广场”。为了建设这条大街拆毁了更多的住宅。那些不幸的住户们被勒令在24小时之内滚出自己的家，一些业主自杀了。许多被吓呆了的老人被逐出自己的房屋，像阴森可怕的幽灵一样在他们被推土机铲倒的房子周围转来转去。根据某个官僚的残忍的主意，这些不幸的失去家园者不仅要签字同意拆毁自己的住宅，有时甚至还要支付拆毁的费用。（《尼古拉·齐奥塞斯库》，P174）

“人类的星辰”

岁月流逝，时光荏苒。从七十年代中后期开始，齐奥塞斯库的行为逐渐变得像古罗马暴君卡里古拉皇帝一样荒谬和不可捉摸。罗马尼亚的吹捧家为齐奥塞斯库奉上了众多的东方式头衔，包括“人类的星辰”、“喀尔巴阡山的天才”、“思想的多瑙河”、“工人阶级的英雄”、“最杰出的、无与伦比的战略家”、“举世尊敬的伟大领袖和政治活动家”、“抵抗所有敌人的罗马尼亚捍卫者”、“掌握国家面临的所有问题的答案的领导人”、“贯彻党的马列主义政策的化身”、“民族英雄中的伟大英雄”、“人道主义精神的共产主义者”、“当代世界的杰出人物和光辉战士”、“杰出的马列主义领袖、热忱的爱国者和国际主义者”等等。这些肉麻无耻的阿谀奉承加剧了他的人格自大狂和精神紊乱。

罗马暴帝卡里古拉流传后世的一个著名故事是把他的马牵到罗马元老院，并且任命它为罗马执政官。“人类的星辰”也有类似的举动。1978年，英国自由党领袖戴维·斯



1982年齐奥塞斯库接待来访的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照片右边的那条黑狗就是在罗马尼亚家喻户晓的“考布同志”，齐奥塞斯库身后是考布的“妻子”

蒂尔为了感谢他访问罗马尼亚时受到的盛情招待，送给齐奥塞斯库一只黑色的拉布拉多幼犬。齐奥塞斯库很喜欢这条狗，给它取名字叫“考布”（Corbu，罗马尼亚语意为“渡鸦”）。他与这条狗形影不离，很快罗马尼亚人在提到这条狗时就称之为“考布同志”。

齐奥塞斯库非常宠爱“考布同志”，授予它罗马尼亚人民军上校的军衔。人们经常看到“考布”坐着小汽车，在警察车队的严密护送下穿过布加勒斯特的场面。英国驻罗马尼亚大使有一次就见到了这个令人难忘的场景：“我看到这条黑狗独自坐在‘达契亚’轿车的后排座椅上，仰面朝天，相当傲慢。黑色的拉布拉多犬常有这种神态。”罗马尼亚驻英国大使每星期要去伦敦的圣伯利公司为“考布同志”购买高级狗饼干和狗粮，然后用外交包裹把它们寄到布加勒斯特。

有一次齐奥塞斯库带着“考布同志”视察布加勒斯特的布兰科温斯克医院，医院的职工为了灭鼠而养了许多猫。那位四条腿的人民军“上校”在走廊里发现一只猫，并追逐起来。经过激烈的搏斗，上校和猫都受了伤。这两只动物被惊恐万状的医院职工分开，齐奥塞斯库发现“上校”的鼻子在流血，于是愤怒地中止了对医院的视察，乘车离去。医院的医生们都吓傻了，因为他们的猫擅自攻击一位罗马尼亚陆军的上校，这会带来严重后果。果然几天之后，一份拆除医院大楼的命令被送到医院。尽管这座医院在前一年为五万名患者提供了治疗，但是因为“考布上校”的鼻子在那里受了伤，所以必须把医院拆了。

齐奥塞斯库在布加勒斯特的主要官邸“春天宫”。1989年12月齐奥塞斯库夫妇乘直升机出逃后，一群吉普赛人闻讯前来，试图从中偷窃珠宝，但被保卫这里的老百姓和军队驱散。这些人保护这座宫殿的动机是为了保存下齐奥塞斯库一家奢侈生活的原貌，作为今后审判的“罪证”



根据新华社驻罗马尼亚首席记者张汉文、周荣子等人在《风云突变——齐奥塞斯库垮台始末》一书中的记载，齐奥塞斯库在罗马尼亚全国共占据了62幢宫殿、别墅和22座狩猎山庄。仅在布加勒斯特一地，齐奥塞斯库一家就占据了21座宫殿和别墅。齐奥塞斯库倒台后，新华社记者有幸参观了这些行宫，齐奥塞斯库家族奢华的生活

也得以窥见一斑。

从担任党的第一书记时起，齐奥塞斯库就搬进了弗罗雷斯卡湖畔豪华的"春天宫"。这座用白色大理石建造的宫殿坐落于罗马尼亚高级党政领导人的住宅区——弗罗雷斯卡区，周围的街道由安全部队严密守卫，禁止老百姓穿行。春天宫门前一字排开德国产的黑色奔驰防弹轿车和英国"美洲豹"高级汽车。房子周围是宽阔宁静的林荫，栽种着法国梧桐和橡树。走进宫殿，一楼的大厅里摆满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金银器皿、茶具、烟具、景泰蓝、玉雕，还有一对高大的明代青花瓷瓶。穿过大厅往里走是齐奥塞斯库一家的两间大小不同的餐厅，餐桌上摆的餐具全是金或银的，在那间较大餐厅的长桌上还放着三个形状不同的金烛台。陪同新华社记者参观的军官说中间的那个烛台是纯金的，重约1公斤，另外两个烛台是包金的。

春天宫的二楼是齐奥塞斯库夫妇及其女儿卓娅住的六个房间（每人一间卧室和一间休息室）。中央的大厅里也摆满了和一楼一样的各种珍贵陈设，不同的是在墙上还挂着十几幅罗马尼亚大画家格里戈莱斯库、卢奇安、安德列耶斯库和多尼策等人的风景画和肖像画原作。这些油画都是罗马尼亚的国宝，原来陈列在罗马尼亚国家艺术馆里，齐奥塞斯库夫妇后来把这些价值连城的艺术品弄到家里，据为己有。埃列娜的卧室和休息室更加华丽，镀金的床柱雕满花纹，床上铺的是金光闪闪的高级丝绸被。衣柜里挂着数百套服装，光是貂皮大衣就有十几件，每件的价值都高达十几万列伊。柜子底层摆着几百双高级皮鞋。许多衣服和鞋上还挂着赠送单位的标签，说明埃列娜从未穿过。

埃列娜的休息室约有60平方米，除了各种金器外还摆有从国外进口的高级瓷制工艺品。室内一角的封闭式阳台十分引人注目，阳台两侧有人工小喷泉，右边的泉水从一只金鸭子的嘴里喷出来，左边的泉水从一条金蛇的口中喷出来。阳台上还摆着仆人给埃列娜端茶送水用的镀金小推车。埃列娜卧室盥洗间的水龙头、各种手柄、挂钩、甚至装卫生纸的小盒子都是镀金的。一枝插在景泰蓝花瓶中、有果有叶的树枝是用黄金制成的。左边墙上全是镀金片镶成的马赛克团，房间天花板的浮雕也是镀金的。室内四周暖气片也都是金黄色的，陪同中国记者参观的罗马尼亚军官说这些暖气也是镀金的（引自新华社驻罗记者所著《风云突变——齐奥塞斯库垮台始末》，P31-33）。



位于黑海"海王星"疗养地的齐奥塞斯库别墅

新华社记者回忆说，齐奥塞斯库夫妇不仅爱黄金，而且珍珠玛瑙、钻石翡翠、各种宝石也是他们的心爱之物。春天宫的抽屉里、桌子上、保险柜内都存放着大量金银首饰和宝石。在一座保险柜内发现几个信封，每个信封里都装着齐奥塞斯库1．6万列伊的月薪和4000列伊的补助金，几个信封都从未动过。看守春天宫的军官还告诉新华社记者，这座宫殿的庭院很大，里面一共散落着十四幢建筑物，埃列娜的母亲和齐奥塞斯库的两个儿子各占一座（齐奥塞斯库养的两条狗，即考布上校同志和它的"妻子"——另一条黑色的拉布拉多犬，也占用了其中的一座别墅，即12号别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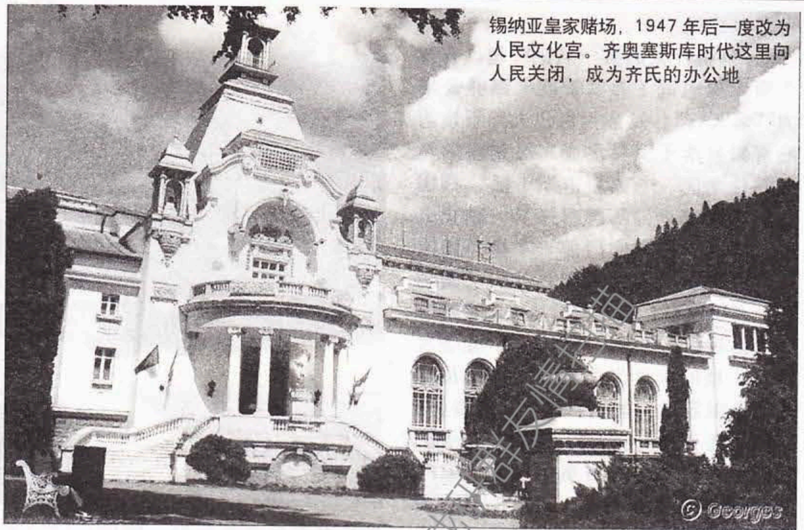
除了春天宫这座主要住所外，齐奥塞斯库一家还占有埃莱斯特拉乌湖畔的宫殿、斯纳戈夫的别墅和黑海海滨的行宫，在全国各县都至少有一个别墅、招待所或狩猎木屋。在众多的"行宫"中，利用率最高的要数位于黑海海滨的"海王星"休养站和首都布加勒斯特北郊的斯纳戈夫别墅。"海王星"休养站位于康斯坦察以南30多公里，靠近保加利亚边境，附近还有"火星"、"土星"、"金星"、"木星"等多处休养站，每处休养站都是一处可以容纳3000到5000名游客的饭店－娱乐设施综合体。每年夏季齐奥塞斯库都在"海王星"休养站办公并接待外宾，从此这里也有了"夏季首都"之称，许多外国政要都曾在此受到齐奥塞斯库接见。1990年7月新华社驻罗马尼亚记者参观了这处豪华的休养站。

齐奥塞斯库一家的起居楼坐落于当地人称为"宝藏"的一片树林中，建于1969年，五年后才完工。建筑师把罗马尼亚建筑风格同西欧和亚洲的建筑风格结合到一起，楼内还有一段中国式的长廊。这座楼的一层是齐奥塞斯库一家的餐厅、电视室、娱乐室，二层是齐奥塞斯库本人、埃列娜、大儿子瓦伦丁、小儿子尼库和女儿卓娅的套房，每人一间卧室、一间休息室。中间的过厅旁是一间十分精致的小暖房，种满了奇花异草。在这一层还有一间"狗室"，面积约20平方米，里面有一间专供"考布上校"使用的椭圆形沙发小床，铺着高级锦缎，狗床前有一个方桌，两旁摆着两把扶手椅。在一楼也有一间类似的"狗室"。整座起居楼的外观并不显眼，但内部装修十分高级，地面上铺的花瓷砖全是从意大利进口的，空调设备、吊灯和其他电器是从西德进口的。所有的房间里都摆着精美的工艺品，以前还挂着贵重的油画，这些画也是齐奥塞斯库夫妇从国家艺术博物馆弄来的。齐奥塞斯库垮台后，油画又物归原主，回到了博物馆里。

"海王星"休养站供齐奥塞斯库一家专用的室内游泳池建于1980年，设在两座圆形建筑里，两座建筑相连，第一座设有齐奥塞斯库的办公室，宽敞明亮，面对大海，墙上有金箔镶嵌的古代勇士像。再往里走是齐奥塞斯库夫妇午休时用的卧室、埃列娜的办公室和餐室。再往里走就是圆形的室内游泳池，里面的水全是用专列从喀尔巴阡山运来的温泉水，含有多种矿物质。自从游泳池建成后，齐奥塞斯库本人

从未在里面游过泳，但他和埃列娜经常在游泳池旁边的躺椅上打扑克、聊天。“海王星”休养站一共占地18公顷，有100多名工作人员，还有齐奥塞斯库一家专用的海滩和游艇码头。

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霍亨佐伦王室在喀尔巴阡山麓避暑胜地锡纳亚修建的夏宫佩列什城堡被定为文物保护单位，一度作为博物馆向公众开放。但是从1974年起，城堡以“内部维修”的名义停止对外开放，原来齐奥塞斯库夫妇看中了这座宫殿，把它变成了自己的私人别墅。城堡附近的老赌场（1947年后一度成为人民文化宫）也被关闭，进行了全面的修缮，安装各种现代化设备，原来的赌场大厅变了宴会厅，剧院变成了会议室，此外还有办公室和会客厅，成为齐奥塞斯库夫妇的办公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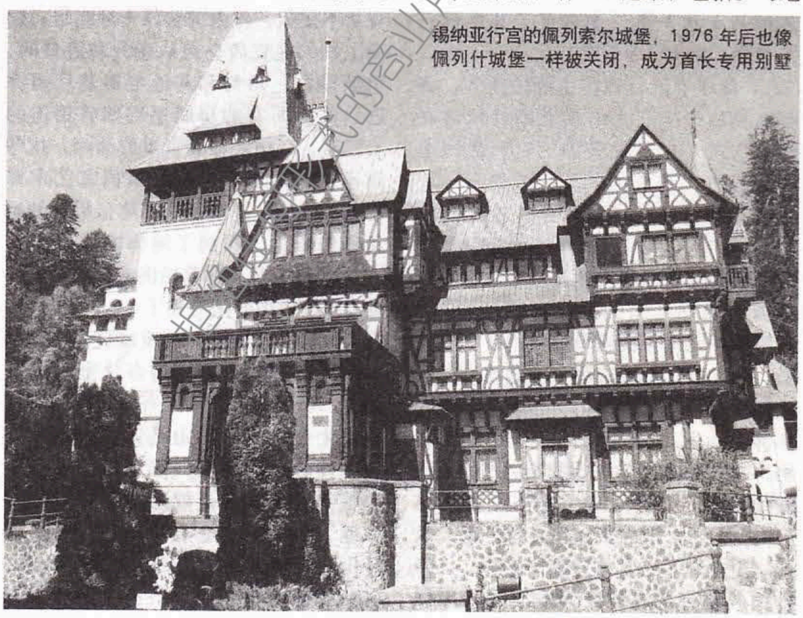


锡纳亚皇家赌场，1947年后一度改为人民文化宫。齐奥塞斯库时代这里向人民关闭，成为齐氏的办公地

1981年，佩列什城堡的管理人员在宫里的木板墙上发现了一种真菌，它繁衍得很快，24小时内能扩散6厘米，并且能侵蚀任何木料。齐奥塞斯库夫妇知道此事后不敢再进入佩列什城堡，怕染上疾病。但是尽管如此，这座宫殿仍然不对群众开放，因为齐奥塞斯库夫妇在城堡北边不远处又修建了一座三层的现代化别墅。由于工程难度大、所用的材料和设备极其考究和现代化，因此用了12年才竣工。新别墅在1987年落成后，齐奥塞斯库一家只来这里住过几次。

喜欢打猎的齐奥塞斯库经常把冬季狩猎作为接待来访外国首脑的一个项目，喀尔巴阡山区的一些猎场因此成为接待贵宾的重要场所，也是总书记光顾得比较多的“行宫”。这些猎场他随时可以不期而至，人们会立即把皮毛油光闪亮的黑狗熊放出来，齐奥塞斯库开枪，看着狗熊原地打转，然后沉重地倒在地上。有时候，这位“思想的多瑙河”会出神地凝视着浓浓的鲜血慢慢洇透狗熊那厚重的皮毛，神情专注，若有所思。

在齐奥塞斯库家族遍布全国各地的多处宫殿中，有各种与百姓绝缘的进口高级食品，有豪华的加温游泳池、私人网球场、健身中心，有佣人、女仆、保健医生、营养专家和安全部卫队。齐奥塞斯库垮台后，罗马尼亚有关部门保存了不少有关齐奥塞斯库一家的生活档案，其中一份是1984年3月8日的午餐菜谱，有12道菜，包括罗马尼亚老百姓从未在市面上见过的黑鱼子酱、虾仁、锡比乌香肠、鲑鱼与河鲈鱼，而菜单中的猪肉、牛肉和羊肉，老百姓也很难在市场上见到。此外，齐奥塞斯库一家在佐餐时饮用的法国葡萄酒（每瓶500到1400法郎）、法国香槟酒（每瓶200到305法郎）和矿泉水都是从西欧进口的，甚至连餐桌上用的擦手纸也是进口的。



锡纳亚行宫的佩列索尔城堡，1976年后也像佩列什城堡一样被关闭，成为首长专用别墅

齐奥塞斯库夫妇平时不与自己的子女一道吃饭，只是节假日才一起聚餐。齐奥塞斯库同志光是午餐就要12道菜，那么剩下的菜是不是给喂养的“考布”上校同志吃呢？不是。“考布同志”也有自己的菜谱，是由营养学家精心配制的。一位齐奥塞斯库时代的宫廷女仆后来回忆说，“秘密警察告诉我们永远不要喂狗。有专门医生检查狗食（都是最好的肉），只有医生尝过以后，肉才能喂狗。晚上‘考布’总是与这位同志（齐奥塞斯库）睡在一起。白天，狗待在12号别墅，里面设施齐全，床、豪华的家具、电视、电话，应有尽有。”

以1982年12月2日的菜谱为例，这条狗一天的食谱是：早餐（7:30）有两个法式牛角面包、1公斤伯萨尼亚肉卷、1公斤牛奶、LATZ狗饼干；午餐（13:30）是四公斤牛肉菜汤（成份包括牛肉块、500克面条或大米、胡萝卜、芹菜、盐）；晚餐（20:00）是一公斤伯萨尼亚肉卷、500克通心粉或细面条、以及500克奶酪加甜布丁。

根据罗马尼亚官方统计，从1965年到1989年，罗马尼亚国家为齐奥塞斯库一家在饮食方面花费了1025万列伊，为狗花去了217万列伊。为齐奥塞

斯库一家服务的勤务人员的伙食费用达73万列伊，这还不算打猎、出访时的饮食费用开支。而在这二十多年里，齐奥塞斯库夫妇只从自己的腰包中掏了38万列伊，平均每天支付43列伊，只相当于一公斤猪肉的价格（《风云突变》P37—38）。

除了遍布全国的宫殿外，齐奥塞斯库还拥有两艘内河游艇。第一条游艇叫“勇敢的米哈伊”号，建造于1969年，长64米，宽11米，看上去与多瑙河上的普通客轮差不多，但内部装潢截然不同。船上的一应设备全都从西方国家进口，齐奥塞斯库夫妇各占一间卧室，室内铺着厚厚的波斯地毯，墙上挂的油画也是从国家博物馆里取来的。船上也有一间专门的狗室，齐奥塞斯库夫妇在多瑙河地区“视察”时都要带着吃得滚瓜流油的那两条狗。船上还有几间客舱是给随行的政府总理和部长级干部用的，但是他们的待遇比不上那两条狗，因为他们睡的是普通的双层床铺。

“勇敢的米哈伊”号的船员最怕齐奥塞斯库夫妇上船，因为上级做了严格规定，“首长”上船后船员必须待在机舱里，不得上甲板，不得让“首长”看见他们。在行船期间，船员不得在船上做饭，因为菜锅里冒出的气味会“污染”空气，因此船员只能躲在机舱里吃罐头。除此之外，在齐奥塞斯库夫妇驾临时，船员还有一个额外的侮辱行任务，就是用专门的进口消毒湿巾给那条狗老爷“考布同志”擦爪子、擦肚子、擦皮毛。

1979年，齐奥塞斯库嫌“勇敢的米哈伊”号船龄太大，太老气，下令建造另一艘更大的游艇“米尔恰大公”号。本来一艘这样规格的船七个月就能造好，但“米尔恰大公”号却建造了七年，因为齐奥塞斯库经常去船厂“视察”，看到船上哪儿不中意就勒令修改，光油漆就涂了好几遍。“米尔恰大公”号的造价高达4亿列伊，等于几十条同型内河客轮的造价，年保养费也要1500万到2000万列伊。

作为国家元首，齐奥塞斯库拥有自己的专机本属正常，有两三架也无可非议，但齐奥塞斯库的专机却达17架之多！他有五架大型客机，其中两架波音707是在美国专门定造的，花了4500万美元，由于罗方要求增加生活服务设施，每架飞机比正常机型重5吨。飞机上设有卧室、浴室、厨房，浴



齐奥塞斯库的波音707-300型专机，如今是罗马尼亚政府公务机，编号YR-ABB

齐奥塞斯库的BAC 1-11型专机，如今也是罗马尼亚政府公务机。1979年罗马尼亚从英国航空公司（BAC）购买了3架这种飞机，并引进许可证在布加勒斯特制造22架，称为ROMBAC 1-11，预计出口到中国、东欧和第三世界国家，但最终由于市场和技术原因未能实现



室里各种挂钩和水龙头都是镀金的。除此之外齐奥塞斯库还有两架苏制“伊尔”18型飞机和一架BAC 1-11型专机。总统机队还有12架直升机，其中8架购自法国，是最先进的“海豚”型直升机，每架价格1900万法郎，直升机上还有狗的座位。

为了将政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齐奥塞斯库从七十年代起就开始把自己的亲友在重要的岗位上。齐奥塞斯库自己担任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国务委员会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爱国卫队总司令、社会主义民主团结阵线主席、经济发展委员会主席、全国劳动人民委员会主席等多项罗马尼亚最高职务。他的妻子埃列娜担任罗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常委（主管干部工作）、罗马尼亚政府第一副总理、文化部长，同时被选为罗马尼亚科学院院士，此外还兼任了14个官方职务。最重要的是，由于担任罗共中央干部委员会主席，埃列娜掌握了干部人事大权，党内最高层的人事变动只有她说了算。

埃列娜经常随心所欲地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把自己的亲信提拔到党中央和政府部门，并竭力打击那些与自己意见不同的干部。像波斯泰尔尼斯库尽管才干平庸，但由于对埃列娜忠心耿耿，又为齐奥塞斯库子女的婚姻和生活问题立过大功，就被提拔为内务部长。罗共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相当于政治局常委）穆列尚是另一个庸才，罗共十四大之前，罗共中央已经内定解除其中央政治执委和全国妇联主席的职位，只保留商业部长的职务。但是由于穆列尚十分效忠齐奥塞斯库一家，经常为他们弄来国外进口的高级商品和紧俏物资，因此埃列娜保住了其所有职位。与此相反，前

罗共中央政治执委法泽卡什（匈牙利族）只是因为在讨论授予埃列娜罗马尼亚科学院院士称号的会上表示不同意见，没多久就被解职了。

埃列娜对她丈夫的影响是非常坏的。所有上呈给她丈夫的请示和报告都要由她先过目，而齐奥塞斯库批过的文件还要返回到“二号首长”手中。有时齐奥塞斯库的批示不中她的意，她便自作主张进行修改，甚至取消批示。她还以照顾齐奥塞斯库身体健康为由对他封锁信息，每天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情都要先向她汇报，然后由她决定哪些消息需要告诉“一号首长”。如果有人没经过她便向“一号”泄露了不该说的情况，就会受到严厉的指责。

埃列娜这个作风霸道的女人还容不得比她有才华、比她漂亮的女性出风头。比如罗马尼亚前外交部长、罗共中央候补政治执行委员斯特凡·安德列的妻子维奥莱塔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漂亮女演员，在六七十年代拍过不少电影，名望颇高。埃列娜对维奥莱塔既嫉妒又反感，先是劝说安德列与妻子离婚，遭到拒绝后又下令禁止维奥莱塔再拍电影，并封存她的所有影片。

埃列娜对下人更是颐使气指、横行霸道，把身边的工作人员当作牛马，经常辱骂。有一次在出访津巴布韦时，随行的罗马尼亚厨师准备给齐奥塞斯库夫妇准备一道清蒸鱼，但津巴布韦方面提供的是当地产的黑鲫鱼，厨师怕埃列娜不吃鲫鱼，就改做了一条随专机带来的大鳟鱼。当菜端上来时，埃列娜得知是从国内运来的鱼，便破口大骂：“你们这些懒鬼，竟敢让我们吃存放了7 天的鱼，是不是想毒死我们？”回国后那位厨师就被解雇了。齐奥塞斯库的专机机组人员也会以说，埃列娜对机组人员经常是横挑鼻子竖挑眼，“飞行时风向变了骂我们，飞机有些颠簸骂我们，降落后当地气候变了也骂我们。”

埃列娜是个非常爱慕虚荣的女人，她依靠自己丈夫的权势和地位，用弄虚作假的手段骗取了工程师、化学博士、科学院院士等称号，还自封为“世界著名的学者”。虽然一位罗马尼亚马屁诗人称赞她是“科学之镭，新时代的居里夫人，激励我们的汽笛，迷茫学者的恩田，用您无垠的多瑙河水般的学识驱散了我们的愚昧无知”，但是这位“二号首长”（她丈夫是“一号首长”）的不学无术实在是出了名。她虽然兼任布加勒斯特化学研究所所长，但是为了掩盖自己在学术上的无知从不去上班，从1978 年到1989 年，这位所长只去过所里两次，还是去“视察”的。



1974 年齐奥塞斯库夫妇访问阿根廷时与庇隆总统夫妇出席礼宾活动



上图为1975 年齐奥塞斯库夫妇访日的情景。按照外交礼仪，在东道国为来访国家元首举行的欢迎仪式上，只有两国元首有资格登上检阅台，检阅仪仗队，但新华社驻罗记者回忆说，埃列娜在这种场合总是要求也登上检阅台，摆出与齐奥塞斯库平起平坐的架势，给接待方面的礼宾安排带来困难。下图为1975 年埃列娜接受马尼拉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的情景



由于不学无术，埃列娜闹了不少笑话，比如有一次研究所里急需实验用酒精，由于阴差阳错，前后向所长同志交上去两份相同的报告，只是一份是购买酒精的，另一份是购买乙醇的。埃列娜不假思索地在两份报告上都签了字，这位化学博士不知道酒精的学名就是乙醇。还有一次研究所申请购买6 立方米氧气，埃列娜有个习惯，对所有申请花钱的报告都将数字砍掉一半，于是大笔一挥砍掉了3 立方米。研究所的人拿到批示后哭笑不得，因为当时罗马尼亚的氧气瓶规格全是6 立方米的。

在其丈夫大搞特搞个人崇拜的同时，埃列娜也分得了“党和国家的卓越战士”、“杰出的科学家、政治家”、“光辉的国务活动家”等桂冠。她俨然以“国母”自居，生日也由全国庆祝，人们在各种大会上的发言，在呼完“敬爱的总书记齐奥塞斯库同志”之后，必向“尊敬的埃列娜同志”山呼致敬。在她的要求下，二十多个国家翻译和出版了她的“学术著作”，美国、意大利、菲律宾等十几个国家的研究所、大学和科学院授予她荣誉称号和证书。1988 年埃列娜随丈夫访华之前，也通过其亲信提出授予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称号的要求，被中方婉拒，因为这个称号只授予那些在国内外科学界享有盛名、在学术上确实有突出成就的人。为了不使罗方过于失望，中方提出可授予埃列娜中国科协下属的一个化学研究所名誉会员的称号，但罗马尼亚方面对此未作答复，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1974 年，罗马尼亚成立了“二号首长服务处”，专门为

埃列娜从国外进口各种服装、鞋帽、香水、化妆品、首饰、珠宝和其他高档消费品，埃列娜经常从法国和英国订购最新款式的时装。她还有点迷信色彩，如果穿哪件衣服后遇到了得意的事，就认为这件衣服给她带来了好运，就留下来再穿，否则就扔掉（《风云突变》，P52）。1978 年她随齐奥塞斯库访问美国时，美国最著名的高级珠宝商“哈里·温斯顿”公司根据她的要求把一大批首饰送到齐奥塞斯库夫妇在纽约下榻的宾馆，供她挑选。埃列娜挑来挑去，爱不释手，最后指着这些首饰对随行人员说“先把这些带回国看看，然后再决定要哪几件。”实际上这些首饰她都要了，钱当然是国家出。随行人员在收拾首饰时看了一下价钱，每件的价格都在两万美元以上。

埃列娜还很怕死，出门时只乘坐法国和德国制造的防弹轿车，前后还要有警车护卫。她每月的烫发费用就高达8000 列伊，而当时罗马尼亚工人的平均月薪只有3000 列伊。1975 年埃列娜和她丈夫访问约旦时，约旦国王侯赛因在王家游艇“努库尔”号上招待这对罗马尼亚元首夫妇。埃列娜对金碧辉煌的“努库尔”号心醉神迷，对丈夫说她想要这艘游艇。齐奥塞斯库以为埃列娜想要一艘相同的游艇，但埃列娜说她就想要约旦国王的这一艘。最后侯赛因国王解释说这艘游艇已经送给了他女儿阿丽雅公主，埃列娜这才作罢。她回国后要求“二号首长服务处”为她从美国订购一艘同样的钢质游艇，这件事后来由于游艇造价昂贵（美国人开价3000 万美元）、罗马尼亚又缺乏外汇而作罢。

埃列娜虽然出身于贫穷的农民家庭，在小时候还靠摆摊卖瓜子帮家里挣过钱，但在发迹之后却对劳动人民没有丝毫感情。她极度蔑视罗马尼亚的人民，曾经轻蔑地把他们称作“狗崽子”，认为罗马尼亚人既迷信、又忘恩负义、懒惰成性，成天只关心吃饱肚子，想方设法少干活、多享受。只有儿童，如果教育得好，还是可以救药的。

在齐奥塞斯库执政的最后十年里，罗马尼亚市面上商品缺乏，大街上经常可以看到人们排长队购买食品的场景。每当埃列娜坐在防弹的“奔驰”轿车里从布加勒斯特的大街上呼啸而过、看到这种场景时，总要忿忿地说“瞧这些囊虫！”为了解决国内肥皂短缺的问题，齐奥塞斯库曾经提出把出口用的“罗娜”牌香皂提价投放国内市场，埃列娜却说“香皂用普通的，但外面用‘罗娜’的包装。这种肥皂对这帮懒鬼已经是不错的了。”1989 年 12 月罗马尼亚爆发“蒂米什瓦拉事件”，国内形势风紧云急，当埃列娜听说该市的八百多名女工人也上街游行、要求撤换厂长、改善生活条件时，竟恶狠狠地说“放狗咬这些臭娘子！”（《尼古拉·齐奥塞斯库》，P132—133；《风云突变》，P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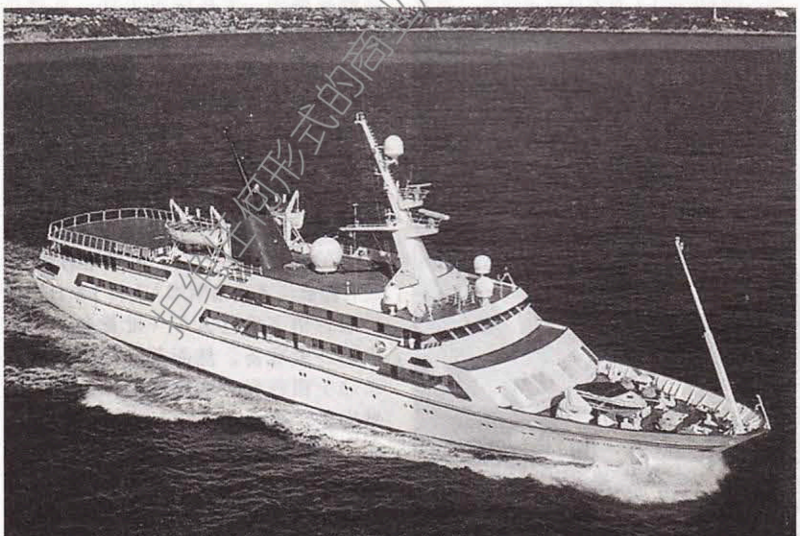


齐奥塞斯库夫妇的女儿卓娅（1949—2006），布加勒斯特大学数学博士。1989 年罗马尼亚剧变后以“盗窃国家财产”为由被捕，但不久即获释。由于长期过量吸烟而在2006 年死于肺癌

公平地说，齐奥塞斯库的大儿子瓦伦丁为人比较沉稳收敛，是一个颇有成就的核物理学家，对政治不感兴趣，1989 年罗马尼亚剧变后他被新政权逮捕时，核物理研究所数百人联名上书政府，要求公正审判并释放瓦伦丁。

不过，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瓦伦丁也做过一些不得人心的事，比如在一次全国足球联赛中，罗马尼亚人民军“星”队败给内务部的“迪纳莫”队时，他就动用自己的权势勒令裁判改变比赛结果。还有一次，他和一名医生朋友驾着当时罗马尼亚唯一的一辆保时捷跑车在布加勒斯特的大街上超速兜风，在经过一座狭窄的桥梁时，一辆国际联运大卡车迎面开来。医生提醒他放慢车速，让有优先权的大货车先过桥。但瓦伦丁不屑一顾地说“难道不认识我的车吗？全国才有几辆这种型号的车？”医生说“那是外国联运卡车，司机可能不认识你的车”，话音未落，那辆保时捷就钻到了大货车的底下，医生的一只眼睛当场被撞瞎。事后埃列娜一面放风说事故是医生导致的，一面付给医生20 万列伊的“封口费”，又把他送到国外去“进修”。

齐奥塞斯库夫妇的女儿卓娅是一位数学家，布加勒斯特理工大学的教授。她曾经用自己的家庭背景把一些有“历史问题”的数学家安排进自己的单位。在八十年代罗马尼亚闭关锁国期间，罗马尼亚数学研究所却没有中断与国外的交往，并多次举办国际学术会议，这也是卓娅的功劳。不过，她在生活上也十分奢侈，平时经常开一辆奔驰450SEC 型轿跑车。她在春天宫的卧室和休息室比其母亲的小一些，



约旦国王的豪华游艇“努库尔”号。埃列娜·齐奥塞斯库对这艘游艇非常艳羡，曾试图为自己也订购一艘

但也十分豪华奢侈，桌子上摆满了西方的高级化妆品和金银首饰，衣橱里装满了高级面料的服装，仅长裤就有50多条。卓娅在罗马尼亚剧变后也被逮捕入狱，1990年6月释放。

由于长子和长女对政治的兴趣都不大，因此齐奥塞斯库把他那不成器的宝贝疙瘩小儿子尼库视作未来的接班人。这个喜欢酗酒和寻欢作乐的年轻人在31岁时被选入中央委员会，36岁时被选入中央执行委员会，38岁时成为青年部部长，还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常委。1987年齐奥塞斯库在派尼库到锡比乌县担任第一书记时，公开对外国记者说，如果大家拥护，“他可以接班”。



齐奥塞斯库夫妇的小儿子尼库（1951—1996），毕业于布加勒斯特大学物理系，随后开始从政，被其父亲当作接班人刻意培养。1989年罗马尼亚剧变后被逮捕判刑，1992年由于长期酗酒导致的肝硬化而被释放，1996年死于维也纳

花花公子尼库在生活上的奢侈和腐化在罗马尼亚是全国众所周知的。除了在齐奥塞斯库的六十多处行宫里有尼库的住所外，他还在布加勒斯特、锡比乌和喀尔巴阡山区有自己的私人别墅和住宅。他在锡比乌的住宅是一座两层洋楼，院子里有用白色大理石修建的游泳池和苹果园，还安装了两个卫星天线，专门用来收看西方的电视节目。屋子里的电器设备全是从西德和日本进口的，家具与摆放的工艺品也十分考究。他还有一间专门用来存放衣服的房间，里面挂满了各种长短大衣、西服、风衣、夹克、猎装，足以抵得上一个男子服装店，他平时用的香水、抽的香烟和喝的酒也都是高干服务处从国外买来的进口货。尼库的另一处别墅位于锡比乌县的萨利什蒂，占地5公顷，仿照北欧风格，用玻璃、不锈钢和优质木料建造。别墅里面有两间卧室、起居室和厨房，还有游泳池、网球场和专门用来钓鱼的一片小湖泊。这处别墅的造价高达600万列伊，当然是国家出钱。

尼库有两辆奥迪轿车、一辆日本的“铃木”、一辆法国“雷诺”和一辆达契亚，所有的车上都装着警报器。他非常喜欢超速驾车，有时遇到交通拥堵便拉响警笛驶入逆向车道。1972年6月4日，在总统专车队的一名司机开车接他从大学回到“春天宫”时，尼库要求亲自驾车，结果由于车速过快撞死一个18岁女青年，最后由同车的司机顶罪（《风云突变》，P151－152）。尼库的另一个爱好是猎色，他的通讯簿上记录着一连串女士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其中有学生、运动员、歌星、女干部……其中绝大部分是被他玩完后踢开的姑娘。

由于尼库经常拈花惹草、酗酒闹事、打架斗殴，埃列娜害怕造成不好的影响，不得不动用警察和内务部的便衣对他进行跟踪，甚至在他的住所和幽会地点都装上了窃听器。在与他有过密切关系的“女朋友”当中最著名的是退役的体操运动员纳迪娅·科马内奇，甚至在他调动到锡比乌县工作后，只要打一个电话，科马内奇还要从300公里外的布加勒斯特赶来与他“赴约”（《风云突变》，P150）。这位体操明星不堪忍受尼库和齐奥塞斯库一家给她带来的各种精神和肉体折磨，最终在1989年11月与七名朋友一起偷偷越境逃往匈牙利，最终向美国驻奥地利大使馆请求政治避难。



齐奥塞斯库的父母与儿子和儿媳妇在一起的合影，1968年摄于春天宫

1989年12月罗马尼亚爆发“蒂米什瓦拉事件”后，尼库下令用装甲车把锡比乌县委大楼围起来，并对示威人群鸣枪示警。但是12月22日中午，当他听到父母乘直升机逃离布加勒斯特的消息后，知道大势已去，于是戴上假发，和他最后一任女朋友驾车前往布加勒斯特。在进入首都的检查站，他被人认了出来，随即被捕。由于民愤太大，在押往“救国阵线”总部——罗马尼亚电视台的途中，尼库的肚子被人捅了一刀，经抢救脱险。

1990年5月，锡比乌地方法院对尼库进行审判，罪名是“煽动杀人罪”和“藏匿武器罪”，判处20年徒刑。1991年罗马尼亚军事检察院和尼库本人同时向罗马尼亚最高法院提起上诉，法院最后改以“屠杀罪”判处尼库16年徒刑。一年之后尼库由于酗酒导致的黄疸和肝硬化而被提前释放，1996年在维也纳的一家医院里去世，其财产都被罗马尼亚政府没收。

1990年到1993年，罗马尼亚新政府对传说中沸沸扬扬的“齐奥塞斯库夫妇十亿美元瑞士存款”一事进行了调查。齐奥塞斯库在瑞士有存款的消息是在1989年12月23日，即齐氏被捕的第二天由瑞士报纸首先披露的，说他在瑞士存有价值4亿美元的黄金。还有报道说齐奥塞斯库12月18日出访伊朗时用飞机运去了一批黄金，为流亡国外做准备。然而罗马尼亚政府请求瑞士银行和伊朗政府对此协查的结果均是“查无此事”。

除了黄金事件之外，《华盛顿邮报》还在1990年5月披露说，从1979年到1989年，美国曾秘密通过齐奥塞斯库的两个兄弟从罗马尼亚购买苏联的军事技术情报，美国政府通过外国

中间人向罗马尼亚支付了4000多万美元，其中20%作为佣金存入了齐奥塞斯库亲属控制的瑞士银行账户。美国官员说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同这十多次交易没有直接牵连，但交易的成功必须经过他的默许。1991年3月，罗马尼亚追查齐奥塞斯库家族财产委员会宣布说，罗马尼亚在1986到1987年间曾将80.8吨黄金运出国外抛售，所得的10.4亿美元已经全部用于偿还外债。

齐奥塞斯库家族的“国外存款”一事谁也说不清，但有一件事是尽人皆知的，那就是齐奥塞斯库的儿子尼库和女儿卓娅在西方世界花钱如流水。尼库生性好赌，经常在国外挥霍公款赌博。1983年他在美国拉斯维加斯和迈阿密的赌场里狂赌滥饮，把身边带的钱都输光后还欠了一大笔钱，百般无奈，只好向爹地求助。齐奥塞斯库夫妇对此事很焦急，因为用国库还债太惹人注意，找美方帮忙又太丢脸，最后用“展销”的形式把罗马尼亚国内的17匹纯种阿拉伯马在美国拍卖，换回了150万美元的外汇，偿还了尼库的赌债。至于卓娅，她连烫头发都要去巴黎，往返的机票以及在巴黎的各种花销全都是由罗马尼亚政府支付的。此外，齐奥塞斯库的子女在过生日时还经常从新加坡和泰国订购特种名贵兰花，用专机空运回来。这些兰花每束价值180美元，费用全都从罗马尼亚内务部开设的驻外公司特别基金中支付。

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统计，齐奥塞斯库家族成员在罗马尼亚党政军界担任要职的不下30人。一些其他亲戚，包括他妻子的彼得列斯库家族、以及有幸娶了他妹妹们的家伙，也先后“升天”，分别担任了罗共中央委员、政府部长等要职。齐奥塞斯库的哥哥马林·齐奥塞斯库在维也纳主管罗马尼亚驻外经济代表处，但是其真正工作是领导对西欧的政治和经济特务工作，同时还负责齐奥塞斯库家族与几家瑞士银行之间的往来联系。1989年罗马尼亚剧变、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处决几天之后，他在维也纳的住所里上吊自杀。

齐奥塞斯库的弟弟尼古拉（他老子在这个儿子降生时喝醉了，在镇公所办理出生登记时忘记了前一个儿子也叫尼古拉。大尼古拉成为罗马尼亚的统治者后，第二个尼古拉把父名安德鲁察用作中间名，以与他那著名的哥哥有所区别）担任内务部警官学校校长，在内务部有很大的权力，能指挥安全部队的调动。他在罗马尼亚剧变后因“指挥安全部队枪杀游行群众”而被判处15年徒刑。另一个弟弟伊利埃担任国防部副部长兼罗军最高政委会总书记，1989年12月被捕，之后无罪释放。第三个弟弟扬曾经先后担任农业和食品工业部秘书长、副部长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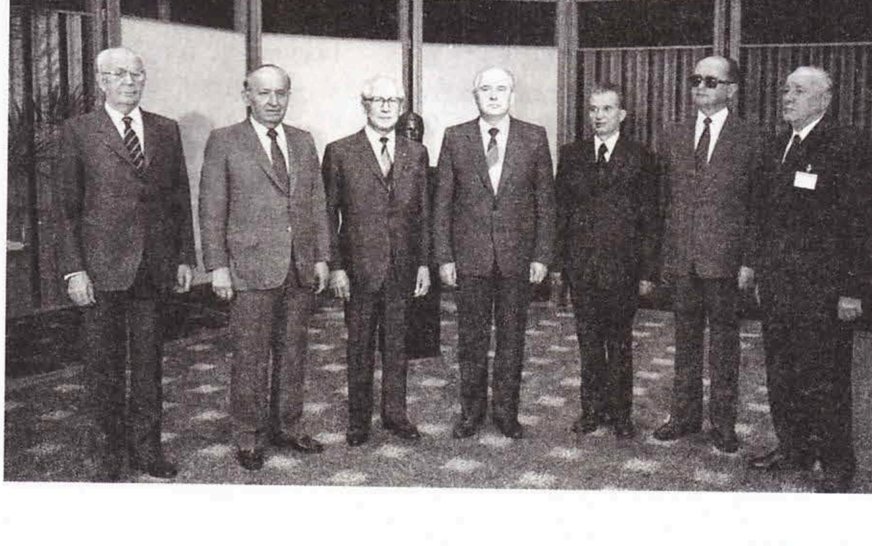
齐奥塞斯库的妻兄乔治·彼得列斯库负责工会工作，担任罗马尼亚总工会全国理事会副主席，还出任石油和化学工业部部长。齐奥塞斯库的妹妹埃列娜（与齐奥塞斯库夫人同名）也沾了哥哥的不少光，她和她丈夫瓦西里·伯尔布列斯库在齐奥塞斯库家族的老家奥尔特县成了一霸。伯尔布列斯库从1982年起当上了罗共奥尔特县委第一书记兼县人民委员会主席，随后又兼任罗共中央书记。甚至连小儿子尼库的妻子波利亚娜在结婚后也飞黄腾达，成为罗马尼亚少先队全国委员会主席、大国民议会书记。

这样，在二十几年的苦心经营后，齐奥塞斯库居然在社会主义的罗马尼亚成功地建成了颇有中世纪色彩的“齐家天下”。罗共中央开会就好像是齐奥塞斯库的家庭会议。罗马尼亚群众对这种裙带关系和家族统治十分憎恶反感，“社会主义是一家”的笑话在罗马尼亚国内不胫而走。新华社记者记录的一个罗马尼亚政治笑话是这样的：有人问“齐奥塞斯库王朝与其他王朝有何区别？”答：“其他的王朝统治是世袭的，而齐奥塞斯库全家人则是在同一时间进行统治”（《风云突变》，P54）。罗马尼亚民间议论说，不仅国家的党政军大权掌握在齐奥塞斯库手里，全国三代人（党员、团员、少先队员）的命运也全掌握在他们一家人手里。在当时的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都还从未出现过像罗马尼亚这样的现象：一个共产党的领导人，正在设法试图建立一个由其家族合法继承的王朝。有人不怀好意地将诋毁为“朝鲜经验”。

（待续）

本文关于二战之后的罗马尼亚及其领导人的内容全部引用自国内出版的下列书籍：
《东欧剧变纪实》，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12月
《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8月
《齐奥塞斯库与罗马尼亚》，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12月
《风云突变——齐奥塞斯库垮台始末》，新华出版社，1993年
《罗马尼亚近现代史》，商务印书馆，1974年
《罗马尼亚史》，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8月
《国际事务概览·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五、第九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
《非常病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6月
《愚昧改变历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6月
《夹缝中的六国》，商务印书馆，1997年11月
《悲剧悄悄来临：东欧政治大地震的征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
本文引述上列书中的相关内容和段落，并非证实或赞同其中的观点，仅供读者参考

1987年齐奥塞斯库与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领导人合影。左起依次为捷克斯洛伐克的胡萨克、保加利亚的日夫科夫、东德的昂纳克、苏联的戈尔巴乔夫、齐奥塞斯库、波兰的雅鲁泽尔斯基和匈牙利的卡达尔。两年以后，这张照片中的绝大多数领导人就都“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延歌舞，眼见他楼塌了”，而戈尔巴乔夫也不过比其他人多捱了两年而已



出没风波里

——条约时代的日本海军水雷战队旗舰（三）

○ 刘怡



科曼多尔冰海之战

山本五十六从中途岛大败而归后的1942年6月7日，细萱戊子郎中将指挥的日军第五舰队主力由第4航空战队掩护，将舞鹤第3特别陆战队和陆军北海支队的2400名步兵送上了阿留申群岛中的基斯卡岛（Kiska）与阿图岛（Attu）。靠近北极圈的阿留申群岛四季苦寒、常年大浪滔天，并非兵家必争之地；基斯卡岛与阿图岛相隔162海里，也很难相互策应。但从纸面上说，此地南扼北美到亚洲航程最短的北太平洋航线，北控美俄两国毗邻的白令海峡，还是日本占领的头一处“美国本土”，具有一定宣传价值。在中途岛的惨败后，联合舰队迫切需要以这次成功的AL作战作为鼓舞士气的遮羞布。基斯卡岛和阿图岛随后就被更名为鸣神岛、热田岛，前者进驻了特设水机母舰君川丸、神川丸运来的6架二式水上战斗机（A6M2-N，由零战11型加装浮舟而成）和千代田号水机母舰运来的6艘袖珍潜艇“甲标的”，并得到潜艇、驱逐舰和不定期运输船的补给，后者也派遣了2000余人的守备队。

由于主力舰只全部被抽调到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战线，实力偏弱的美军北太平洋部队对日本人的存在一时无可奈何。8月30日，他们占领了基斯卡岛以东的阿达克岛（Adak），建造了一个可容纳40余架飞机的机场，随后就以不定期的空袭、炮击和潜艇封锁对日军进行孤立。从7月到8月，日军相继损失了2艘驱逐舰和1艘运输船，另有多艘军舰受伤。不过此时美日双方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瓜岛，对北方战场投入的资源极为有限，所以直到1942年底，日军依然控制着阿留申群岛的西端，美军则据有东端，彼此都没有继续推进之意。

1943年1月，日军在瓜岛的败退已成定局，尼米兹终于有足够的兵力完成收复阿留申群岛的任务了。1月12日，4000名美军在距基斯卡岛东南岸仅有52海里的阿姆奇特卡岛登陆，在岛上修筑了第二个机场。至此，日军控制下的两个大岛都被纳入美军的空袭范围，而日本人在基斯卡岛建造的机场却因为工程设备和技术人员不足，直到1943年8月撤离时都没有建成。

美军新任北太平洋部队司令金凯德少将（同年6月升中将）派麦克莫里斯少将（Charles McMorris）指挥水面舰艇出海，破坏日军从千岛群岛驶往阿留申群岛的交通线。2月18日，麦克莫里斯的舰队对阿图岛进行了炮击，次日深夜在返航途中又击沉1艘日军运输船。此时日军在两个岛上的守备队总数超过8000人，弹药和给养全靠海上运补，美军的空袭和封锁使其状况告急，第五舰队不得不改变以往零打碎敲的分散运补方式，出动主力舰艇为大队运输船护航。

1943年3月7日，细萱戊子郎亲率第五舰队主力离开幌筵岛，由第21战队的轻巡木曾号与3艘运输船组成输送队，2艘重巡那智号、摩耶号和2艘轻巡多摩号、阿武隈号率5艘驱逐舰组成护卫队，一同朝阿图岛进发。两天后，编队顺利完成运补任务，于13日返回幌筵岛。这次行动的成功令细萱信心大增，3月19日，他再度下达了运补阿图岛的命令：第1水雷战队司令官森友一少将率旗舰阿武隈号、3艘驱逐舰和3艘运输船（其中一艘搭载着新任阿图岛守备队队长山崎保代陆军大佐）组成输送队，细萱本人率2艘重巡那智号（旗舰）、摩耶号，轻巡多摩号与2艘驱逐舰组成护卫队，于3月22日和23日分别自占守岛、幌筵岛出发。25日白天，两队应在科曼多尔群岛（Komandorski



Islands）以南100海里、阿图岛西南180海里处会合。此时若美舰出现，即以运输船为诱饵，将其引入包围圈歼灭；若未遭遇敌舰，则继续驶往阿图岛卸载货物。第21战队的另一艘轻巡木曾号由于已经在3月15日返回本土加装电探（雷达），没有参加此次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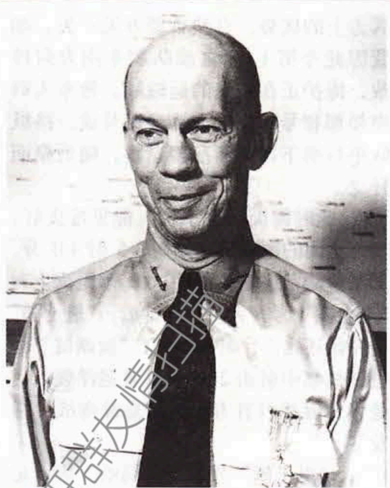
与细萱出航几乎同时，麦克莫里斯指挥的美军TG16.1特混大队也驶离了位于阿留申群岛东部的荷兰港（Dutch Harbor），向阿图岛以西水域进发。在上个月拦截敌船成功后，麦克莫里斯并不清楚日军已经改变了战术，他的舰队是以拦截小股运输船队为目标的，编成内包括1艘重巡洋舰、1艘轻巡洋舰和4艘驱逐舰，没有想过要进行大规模交战。26日夜间，TG16.1抵达目标水域，开始以15节航速由南向北展开搜索。

细萱最初的航程不甚顺利。科曼多尔群岛附近自24日起即狂风肆虐，护卫队所属的运输船三兴丸和驱逐舰薄云号因此掉队。26日夜间，日军其余的2艘重巡洋舰、2艘轻巡洋舰、4艘驱逐舰与2艘运输船在预定地点会合。细萱下令全队组成单纵阵，以那智号为首，运输船夹在护卫队主力和殿后的电号驱逐舰之间，以13节航速驶向东南方的阿图岛。那智号同时还不断向薄云号拍发电报，要求该舰和三兴丸尽快追上主队。

当地时间3月27日4时30分（夏威夷时间26日7时30分），日出后一小时，TG16.1正在科曼多尔群岛西南约100海里处沿北偏东方向前进，驱逐舰“科格伦”号（USS Coghlan，DD-606）和轻巡洋舰“里士满”号（USS Richmond，CL-9）几乎同时在雷达示波屏上发现了北方7.5海里外的3个目标。已经被恶劣天气折磨了若干天的麦克莫里斯认定那是2艘运输船和1艘驱逐舰，他下令6艘美舰由反潜队形变换为单纵阵，以25节高速摸上去，争取一举歼灭敌船。

在浓重的晨雾中，位于日方队列最后的电号也发现了远处驶来的美舰。该舰不能分辨敌我，于是向阿武隈号上的森友一司令官报告。后者认为那是正在追赶主队的薄云号和三兴丸，故并未作出反应，也没有报告先头舰上的细萱。直到4时55分，电号已经确认后方舰只为巡洋舰2、驱逐舰4，甚至还观察到了“里士满”号高大的三脚桅，森友一才忙不迭地向那智号告警。细萱下令电号护卫2艘运输船朝西北方退避，其余舰只做U形大转弯，以25节高速迎敌。

“科格伦”号与“里士满”号初次发现目标之时，日本舰队正以正北偏西的航向行驶，而高速接敌的美舰航向正北，形成追尾之势。但日舰调头朝南后，TG16.6就得迎面接敌了。5时11分，雷达监测到正面日舰增加为轻巡洋舰2艘、驱逐舰1艘、运输船2艘；24分钟后，另外2艘重巡洋舰和2艘驱逐舰也得到确认。透过逐渐散开的晨雾，旗舰“里士满”号的了望哨惊讶地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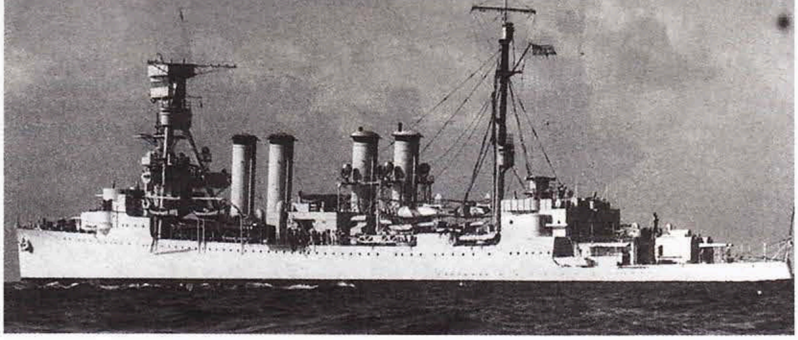
查尔斯·霍雷肖·麦克莫里斯（1890-1954），亚拉巴马人，1908年进入安纳波利斯海军官校，1914年参加夺取墨西哥维拉克鲁兹港的行动。一战末期曾随驱逐舰前往欧洲参战，“海军假日”期间在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任教，1938年从海军防务学院进修结业后出任太平洋舰队作战参谋。珍珠港事件爆发前，他曾对金梅尔上将断言日军不会采取突然袭击，成为一大污点。1942年麦克莫里斯改任北太平洋部队水面舰艇指挥官，在阿留申群岛战役中表现出色，获颁海军十字勋章。1943年后任太平洋舰队参谋长直至战争结束，1950年在珍珠港海军第14军管区中将司令任内退休。美国海军有一艘护航驱逐舰DE-1036以麦克莫里斯命名

敌人根本不是什么落单的运输船，而是实力足足超过美军一倍的主力舰队！

TG16.6的主力舰“盐湖城”号（USS Salt Lake City，CA-25）航速比细萱的2艘重巡洋舰慢1-2节，即使立即调头撤退，多半也会被追上歼灭。唯有冒死一搏，还可能觅得一线生机。5时39分，美舰组成战斗队形，以“里士满”号为首朝日舰驶去。

在TG16.6以自取灭亡的姿态朝日舰扑来时，大喜过望的细萱正在调兵遣将，准备围歼对手。日舰握有航速和

科曼多尔海战中担任麦克莫里斯舰队旗舰的“里士满”号。属美国最老的条约型轻巡洋舰“奥马哈”级，完工于1923年，标准排水量7050吨，安装12门6英寸主炮、4门3英寸高炮和10具鱼雷发射管，还可搭载2架水侦及224枚水雷，航速34节，水线附近有3英寸装甲带。“里士满”号后于1946年退役拆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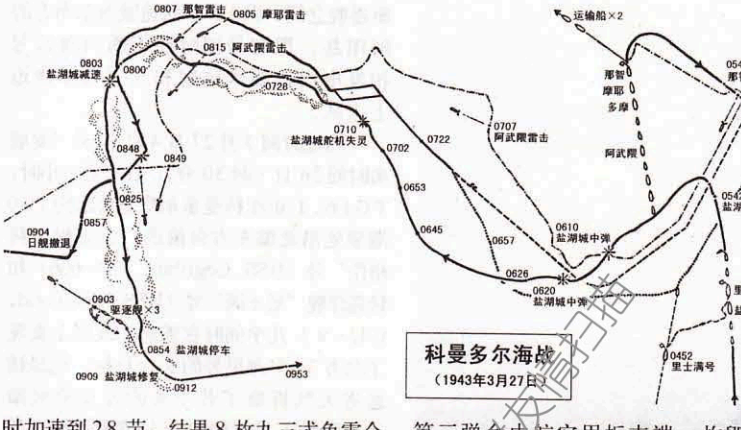


兵力上的优势，自然希望万无一失，细萱因此令第1 水雷战队朝东南方向接敌，掩护正在撤退的运输船；他本人则率领那智号、摩耶号、多摩号成一路纵队平行南下，截断敌舰退路，随后聚而歼之。

此时海面微波不惊，能见度良好，双方之间的距离迅速缩短，5 时40 分，那智号的前主炮在18000 米距离上对“里士满”号开火；1 分钟后，“里士满”号开始还击。5 时42 分，“盐湖城”号也开始集中射击2 艘日军重巡洋舰，科曼多尔海战（日方称阿图岛冲海战）爆发了。

“里士满”号属“奥马哈”级，是美国最老的条约型轻巡之一，舷侧齐射火力仅为8 门6 英寸主炮。那智号的第二次和第三次齐射对该舰形成了跨射，“里士满”号的射击指挥仪被近失弹震坏，火力一时失准。不过日舰继续集中攻击这艘先头舰，给了后方的“盐湖城”号以可乘之机。该舰在19000 米距离上以前方的5 门主炮对那智号和摩耶号连续开火，并不断接近，第二次齐射就形成了跨射。而摩耶号忙中出错，4 号炮塔在转向舷侧射击时，炮口的暴风摧毁了右舷弹射器上的水侦，还引起一场小火灾，不得不灭火抢救。而在这几分钟里，“科格伦”号和“贝利”号（USS Bailey，DD-492）这两艘美国驱逐舰已经逼近至13000 米处，对日本重巡连续开火，“里士满”号也抢修完毕、重新开火。

5 时44 分，随着双方距离不断接近，细萱下令那智号对美军先头舰“里士满”号齐射8 条鱼雷，但麦克莫里斯鉴于日舰舷侧火力优势越来越明显，恰好在5 时45 分下令全队向西南转向，同



科曼多尔海战
（1943年3月27日）

时加速到28 节，结果8 枚九三式鱼雷全部从“里士满”号舰首前方通过，无一命中。细萱舰队随后也陆续开始转向，尾随“里士满”号而来。

从火力上说，细萱的2 艘重巡和2 艘轻巡有20门8 英寸炮、14门5.5 英寸炮和48 具鱼雷发射管，而美方的2 艘大舰仅有10门8 英寸炮、12门6 英寸炮和16 具鱼雷发射管，对比极为悬殊。但在5 时50 分前后的这几分钟里，由于“盐湖城”号和“里士满”号分别位于那智号的前方左右侧，可以同时使用舰尾方向的5门8 英寸炮和6门6 英寸炮，而那智号在舰首方向仅有1、2 号炮塔中的4 门主炮可以射击（3 号炮塔射界不良），美舰反而取得了暂时的火力优势；至于摩耶号和2 艘轻巡，它们不是还在转向就是被那智号所阻挡，一时无法射击。

从5 时50 分到52 分，那智号连续被“盐湖城”号命中三弹（亦有资料认为命中日舰的是“里士满”号），第一弹命中那智号航海舰桥后部的海图室，炸死11 人、炸伤21 人，造成旗舰通讯线路中断；第二弹击中主桅支柱底部；


1939 年美国海军演习中并肩施放烟雾的“戴尔”号和“莫尼汉”号。两舰在1942 年科曼多尔群岛海战中也共同战斗

第三弹命中航空甲板末端，炸毁了右舷弹射器，下方鱼雷发射管室内的水兵也被炸死2 人、炸伤5 人。那智号的损管人员在匆忙中切断了全部5 个主炮塔的电源，该舰的10门8 英寸主炮全都被固定在最大仰角，一时无法射击，只能拖着浓烟暂时转向规避。

那智号停火之后，完成机动的第1 水雷战队自美舰右侧占据了阵位，而摩耶号和多摩号则超越规避的那智号，开始尾随“盐湖城”号，摩耶号还发射了4 枚鱼雷（未中）。“里士满”号因为航行过快、超出了主炮射程，不得不暂时停火。该舰后来和多摩号发生了一轮短促接战，命中日舰2 弹，但只造成轻微损伤。

“盐湖城”号这艘美国最老的重巡洋舰则被日舰的交叉火力所笼罩，6 时10 分，摩耶号的一发8 英寸炮弹命中该舰中部的弹射器，造成观测机起火，美军不得不将飞机推入水中。6 时20 分，摩耶号的第二弹从舰尾右后方入水，贴着舰体钻进了后部油舱，“盐湖城”号有2 人战死，一条输油管线被打坏、部分燃料泄漏。两艘殿后的驱逐舰“戴尔”号（USS Dale，DD-353）和“莫纳汉”号（USS Monaghan，DD-354）急忙冲向日舰，佯装要发射鱼雷，日本巡洋舰因为与伴航驱逐舰脱节、不敢贸然向前，只得暂时减速机动，“盐湖城”号这才得以暂时喘息，加速继续西行。

6 时30 分，那智号的炮塔电力得到恢复，日舰重新整队，再度开始追击“盐湖城”号。麦克莫里斯此时已经得知，从阿留申群岛赶来的陆军轰炸机要到中午才能抵达战场，倘若继续被日舰尾随追击，他的小舰队必败无疑；只有继续紧跟运输船、迫使细萱分散兵力，才能搏得一线生机。美舰于是改航向为西北，向日军运输船退避的方向追近，细萱的2 艘重巡为躲避可能的鱼雷

攻击，只敢远远尾随。6时45分，航速较快的多摩号一度追近“盐湖城”号，遭到全部10门8英寸主炮的痛击，仓皇后撤。

这样的追逐一直持续到6时50分，那智号和摩耶号终于追上了“盐湖城”号，双方航向一致，在刚刚弹射的零式水上观测机的校射下，两艘日舰开始以优势火力覆盖美舰。

6时52分，“盐湖城”号的舵机被一枚近失弹打坏，改以人力操舵，转动范围不超过10度，航行异常笨拙。日舰的炮弹开始越来越准确地跨射该舰，阿武隈号还发射了4枚鱼雷，不过依然没有命中。7时10分，摩耶号的一枚8英寸炮弹自19800米外穿入机舱，虽未爆炸，但造成水线以下破损进水，操纵更加不灵，麦克莫里斯只得再度命令驱逐舰上前保护。“贝利”号和“科格伦”号随即施放了烟幕，并对日军观测机进行射击。托庇于良好的气象条件，烟幕很快笼罩了“盐湖城”号周围水域，使日舰无可奈何。此时美舰距本方驻兵的阿达克岛已有550海里之遥，而离开细萱的基地幌筵岛却仅有420海里，倘若日军出动飞机前来轰炸，美舰断无幸存之理。在“盐湖城”号已经受损的情况下，麦克莫里斯也不再奢望继续拦截日军运输船，8时左右，美舰以30节航速折向西南方，准备脱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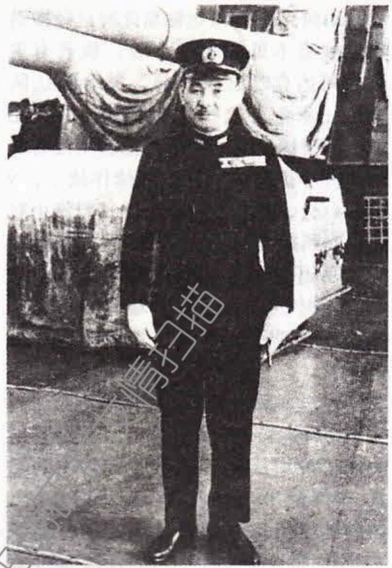
对美国舰队的这些动向，那智号上的细萱因为视界不良，并未作出反应。但一直在北方水域保护运输船的第1水雷战队却发现了猫腻，旗舰阿武隈号迅速向“盐湖城”号右舷逼近，再度开火射击。8时03分，阿武隈号射出的140毫米炮弹击穿了“盐湖城”号左舷水线以下舰体，海水再次涌进破损的机舱和油舱，泄漏的重油在低温下结成了粘稠的胶状物，短时间内无法修复。细萱的2艘重巡趁机靠拢过来，于8时05分到07分先后发射了12枚鱼雷，依旧没有中的。“盐湖城”号的左倾逐渐增加到5度，后部2座炮塔也因为射击时间过长出现弹药不足，到8时30分前后，后部锅炉已经熄火，航速下降至16节。而细萱因为害怕美国驱逐舰发射鱼雷，一直小心翼翼地从两侧向“盐湖城”号逼近，并未贸然发动攻击。

趁此机会，美军驱逐舰再度施放烟幕，并对那智号展开了突袭。8时48分，该舰的1号炮塔被一枚5英寸炮弹击中正下方，1名炮手被打死、另1人受伤，炮塔旋回装置被弹片卡死。而阿武隈号和那几艘日军驱逐舰虽然也向美舰发射了鱼雷，但因为对方转舵及时，依然一发未中（日舰此役共发射43枚鱼雷，全部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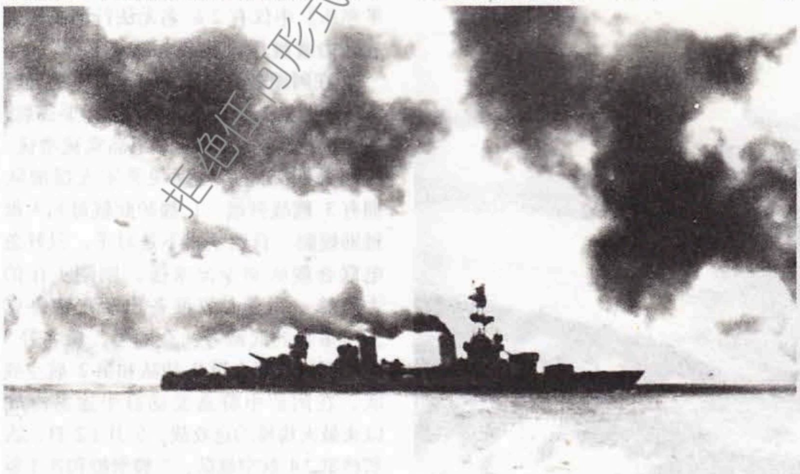
8时50分，“盐湖城”号的好运终于到头：该舰的损管人员在向空油舱注水、试图减少左倾时，海水灌入了之前被摩耶号打坏的输油管线，剩下的锅炉也开始熄火。8时54分，由于蒸汽压力不足、主机彻底停转，“盐湖城”号瘫痪在了海面上。该舰的弹药已经用去85%，主炮穿甲弹全部耗尽，只能徒劳地继续进行象征性射击。麦克莫里斯命令“里士满”号靠近该舰，准备营救舰上人员并放弃“盐湖城”号，但罗杰斯舰长（Bertram J. Rodgers）认为本舰尚可挽救，要求友舰掩护他进行抢修。麦克莫里斯答应了这一请求，9时许，“里士满”号和“戴尔”号又一次开始施放烟幕。

为了让不明真相的细萱远离笼罩“盐湖城”号的烟幕，“贝利”号、“科格伦”号和“莫纳汉”号以31节高速冲向迎面扑来的日舰，发起了TG16.6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轮反击。细萱直到双方接近到14600米时才发现目标，他下令全队以主炮齐射美舰。9时整，一枚8英寸炮弹命中“贝利”号右舷中部，打死5人、打伤6人；2分钟后，另一发炮弹击中其前机部锅炉舱，“贝利”号航速下降到18节。但该舰拼死射出的5枚鱼雷吓跑了正在逼近的摩耶号，后者不得不转舵规避。“科格伦”号和“莫纳汉”号也一路逼近至距那智号仅8000米处，虽未能发射鱼雷，但5英寸主炮的炽烈齐射再度命中日舰舰首一弹。与伴航驱逐舰脱节的日本巡洋舰又一次向西转航，远离了危难中的“盐湖城”号。

令人惊奇的事情就在这时发生了：细萱戊子郎大概是对始终打不死的“盐湖城”号和如苍蝇一般讨厌的美国驱逐舰产生了厌烦。他的旗舰已经多处受损，1个炮塔无法转动；由于战场上空被烟幕笼罩，了望哨也看不清敌



科曼多尔海战的指挥者、第五舰队司令长官细萱戊子郎中将（1888–1964）。长野县人，海兵第36期、海大甲种第18期出身，历任军令部第2班参谋，重巡洋舰鸟海号、战列舰陆奥号舰长，第5、第4水雷战队和第1航空战队司令官，开战时任第五舰队司令长官。科曼多尔海战后，细萱因指挥失误、未能歼灭劣势敌军遭到提前退役的处罚，转任负责中太平洋岛屿民政事务的南洋厅长官



科曼多尔海战中，“盐湖城”号正在转向，以规避日舰的齐射，舰体中部可见弹射器和1架水侦。该舰是美国最老的条约型重巡，完工于1929年，标准排水量9097吨，安装10门8英寸主炮、4门5英寸高炮和6具鱼雷发射管，搭载2–4架水侦，航速32.5节，水线附近和机舱有2英寸装甲防护。“盐湖城”号战后曾参与“十字路口”核试验，1948年5月25日作为靶舰击沉于南加州外海

舰的动向。而2艘运输船此时已经撤退到友舰看不见的北方水域，倘若有美机从阿达克岛赶来空袭，整个输送队将无一幸免。这些复杂的想法夹杂在一起，干扰了他的判断，他已经没有决心在占尽优势的局面下继续作战了。9时04分，那智号下令全体日舰停止射击、向西撤离战场，同时令运输船也朝幌筵岛返航。当胜利的天平开始朝细萱倾斜时，这个胆小鬼却因为心理崩溃无法接受这一事实，居然就这么溜走了！

“盐湖城”号的损管队员则创造了另一个奇迹：停车4分钟后，应急小组关闭了油舱阀门，清除了锅炉中的海水，到8时58分恢复了供汽。9时03分，该舰的主机恢复运转，航速很快达到23节。当日本人消失在西方时，麦克莫里斯下令“贝利”号以一排鱼雷为其送行，并于9时12分下令全队停火，朝东返回荷兰港。而左倾10度的“盐湖城”号在归途中居然还排除了之前的舵机故障，把航速恢复到了30节！

科曼多尔海战是1942年之后日美之间少有的火炮对战之一，也是1944年10月萨马岛海战的预演。美军有1艘重巡洋舰受重伤、2艘驱逐舰轻伤，7名水兵战死；日军1艘重巡洋舰中度受损、1艘轻巡洋舰轻伤，14人战死、26人受伤，从战果上看可谓平分秋色。但麦克莫里斯在实力明显偏弱的情况下，以有效的机动、烟幕掩护和猛烈的火力挫败了细萱向阿图岛运送补给的企图；而后者调度无方，不仅未能完成护航任务，关键时刻还错过了击沉美军主力舰的绝佳机会（细萱比两年后的栗田健男更值得谴责，因为栗田并不知道正面敌手的实力，而细萱在一开始就已经确认了TG16.6的兵力）。这位胆怯的指挥官被他的幕僚和上级共同抛弃，在此役之后三天就“被退役”了。



科曼多尔海战结束后在旧金山母马岛海军船厂修复战损的“贝利”号驱逐舰

细萱被撤职之后，继任第五舰队司令的河濑四郎中将丧失了继续向阿图岛派遣大规模运输船队的信心。由于那智号受损需要修理，此后日军仅以少数潜艇和驱逐舰组成“东京快车”，不定期地向两岛运送补给品。进入4月下旬，阿图岛上的2600余名守军战斗力已经大为衰退，美军乘机绕过防守更为严密的基斯卡岛，于5月11日白天将陆军第7师主力运往阿图岛登陆。

尽管美军因为误判敌情和天气不佳，推进比预想的要慢，但4月18日才乘坐潜艇上岛的日军指挥官山崎保代大佐（科曼多尔海战结束时，山崎搭乘的运输船也随细萱返回了幌筵岛）已经不抱守住阵地的奢望了。他很清楚，美军海量的火力掩护、大规模空中支援和源源不断的人员、弹药补给都是他无法企及的，唯一的出路是尽量延长抵抗的时间，增加对手伤亡。

战斗开始之后，山崎主动放弃了难以据守的滩头阵地，将主力后撤到奇恰科夫湾附近狭窄的冷山山脉中，进行寸步不让的顽抗。从南北两个方向上岛的11000名美军与其展开了残酷的肉搏战，至5月29日凌晨，最后一批有战斗力的日军在自杀式冲锋中悉数毙命，美军才完成对全岛的占领。参战的15000余名美国海陆军官兵阵亡549人、负伤1148人，另有2100余人因冻伤和各种疾病丧失战斗力。而山崎保代以下2638名日本守军（其中100余人属海军部队）中仅有28名无法行动或丧失战斗力者被俘，其余全部“玉碎”。

在阿图岛战事正酣时，日军第五舰队一度调集2艘重巡洋舰和2艘驱逐舰，准备护送8个大队援军上岛实施增援。但河濑四郎随后就发现美军支援部队拥有3艘战列舰、1艘护航航母和大批辅助舰艇，自己根本不是对手，只好急电联合舰队司令部求援。刚刚上任的古贺峰一司令长官准备出动在特鲁克无所事事的武藏号、金刚号、榛名号3艘战列舰，配合第8战队和第2航空战队，在阿留申群岛发动自中途岛海战以来最大规模的进攻战。5月12日，古贺将第24航空战队、7艘潜艇和若干驱

1943年美军发动收复阿图岛的战役后，一架“卡塔琳娜”水上飞机在泥泞的代用跑道上滑行降落



逐舰加强给第五舰队，他本人则亲率联合舰队主力于17日驶离特鲁克，准备先返回本土集合可用舰只，随后北上与河濑会合。

但大本营海军部认为，北太平洋战局耗费甚巨而收效微薄，即使继续增加陆海军兵力，也未必能挽救阿图岛败局；倘若古贺贸然将主力舰调往千里之外的阿留申群岛，反而可能给中太平洋美军以可乘之机，颠覆整个战局。5月19日，大本营决定修改北方作战方针，放弃阿留申群岛，将部队撤回到千岛群岛、北海道方面，同时严令古贺率舰队返回特鲁克。现在，河濑又只剩下潜艇和驱逐舰"快车"这套伎俩了。

阿图岛守军既已"玉碎"，基斯卡岛上的日军已成惊弓之鸟。5月21日，大本营正式下达自基斯卡岛撤退的命令，行动代号"开号作战"。自5月27日到6月23日，河濑组织15艘潜艇对该岛实施分批撤军，先后撤出各类伤病员和军属872人，并为残军补充231吨物资，但潜艇也损失3艘。

当时日军吨位较大的甲型潜艇每艘仅能搭载100名士兵，乙型80人，海大型60人，巡潜型40人，入港和出港时间受到天气条件的限制；由于美军巡逻舰以雷达锁定目标，日军潜艇虽能借助浓雾掩护靠近基斯卡岛，却时常遭到5英寸炮和深弹的"款待"。按照5—6月撤军的速度，岛上剩余的5000余名残军要花费半年以上时间才能撤走，这显然与大本营的"割肉"战略背道而驰。有鉴于此，河濑四郎只得改变既定路线，利用白令海水域进入雾季（每年7月）的机会，派水面舰艇冒险实施撤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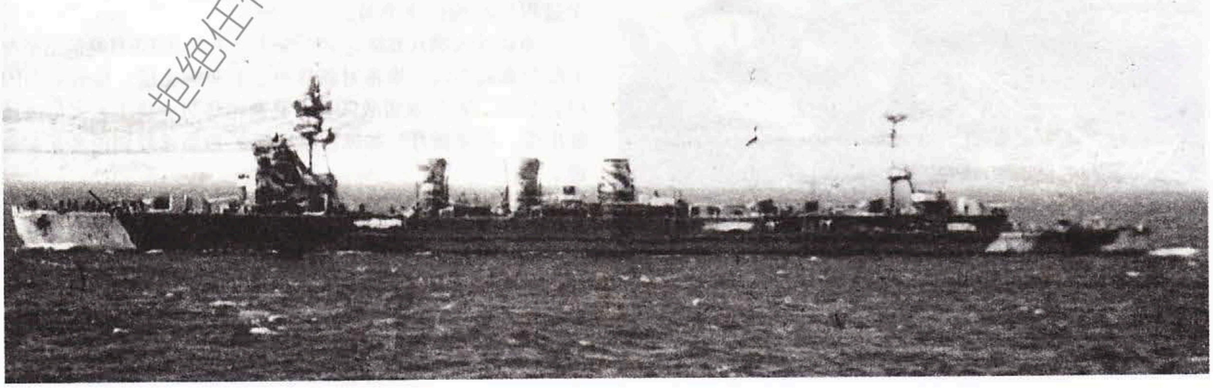
7月7日，实施"开号作战"第二阶段行动的日军2艘重巡洋舰、3艘轻巡洋舰、13艘驱逐舰、1艘给油舰和1艘海防舰在特设水机母舰君川丸和11艘潜艇的掩护下驶离幌筵岛。其中，由河濑四郎本人指挥的2艘重巡、轻巡多摩号以及2艘驱逐舰将承担支援任务，刚刚接替脑溢血病危的森友一出任第1水雷战队司令官的木村昌福少将则指挥阿武隈号、木曾号和11艘驱逐舰驶近基斯卡岛，让守军尽快登舰离开。


在阿图岛，美军情报军官试图对躲在一个掩体里的日本军人劝降，但遭到射击，于是画面右侧的士兵向掩体内丢入两颗手榴弹。图为手榴弹爆炸后从掩体中冒出硝烟的情景

为便于快速卸载部队，阿武隈号和木曾号每舰搭载了3艘"大发"登陆艇，驱逐舰每艘搭载1艘"大发"。日舰计划在11日傍晚驶入基斯卡湾，但由于该岛周边反常地天气晴朗，美国舰队正对其进行炮击，河濑为避免再度发生科曼多尔海战一般的遭遇战，下令在阿姆奇特卡岛西南500海里以外停航待机。这一等就是4天，到了15日，河濑和木村认为战机已经丧失，遂率队返回幌筵岛，让基斯卡岛上的残军空欢喜一场。联合舰队司令部也对这一"胆怯"行为大加申斥，责令其尽快再度出动。

7月22日，第五舰队气象班报称25日前后基地卡岛附近将有大雾，河濑和木村立即决定出动。当天夜间，第二次撤退部队在恶劣的气候下驶出幌筵岛泊地，由于此时第五舰队已经出现燃料短缺，撤兵部队缩减为阿武隈、木曾2艘轻巡和6艘驱逐舰，指挥官仍为木村昌福；河濑本人率轻巡多摩号（旗舰）和6艘驱逐舰、1艘给油舰、1艘海防舰担任支援。出发之前，阿武隈号还

1942年10月正在幌筵岛武藏湾进行运输和训练作业的木曾号，背景是北太平洋海区的白雪。照片自第21战队旗舰多摩号上拍摄，由于在1939年的改装中拆除了滑行台和前部机库，木曾号的舰桥尺寸明显缩小，前桅中段增加了防空机炮



搭载了一门陆军的高射炮。

由于整个阿留申群岛西部已被大雾笼罩，日舰一路上只能维持14.5节低速，还多次出现掉队和擦碰的状况。26日傍晚，殿后的国后号海防舰闯入运输队的序列，造成了一串连环碰撞，木村的旗舰阿武隈号和长波号驱逐舰被撞成轻伤，警戒部队的驱逐舰若叶号和初霜号一个被迫返航、一个转入殿后部队，所幸运兵驱逐舰无一受损严重。27日入夜后，大雾果然伴随着降雨笼罩了基斯卡岛，木村遂决定在29日下午实施突入和撤退行动。当天凌晨，河濑的支援队调头返回幌筵岛，只剩木村舰队继续朝基斯卡岛前进。

7月29日午后，木村舰队以阿武隈号为先导，缓缓驶入基斯卡湾。由于大雾干扰外加精神紧张，一艘驱逐舰的了望哨居然将港湾入口处的小岛当成了美国驱逐舰，还向其发射了4枚鱼雷。所幸本日附近并无美舰活动，巨大的爆炸声只引起了翘首以盼的日本守军的注意。当日舰入港下锚后，"大发"立即下水，将等候在海滩上的部队分批运送上舰。由于事先准备充分，在短短55分钟内，2410名陆军、2773名海军官兵和30具骨灰盒全部被运送上舰，其中木曾号和阿武隈号每舰搭载约1200人，6艘驱逐舰每艘搭载400余人，合计5183人。

日舰随后分成两队返航，尽管阿武隈号在途中曾发现一艘美军潜艇，但对方误以为日舰是执行岸轰任务的北太平洋部队，错过了收拾这群臃肿的"罐头"的良机。7月31日下午和8月1日清晨，两批日舰先后驶入幌筵岛泊地，结束了有惊无险的"开号作战"。

8月15日，在连续进行了半个月一本正经的炮击和空袭之后，34300名美国和加拿大混合部队终于登上空无一人的基斯卡岛。由于大雾遮盖和草木皆兵，这些部队在随后一个星期里相互误击打死25人、伤31人，找到的只有日军遗弃的"甲标的"残骸和几门来不及带走的高射炮。8月22日，金凯德宣布阿留申群岛战役结束。美日双方在这个缺乏实际价值的次要战区纠缠了整整14个月，双方先后付出了损失20余艘舰船、数千名官兵和大量物资的代价，却没有真正的受益者。联合舰队在"开号作战"末期赢得一场可称精彩的战术撤退，但当西南太平洋前线急需驱逐舰和巡洋舰时，这些舰艇却在北太平洋的大雾和冰雪里无谓地穿来穿去。对双方来说，这都是一场令人沮丧的鸡肋之战。





八、战略僵局的结束

萨哟那啦，所罗门

1943年4月18日，山本五十六这位联合舰队在任时间最长的司令长官在乘坐飞机视察前线时，于布干维尔岛上空被美机击毙。在他战死之前，所罗门方面的日本海航兵力已经因长期消耗战严重减员；继任司令长官古贺峰一大将一度打算恢复攻势，但在6月上旬的几次大空战失利后也不得不偃旗息鼓，把飞机统统撤到拉包尔。借此良机，哈尔西决定在所罗门战线恢复攻势，登陆新乔治亚岛、攻占对日机空袭瓜岛至关重要的中转站——蒙达机场（Munda）。

6月30日凌晨，第31特混舰队的第一批登陆舰靠上了蒙达角南方的伦多瓦岛（Rendova），当天就把一个团送上这个"楔子"。由于古贺的基地航空队远在拉包尔，日机直到当天下午才对伦多瓦岛进行了两次空袭，只炸沉1艘运输舰。7月2日，回过神来的日本人集中了24架性能较差的陆航九九式轻爆和24架一式单战"隼"、24架零战，对伦多瓦岛滩头进行了集中攻击，美军有59人被炸死、77人受伤。大喜过望的新任第八舰队司令长官鲛岛具重中将（明治维新元勋岩仓具视的孙子）决定乘胜追击，在当晚派夕张号率领第3水雷战队（缺少旗舰川内号，该舰当时临时回国进行检修和改装）前去炮击伦多瓦岛。

夕张号是在当年4月才重新返回拉包尔前线的。第一次所罗门海战后的大半年里，该舰一直在特鲁克和南洋岛屿之间执行运输和护航任务，其间加装了逆探。受热带潮湿气候影响，该舰的锅炉多次发生故障，中央推进轴一度无法使用，航速只能达到26节。为根除此问题，夕张号在1942年12月返回横须贺进行检修，除排除动力系统的故障外，还将舰桥两侧的双联13.2毫米机枪更换为双联25毫米机炮，整个过程耗时约三个半月。

重新编入第八舰队之后，夕张号于6月30日晚前出至布干维尔岛的布因，准备对新乔治亚岛实施支援。接到鲛岛的出击令后，第3水雷战队司令官秋山辉男少将于入夜后乘该舰出港，率领新月、谷风、凉风等9艘驱逐舰朝伦多瓦岛前进。

左上图：美军在阿图岛掩体中发现的日军尸体

左图：美军占领基斯卡岛后发现的3艘袖珍潜艇"甲标的"，摄于1943年8月23日。这些袖珍潜艇是在1942年7月由水机母舰千代田号运送上岛的，共有6艘，由绞车通过特殊的轨道进行释放和回收。因为严寒和空袭，"甲标的"在很短时间内就损失了3艘，没有取得任何战果，剩余的3艘在日军撤退前做了爆破处理

7 月2 日午夜前后，10 艘日舰驶入蒙达角和伦多瓦岛北岸之间的布兰奇水道（Blanche Channel)，背靠日军控制的蒙达滩头，开炮猛轰伦多瓦岛。不过日舰没有航空掩护，为免招来瓜岛上的美国飞机，秋山下令不准开探照灯，这使得炮击的效果大打折扣。夕张号的140 毫米炮弹和驱逐舰的127 毫米、100 毫米炮弹大多打在了岛中部1000 多米高的山上和丛林里，而美军刚刚运送上岛的155 毫米榴弹炮因为安装在周边的珊瑚礁上，几乎毫发无损。

在伦多瓦岛南岸，由凯利少校指挥的3 艘美军鱼雷快艇正在进行例行巡逻。一天之前，他们曾在布兰奇水道发现6 月30 日被日机炸沉的运输舰“麦考利”的残骸，对其发射了一通鱼雷，并上报“击沉一艘日本运输船”。在挨了上级一通嘲讽之后，凯利再也不敢妄下结论了。当他的快艇发现从北岸传来的火光时，少校下令编队从岛西侧进入水道，查看情况。与此同时，夕张号领头的日本舰队刚好也在转向绕过岛的西面。

在宽度仅有5 海里的布兰奇水道上，3 艘PT 艇横向插入日舰队列，引起了一片混乱。秋山下令夕张号以两舷的25 毫米机炮对海面进行扫射，并分出4 艘驱逐舰去包围美军快艇。但凯利下令施放烟幕、并以Z 字折线航行，很快脱出了日舰的包围。在转向过程中，PT 艇发射了6 枚鱼雷，虽然因为角度不良无一命中，但还是把秋山吓了一跳。考虑到炮击已基本结束，在狭窄的水道内停留太久只会增加危险，加上担心瓜岛机场的美机会飞来空袭，秋山仓促下令舰队朝布因返航。

这一返航便倒了大霉。7 月5 日，当夕张号自布因出港时，在泊地以南30 海里处意外地撞上了一枚750 公斤Mk-12 型磁性水雷，这枚水雷是5 月份由瓜岛飞来的美军TBF 攻击机布下的。夕张号左舷前部被炸伤，粮食舱和淡水舱当时就被淹没，整个舰首几乎都沉入水下，所幸该舰动力并未受到影响，依然得以低速驶向拉包尔。次日，该舰在拉包尔泊地由特设修理舰山彦丸实施了抽水和抢修，受损部位以防材堵塞，外部焊上钢板，随后以自身动力向本土返航。

7 月30 日，夕张号返回横须贺，随即入坞进行彻底的修复和改装，其间加装了93 式水中探信机和水中听音机，还拆除航海舰桥顶部的90cm 探照灯、换装22 号电探，直到当年11 月初才重新返回拉包尔。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夕张号的“早退”恰恰使其逃过了战沉的厄运：7 月4 日傍晚，鲛岛具重继续玩弄瓜岛之战时的把戏，以新月、长月、夕止、皋月4 艘驱逐舰组成“东京快车”，从布因向新乔治亚岛西北方的科隆班加拉岛(Kolombangara）运送援军。



库拉湾海战后，被“尼古拉斯”号驱逐舰救起的“海伦娜”号舰员。该舰的907 名官兵中有168 人随舰沉没，大部分幸存者在7 月6 日白天被友舰救起，但有165 人漂流到日军控制下的韦拉拉韦拉岛，在当地土著的帮助下躲藏到丛林中，以无线电向瓜岛呼救。7 月16 日凌晨，2 艘美军高速运输舰由8 艘驱逐舰护航，趁夜靠上韦拉拉韦拉岛滩头，将这批官兵全部救出



在库拉湾海战中中雷受损的美国海军“斯特朗”号驱逐舰（DD-467）

当天深夜，当“快车”进入两岛之间的库拉湾（Kula Gulf）时，意外地撞上了同样是驶往新乔治亚岛、为当天登陆的美军提供火力掩护TF18 特混舰队（3 艘轻巡洋舰、9 艘驱逐舰）。新月号趁美舰忙于炮击岸上目标，抢先发射鱼雷重创了“斯特朗”号驱逐舰（USS Strong，DD-467，后被新乔治亚岛上的日军岸炮轰沉），但领队的金冈国三大佐忌惮美军的火力，当即下令放弃运输任务、撤回布因。

斗志旺盛的鲛岛不依不挠，7 月5 日傍晚，他再度派秋山辉男指挥由10 艘驱逐舰组成的“东京快车”离开布因，驶往科隆班加拉岛南端的维拉港（Vila)；6 日凌晨，当“快车”再度潜入库拉湾时，前一天拦截过金冈的那支美国舰队再度出现，在雷达引导下，“海伦娜”号、“檀香山”号和“圣路易斯”号3 艘轻巡洋舰以45 门152 毫米主炮猛轰秋山的旗舰新月号，这艘完工仅3 个月的新型驱逐舰在数十分钟内就被击沉，秋山以下司令部人员和全体舰员共290 余人无一生还。假如夕张号没有在前一天“幸运”触雷受损，受到152 毫米炮弹款待的就不是新月号而是该舰了。

不过，“东京快车”娴熟的夜战能力在库拉湾海战中依然得到了印证：就在新月被美舰围殴的同时，凉风和谷风一次性射出了全部16 枚九三式鱼雷，其中3 枚直接命中“海伦娜”号（USS Helena，CL-50)，该舰在一小时内沉没，有168 人战死。当美军继续打扫战场时，载有陆军的7 艘日本驱逐舰也在维拉滩头卸下了1600 名步兵和90 吨物资。尽管长月号在撤退时意外搁浅、随后遭美机炸沉，其余各舰也是伤痕累累，但“快车”依然圆满完成了运输任务，并以损失2 艘驱逐舰为代价取得了击沉1 艘轻巡洋舰的战果。

更要命的是，美军指挥官安斯沃思少将（Walden L. Ainsworth）固执地认为7 月5 日沉没的“斯特朗”号是被日本潜艇击沉的，新月号被轰沉的战果又使他格外迷信由雷达照准的152 毫米舰炮的威力；对氧气鱼雷和刚刚开始上舰的逆探（雷达波告警器）这两种日本人的新玩具，他几乎是一无所知。

库拉湾海战后的一个星期里，5 日凌晨在新乔治亚岛北

端登陆的美军开始朝蒙达角推进，但进展缓慢。安斯沃思的TF18被重新编为TG36.1，由新西兰轻巡洋舰“利安德”号（HMNZS Leander）顶替了沉没的“海伦娜”号，继续在库拉湾内执行封锁警戒任务。而坐镇拉包尔的鲛岛具重和草鹿任一因为接连收到新乔治亚岛守军告急的电报，只得再度出动“东京快车”向科隆班加拉岛输送援军。

由于第3水雷战队各舰在库拉湾海战中已严重受损，夕张号又无法迅速修复，草鹿决定由7月10日刚刚抵达拉包尔的第2水雷战队（旗舰神通）来承担本次作战任务。

7月12日晨，伊崎俊二少将（曾任川内、神通舰长）率领神通号和驱逐舰三日月、雪风、滨风、清波、夕暮自拉包尔出航。自从前一年8月在瓜岛被美机炸伤以来，神通号已经有将近11个月没有参与实战了。在吴厂大修期间，该舰拆除了4联装13.2毫米机枪，加装2座双联25毫米机炮、1座双联13.2毫米机枪和逆探，不过依旧没有电探。因为该舰的兵器消耗记录中还出现了“九三式氧气鱼雷”的字样，据推测该舰此时已经拆除了旧式双联装鱼雷发射管，改为和阿武隈、那珂、川内号一致的2座四联装610毫米九二式鱼雷发射管（根据舰政本部战后发现的“防空兵装略图”，神通号的改造方案还包括拆除5号主炮、加装2座三联装25毫米机炮等内容，但吴镇战时日志中并没有记载该项，可能未及实施）。当天晚些时候，这支警戒队抵达布因，与运载着1200名士兵和20吨弹药的皋月、水无月、松风、夕止4艘驱逐舰会合。日落之后，舰队朝科隆班加拉岛进发，于子夜时分接近库拉湾北口。

安斯沃思的TG36.1在当天下午5时离开图拉吉岛泊地，朝新乔治亚海峡进发。13日0时36分，一架PBY夜间侦察机向他的旗舰“檀香山”号报告了日舰的位置和航速（30节），少将下令加速到28节迎敌。1时06分，美舰开始转向抢占有利阵位，安斯沃思命令前卫和殿后的驱逐舰首先发射鱼雷，然后以雷达指示巡洋舰主炮跨射对方。在安斯沃思看来，日本人没有雷达，自然无法知晓他的存在，美舰可望造成奇袭之势。他当然不会了解，神通号的逆探远在两小时前就检测到了美军雷达的脉冲，伊崎不仅早早洞悉了美舰的存在，甚至还在海图上绘算出了TG36.1的大致航迹。安斯沃思舰队有3艘轻巡洋舰和10艘驱逐舰，伊崎的警戒队只有神通号1艘大舰和5艘驱逐舰，但伊崎为掩护运兵舰完成输送任务，决定主动暴露自己、吸引对方火力，同时利用氧气鱼雷的航程优势进行远距袭击。

0108时，由北向南前进的日舰与美舰的距离已缩短至9000米，位于2号位的神通号的了望哨已经发现了美军先头的“尼古拉斯”号驱逐舰（USS Nicholas，DD-449），伊崎下令神通号打开探照灯，发射鱼雷并齐射140毫米主炮。1时09分，美日双方几乎同时开始射击。神通号的前主炮第一次齐射就命中了位于美军舰列中部的“利安德”号，将该舰的无线电天线打坏。5分钟后，6艘日舰齐射完了第一批氧气鱼雷，美舰的速度则慢了半拍，在0109-0113时和0112-0118时才分两批发射了鱼雷。

此时“檀香山”号已经以雷达锁定探照灯大开、目标最显眼的神通号，“檀



在科隆班加拉海战中被“回马枪”重创的美国巡洋舰部队指挥官瓦尔登·安斯沃思少将（1886-1960），绰号“拳师”。1910年毕业于安纳波利斯官校，1914年参与对维拉克鲁兹港的进攻，“海军假日”期间主要在驱逐舰分队和造船厂任职。二战爆发时他在图兰大学任教，瓜岛战役开始后出任太平洋舰队驱逐舰总指挥，随即受哈尔西之命接掌巡洋舰特混舰队TF67（后改为TF18），虽然因轻敌遭遇大败，但仍有效隔断了“东京快车”在所罗门海的活动。因为在西南太平洋战线和收复关岛之战中的功绩，安斯沃思先后获颁海军十字勋章及优异服务勋章，1948年在第5军管区中将司令任内退休。美国海军有一艘“诺克斯”级反潜护卫舰FF-1090以安斯沃思命名

香山”号、“圣路易斯”号、“利安德”号三舰开始以152毫米主炮集中射击该舰，空中的PBY侦察机还不时提供校射数据。当“檀香山”号打出第6次齐射时，安斯沃思注意到神通号的第三根烟囱附近发生了猛烈的爆炸。

据美军战后统计，3艘盟军巡洋舰当晚一共朝神通号倾泻了2630发152毫米炮弹。该舰的操舵装置在1时17分被打坏，锅炉舱中弹10发以上，失去了行动能力。几分钟后，一枚美军前卫驱逐舰发射的鱼雷击中舰尾附近，神通号变成了一座死城。1时45分，第二枚鱼雷命中2号烟囱下方，神通号脆弱的舰体被整个炸成两截，在几十秒之内从海面上消失了。伊崎少将、佐藤寅次郎舰长以下482名官兵中有480人步了秋山辉男和新月号的后尘，随舰沉入海底，仅有2人被美军驱逐舰捞起。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俨然就是库拉湾海战的重演：1时22分，当美舰正在朝南方转向时，神通号在战斗一开始发射的一枚九三式鱼雷击中了“利安德”号的中部，该舰被炸死28人、进水严重，丧失了战斗力。其余美舰因为正在

在科隆班加拉海战中被日军氧气鱼雷击伤的新西兰轻巡洋舰“利安德”号。该舰原系为英国海军建造，1937年租借给新西兰，在1942年荷印战役中沉没的澳大利亚巡洋舰“珀斯”号是其姊妹舰，同型舰还有新西兰的“阿喀琉斯”号，澳大利亚的“悉尼”号、“霍巴特”号以及英国的“海王星”号、“阿贾克斯”号、“猎户座”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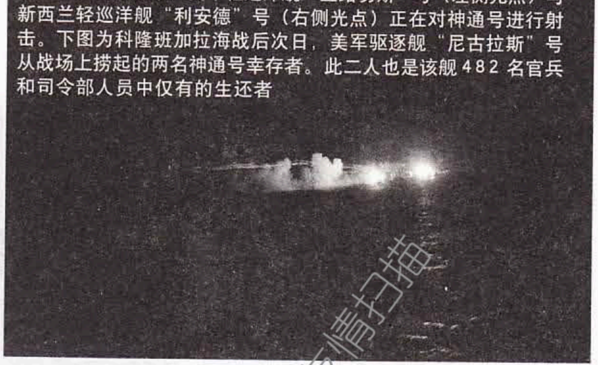
急剧变向，幸运地未被命中。此时战场上一片混乱，“檀香山”号的无线电发生了间歇性故障，安斯沃思误以为除神通号被击沉外，其余几艘日舰也已遭重创，他放心地下令3艘前卫驱逐舰去收拾已经奄奄一息的神通号，自己则带着完好的“檀香山”号、“圣路易斯”号和5艘后卫驱逐舰绕着“利安德”号做了一个大转弯，朝西北方继续前进。

真实情况远不像美国人所想的那么乐观。当伊崎在新乔治亚海峡对TG36.1开火之时，4艘载着陆军的日本驱逐舰意识到库拉湾北口已不安全。它们狡猾地绕过科隆班加拉岛北岸，在西海岸上卸下了人员和物资。而伊崎所率的警戒队剩下的5艘驱逐舰，因为神通号吸引了美国人全部的注意力，在最初的交火中几乎毫发无损。在著名“祥瑞”雪风号的率领下，这5艘驱逐舰绕过瘫痪的神通号，朝新乔治亚海峡西端做U形转弯，同时利用暴雨掩护迅速进行鱼雷装填。对比库拉湾海战中日军花费1小时才完成鱼雷再装填的速度，这次作业只用了短短18分钟。1时36分，5艘日舰已经重新做好战斗准备，而安斯沃思却还在战场南边进行机动。1时42分，美舰终于完成转向，以30节速度恢复前进；1时56分，雷达在21000米外重新捕捉到目标。

这个时候，安斯沃思犯了第三次所罗门海战中的指挥官卡拉汉曾经犯过的错误：他误以为伊崎的5艘驱逐舰和神通号一起在南方海上燃烧，对这批新目标的身份一时无法确认。美军参谋中有人认为这些目标属于日本人的第二个分队，来意是发动进攻，也有人认为这是伊崎的残部在脱离战场。加上之前“檀香山”号曾经命令前卫驱逐舰朝西北方继续搜索，为避免误击友舰，安斯沃思下令以无线电一一呼叫每艘驱逐舰，以确认其位置，这一来一去浪费了整整7分钟。在这7分钟里，5艘日舰已迅速转换航向、占领有利阵位；2时05分，当“檀香山”号和“圣路易斯”号打出照明弹、确认敌方目标的一刹那，31枚九三式鱼雷朝着美舰所在的位置直奔过去。

当照明弹确认敌舰身份之后，美舰开始原地转向，准备以主炮射击目标，这个致命的机动刚好被鱼雷打了死靶。2时08分，尚未打开炮门的“圣路易斯”号被一枚鱼雷命中舰首；位置更靠北的“檀香山”号虽然奋力避开4－5枚鱼雷，但仍在2时11分被一枚鱼雷将舰首炸掉，另一枚命中舰尾正中的鱼雷没有爆炸，否则该舰断无生还之理。

位于“檀香山”号之前的驱逐舰“格温”号（USS Gwin, DD－433）在2时14分被1枚鱼雷击中轮机舱，立即发生大火，于当天上午由舰员自行凿沉。加上之前已经中雷撤退的“利安德”号，盟军共有89名官兵在此役战殁。而5艘日舰在发射完鱼雷后即高速撤出战场，返回了布因。科隆班加拉岛西岸的4艘运兵舰则在3时40分卸载完毕，在第11驱逐队司令杉野修一大佐（一个月后改任球磨号舰长）的指挥下，它们像来时一样静悄悄地溜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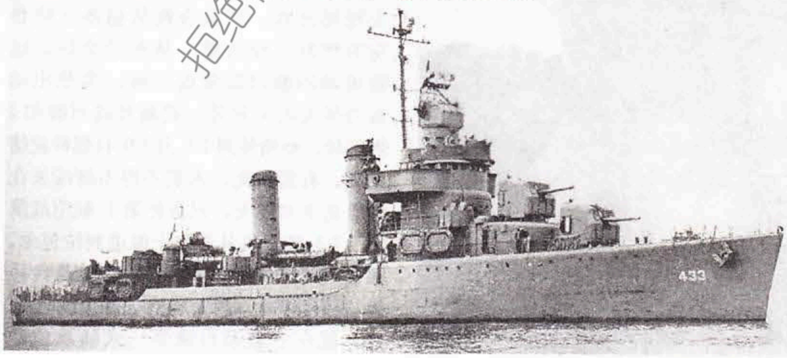
科隆班加拉海战中，美军轻巡洋舰“圣路易斯”号（左侧光点）与新西兰轻巡洋舰“利安德”号（右侧光点）正在对神通号进行射击。下图为科隆班加拉海战后次日，美军驱逐舰“尼古拉斯”号从战场上捞起的两名神通号幸存者。此二人也是该舰482名官兵和司令部人员中仅有的生还者



舰首受损的“檀香山”号和“圣路易斯”号以12－15节的速度只能朝图拉吉回航，在拉塞尔群岛起飞的战斗机的掩护下，它们于当天下午入港，随后返回本土修理，直到年底才恢复使用。而重伤的“利安德”号随后就被返还给新西兰海军，直到二战结束再未在海上出现。加上沉没的“格温”号，美军在这场科隆班加拉海战中共损失1艘驱逐舰、重伤3艘轻巡洋舰，而日军虽然蒙受较大的人员伤亡，却只战沉1艘轻巡洋舰，并再度完成了增兵任务。

对日军来说，库拉湾海战和科隆班加拉海战无疑是辉煌的战术胜利，日本舰队不仅完成了输送援军的任务，还以较小代价使美军蒙受了相当损失。但荒诞之处在于，积小胜未能成大胜，反而埋下大败的伏笔——部分受“不失寸土”僵化战略的影响，部分也是为了渲染“转进”的合理性，日军往往在美军的直接进攻点上投入大量兵力，造成固守态势；而在败局已定后，上级

科隆班加拉海战中遭九三式鱼雷重创、被迫自沉的“格温”号（DD－433）。属“格里夫斯”级，完工于1941年，标准排水量1630吨，航速37.4节，安装5门5英寸主炮、6门20mm机炮和10具21英寸鱼雷发射管。库拉湾海战后，该舰曾参与对沉没的“海伦娜”号幸存者的营救



又不愿过早下放弃的决心，一定要想方设法撤退被困部队。为了挽救蒙达和维拉，“东京快车”和岸基航空队频频出动，消耗了大量人员、舰艇与飞机(从1942年6月到1943年8月，日军在14个月里战沉的驱逐舰总数高达40艘)；嗣后为了从新乔治亚岛撤退，又付出了更多损失。从瓜岛、基斯卡岛到新乔治亚岛，日军一直是遵循这样的逻辑在行动，终于“积小胜而成大败”，自食苦果。

科隆班加拉海战之后，美军改以巨大的PB4Y-1“解放者”(B-24重型轰炸机的海军型)和自瓜岛起飞的TBF攻击机对“东京快车”进行夜袭。从7月20日到22日，开往科隆班加拉岛的“快车”相继损失了水机母舰日进号和2艘驱逐舰，重巡洋舰熊野号也被炸伤，却没能把一名士兵运上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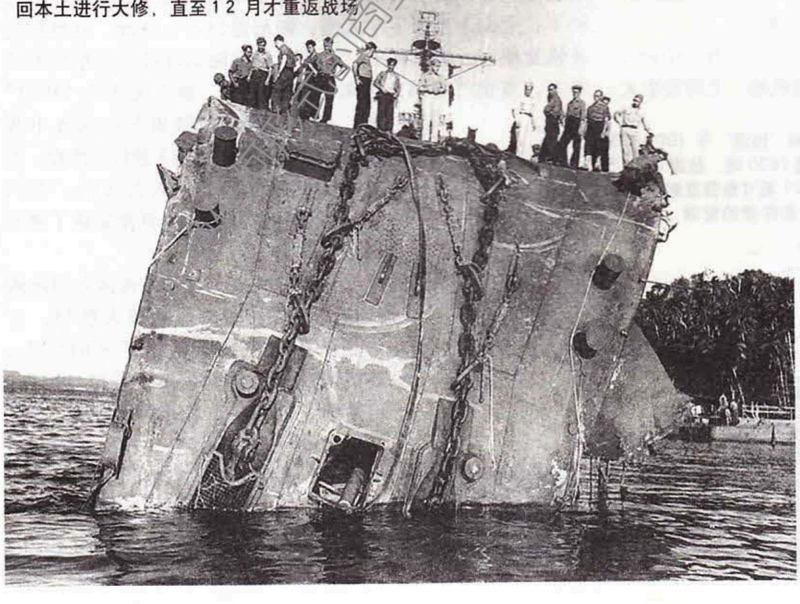


科隆班加拉海战中被九三式鱼雷炸伤舰首的“圣路易斯”号。该舰与“檀香山”号、“海伦娜”号同属“布鲁克林”级，标准排水量9767吨，安装15门6英寸主炮和8门5英寸高炮，搭载2-4架水侦，航速32.5节，水线附近有5.75英寸装甲带。“圣路易斯”号在修复后继续使用至1951年，随后作为军援转交巴西，更名为“海军上将塔门迭”号

古贺峰一鉴于损失太大，不得不暂停用驱逐舰运兵，改从肖特兰岛派出“大发”登陆艇朝库拉湾偷运援军，美军则以PT快艇加以拦截。8月6日深夜，吸取科隆班加拉海战教训的美军驱逐舰在韦拉湾一举击沉3艘日本驱逐舰，超过1200名日本海陆军官兵溺毙，美舰则无一损失。与此同时，陆上的美军也在8月5日攻入蒙达机场。夜幕笼罩下的库拉湾再也不是“东京快车”的天堂了。

新乔治亚岛战役结束后，美军开始大规模地实施“蛙跳作战”(Leapfrogging)，借助优势海空兵力迂回日军防御的纵深，弃敌军重兵把守的岛屿不取，专攻其薄弱点，以加快推进的速度，并借助空袭和封锁使日军不战而逃。8月15日，美军在仅有少数敌军防御的韦拉拉韦拉岛登陆，从侧翼威胁驻有重兵的科隆班加拉岛，连日对其进行空袭和炮击。由于日军已没有多余兵力可用于增援中所罗门，从9月28日到10月3日，第八舰队被迫将科隆班加拉岛上的10000多名驻军全部撤退到布因。10月7日凌晨，韦拉拉韦拉岛上的日军残部也被“东京快车”接走。在过去三个月里，美军以战沉1艘轻巡洋舰和5艘驱逐舰为代价，使联合舰队失去了1艘轻巡洋舰、1艘水机母舰、10艘驱逐舰以及5艘潜艇，并连续后撤250海里。现在，日军在所罗门群岛只剩下布干维尔岛这个仅存的航空基地了。

科隆班加拉海战后“檀香山”号被炸断的舰首，该舰随后返回本土进行大修，直至12月才重返战场



布干维尔岛海空战

对美军南太平洋部队来说，攻占布干维尔岛的价值是双重的：该岛处在前往拉包尔的必经之路上，早一日占领该岛，就能早一日结束所罗门战役，集中兵力向新不列颠岛进军；到1943年10月为止，只有从巴布亚岛起飞的陆军重型轰炸机才能空袭拉包尔，而布干维尔岛周边分布有5个机场，若能得到这个中转站，从瓜岛起飞的海军飞机也能威胁到拉包尔，瘫痪这个东南战线上最重要的日军航空基地。为了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战果，南太平洋部队司令哈尔西上将决定绕过肖特兰岛和日军重兵据守的布干维尔岛东北岸，在西南岸防御薄弱的托罗基纳角(Cape Torokina)登陆。

古贺峰一对此并非无动于衷。10月中旬，大本营海军部根据截获的电报判断，美军即将在中太平洋方向发动大规模进攻。但联合舰队储备在特鲁克的燃料已经告罄，从东印度群岛运输重油的船只数量也不够，要想出动威力强大的大和号、武藏号战列舰和2艘航母，必须等到11月10日燃料就绪之后。有鉴于此，古贺不得不继续呆在特鲁克坐井观天，只是把第1航空战队的173架飞机从母舰上派遣到拉包尔，准备对布干维尔方向的美军发动代号为“吕号作战”的大规模空袭。11月1日，就在古贺亲自乘坐一式陆攻前往

拉包尔、准备开始“吕号作战”的当天凌晨，14000 名美军登上了托罗基纳角滩头。

对日本海军来说，美国人上岸的时间着实不凑巧：10 月 31 日上午，侦察机一度发现美舰在肖特兰岛以南航行，草鹿任一派第 5 战队司令官大森仙太郎少将率领在拉包尔的所有可用舰艇——第 5 战队（重巡妙高、羽黑）、第 3 水雷战队（旗舰川内）和第 10 战队（旗舰阿贺野）前去拦截。但当大森舰队在 31 日深夜驶入新乔治亚海峡时，美舰已经转移到布干维尔以西了。

直到 11 月 1 日中午舰队驶返拉包尔，大森才得到关于美军登陆位置的准确情报。草鹿中将匆匆宣布：大森舰队应于当晚再度驶往布干维尔岛，以重炮和鱼雷摧毁美军登陆场，同时掩护天雾、文月、卯月、夕止、水无月 5 艘驱逐舰搭载的 930 名步兵在滩头以北实施反登陆行动。大森的全部兵力包括 2 艘重巡洋舰、2 艘轻巡洋舰和 6 艘驱逐舰，按原编制分为三队：第 5 战队为第一袭击部队（本队），第 3 水雷战队为第二袭击部队（左翼），第 10 战队为第三袭击部队（右翼）。11 月 1 日下午 5 时，舰队自拉包尔出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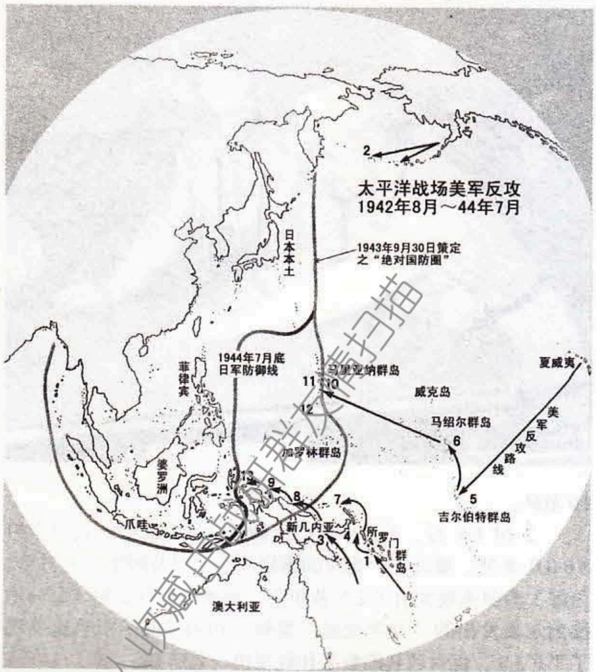
第 3 水雷战队旗舰川内号是在 7 月 9 日驶返所罗门前线的。该舰在佐世保进行了检修和改装，前桅顶部加装 1 部 21 号电探，舰体中央的 5 号主炮拆除，原炮位两侧加装 2 座三联装 25 毫米机炮，全部防空火力增加为 10 门 25 毫米机炮和 4 挺 13.2 毫米机枪。

由于战队司令官秋山辉南在库拉湾海战中阵亡，伊集院松治少将（大正时代的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集院五郎之子，在海军兵学校 43 期的入学考试和毕业成绩都排倒数几名，但因为“我爸是大将”，依然屡获晋升）被晋升为第 3 战队司令官。伊集院在 8 月到 10 月的几次小规模遭遇战中曾与美军交手，战绩不算难看，这使得他更加信心满满。

不过，实际情况并不像大森和伊集院所想的那么顺利。攻击部队预定于 18 时 30 分在拉包尔以南与运兵舰回合，但后者在装运器材时耽搁了太多时间，当两队集合时已是 20 时 30 分了。大森随后又发现，运兵舰中的夕止号由于锅炉管道损坏，最大航速只能达到 26 节，倘若舰队以这样的低速南行，无法在次日凌晨驶进登陆场。更狼狈的是，先导舰随后就发现了美国潜艇，一架从附近掠过的 PBY 巡逻机还向川内号投下了炸弹，规避攻击又花去不少时间。大森认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同时实施突袭和反登陆两项举措，他发电报要求草鹿召回运兵舰，只留下三支袭击部队前去扫荡登陆场附近的美军运输船。午夜时分，运输队掉头折返，袭击部队则以 30－32 节高速朝布干维尔岛驶去。

大森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在潜艇和巡逻机相继发现日舰后，哈尔西已经命令梅里尔少将（Aaron S. Merrill）指挥在韦拉拉韦拉岛海面进行补给的 TF39 前去截击，该部于 23 时 30 分在托罗基纳以西的奥古斯塔皇后湾（Empress Augusta Bay）完成集结。

TF39 拥有 4 艘轻巡洋舰和 2 个中队共 8 艘驱逐舰，与大森舰队相比，刚好是科隆班加拉海战的反向翻版：在那次战斗中，安斯沃思是攻方、伊崎俊二是守方，美舰实力占优又有雷达指引，却被日本人的“回马枪”杀了个措手不及；这一次，大森舰队气势汹汹杀来，在火力上处于绝对优势，又有新型雷达和擅长夜战的历史壮胆，俨然要重演第一次所罗门海战的旧事。梅里尔可资依靠的只有 4 艘巡洋舰上的 48 门 6 英寸主炮，以及担任前卫的第 45 驱逐舰中队指挥官、经验丰富的阿利·伯克上校（Arleigh A. Burke）。



太平洋战场美军反攻态势图：(1) 1942 年 8 月 7 日，美军登陆瓜岛。1943 年 2 月 7 日，日军自该岛撤退。(2) 1943 年 5 月 29 日，阿图岛日军守备队“玉碎”。(3) 1943 年 9 月 4 日，美军登陆莱城。(4) 1943 年 11 月 1 日，美军登陆布干维尔岛。(5) 1943 年 11 月 25 日，马金岛、塔拉瓦岛日军守备队“玉碎”。(6) 1944 年 2 月 2 日，美军登陆夸贾林岛。(7) 1944 年 2 月 29 日，美军登陆阿德勒默尔蒂群岛。(8) 1944 年 4 月 22 日，美军同时在艾塔佩和霍兰迪亚登陆。(9) 1944 年 5 月 27 日，美军登陆比亚克岛。(10) 1944 年 6 月 15 日，美军登陆塞班岛。(11) 1944 年 6 月 19–20 日，马里亚纳海战。(12) 1944 年 7 月 21 日，美军登陆关岛。(13) 1944 年 7 月 31 日，美军登陆桑萨波角

11 月 2 日凌晨 1 时 30 分（东京时间 11 月 1 日 2330 时），一架 PBY 巡逻机发现了东北方以三路纵队来袭的大森舰队，并对羽黑号进行了攻击。10 分钟后，羽黑号弹射的零式水侦也发现了 TF39。不过到 2 时前后，妙高号的侦察机在托罗基纳角以北侦察到另一群美舰，该机投下了照明弹，报称“多有运输舰正在卸载部队”。其实，那只是 3 艘正在执行布雷防御任务的美国布雷舰，真正的运输船队还在南方 35 海里外隐蔽。不过大森对此深信不疑，他决定吸取三川军一在萨沃岛的教训，以运输船而非警戒部队为第一目标。三队日舰以 30 节航速、间隔 5000 米朝滩头方向驶去。

2 时 27 分，梅里尔的旗舰“蒙彼利埃”号（USS Montpelier, CL－57）在 33000 米外发现了雷达信号，那正是日军左翼部队的先头舰川内号。不久，中央部队和右翼部队也被发现，TF39 立即将航向修正为正北。吸取库拉湾和科隆班加拉海战的教训，梅里尔把伯克的第 45 驱逐舰中队（4 艘）放在巡洋舰之前 3 海里，第 46 驱逐舰中队则在巡洋舰内侧跟进，这种较分散的队形使得美军驱逐舰可以以攻为守、在战斗一开始就发射鱼雷，减少对巡洋舰 6 英寸主炮的依赖。而日舰由于雷达性能不佳以及过分迷信目视搜索，此时对正在接近的对手还浑然不觉。

2 时 31 分，伯克的 4 艘前卫驱逐舰离开编队、开始左转，准备攻击以川内号为首的第 3 水雷战队（伊集院部队）；4 艘巡洋舰则做了一个 U 形转弯，变航向为正南，4 艘后卫驱逐舰在外侧为它们提供掩护，同时准备攻击大森舰队右翼的第



奥古斯塔皇后湾海战中指挥美军巡洋舰部队的阿隆·“蒂普”·梅里尔少将（1890–1961）。他的外曾祖父阿隆·斯坦顿曾参加1811年对印度安原住民的蒂珀卡诺之战，因而获得绰号“蒂普”，这一绰号也被梅里尔继承。1912年毕业于安纳波利斯官校，随后长期担任驱逐舰舰长和驱逐舰分队指挥官。日美开战时他正在图兰大学教授海军科技与战术，1942年才以“印第安纳”号战列舰舰长的身份重回一线。瓜岛和布干维尔战役期间，梅里尔指挥的巡洋舰部队多次挫败日军“东京快车”的增援行动，并首创雷达指控无照射炮击战法，因此获颁海军十字勋章。战后他出任本土海岸防卫司令，1947年以中将军衔退役。美国海军有一艘“斯普鲁恩斯”级导弹驱逐舰DD–976以梅里尔命名

10战队。

2时46分，伯克中队已经驶至日军左翼部队正北方约8000米处，随即朝伊集院的旗舰川内号以及时雨、五月雨、白露3艘驱逐舰发射了25枚鱼雷。而大森直到2时45分才接到水侦发出的“发现敌舰”警报，川内号的了望哨也发现了TF39，但对敌舰的数量和舰型仍一无所知。

大森想当然地认为美舰会采取传统的纵队方式接敌，为抢占有利阵位，他下令全队向南转向，这倒是个歪打正着的妙招——当第3水雷战队向南掉头时，伯克中队之前发射的鱼雷刚好从日舰前方通过，无一命中。从2时50分到52分，变向中的第3水雷战队依旧例朝远处的美军巡洋舰射出了8枚鱼雷；与此同时，发现日舰开始机动的梅里尔下令全队开火，奥古斯塔皇后湾海战爆发了。

美军巡洋舰开始射击之时，调头中的伊集院部队刚好处在梅里尔4艘巡洋舰的正西方，而伯克的驱逐舰在完成机动后则位于日舰北面，伊集院部队刚好处在两面的夹击当中。领头的川内号因为四个烟囱的醒目外形，受到由雷达导引的152毫米炮弹的重点“关照”。2时52分，该舰在17000米距离上被首次齐射命中；3分钟内，锅炉舱和机舱相继被多次击中，舵机失灵，全舰丧失动力。而该舰的反击却因为美舰施放烟幕，无一中的。位于编队尾部的白露号也被6英寸至近弹擦伤，该舰在转向规避时撞上了前方的五月雨号，两舰均受重伤，航速降至20节以下。战斗仅仅开始了5分钟，日军左翼的伊集院部队已经完全丧失了战斗力，伊集院松治本人也被困在熄了火的川内号上，生死未卜。

当梅里尔的巡洋舰集中攻击伊集院部队时，位于中央、由大森本人率领的妙高、羽黑两舰正在徒劳地寻找着对手。由于了望哨始终无法确认目标，从2时50分起，这两艘重巡洋舰在原地做了一个360度转向，直到3时01分才恢复正南航向，而右侧由大杉守一少将指挥的第10战队只是不明就里地继续朝东南方前进，直至3时01分转向正南。在此过程中，美军巡洋舰已经将航向变为200度，开始向日军中央和右翼部队射击，第三次齐射就命中羽黑号。该舰先后被6发152毫米炮弹命中，不过其中4发没有爆炸，损失不大。而大杉部队的3号舰初风号在规避炮弹时意外闯入中央部队的舰列，于3时07分与旗舰妙高号相撞，右侧舰首和2具鱼雷发射管被撞掉。与此同时，美舰则以30节高速频繁变换航向，加上烟幕遮蔽，大森既无法发射鱼雷，又无法集中主炮火力射击。

不过，TF39的表现也不是无懈可击。伯克的第45驱逐舰中队在发射完鱼雷后就陷入了混乱，直到一小时后才重新编队成功。而位于巡洋舰外侧的第46驱逐舰中队行动过于迟缓，不仅没能找到发射鱼雷的时机，反而挡住了巡洋舰的射界。2时53分，该中队开始转向以避让巡洋舰，但位于队尾的驱逐舰“福特”号（USS Foote，DD–511）看错了信号，在原地进行了一番徒劳的机动。当该舰于3时08分重新朝正确的方向追赶时，却被10多分钟前川内号发射的一枚鱼雷炸掉了舰尾，19名舰员在爆炸中身亡。好在友舰都小心翼翼地掠过了丧失动力的“福特”号，没有发生碰撞。

3时13分，已经挨打近半小时之久的大森终于确认了美国巡洋舰的方位，他下令变航向为160度，准备接敌。3时18–20分，妙高和羽黑向位于其正东方的4艘美国巡洋舰发射了鱼雷，并以8英寸主炮打出一串齐射。两艘重巡和川内号在战斗开始前各弹射了1架水侦，这些飞机在美舰上空投下了照明弹，为日舰指示目标。

3时20–25分，梅里尔的先导舰“丹佛”号（USS Denver，CL–58）先后被3弹命中舰首，虽然炮弹没有爆炸，但造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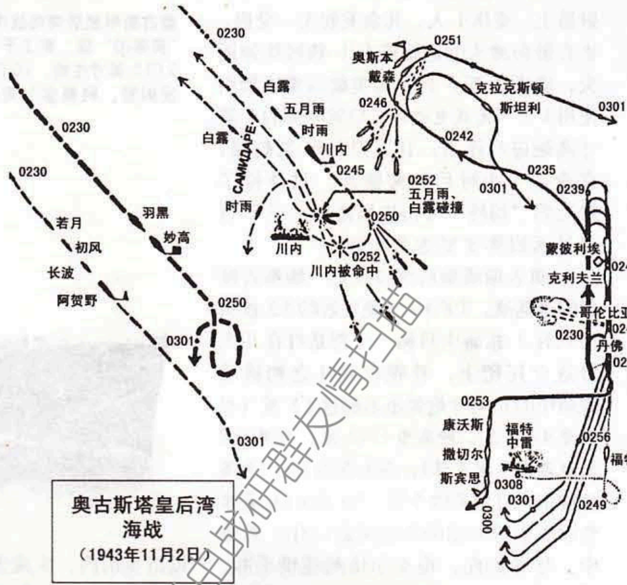
在瓜岛运补作战、塔萨法隆加海战和奥古斯塔皇后湾海战中表现活跃的长月号驱逐舰。属夕云级（甲型），标准排水量2077吨，航速35节，安装6门5英寸主炮、4门机炮和8具带再装填功能的24英寸鱼雷发射管。长波号后来在1943年11月11日美机对拉包尔的空袭中严重受损，直到次年5月才修复，1944年11月11日在菲律宾奥尔莫克湾被美军舰载机炸沉

了进水，被迫减速至24节。后卫驱逐舰“斯宾思”号（USS Spence，DD-512）也在3时20分被1发8英寸炮弹命中水线，海水进入油柜，军舰被迫减速。此时双方的距离已经缩短到12000米，梅里尔虽然并未发现日舰已发射鱼雷，但他回忆起3个多月前安斯沃思被“回马枪”所伤的教训，在3时26分果断地下令全队做逆时针回转，恰好躲过了妙高和羽黑射出的鱼雷。不过第46驱逐舰分队也因为旗舰“斯宾思”号的受伤出现混乱，战斗情报官将正从其前方通过的妙高号和羽黑号误判为友舰，使美国驱逐舰错过了在5500米距离上对这两艘日舰发射鱼雷的机会。

与梅里尔的沉着相比，大森仙太郎此时极为焦躁。尽管有水侦提供校射，但美舰施放的烟幕降低了战场能见度，加上不开探照灯的射击命中率偏低，日军始终无法判定取得了多少战果。由于指挥官对电探性能不信任，这种技术装备在海战的整个过程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日本人一直是靠了望哨确认目标的。3点半左右，妙高号的观察员注意到美军巡洋舰舷侧涌起巨大水柱，他误以为那是鱼雷命中了目标（*实际只是近失弹*），兴奋地报称“巡洋舰3艘中雷”；“斯宾思”号燃烧的火光又使大森误判击中了另外2艘巡洋舰。在他看来，自己取得的战果至少是第一次所罗门海战的两倍。此时妙高号接到伊集院从奄奄一息的川内号上发来的信号，大森见左翼部队已经崩溃，担心如果继续滞留在奥古斯塔皇后湾内，天明后难免遭到空袭。他对自己的“胜利”相当满意，在3时37分下令所有舰艇转向西北方返航。

3时45分，日军中央和右翼部队完成集结，开始撤出战场，不过美舰并不知情，依然在战场上继续搜索。3时49分，伯克的第45驱逐舰分队终于完成集结，他们在战场北方发现了一艘大舰，于是以32节高速绕过去查看。那正是被打残的川内号，该舰已经倾斜15度，舰尾沉入水中，毫无抵抗能力。伯克发现手脚不灵的五月雨号和白露号正在川内北边警戒，他打算追过去攻击这两艘日舰。但就在同时，第46驱逐舰分队也从南边赶来助战，该分队的“斯宾思”号和“肯沃思”号在3时28分向川内号发射了8枚鱼雷，日舰被命中2雷，但仍未沉没。而第46分队继续北上时刚好和白露、五月雨混到一起，两个方向的美舰都无法射击，而两艘日舰却机警地从中央避过炮火，悄悄溜走了。

到这时为止，残留在战场上的日舰只剩下了处于弥留状态的川内号和被妙高号撞伤的初风号。由于“斯宾思”号燃



料已经不足，结果川内号的任务被交给了伯克的第45分队。4时整，该舰被一通5英寸炮弹送入海底，舰长庄司喜一郎大佐以下185人随舰同沉。先期撤走的白露号和五月雨号救走了100多名幸存者，不过伊集院少将和另外200多人还在水里泡着。

大森在返回拉包尔途中召唤吕-104号潜艇南下救助，该艇在3日下午又捞出了75名幸存者，包括伊集院松治（*俗话说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此公在半年后还是随乘坐的壹岐号海防舰被美国潜艇送下了海底*），于5日返回拉包尔。加上利用救生筏和木片划水游到布干维尔岛上的100多人，川内号的幸存者总数达到311人，比此前的神通号总算略强。不过伯克随后还继续追击正在燃烧的初风号，该舰在5时38分沉没，舰长以下164人无一幸免。而当梅里尔在11月2日5时前后下令重新集队时，天边已经微微发亮了。

神奇的是，大森仙太郎所担忧的“美国轰炸机”在11月2日天亮后根本没有出现，真正飞进奥古斯塔皇后湾的倒是从拉包尔赶来的89架零战和18架九九式舰爆——古贺大将的“吕号作战”终于开始了。由于TF39已经得到预警，日机只有2枚250公斤炸弹打在“蒙彼利埃”号的右舷飞机弹

库拉湾海战中沉没的新月号和参加奥古斯塔皇后湾海战的若月号属于1943年完工的乙型驱逐舰（防空舰），标准排水量2710吨，航速33节，安装8门100mm高炮、4门25mm机炮和4具610mm鱼雷发射管，除无装甲外尺寸和吨位已与夕张号接近，因此经常被美舰误认为轻巡洋舰。图为同型首舰秋月号，1942年10月25日曾在瓜岛海面被美机炸伤



拒绝任何商业用途与倒卖传播 仅供二战研究群友情扫描



奥古斯塔皇后湾海战中被日军氧气鱼雷重创的“福特”号（DD-511）。属“弗莱彻”级，完工于1942年底，标准排水量2050吨，航速35节，安装5门5英寸主炮、10门40mm机炮、7门20mm机炮和10具21英寸鱼雷发射管。科曼多尔海战中受损的“贝利”号与其为同型

射器上，重伤1人，其余美舰无一受损；正在驶向滩头的运输船有1艘被炸弹近失，造成2死5伤。而美舰以雷达指引使用VT（无线电近炸）信管炮弹的5英寸高炮进行还击，日军损失6架舰爆，在攻击一小时后匆匆撤离。被炸掉了舰尾的“福特”号由拖船协助，于4日清晨返回佛罗里达岛泊地。

奥古斯塔皇后湾海战是一场难言精彩的遭遇战。TF39当晚发射的52枚鱼雷只有2枚命中目标——都是打在川内号这个死靶上，日舰在战斗之初被美舰命中的6英寸炮弹也不超过15发（川内号4-5发，妙高号1-2发，羽黑号6发但其中4发未爆）；而大森的20门8英寸舰炮只打中美舰5弹，88具610毫米鱼雷发射管射出的鱼雷更是只有1枚命中。尽管如此，梅里尔依然凭借果断、灵活的指挥和有效的机动，以1艘驱逐舰重伤，19人战死、26人受伤为代价，取得了击沉日军1艘轻巡洋舰、1艘驱逐舰，重创2艘驱逐舰，击毙日军近400人的战果。而大森仙太郎既未能重演三川军一在第一次所罗门海战时的奇迹，又没有找到一艘运输船，尽管他返回拉包尔后就报称“击沉美军巡洋舰7艘、驱逐舰12艘”，还是很快被调离了第一线，贬为海军水雷学校长。

以奥古斯塔皇后湾海战为开端，所罗门群岛战役迎来了最后的高潮。日美双方都调兵遣将，准备在布干维尔岛决一死战。11月3日，古贺峰一派第二舰队司令长官栗田健男中将率第4、第7、第8战队和第2水雷战队从特鲁克开往拉包尔，这支舰队包括6艘重巡洋舰、2艘轻巡洋舰和11艘驱逐舰，古贺计划在5日夜间派栗田舰队驶入奥古斯塔皇后湾，完成大森在1日晚上未能完成的任务。显然，单靠TF39的单薄兵力已经不足以抵御日本人的进攻了，而即将开始的吉尔伯特群岛登陆战又使得哈尔西手中没有多余的巡洋舰可用。南太平洋部队仅有的主力舰是谢尔曼少将指挥的“萨拉托加”号和“普林斯顿”号航母（TF38），哈尔西决定冒险派该部队驶近拉包尔，摧毁栗田的巡洋舰。

11月5日清晨，TF38在拉包尔东南230海里处放飞了97架的攻击队，在所罗门航空队配合下对拉包尔发动了突袭。猝不及防的栗田舰队有4艘重巡和1艘轻巡被炸成重伤，另有多舰不同程度受损，死130余人、伤190余人。52架日军飞机（其中8架属于从特鲁克调来的航母飞行队）在地面和空战中被击毁，而美机仅损失27架，其中10架为航母舰载机。追击美国航母的日军攻击机在当晚飞至布因海面，只击伤1艘步兵登陆艇。遍体鳞伤的栗田舰队在7日和8日陆续返回特鲁克抢修，而古贺和草鹿只能靠代价巨大的航空消耗战来威胁托罗基纳角的美军部队了。



奥古斯塔皇后湾海战后第二天（1943年11月2日），美国陆军侦察机在拉包尔港拍摄到的羽黑号，图中可见该舰前主桅上已经安装了21号电探。三天后，“萨拉托加”号和“普林斯顿”号对拉包尔发动了第一次空袭，日军4艘重巡和1艘轻巡被炸成重伤

11月6日深夜，草鹿派出由4艘驱逐舰组成的“东京快车”，利用美军也在向托罗基纳角运送第二梯队的机会，悄悄潜入奥古斯塔皇后湾，向布干维尔岛北岸运去了475名援军。另有2艘驱逐舰在稍早时将700名步兵和25吨物资偷运到了布干维尔岛以北的布卡岛。加之从拉包尔起飞遂行“吕号作战”的日军航母飞行队不断威胁布干维尔岛海面的美国舰队，哈尔西决定再度祭出釜底抽薪之计，彻底摧毁拉包尔的海空力量。为此，尼米兹将蒙哥马利少将的TG50.3大队（航母“埃塞克斯”号、“邦克山”号、“独立”号）补充给他，TG50.3的舰载机总数达235架，还得到TF38的支援；而草鹿的基地航空队和航母飞行队因为连日来伤亡惨重，可用飞机数已降至270架。

11月11日上午，TG50.3在拉包尔东南160海里处放飞了130架的攻击波（包括23架新型SB2C俯冲轰炸机）。由于TF38的攻击波在当天稍早已经冒雨攻击了码头，有所警觉的草鹿提前派出了67架零战（一说107架）对其进行拦截，不过美机还是成群涌入港内，对一切可见目标发起了长达3个小时略显凌乱的攻击。正在布兰奇湾装填鱼雷的驱逐舰凉波号被1枚454公斤炸弹直接命中，引爆了鱼雷发射管内的氧气鱼雷，凉波号断成两截、迅速沉没，舰长以下209人战死。

在这次空袭中，阿贺野号的舰尾被

1枚由TBF攻击机发射的鱼雷炸断，驱逐舰长波号则是中部中雷，均因友舰救援及时才幸免沉没。刚刚完成对水雷炸伤处的修复、回到拉包尔还不足一星期的夕张号又一次遇险，在码头边遭到美机的扫射，与驱逐舰浦风、海风一样受了轻伤。日军在空战中还损失11架零战（一说6架），与美军损失的总机数相当。而匆匆忙忙赶去追炸TG50.3的71架日军航母飞行队飞机则遭遇了127毫米、40毫米和20毫米高炮的“问候”，损失高达33架，却没有取得哪怕一个微不足道的战果（日军报称美军航母1艘中度损伤，1艘大火）。

从11月2日到11日，日美双方围绕布干维尔岛共展开了三次大规模海空战，东南方面舰队的主要水面舰艇几乎全部丧失战斗力；投入“吕号作战”的第1航空战队飞行队损失了52%的舰战、84%的舰爆、85%的舰攻和全部舰侦，可用飞机数从173架骤降到52架，363名飞行人员中有181人战死。

由于母舰飞行队的损失率已经超过70%，古贺峰一不得不在11月12日终止“吕号作战”，将一航战所部调回本土重建。第十一航空舰队的损失率与之相当，但只能得到一半左右的补充机。到1943年圣诞节，美军已控制布干维尔岛大部，完成了预想中的大型机场的建设。日军东南方面舰队的舰艇已不敢越过新爱尔兰岛南端的圣乔治角，拉包尔这个东南战线上最大的航空基地已经成为战争中的盲肠。

九、潜航猎杀

旧式轻巡的战时改装

进入1944年，联合舰队编制内以旧式轻巡为核心的部队只剩下第一舰队的第11水雷战队（龙田带3艘驱逐舰），第四舰队的第14战队（那珂、五十铃，长良为舰队直属），第五舰队的第21战队（多摩、木曾）、第1水雷战队（阿武隈带2个驱逐队），第八舰队的第3水雷战队（夕张带2个驱逐队）和西南方面舰队的第16战队（鬼怒、球磨、北上、大井）了。由于此时已经没有多少夜战的机会留给这些老舰，大部分旧式轻巡在1943年底的复旧改造中拆除了弹射器，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强化防空火力的改装。为平衡重量，大部分军舰的5号、7号主炮和弹射器均被拆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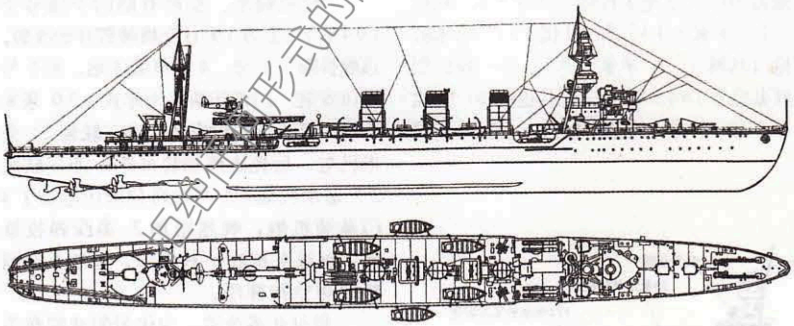
在没有实施“重雷装舰”改造的三艘球磨级巡洋舰当中，球磨号于1943年11月在新加坡入坞，拆除弹射器与5号主炮，加装2座三联装25毫米机炮，全舰25毫米机炮总数增加到10门（三联×2、双联×2），没有安装电探。多摩号则于1943年10至12月和1944年6月两次在横须贺进行改装。同属第21战队的木曾号则是在1943年4月、11月（舞鹤海军工厂）和1944年6月（横须贺海军工厂）三次接受改装，拆除5号、7号主炮及90cm探照灯，加装1部21号电探、1部22号电探、2部二式哨信仪、九六式110cm探照灯及1座双联127毫米高炮。醒目的是，该舰搭载的25毫米机炮总数增至38门（三联×4，双联×4，单装×18），此外还有13.2毫米机枪10挺（双联×1，单装×8）。球磨和木曾两舰因此成为旧式轻巡中防空火力较强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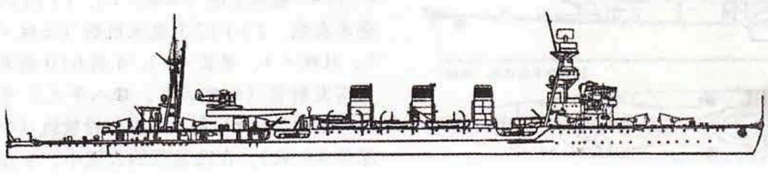


阿武隈号右舷的四联装九二式610mm鱼雷发射管，摄于后桅附近。本舰与神通、那珂是战前第一批换装四联装发射管的5500吨级轻巡

在七艘长良级巡洋舰中，长良号1943年8~10月在舞鹤加装了21号电探和新型110cm探照灯，吴式二号3型弹射器也更换为5型。这年12月5日，该舰刚刚和五十铃号一起护送陆军部队抵达夸贾林环礁，就遭到了一个月前空袭拉包尔的美军TF50特混舰队起飞的50余架TBF和SBD的空袭。长良号被多枚近失弹波及，弹射器上的水侦起火爆炸，近失弹的冲击波还引爆了1号发射管内未及丢弃的一枚八年式二号改2鱼雷，使该舰严重受损，有48名舰员在空袭和爆炸中死亡，112人受伤。长良号前部的兵员室严重进水，一台锅炉失灵，航速下降至26节。

五十铃号则在罗伊岛附近被3枚227公斤炸弹命中右舷后部，另有多发近失弹损伤，左舷外轴以外的3根推进轴全部失灵，舵轴也发生故障。该舰有20人战死，40人受伤。两舰在夸贾林岛由





左图：球磨号，1942年状态

左下图：多摩号，1943年状态。该舰于1943年11月在新加坡入坞，拆除弹射器与5号主炮，加装2座三联装25毫米机炮，全舰25毫米机炮总数增加到10门（三联×2，双联×2）；没有安装电探。多摩号则于1943年10至12月和1944年6月两次在横须贺进行改装，拆除5号、7号主炮及弹射器，加装1部21号对空电探、1部22号对海电探、2部二式哨信仪（用于夜间通讯的红外信号灯），1座双联127毫米高炮，5座三联装、2座双联和18门单管25毫米机炮，5挺13.2毫米机枪以及2部深弹投射机（带深弹18枚）

特设工作舰山霜丸进行了抢修，随后返回本土进行大规模改装。

长良号的改装于1944年1～4月在舞鹤海军工厂进行。该舰拆除了7号主炮、弹射器和旧式鱼雷发射管，在原7号炮位加装一门无防盾的双联八九式127毫米高炮，舰尾增加2条深弹投放轨（每道一次可布放6枚深弹）和4部三式深弹投射机，舰首加装九三式水中探信仪和水中听音机。依照原计划，该舰还应在后部两舷处加装2座新的四联装九二式鱼雷发射管，以发射九三式氧气鱼雷，但《舞鹤镇守府战时日志》中并未记载拆卸和换装鱼雷发射管的条目。据当事人回忆，长良号仅拆除了前部的1、2号发射管，同时对3、4号发射管的填充设备进行了改造，使其能发射相同口径的九三式鱼雷，所以长良号在改造后只剩下4具鱼雷发射管。该舰的改造工程直到1944年4月才告完成，当时标准排水量已增加到6050吨，公试吨位7197吨、航速为33.4节，随后重新编入中太平洋方面舰队。

在三菱横滨船厂改造为防空巡洋舰的五十铃号，摄于1944年9月，横滨外海全力公试中。该舰拆除了全部主炮，换装3座双联127mm高炮和38门25mm机炮，鱼雷发射装置更换为2座四联装样式，同时加装雷达和新型射控装置，成为新编第31战队（反潜扫讨部队）旗舰



五十铃号的改造则更加彻底。1944年5～8月，本舰在横滨入坞，改造为全新的防空巡洋舰。7门旧式140毫米主炮和弹射器全部拆除，原1号、5号、7号炮位分别安装一座无防盾的双联127毫米高炮。双联25毫米机炮和13.2毫米机枪改为数量更多的三联装25毫米机炮，最终全舰的25毫米机炮总数达到了38门（三联×11，单装×5）。旧式双联装鱼雷发射管也被拆去，两舷后部加装2座四联装九二式610毫米鱼雷发射管，可携带16枚氧气鱼雷。

由于武器装备和职能发生巨大变化，五十铃号的主桅和舰桥也重新进行了设置：主桅顶端的方位盘、射击指挥所和探照灯全部移除，改设带4.5米测距仪的九四式高射装置（高炮射控仪），位置较高；航海舰桥顶端改为对空见张所，拆除测距仪，其后安装一部21号电探；下部舰桥之前还增设了安装2座三联装25毫米机炮的平台。为加强对空预警力，1号、2号烟囱之间加装一具110cm探照灯，后桅高度也明显增加，上部安装1部22号对海电探和1部13号对空电探（亦有资料认为13号电探未及加装）。反潜武器方面，舰首下部安装1部93式2号水中听音机和1部93式3号水中探信仪，舰尾安装2条深弹布放轨道，其他改装还包括增设2部二式哨信仪和2只“小发”。由于排水量增加，改装后的航速降至33节。五十铃号直到1944年8月底才完成改装，随后出任新编第31战队（反潜扫讨部队）旗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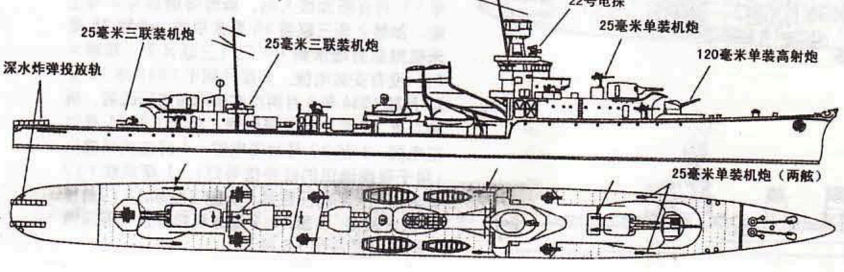
参加过科曼多尔海战的阿武隈号于1943年10～11月（横须贺海军工厂）、1944年3月（大凑海军工厂）和6～7月（横须贺厂）三度进行改装，拆除了5号、7号主炮及弹射器，加装1座双联127毫米高炮、1部深弹投射机、2部二式哨信仪和1部21号电探，近程对空火力则加强为30门25毫米机炮（三联×4，双联×2，单装×14）和10挺13.2毫米机枪（双联×1，单装×8）。另一艘同型舰鬼怒号1943年8～10月也在吴厂拆除了5号、7号主炮及弹射器，加装1座双联127毫米高炮、2座三联装25毫米高炮、2条深弹投放轨和1部21号电探，防空火力较几艘姊妹舰要薄弱一些。

三艘川内级巡洋舰中，那珂号在1942年4月被潜艇击伤后，于同年6月在舞鹤入坞改装。该舰拆除了5号主炮，在原炮位安装一门双联八九式127毫米高炮；旧式鱼雷发射管全部拆除，换装2座四联装九二式610毫米鱼雷发射管，可发射九三式鱼雷；全舰近程防空火力加强为14门25毫米机炮（三联×2，双联×4）和4挺13.2毫米机枪（四联×1），前桅顶部加装一部21号电探；弹射器得到保留，舰载机更换为一架九四式2号水侦。值得一提的是，为方便执行运补任务，该舰还在舰尾搭载了4艘10米长的“小发”小型登陆艇，每艘可搭载35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或3.3吨货物。该舰于1943年4月重新编入第14战队，以特鲁克为基地活动于中太平洋。战沉较早的川内、神通两舰则未及进行类似改装。

吨位较小、空间有限的夕张号于1943年12月19日在横须贺开始改装。该舰拆除了1号、4号单装主炮，原1号炮位安装一门带防盾的十年式120毫米高炮，原4号炮位安装1座三联装25毫米机炮，后桅底部加装另外2座三联装25毫米机炮，2号炮塔周围还增加了4门单装机炮；舰尾增加2条深弹投放轨，每道可布放6枚深弹，舰桥上部则新设防空指挥所。

经过此番改造，夕张号的武装变为4门140毫米主炮（双联×2）、1门120毫米高炮、25门25毫米机炮（三联×3，双联×4，单装×8）、4具610毫米鱼雷发射管（双联×2，带八年式2号改2鱼雷10枚）和2条深弹投放轨（带深弹36枚）。在改装后的公试中，夕张

1943年改装后的夕张号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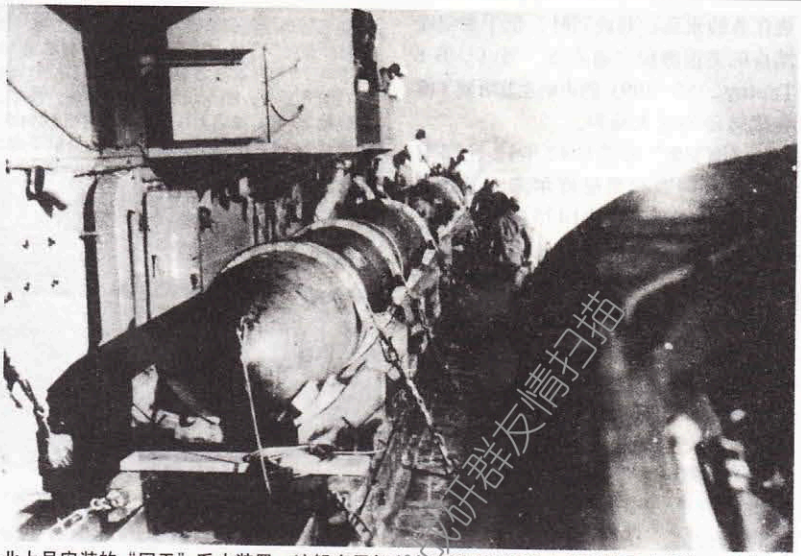
号的排水量上升到3500吨，航速则下降至32节。

至于糜费巨亿的“重雷装舰”北上号与大井号，由于海战模式的变化，自改装完成以来全无用武之地。中途岛海战中，两舰曾随“柱岛舰队”驶向战场，但因为作战中止，半途即告折返。瓜岛之战开始后，鉴于在舰队决战中使用“重雷装舰”的概率已是微乎其微，军令部再度别出心裁，决定利用两舰航速较快、雷击能力强的优势，将其改装成执行夜间“东京快车”任务的高速输送舰。

1942年8~9月，北上、大井先后在吴厂和佐世保厂接受改装，拆除两舷后部的4座四联装鱼雷发射装置、保留6座，加装2座三联装25毫米机炮，后甲板以系留方式搭载2－4只14.8米长的“大发”登陆艇（“大发”是“大发动机艇”的简称，海军通称“14米特型运货船”）。这种20吨小艇可以搭载70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或11吨货物，以8.5节速度航行50海里，还可搭载九五式轻型坦克，最适合向岛屿偷运人员物资。两舰的舰尾还加装了2条深弹布放轨，载深弹18枚。

1942年9、10月间，经过改造的北上、大井就将佐世保第4特别陆战队从横须贺运到了特鲁克、肖特兰岛和拉包尔。1942年11月，联合舰队解散第9战队，北上、大井改为直辖舰，负责掩护从中国运兵前往新几内亚前线的船队。1943年3月后，两舰又改为由西南方面舰队直辖舰，依旧执行运输与护航任务。

1943年6月23日，停泊于望加锡港的北上、大井与另两艘轻巡球磨、鬼怒遭到美国陆航第五航空队17架B－24轰炸机的空袭，被近失弹轻微擦伤。此时军令部希望进一步强化两舰的运输能力，遂于当年11月在新加坡对两舰进行第二次改造，将两舷前部的1－4号鱼雷发射装置也予以拆除，装回之前移走的7、8号发射装置，使全舰保留的鱼雷发射管数量控制在16具（四联×4）；剩余的4门140毫米主炮全部拆除，在原1号、2号炮位安装2座双联127毫米高炮，并加装10座三联装25毫米机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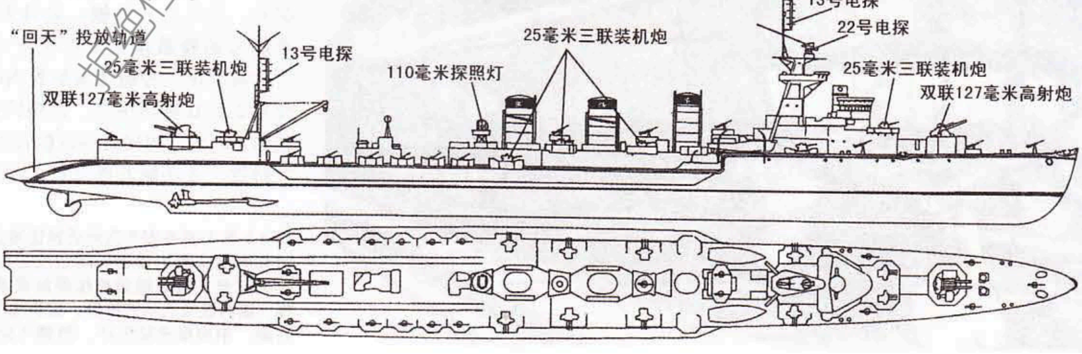
北上号安装的“回天”系止装置。该舰在尾部左右两侧嵌入通往上甲板的系止轨道，轨道末段为斜坡形状，每条轨道可系留4具“回天”1型。作战时松开固定的铰链，“回天”下方的滑车顺斜坡滑下舰尾，随后“回天”凭借自身的动力下潜、驶向目标发动攻击

北上和大井的舰桥和主桅也在同一时期进行了相应改造。动力方面，拆除了前部机舱内的2座蒸汽轮机、1号锅炉室内的2组锅炉以及1号烟囱，空出的部分设置可容300吨补给品的货舱和淡水舱，并在舰尾安装1部卸货用的30吨电动起重机（千岁级水机母舰改造为航母时的剩余物资）。

经过这次改造，两舰将成为主机功率40000马力（双轴）、航速29节的专用运输舰，除舰体内可载300吨补给品外，前后甲板还以露天方式系留4只“大发”及2只“小发”。但这项运输舰改造工事预计耗时达5个月之久，在战局紧张的情况下，西南方面舰队不能静待其成，所以大井、北上在新加坡只停留了一个多月，完成鱼雷发射管改装和上甲板的天幕、侧幕安装任务后就重回一线，编入第16战队。

原属第16战队的名取号在1942年12月底奉命运送第21特别根据地队的陆战队员前往新几内亚北部的霍兰迪亚，随后返回安汶岛基地休整。1943年1月6日，第24特别根据地队附属的友鹤号水雷艇（1934年“友鹤事件”的主角，后来捞起修复）在多博湾入口遭到美国陆军轰炸机的袭击，被命中2弹，姊妹舰初雁号紧急赶往战场救援。为掩护初雁号，名取号也在1月8日驶离拉姆巴塔岛前去救助。9日清晨，由于新抵达的特设炮舰万洋丸（2904吨）已经完成对友鹤号的拖曳，名取号先行朝安汶岛返航。当天上午9时38分（东京时间1138时），当该舰驶至安汶海岸18海里外时，舰长决定回收正在执行哨

改造为“回天”搭载舰的北上号



戒任务的水侦。与此同时，位于潜望镜深度的美国潜艇“遍罗鱼”号（USS Tautog，SS-199）的声呐也监听到了螺旋桨转动的巨大噪声。

“遍罗鱼”号在1942年12月15日驶离澳大利亚弗里曼特尔港，开始其第五次战斗巡航。这艘1475吨的“鼓鱼”级潜艇此前的履历相当显赫——珍珠港事件当天，系泊在海军船坞附近的“遍罗鱼”号就用高射机枪击落了一架日军九七式舰攻；珊瑚海海战中，该艇又曾追击受伤的日本航母翔鹤号，并击沉处于浮起状态的日军潜艇伊－28号。

“遍罗鱼”号第五次巡航开始时，担任艇长的正是珍珠港事件那一天该舰的值星官巴尼·西格拉夫少校（W. B. Sieglaff），他命令潜艇首先绕过帝汶岛西北海岸，侦察瓦英阿普港和松巴岛（Sumba，今属印尼）的日军布防情况，随后驶往安汶岛附近寻找目标。

初次担任艇长的西格拉夫急于事功，因为新装的搜索雷达出现故障，他一度下令潜艇在傍晚时分即行上浮、目视搜索目标，为此还遭到了日军巡逻机的攻击。不过“遍罗鱼”号的运气实在不佳，出航二十来天只击沉了1艘不到1000吨的运粮船，倒是两次遭到日军驱潜艇的追逐。名取号出现前，这艘潜艇已经在安汶附近无所事事有四天整了。

当三个烟囱的名取号出现在“遍罗鱼”号左前方80度方位时，西格拉夫立即兴奋起来。此时两舰相距约3000码，9时41分，“遍罗鱼”号以艏部发射管朝日舰后部齐射了2枚鱼雷；两分钟后，声呐监听到一声沉闷的爆炸，日舰



击伤名取号的美国潜艇“遍罗鱼”号。属“鼓鱼”级，1940年1月在电船公司格罗顿船厂下水，同年7月竣工。排水量1499/2408吨，水面航速20.4节，水下8.75节，续航力11000海里/10节（水上），装备10具21英寸鱼雷发射管（前6后4）和1门3英寸甲板炮。整个二战期间，“遍罗鱼”号共击沉日军舰船26艘，排名美军第1；总吨位72606吨，排名第11，因此获得海军单位嘉奖令。1947年该艇退役封存，1960年出售解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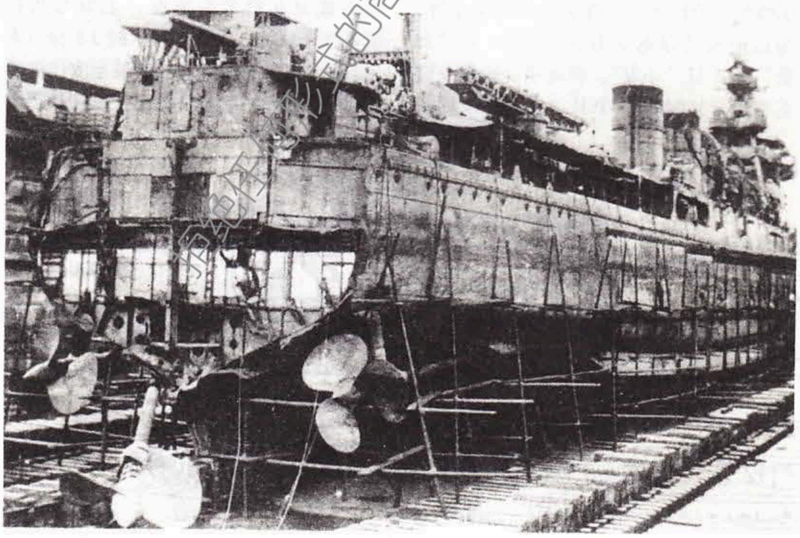
的螺旋桨转动声消失了。但当西格拉夫升起潜望镜视察战果时，他疑惑地发现日舰仍在左转，试图以10节低速脱离战场。9时48分，“遍罗鱼”号再度齐射了2枚鱼雷，未能命中。3分钟后，名取号开始以全部7门主炮射击“遍罗鱼”号，在极短时间内就打出4次齐射；声呐兵还监听到深水炸弹的爆炸声和日舰螺旋桨重新转动的声音，不过驱动轴数目由4根减少到了2根。西格拉夫判定第一次雷击已经使日舰丧失一半动力，他无意继续纠缠，立即潜航规避。

幸运之神的确对“遍罗鱼”号睁开了一只眼——但仅仅是一只：该舰第一次齐射的2枚鱼雷全部命中名取号，但无一爆炸。名取号的舰尾被巨大的震动撕裂，舰楼之后的20米舰体几乎完全折断，舵机全毁，内侧的2根推进轴也悉数损毁：这正是“遍罗鱼”号的声呐兵监听到螺旋桨数减少一半的原因。7名舰员随断裂的舰尾沉没，12人受伤。

名取号此时的舰长是以顽强著称的炮术专家猪口敏平大佐（后出任武藏号战列舰舰长），他断定敌潜艇仍在附近，下令齐射主炮，并命令仍在空中盘旋的水侦向海中投放深水炸弹。一个小时内，九四式水侦几次对“遍罗鱼”号所在的海域投下深弹，虽无一命中，却也使这艘潜艇不得不脱离战场。名取号这才得以蹒跚驶往安汶岛，等待第102工作部的技术人员从泗水赶来抢修。

1月20日，植田弘之介大佐在安汶接替猪口敏平出任名取号舰长，此时该舰的战损已抢修完毕，可以靠人力操舵、双轴推进。但一天之后，美国陆航第319中队的B-24轰炸机就对锚泊中的名取号发动了空袭，一枚227公斤炸弹在右舷7-10米外的水下爆炸，双层舰底部分进水，2号锅炉室严重受损，20人战死。植田舰长只得仓皇下令起航。名取号在初雁号和苍鹰号布网舰的护航下驶向望加锡，于23日清晨接近了萨拉扎海峡（Salajar Strait）。

“遍罗鱼”号自1月9日击伤名取号之后，于22日深夜在萨拉扎海峡击沉了满载航空汽油的运输船八洲丸（1873吨）。当名取号一行驶至海峡以东5海里外时，“遍罗鱼”号刚好位于日舰前方，舰尾直对日舰。是日天气晴好，名取号的舰载水侦正在空中盘旋，由于“遍罗鱼”号艇尾发射管内的鱼雷已经在22日夜间用完，西格拉夫下令潜航到20米，掉转航向以艇首正对日舰。9时许，先头舰苍鹰号自“遍罗鱼”号



1943年1月在安汶岛附近担任海上警戒任务时遭到美军潜艇雷击和航空攻击后失去舰艉的名取号，该舰随后前往新加坡进行应急修理，图为该舰入坞的情景。舰艉在甲板室部位切断，中央推进轴损坏，舷侧可见消磁电路

上方通过；8 分钟后，潜艇向名取号齐射了剩余的全部4 枚鱼雷，但日舰已经通过最佳攻击位置，鱼雷无一命中。名取号随即以后主炮向该艇射击，九四式水侦投下了2 枚炸弹，苍鹰号也连续投放9 枚深弹。“遍罗鱼”号紧急下潜、向南返航，名取号则于23 日驶入望加锡港。

在望加锡，第102 工作部对名取号的尾部进行了加固，军舰随后于27 日转往新加坡实里达基地进行进一步维修。在英军留下的“乔治六世”干船坞中，佐世保工厂的技术人员为该舰安装了一个4 米长的临时舰尾和舵机，修补了水线以下的伤损，名取号这才得以在5月24 日向本土返航。6月7日，该舰在舞鹤入坞，除装上新的舰尾和推进轴、舵机外，还拆除5 号、7 号主炮和弹射器，在原7 号炮位加装一座双联127 毫米高炮；舰桥顶端加装1 部21 号电探，近程防空火力也加强为14 门25 毫米机炮（三联×2，双联×2，单装×4）和4 挺13.2 毫米机枪，舰首还加装了水中听音机和探信仪，原有的鱼雷发射管则予以保留。由于改装工程量较大，该舰直到1944 年4 月下旬才重新编入作战序列。

来自水下和空中的绞杀

在5500 吨级轻巡中，完工较早的球磨号在太平洋战争中是最不活跃的角色之一。该舰自1942 年以来一直在荷属东印度群岛活动，执行运输和训练任务，与其对抗的是1942 年初被南云打得落荒而逃的英国东方舰队。由于日军放弃进攻锡兰，这支舰队以亭可马里为基地，继续对1000 海里外的缅甸港口和苏门答腊进行袭扰。萨默维尔上将的班底包括原东方舰队的老式R 型战列舰和1943 年调来的护航航母，1944 年1 月又得到航母“卓越”号，战列巡洋舰“声望”号，战列舰“伊丽莎白女王”号及“勇士”号的增援。

由于盟军计划在1944 年中发动印度洋反攻，自当年1 月起，萨默维尔就派第2 潜艇支队的12 艘潜艇（8 艘S 级、4 艘T 级）在日军主要基地新加坡附近进行巡航，捕捉战机。英军潜艇大多是在“海军假期”期间建造，吨位和续航力较小，鱼雷发射管全在艇首，综合性能不如美军潜艇，但在补充了一批调自大西洋战区的潜艇指挥官后，保持了较高的出动率。日军西南方面舰队不得不出动基地航空队与水面舰艇协同反潜。

1290 吨的英国潜艇“塔利霍”号（HMS Tally–Ho，P–317）在1943 年4 月才正式服役，早先在挪威外海和比斯开湾执行过两次巡航任务。同年8 月，舰长本宁顿少校（Leslie W. A. Bennington）率该艇自直布罗陀出发，经阿尔及尔、塞得港和亚丁抵达科伦坡，随后开始巡弋马六甲海峡。1943 年11 月的一次战斗中，“塔利霍”号击伤了活跃于印度洋的德国潜艇U–178 号，还击沉日本商船木曾川丸（1914 吨）。圣诞节过后，该艇开始第四次战斗巡航，依然在槟榔屿一带活动。

球磨号于1943 年11 月结束改装后，一直在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间执行运输任务。1944 年1 月第一周，该舰与重巡洋舰青叶号、足柄号共同完成了从槟榔屿向缅甸拷老岛（Mergui）运输援军的任务，随后单舰返回槟榔屿，参加1 月9 日开始的第551、第732 航空队联合反潜操演。

11 日上午，球磨号和驱逐舰浦波号驶离槟榔屿，在一架零式水侦掩护下朝西北海面航进。当两舰驶离海岸线约10 海里、以通常队形警戒航行时，恰好被位于潜望镜深度的“塔利霍”号捕捉到。此时潜艇位于日舰右舷后方约2000 米处，本宁顿艇长观察到三个烟囱、目标较大的球磨号，决定以艇艏全部发射管对其实施齐射。在1300 米距离上，7 枚鱼雷（另有一雷故障）向直线航行中的日舰直奔过去。

11 时45 分，球磨号后桅上的了望哨突然发现右舷有多条雷迹正在接近，杉野舰长立即下令转向规避。球磨号笨拙地绕起了圈子，躲过了数道雷迹，但仍有两雷准确命中舰楼之后的部分，与名取号一年前在安汶岛被鱼雷击中的位置几乎完全一致。唯一不同的是，英国人的鱼雷爆炸了——球磨号的舰楼立即燃起大火，舰尾开始下沉。三分钟之内，内部涌入的海水就使军舰右倾达到15 度。爆炸的冲击波震断了所有的推进轴和舵柄，海水又顺着推进轴舱灌入后部机舱。中雷后7 分钟，军舰已经丧失动力，右倾增加到25 度。由于舰尾进水太快，水压即将引爆后甲板系留的深水炸弹，杉野舰长下令官兵立即弃舰。“塔利霍”号则借机逃之夭夭，朝亭可马里基地返航。

11 时57 分，球磨号的舰尾传来巨大的爆炸声，军舰瞬间向右倾覆，随后迅速没入水中。其沉没的位置，在槟榔屿西北10 海里外，北纬5 度26 分、东经99 度52 分。由于下沉速度过快，有138 名官兵随舰战死，包括舰长在内的其余300 多人则被浦波号捞起。整整六十年后，当澳大利亚潜水员找到这条舰尾折断（这验证了5500 吨级轻巡的舰尾存在结构缺陷）、烟囱倾颓的军舰时，它正躺在47 米深的海底，已经变成了一座巨大的人工渔礁。

球磨号的末代舰长杉野修一大佐毕业于海兵46 期，是日俄战争中的旅顺口“肉弹”杉野孙七兵曹长[注]的长子。对球磨号战沉一事，他至少要负指挥失当（出港后未立即采用Z 字反潜航路）、下令弃舰太迟两项责任。但此时日军一等舰指挥官数量已经不足，杉野在球磨号沉没后不降反升，当上了大鹰号护航航母的舰长。但大鹰号在同年8 月也被潜艇击沉，杉野再度生还，这才坐上了冷板凳。不过到了日本战败前的1945 年7 月底，此人又被启用，成为长门号战列舰的末代舰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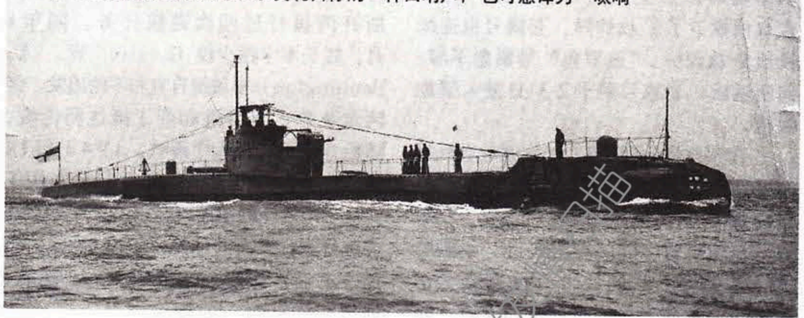
继球磨号之后，北上号也被另一艘英国潜艇“圣殿骑士”号（HMS Templar，P–316）盯上。1944 年1 月27 日，这艘巡弋于马六甲海峡的潜艇在槟榔屿西南遭遇刚刚从布莱尔港返航的北上号，如法炮制地对其齐射8 枚鱼雷。与名取号和球磨号一样，北上号的舰尾在连中两发鱼雷后也几乎折断，后机舱进水停车，但尚余一根推进轴可用。由于舰尾的四联装鱼雷发射管在此前的改装中已经拆除，没有发生弹药殉爆，只有12 名舰员在爆炸中死亡。控制住进水后，伴航的鬼怒号将北上号拖往新加坡，由第101 工作部对舰尾进行加固。7 月2 日，该舰与同样带伤的特设给油舰极东丸一起朝本土返航，随后在佐世保海军工厂入坞进行

【注】杉野孙七（1867–1904）在日俄开战时是朝日号战列舰上的一等兵曹，与水雷长广濑武夫关系很好。广濑指挥阻塞船福井丸对旅顺口进行第二次闭塞时，杉野是其随员，负责引爆底舱的炸药。福井丸乘员撤退时，杉野失踪，广濑在舱中遍寻不着，换乘舢板时被炮弹炸死。广濑武夫后来成为文部省和海军宣传部门着力包装的“军神”，杉野孙七于是也鸡犬升天，也成为一个小名人。在日本国铁东京万世桥驿前立有他和广濑两人的铜像（二战后拆除）。不过，像许多下落不明的历史人物一样，一直有传闻认为杉野尚在人世。1946 年底的《朝日新闻》甚至宣称杉野在福井丸沉没后被旅顺的中国人救起，回国后却发现自己已经成为“军神”，无法恢复身份，于是隐姓埋名回到满洲，后供职于甘粕正彦领导的特务机关。按照目击者的回忆，1946 年杉野曾现身于葫芦岛附近的锦西日俘收容所，随后再度下落不明

新一轮改装。

饱受潜艇肆虐的还不止这些老旧的5500吨级轻巡。1944年2月16日凌晨，新型轻巡洋舰阿贺野号也在特鲁克以北遭到美军潜艇偷袭，连中2枚鱼雷、丧失动力。伴航的驱逐舰追风号拖曳该舰未能成功，只得向特鲁克基地求救。而古贺峰一因为担心美军会空袭特鲁克这个“太平洋上的直布罗陀”，早在2月10日就把舰队主力撤往帛琉，16日在港的大舰只有刚刚从波纳佩岛返航的那珂号和另一艘轻巡洋舰香取号（预定于17日清晨护送2艘运输船返回本土）。那珂号的末泽庆政舰长上任才一个月，当然知道无空中掩护贸然出航的风险——特鲁克机场仅有180架海军飞机和少量补充机，不可能为该舰提供护航。但军情紧急，那珂号还是在16日傍晚出港向北驶去。

击沉球磨号的英国潜艇“塔利霍”号，属T级潜艇，1942年12月在维克斯－阿姆斯特朗船厂下水，1943年4月竣工。排水量1290/1560吨，水面航速15.5节，水下9节，续航力4500海里/11节（水上），装备11具21英寸鱼雷发射管（前8后3）和1门4英寸甲板炮。除球磨号外，该艇还曾击沉德国潜艇UIT－23及10余艘其他舰船，二战后退役封存至1967年解体。Tally-ho是英国人猎狐时表示发现目标的一种口哨声，也可意译为“呔嗬”



末泽和古贺都没有想到，阿贺野号遭袭并非偶然事件，而是尼米兹上将策划已久的“冰雹”作战（Operation Hailstone）的一部分。由于中太平洋美军已决定发起进攻埃尼威托克岛的“法警”战役，为防止日军利用特鲁克发动侧翼反击，尼米兹决定在2月17日对该地发动摧毁性空袭。米切尔少将指挥的TF58特混舰队所属5艘航母将横扫特鲁克礁湖内的舰船和航空设施，斯普鲁恩斯上将指挥的新型战列舰“衣阿华”号、“新泽西”号则以炮火封锁礁湖出口，防止日舰逃窜。太平洋舰队潜艇部队的10艘潜艇也在加罗林群岛周边巡弋，伺机发动攻击。攻击阿贺野号的正是这10艘潜艇中的一艘。

那珂号出港后不到10小时，米切尔的“冰雹”就降下来了——清晨5时，从5艘航母上起飞的200余架舰载机将特鲁克炸的一片狼藉，270余架日本飞机在地面被炸毁，堆积如山的航空燃料、炸弹和物资悉遭破坏。当天凌晨驶往横须贺的香取号和1艘运输船、1艘驱逐舰被斯普鲁恩斯的战列舰轰沉，另有30艘运输船被炸沉。

至于倒霉的阿贺野号，该舰在16日午夜过后就沉入了海底，而前去救援的那珂号还在半路上（阿贺野号沉没处距特鲁克约160海里）。得到消息的末次大感沮丧，只得下令返航。17日上午6时许，那珂号驶近特鲁克环礁，准备经北水道入港。此时美机的空袭已经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末次发现大批美机正在附近盘旋，立即掉头离开北水道，企图撤到西面的开阔水域规避空袭。但该舰西行约35海里后，即被“邦克山”号航母的TBF攻击机盯上，攻击随即开始。

7时开始的第一波攻击来自“邦克山”号的20架TBF，这群飞机仅携带227公斤炸弹，且投弹无一命中；9时许，“邦克山”号的10架SB2C俯冲轰炸机又进行了一轮俯冲投弹，因为那珂号机动灵敏，同样没有命中。真正的终结者则是鱼雷——12时过后，“考彭斯”号航母的4架TBF（各带一枚鱼雷）和“邦克山”号的另外6架SB2C发起第三轮攻击，一枚航空鱼雷命中那珂号右舷下方，几乎与此同时，一枚270公斤炸弹也直接砸中舰桥左侧，当场爆炸。

冥冥之中仿佛有天意。1927年美保关事件发生时，那珂号正是被苇号从右舷撞入，整个舰首严重损毁；这一次，当舰桥左右侧同时被命中时，脆弱的舰首再一次断裂了。几分钟之内，那珂号舰桥之前的部分完全被撕开，军舰断成了两截，漂浮在海面上；失去首端的船体虽然还漂浮在海面上，但已无法操纵。中甲板从舰桥开始燃起大火，主机随后也告停车。

下午14时，第四波4架SB2C再度“光顾”那珂号，断裂的舰首被一枚直接命中的炸弹送入海底。末次下令尚在后半截船体上的官兵也立即离舰。一小时后，那珂号消失在了北纬7度15分、东经151度15分海面，有240人在战斗中毙命，包括末次舰长在内的210人侥幸生还。加上这天凌晨沉没的阿贺野号和下午被击沉的香取号，日本帝国海军在1944年2月17日这一天里就损失了3艘轻巡洋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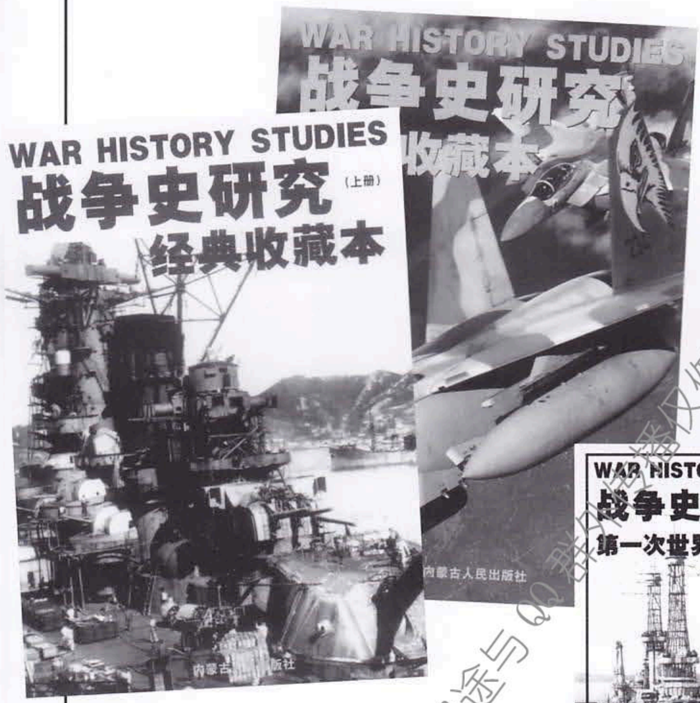
（待续）

1944年2月16日被美军潜艇击中的阿贺野号巡洋舰



书讯

著名军事书刊制作人陈朴先生新著年内即将上市，全书约300页，内容新颖详尽，视角独特深入，有极高的研读和收藏价值。原《巡航者》杂志订阅读者将免费获赠此书，不必重复购买。本书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发行，读者购买时敬请留意出版社名，谨防假冒。更多详情请咨询发行部（010-88561472）及邮购部（010-88560080）。发行人：赵琦、杨洁



《战争史研究》经典收藏版已于2011年1月上市。本书收集《战争史研究》2003-2010年刊登的大量精品文章，全书分上下两册，共640页，定价80元。随书附赠资料手册《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列舰》及精美赠品。详情敬请垂询本刊发行部（010-88561472）







战争史研究2011年增刊《帝国的碎片》（暂定名）即将上市，全书320页，定价38元。具体信息请垂询发行部（010-88561472）及邮购部（010-88560080）。发行人：赵琦、杨洁

拒绝任何形式的商业用途与QQ群外传播仅作个人收藏QQ群友情扫描

责任编辑：哈斯朝鲁
封面设计：张长



这张图是1935年美国财政部为新版1美元设计的背面图案。其左侧为美国大国玺的正面，即美国国徽。国徽中央是一只白头海雕，象征力量、勇气、自由和不朽。白头海雕的双翅展开（纹章学里称为"展现"）。左右雕爪分别抓着象征和平和武力的橄榄枝和箭。雕头对着橄榄枝（早期的美国国徽中鹰头是对着箭的，象征"战争和武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身为共济会会员的哈里·杜鲁门总统在1945年11月25日发布总统令，改变鹰头的朝向，使其面对着橄榄枝，象征"时刻准备着献身和平"。在美国总统纹章中，鹰头是对着箭的）。鹰嘴中叼着的绶带上写着拉丁文格言"E Pluribus Unum"（合众为一）。雕头上方是象征拥有主权的新生国家的"光环"，蓝色背景里镶着象征美国最初13个州的13颗五角星。右侧的图案是美国大国玺的背面，主体是一座未完工的金字塔，象征"未完成的功业"在金字塔的底部用罗马数字刻着1776年，也就是美国独立宣言的发表年份。金字塔的上方上面是共济会的标志之一，洞察一切的上帝的"全能之眼"（普罗维登斯之眼）。金字塔的上方和下方分别写着两句拉丁文铭文，Annuit Coeptis，意思是某人（推测可能是普罗维登斯或上帝）"认可我们开始"，Novus Ordo Saeclorum，这句话引自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诗，意思是"时代的新秩序"。这张图样的右下角是当时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签名，他示意将金字塔与鹰的位置对调。

"犹太－共济会"阴谋论者认为美国国玺的图案设计大有深意，金字塔代表伪救世主"伪弥赛亚"的国度"大以色列"（Eretz Israel）；金字塔上面的三角形是露西弗的标志，当中的眼睛是古埃及的荷鲁斯之眼，"Novus Ordo Saeclorum"（时代的新秩序）象征伪弥赛亚的降临，鹰象征古以色列的但部落，即即将出现"伪弥赛亚"的部落，鹰爪中的十三支箭象征"古以色列的十三个部落"（实际上古代犹太人只有十二部落）。一美元背面的面值"ONE"上面有"In God We Trust"（我们信仰上帝）的字样，加起来就是"In One God We Trust"（我们只信仰唯一神，即伪弥赛亚）。最后，把金字塔颠倒过来形成一个六角星的图案，其六个顶点中的五个正好指着MASON（共济会）五个字母（见右图）



拒绝任何形式的商业用途与QQ群外传播仅供个人收藏电战研究情扫描

ISBN 7-204-04651-X
9 787204 046515 >
ISBN 7-204-04651-X
K·391 定价：15.00元